

拉奧二氏著

政治經濟學

(第八版)

陶達譯



1935年9月出版

J. Lapidus

拉比杜斯 奧斯特羅維采諾夫 合著

K. Astronitjanov

政治經濟學

(第八版)

陶達譯

因書老看

①

字可暫欠分租 (第一版)

從中抽一本出來購書和
改。

1936.4.10 借于蘇聯社
十歲村下 禮師 簽一七
由山老 簽
費 2.05

葉印
人

1935

李達先生序

拉比杜斯等所著政治經濟學第八版，現在由陶達君直接從俄文譯成中文出版了，這在沉寂中的目前中國出版界，可說是值得注意的工作。

這本書是一九二五年以後蘇俄經濟學論戰過程中的產物。那時候，資本論的精神，被機械唯物論與少數派觀念說所曲解，唯有這本政治經濟學，能夠克服了左右翼的曲解，闡明了資本論的真精神。所以這本書在蘇俄經濟學界是一部首屈一指而傳播很廣的著作。可是這部書，截至第五版為止，據著者在第六版的序文中所述，還沒有完全肅清魯平派的觀念論的見解，直到第六版纔比較徹底的排除了機械論的謬誤與右翼機會主義的主張。

第六版是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與蘇俄踏入社會主義階段的事實相適應，經濟學領域中也克服了左右翼的偏向了。但在這第六版出世以後，蘇俄學界莫不集中注意來檢討這書的內容。結果，又發見了這書還有許多不正確不完全的地方，如「馬克思主義諸問題」上所指摘的。

第六版中的缺點，已經在第七版之中完全改正了。現在的第八版，與第七版又大不相同，其不相同的地方，陶達君在譯序中已經大略的指明了，我不贅述。

社會科學之在蘇俄，恰是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水準的寫照，恰是蘇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與功助的表現。所以蘇俄的社會科學，隨着社會主義經濟說發展，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這一層，單就拉

比杜斯等所著的政治經濟學之一再改訂增補便可以窺知了。返觀我們中國的出版界，却呈現一種沉寂鬱悶的情形，這也許是沉寂鬱悶的社會環境的反映罷。追求真理而自強不息的人們，都應自己奮發的向前邁進啊！

李 達 一九三五，九，一二。

譯者小引

本書的著者——拉比杜斯與奧斯特羅維采諾夫，是最近幾年來蘇聯的有名經濟學教授。他們之所以成名，是由於一九二八年初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日譯本改譯為政治經濟學教程，本譯文則仍用原名——之著述。把蘇聯的經濟法則加進政治經濟學中去研究的，在蘇聯——在世界的經濟學界中，實創始於拉奧二氏的這部政治經濟學。是書第一版問世以後，即風行一時，——現已共出八版，銷售四十萬部——在蘇聯各大學中極廣泛地採用，且規定為投考馬，昂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必讀的課本；在外國即有中，日，德，英諸國文字的譯本。

此書，雖被極廣大地採用，但每版必多所訂正與增刪，其中以第五，六，七，八諸版的改動為最甚：第五版，曾於書末，添上經濟學對象與方法一章，第六版，則體例上根本變革，把商品——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與蘇聯經濟的法則分開研究——李達先生等的譯文，係上冊；是書分為二冊裝訂的則自第六版起——；第七版，仍把體例復原，而着重於機械論，觀念論之曲解的批判，其中有四節則出自尤爾可夫的手筆。

至於第八版，則與以前諸版更多不同之處：

1. 以前諸版，大體上均主張以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為主要對象，以蘇聯經濟法則之研究為附，而第八版則主張以『各種經濟形式之發生發展和末落的諸法則，某一經濟形式不可避免地為別的經濟形式所代替的法則』為對象的廣義經濟學。但這種主張與卜格唐諾夫等的廣義經濟學的見解不同，因後者把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機械

地轉嫁到別的經濟形式上去，甚至轉嫁到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上去，致使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永久化，致使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範疇成爲超歷史的，非社會的範疇；前者則主張每種經濟形式各有其獨立的法則；而——加以研討。

2. 以前諸版，除序論外，均由商品開始，而第八版則於商品之前，加入前於資本主義結構一篇，其中包含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制與封建主義三章。這種新材料的加入，譯者認爲對於我們中國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因在我國，封建勢力仍極佔優勢，尤其在農業經濟是如此，所以如光應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以研究封建勢力仍甚盛的吾國經濟，不失之機械論即失之不切實際。然於經濟理論上來研究在封建主義下的經濟形式之發生發展與末落之獨立的法則，則以譯者底見聞之膚淺，似乎尚無專書；有，也自拉比杜斯等底政治經濟學之第八版始。

3. 在體系上也更爲嚴正而清晰。在第七版，往往於每一問題之研究時，加以敘述和批判布爾喬亞或社會——法西斯的理論，例如，在研究剩餘價值率時，加以述說和批判，師尼爾的節儉論；在說到價值與價格時，加以敘述和批判效用論等等，且重複的地方也復不少——當然，溫健公先生等譯文的錯誤，（如第七章，第八章等章題，第二十三節等節題之錯）與遺漏（如第二分冊，九五，一〇二，一一六諸頁）或因日譯本（溫先生等是據日譯本重譯的）錯誤，而隨入『迷途』或因日譯本中有許多『×』『××』，而『暗中摸索』所以一定免不了錯誤』的，當然，不在內——而第八版，則體系更爲嚴正，既無重複之弊，而對於本體系以外的，對於其他『學派』或『見解』則皆另立節目，加以敘述和批判；綱目清晰更便於研讀與翻閱。

4. 第八版，比起以前諸版來，更着重於實際問題與實際材料，例

如：a. 由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之私的佔有形態間之矛盾出發，闡明在企業的內部的組織化與全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間的矛盾，在生產增大與大眾消費之有限性間的矛盾，由此證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瓦解與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必然性，這是為第六版以前諸版所不曾做到，第七版想做仍未達到目的，而於第八版中才完成的工作。b. 單本位制與複本位制，金幣之鑄造制度等節之加入，皆為第七版以前諸版所沒有的。c. 在第七版，有些失掉時間性的材料（如說到我國的貨幣落價等），於第八版中均加修正與刪改了。d. 在第七版以前諸版，僅於理論上說明蘇聯經濟法則與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為什麼不同，而於第八版且根據實際材料與數字證明其如何不同；如八十五節，九十七節，一〇一節等皆是。

5. 在第七版中雖已注意批判機械論與觀念論之錯誤，但係片斷的批判，而第八版，則有系統地予機械論與觀念論曲解之分析與批判，且指出其錯誤的根源，及其對於實際問題之關係和社會背景。

6. 第八版於體系上，大致均根據資本論的順序，且復妥當地盡可能引証資本論的原文，及馬，昂，伊，俾的著作，以資佐証。故第八版可謂深研資本論，及馬，昂，伊，俾一般經濟學說之最正確最重要的唯一入門書。

以上所說，不過是第八版的特徵之最著者，其他特徵尚多，都可以於第八版的目錄中看出，不必多舉。此刻，還應指出一個為以前幾版所沒有而為第八版所獨具的術語——「社會—民主派」或「社會—民主主義派」。按照這個術語的內容，與第七版的「社會法西斯」相當，因二者皆係指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家，如考茨基，費爾希丁等等，說明他們底「經濟理論」，如何曲解馬，昂的學說，且剖析其曲解的意

義與目的。這個新述語的所以出現，與『社會——法西斯』一術語的所以不用，在著者方面雖然不曾說明其理由，但如我們稍一注意到近三年來德國政權的轉變，及因此而發生的種種影響，也不難索解此中的原因的。

上面曾說過，第七版，有四節是出自尤爾可夫的手筆的，而第八版，則純係拉奧二氏的著作，於行文方面自然較為統一與流暢了。



譯文係根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八版上冊——下冊正在繼續譯述不久當可印行，以完全對——原文的。自今年二月初起，於課讀之餘從事譯述者凡四個半月，自六月半以後，在酷暑侵凌，蠅蚊夾攻之下，專事譯述者又二月又半，全書始告完成。譯時，不但逐段逐句譯述，實係逐語逐字譯的。『順』雖不敢說，『信』則已盡力做去，可告無愧了。因係由原文直譯，原文中既無『×』，『××』，幸免『暗中摸索』之苦，但或因原文中不免有小錯誤——為譯者所發現而加以訂正者計有二處1.第二節節題，據節文似遺漏『消費』一詞；2.第六十一節的舉例中的數字也有小誤——為譯者所未曾發現，或因譯者能力有限，似仍不免有錯誤，是則深望海內外碩學之士，不吝賜教了。

第八版中引証馬，昂，伊底著作之處有與第六版同者，多根據李遠先生等譯的第六版，參照原文稍加更改，或一字不改直用李譯；且於翻譯過程中，也復多請教於李先生者，統此致謝。

陶 達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於北平

550.186
300
(808) / 2.1

目 次

李達先生序..... 1
 譯者小引..... III
 目次.....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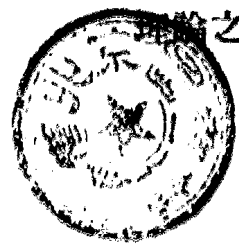
序 論

第一節 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一般概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1
 第二節 生產，分配與交換，〔消費〕..... 4
 第三節 廣義的與狹義的政治經濟學..... 6
 第四節 政治經濟學的黨派性。政治經濟學的伊里奇階段..... 9
 第五節 在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中機械論的與觀念論的曲解
 之批判..... 15

第一篇 前於資本主義的構造

第一章 原始共產主義

第六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發生，第一（前於氏族）時期..... 21
 第七節 原始共產主義發展的第二（氏族）時期..... 25
 第八節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瓦解..... 30
 第九節 關於原始共產主義問題的布爾喬亞理論與修正派
 之批判..... 32



第二章 奴隸制

第十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瓦解與奴隸制的發生……………	35
第十一節	奴隸制的生產方法之特徵。在希臘與羅馬帝國中的 大奴隸生產之發展……………	38
第十二節	商業與貨幣高利貸資本在奴隸社會中的作用。在奴 隸社會中的不生產者底消費……………	40
第十三節	奴隸社會的階段矛盾……………	43
第十四節	奴隸制之滅亡……………	44
第十五節	關於奴隸社會底布爾喬亞見解之批判……………	47

第三章 封建主義

第十六節	封建的剝削形態之一般特徵……………	50
第十七節	封建社會的發展 在封建主義下的城市 商業的作用…	53
第十八節	封建主義的崩潰與滅亡。原始的資本積蓄……………	56
第十九節	關於封建主義底反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之批判……………	62
第二十節	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	67

第二篇 商 品

第四章 商品及其二重性。

創造價值的勞動之特性

第二一節	當作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以及當作資本主義生產 方法研究之出發點看的商品……………	71
第二二節	商品底二重性 使用價值與價值 當作價值基礎 的勞動……………	72
第二三節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	75
第二四節	單純勞動與複雜勞動……………	78

- 第二五節 個別勞動與社會—必需勞動。社會勞動生產性與價值……80
- 第二六節 結論 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當作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之體現者看的商品之內在矛盾……83

第五章 價值形態

- 第二七節 價值實體及其外表。關於價值形態的一般概念……86
- 第二八節 價值之單純的或偶然的形態。價值之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87
- 第二九節 價值形態的發展……91

第六章 商品拜物教及其神秘 價值——商品

生產運動之主要的法則

- 第三十節 商品生產之社會關係及其物的體現，商品拜物教的一般概念……98
- 第三一節 當作商品運動之主要法則看的價值……103

第七章 關於商品的馬克思——伊里奇學說與布

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關於商品的馬

克思——伊里奇學說之曲解底批判

- 第三二節 布爾喬亞科學反對馬克思——伊里奇的勞動價值論的鬥爭。布爾喬亞學說底批判……106
- 第三三節 馬克思——伊里奇商品論之觀念論曲解底批判……111
- 第三四節 關於商品與價值的學說之機械論曲解底批判
〔均衡論〕與〔勞動支出法則〕之批判……116

第三篇 貨幣

第八章 貨幣底本質及其機能

第三五節	貨幣底本質	123
第三六節	貨幣底機能 當作價值尺度的貨幣 價格與價值	125
第三七節	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本位的貨幣機能	128
第三八節	當作流通手段看的貨幣 商品底變態	132
第三九節	貨幣流通 爲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	135
第四〇節	鑄幣 當作價值標誌的貨幣 虛價貨幣與紙幣之發生	137
第四一節	單本位制與複本位制 自由鑄造與強制鑄造	139
第四二節	在字之本義中的貨幣 當作儲存物看的貨幣	142
第四三節	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	144
第四四節	信用貨幣的發生 信用貨幣與紙幣的區別	147
第四五節	世界貨幣	149
第四六節	滙兌 國際清算 總結	151

第九章 紙幣 布爾喬亞的貨幣論與曲解

馬克思—伊里奇貨幣論的批判

第四七節	紙幣的發生及其本質 紙幣與黃金	154
第四八節	通貨膨脹及其意義	158
第四九節	戰時及戰後的貨幣流通 各資本主義國底貨幣 流通現狀	163
第五〇節	布爾喬亞的貨幣論	168
第五一節	社會——民主派之曲解馬克思的貨幣論	170

第十章 在蘇聯經濟中的商品與貨幣

- 第五二節 馬克思與伊里奇論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學說…………… 174
- 第五三節 蘇維埃經濟…………… 176
- 第五四節 蘇聯的商品形式之特性…………… 182
- 第五五節 在蘇聯經濟規律性問題上的布爾喬亞光復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與右派機會主義的曲解之批判…………… 183

第四篇 剩餘價值與資本

第十一章 貨幣之轉化為資本

- 第五六節 資本底一般公式及其矛盾…………… 193
- 第五七節 勞動力之商品化…………… 196
- 第五八節 勞動力這一商品底價值與使用價值…………… 197

第十二章 剩餘價值的生產

- 第五九節 勞動過程與剩餘價值之形成過程 資本的一般概念…………… 200
- 第六十節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202
- 第六一節 榨取率…………… 205
- 第六二節 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資本論之批判…………… 207
- 第六三節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剝削之不存在…………… 212

第十三章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 第六四節 絕對剩餘價值 勞動日與其界限…………… 220
- 第六五節 為勞動日而鬥爭…………… 223
- 第六六節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225

第六七節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	230
------	---------------	-----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發展底三階段和相對剩餘價值

第六八節	單絕協業	233
第六九節	工場手工業	237
第七十節	社會的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各個企業內的生產組織化和全社會內的生產無政府狀態間之矛盾	240
第七一節	機械與大工業	243
第七二節	資本主義之發展與榨取之增大	251
第七三節	資本主義與在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矛盾之發展	256
第七四節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及其發展	258
第七五節	社會主義協業與生產力之發展	261

第五篇 工 資

第十五章 關於工資的一般概念。工資的形式

第七六節	工資——勞動力價值的轉形	265
第七七節	工資的形式 計時的工資	268
第七八節	計件工資	270
第七九節	工資的賞與形態	274
第八十節	額外勞動 工資的其他形態	276
第八一節	現物工資與貨幣工資	278
第八二節	名目工資和實質工資	279
第八三節	工資之國民的差異	281

第十六章 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 理論之批判 蘇聯的工資問題

- 第八四節 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工資論…………… 284
第八五節 蘇聯工資的特性…………… 287

第六篇 資本的再生產與積蓄

第十七章 再生產及積蓄之一般概念

- 第八六節 再生產之概念…………… 295
第八七節 資本主義的單純再生產…………… 297
第八八節 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 300

第十八章 資本積蓄與大生產底長成

- 第八九節 資本的集積與集中…………… 806
第九十節 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高度化…………… 310

第十九章 資本的積蓄與勞動階級的地位

- 第九一節 在以不變的技術為基礎的積蓄下之勞動者底工資…………… 314
第九二節 技術的成長與勞動階級的地位…………… 316
第九三節 預備軍及其對於工作的影響…………… 321

第二十章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資本

主義積蓄與社會主義積蓄

- 第九四節 勞動階級的貧窮…………… 323
第九五節 職工組合及其在為工資而鬥爭中的作用 伊里奇
論階級鬥爭之工團主義的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瞭解…………… 330

第九六節	資本主義積蓄之史的趨勢	332
第九七節	在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的積蓄）	335

第七篇 資本的循環與回轉

第二十一章 資本的循環

第九八節	資本循環的一般概念 循環的三個階段與三種形態	343
第九九節	當作運行看的資本	347

第二十二章 資本的回轉

第 百 節	資本回轉的一般概念 生產時期與流通時期 生產時期	351
第百零一節	流通時期 流通費	353
第百零二節	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	358
第百零三節	固定資本流通的特性 固定資本的還原	361
第百零四節	在再生產中回轉資本的間斷與補充資本的必需性 剩餘價值的資本化與開放的貨幣手段之一時的積蓄	364
第百零五節	資本回轉的一般速率 資本回轉的速率及其對於 藉這資本而榨取得的剩餘價值量之影響	366

第二十三章 關於馬克思底資本流通學說之 觀念論與機械論的曲解

第百零六節	關於馬克思——伊里奇的與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中的流通問題解釋之一般的評註。社會民主派的流通論之批判	370
-------	---	-----

第二百零七節 關於流通說之機械論的曲解	374
---------------------	-----

第八篇 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

第二十四章 關於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 的馬克思——伊里奇學說

第二百零八節 社會資本的運行與各別資本運行之區別 資本主義 的矛盾及其在社會資本運行中的表現	377
第二百零九節 馬克思先輩的社會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的問題	381
第二百一十節 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社會資本全部的運行	385
第二百一十一節 擴大再生產	390

第二十五章 曲解社會資本再生產論的批判 馬 克思的圖表應用於蘇聯經濟的問題

第二百一十二節 社會民主派曲解馬克思底社會資本再生產論的批判	398
第二百一十三節 徒幹伯拉諾夫斯基的市場論之批判	400
第二百一十四節 盧森堡的再生產論之批判	402
第二百一十五節 馬克思圖表對於蘇聯經濟之適用性的問題	406

第九篇 剩餘價值的轉化為利潤

平均利潤及其降低的趨勢

第二十六章 生產費與利潤 利潤率

第二百一十六節 引 言	409
第二百一十七節 生產費	410
第二百一十八節 利潤與利潤率	414

第一百十九節	決定利潤率高度的因素	417
--------	------------	-----

第二十七章 平均利潤率的形成 生產價格

第一百二十節	平均利潤率的法則及其意義	420
第一百廿一節	生產價格的一般概念	425
第一百廿二節	生產價格與價值	426
第一百廿三節	價值轉化為當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史的發展的產 物看的生產價格	429
第一百廿四節	在社會價值中個別價值之對等 額外利潤	433
第一百廿五節	關於馬克思——伊里奇底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學說 的曲解之批判	436
第一百廿六節	論在「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間之歧異的意見	439
第一百廿七節	在蘇聯經濟中的「利潤」與價格的問題	442

第二十八章 平均利潤率下降之趨勢 的法則及其意義

第一百廿八節	平均利潤率下降之趨勢的法則 使下降遲緩的反作 用的傾向	448
第一百廿九節	利潤率低落的傾向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矛盾的 發展	452

一個完全社會化的國家，那兒所有的人都有着同樣的錢包和肉，同樣的衣服，同樣的出產品，和每一產品中的同數量。——這種社會主義是更不難說的，就足以這樣說：在階級沒有完全消除前，在工作沒有成爲勞動前，——因為現今多數人總把工作視爲累贅——有許多人希望別人比自己做些。在階級沒完全消除前人民的享受應當依據他們的生產物，每人依據他的才能。這是社會主義第一階段的公式。等到社會產物及階級時，任何不可以從他以前階級的所做工作的酬報是抹殺的。應當非常顯明的，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需要，有的需要是有的需要。社會主義從來不曾考慮過私人嗜嗜與需要的種類，多少，與着階級。——

序 論

第一節 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一般概念，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馬克思——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爲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革命理論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之一。其任務是研究生產關係的特定形態之發生的，發展的法則，其滅亡及其轉變到別的更高的形態去的法則。

『由其發生，發展與末落中去研究該種於歷史上特定社會的生產關係——這——依伊里奇的說話——就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
(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一五頁)。

人由其發展的最初階段起即已在社會中與別的人生活着且勞作着。只有在布爾喬亞學者的幻想中才能存在着與別的人完全分離的，在社會以外的孤獨的人。

組成人們底社會關係之基礎者，是其物質的生產。爲了維持其生活，人參加進特定的，不依據其意志的物質的生產關係中。彼此聯絡一氣的他們在自然界中互相資助着，生產着。

人類社會發展的各階段以各種生產關係爲特徵，或者也可說，以各種經濟結構爲特徵。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這些就是已經過去的社會在其發展中的生產之主要的社會形態或生產關係。自十月革命起我們在自己的國家中建設新的，生產之更

高的社會形態——為共產主義之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生產的社會形態無論如何不同，而生產的因素則為工人與生產手段。在生產過程中時時參加着使用技巧的工具且藉這些工具以改製勞動對象的人們。想生產，勞動力就應與生產手段結合起來。在社會發展的各階段上，這種結合也不一樣的。即以這結合的方法使某一經濟結構與別的經濟結構區別開來。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手段為資本家的獨佔私有權所操縱，而工人則喪失了生產手段且僅握有勞動力。因而在資本主義之下，只有在特殊的生產關係之基礎上——在資本家剝削勞動階級的基礎上，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結合，才有可能。在蘇聯社會主義的企業上，那裏因生產手段與工具屬諸勞動階級自己，故生產諸要素的結合，能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之基礎上完成之。

結合於特定生產關係之形式中的生產諸要素，參加社會與自然的鬥爭，組織在其發展之該階段上的人類社會生產力，這裏最重要的生產力是勞動力；為工人所使用的勞動手段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又為勞動所藉以完成的社會關係之指標。

『殘餘的勞動手段對於研究過去的社會——經濟形態所有的重要性——馬克思說——正如殘餘骨骼對於研究過去的生物組織所有的重要性一樣。經濟的時代，不以生產，而是以用什麼勞動手段去生產，去劃分開來』。(資本論第一卷一二〇—1)。

是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該階段之特徵的人們的生產關係，適應了生產力發展之特定階段。生產關係的發展，某經濟形態為別的經濟形態所代替是決定於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矛盾的。

這樣，在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上，那時生產力尚處在萌芽的狀態中，生產力發展之最低的水準是適應於原始共產主義之生產關係的。

但由於生產的長成，在某階段上這些關係遂成爲生產力往後發展之障礙物了。此時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遂爲基於這一階級對於那一階級之剝削上的，基於階級對抗上的生產所代替。代替原始共產主義的奴隸制，封建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皆爲生產之對抗的形態。這裏，生產關係是階級的關係，而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表現於階級鬥爭中。

資本主義生產是生產之最後的，最發展的對抗（基於階級剝削與階級矛盾）的形態。當封建主義成爲由其本身的胸膛內所孕育成的生產力往後發展之障害物時，資本主義就在封建廢墟上滋長出來。替換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

然而在一定階段上，資本主義的關係又成爲生產力往後發展之鎖鏈了。生產力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階級的存在成爲社會往後發展之障礙物了。表現於階級鬥爭之增高與深化中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之深化，引導到資本主義的瓦解，引導到無產者掌握政權，引導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毀沒，經過嚴肅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發生人剝削人的一切原因之肅清，引導到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其最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建設。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在蘇聯於無產者專政的基礎上成爲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些關係乃生產力發展之有力的刺激物。在社會主義關係的基礎上，我們（指著者及蘇聯的公民——陶達）已達到了爲資本主義在其最繁榮的年頭所不曾看到的速率。

總之，在生產力一定水準的基礎上所發生出來且滋助其往後發展的生產關係之某種樣相，爲別的樣相所代替，當生產力在其發展中碰到其舊的生產關係之阻害時。在有階級的社會中，某種形態而別種形態的代替，經過殘酷的階級鬥爭，經過統治階級的政權之革命的毀滅

而完成。

社會生產力是不能存在與發展的，如果處在其社會形式，即生產關係以外；只有經過這些關係的中介，勞動過程的各因素（勞動力，生產手段）才能結合起來，成為真實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生產力發展之積極的形式。

假使處在生產關係以外，生產力是不能存在與發展的，那末很明顯地，如果沒有生產力，則生產關係也是無意思的。

所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是物質生產的統一過程之二個內在聯繫的契機。為生產統一過程之形式與內容的牠們統一着，互相滋生着，且同時又互相對立着。在其統一與對立的基礎上完成了物質生產的發展，社會形態的替換，社會的發展。

研究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又研究生產力發展的形式；牠揭示出在社會生產關係及其生產力間的矛盾，且指示出這個矛盾的發展與成長如何不可避免地引導到該社會——經濟形態之發展，及其過渡到別的更高的形式。

第二節 生產，分配與交換，〔消費〕

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彼此參加特定關係的人們，在自然界活動着，為了其消費的滿足必應改製自然物品。

但事情不僅關於直接的生產，想再次更新生產過程，人們就應在自身間分配生產手段與工具以及勞動生產品；勞動力應被分配於生產的各部門間。這就是人們生產關係所以於其自身內包含着一定的分配關係的原因，後者隨生產形式之變化而變化。

在社會發展之一定階段上生產品的分配能因交換的中介而實現，後者為在生產品的生產與分配，一方面，與消費，他方面間之中介的環圈。所有生產品最後又為一定消費之滿足。

所以社會生產過程由下列契機組成統一體：1. 直接生產；2. 分配；3. 交換；4. 消費。所有這些契機內部互相聯繫着且組成統一體——生產過程。在這統一體中之首要的與決定的契機是生產。『生產統治着在生產的所有定義之對立性中的自己且統治着所有其他契機。……生產之特定的〔形態〕決定了消費，分配，交換之特定的〔形態〕以及這些不同的契機彼此之特定的關係』（政治經濟學批判，三五頁）。

事實上，分配，生產與消費首先當作組成部份而參加生產本身的過程。如我們所已指出者然，生產過程以生產手段之一定的分配為前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分配是基於資本家對於生產手段之獨佔的私有權上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則基於社會化的所有權）。生產手段的這種分配（與此密切地聯繫着的還有按部門的勞動力的分配）是生產本身之真實的契機。交換同樣包含於生產過程中：如馬克思所說，在生產本身中進行着『活動的與能力的交換』。『對於生產品的交換也復如此，因牠是預為直接消費的製成生產品的生產之手段。因交換本身是參加生產的行爲』（前書三四頁）。消費同樣包含在生產過程中，因在生產的時候消費掉機械，消費掉勞動力（所謂『生產的消費』）。

但分配，交換與消費不僅包含在生產過程的本身中：在生產品已製成之後，牠被分配於人們之間且被交換了；在生產品的分配與交換以後就進行着個人的消費。在該社會中生產品已製成之後，其被分配，被交換與被消費的特殊方法又為生產的特徵所決定且隨後者而變化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下，勞動生產品為資本家所佔有，而在社會主義的生產之下，則為生產者所支配。勞動生產品的交換也為生產的

特徵所決定；沒有在生產者間的分工，交換是不可能的。『私的交換以私的生產為前提……交換的強度，其分佈及其形式統為生產的結構與發展所決定，例如在城市與鄉村間的交換，在鄉村中的交換，在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前書，三四—三五頁）。

個人消費的特性也為生產關係所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的消費為其購實力所限，社會主義的生產則保證着勞動者之消費之完全滿足。

在生產基礎上滋生出來且為生產所決定的分配，交換與消費對於生產過程又表示出反作用。『例如，當市場，即交換範圍擴大時，又增大了生產的範圍且成為其分化的深淵』（前書，三五頁）。但在各契機的互相作用中，首要的且決定的契機則為生產。分配與交換的形式僅能隨生產之變化而變化；所以如不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想消滅資本主義的分配與交換是不可能的。

在社會生產力與其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之增長同樣體現於在社會的生產（與交換）方法與分配方法間的矛盾中。『生產與交換的該種方法愈活躍，……則分配達到這種階段也愈快，在那階段上牠超過了滋生牠的生產與交換的方法且與之相對立』（反杜林論一〇六頁）。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滋生出在使其滅亡的分配（在一極上愈益富裕，在他極上大眾愈益貧困）中的極尖銳的矛盾。

研究人類社會生產關係之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政治經濟學又是『關於在各種人類社會中的生產品之生產與交換的條件與形式的，以及關於這些生產品的分配之相應的方法的』科學（前書，一〇七頁）。

第三節 廣義的與狹義的政治經濟學

爲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係，不斷地變化着且發展着。某一經濟形態，發展着，且不可避免地爲別的形態所代替。每一經濟形態皆有其發展的特殊法則。

所以，不能把政治經濟學看做那以尋求爲任何經濟形態所共同的法則爲任務的科學。

『誰想——昂格思說——以同一法則去聯結佛果島的經濟與近代英國的經濟，那末很顯然地，除掉極平凡的共同點（即沒有具體內容的共同說法）外，什麼也不能說明（前書，一〇四頁）。』

只有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他們由於其階級的利益以保持資本主義制爲有利——才不願而且不能明白各個經濟形態的歷史性（即其發展，滅亡與過渡到別的形態），努力尋求爲一切時代的人們生產關係所共同的永久的法則。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實際上抹殺了在各個形態間的差異且不能揭穿其中每個的特徵的。

唯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則以研究各種經濟形態之特性爲任務。牠首先闡明那僅固存於該形態中的特殊的法則，依伊里奇的話說，牠應規定『關於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及每一體系之根本特徵的主要概念』（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三七二頁）且揭示出每個經濟構造之特徵，指出其互相的關聯，互相的轉變。

研究任何經濟形態之根本特徵，其發展的，滅亡的，互相變轉的法則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叫做廣義的政治經濟學。

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之組成部份就是以研究資本主義之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爲任務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時時都把科學的理論看做『對行動的指導原理』。馬克思——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首先就集中其注意力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之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之研究，因認識了這

些法則，無產者在其傾覆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就握着强有力的武器。

只有研究了資本主義的法則，才能確信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且指示出無產者應藉以獲得勝利的進程。就是在已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設的，成功地執行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之任務的蘇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也有很大的實際意義。蘇聯國內還進行着爲資本主義份子與階級之徹底肅清，爲經濟上與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之克服而鬥爭。如無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智識是不能執行這些任務的。蘇聯的無產者革命是全世界無產者革命的起點，如無資本主義——這雖已日趨衰落，但在蘇聯無產者國家的周圍仍佔統治地位——發展與滅亡的法則之智識，是不能完成的。

蘇聯經濟發展的法則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根本不同。

研究蘇聯經濟發展的法則，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則有偉大的理論的與革命——實際的意義。牠使我們於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中握有武器，牠『給處理，遠景的明確性，工作的信任性，我們事業的勝利之信仰以實際的力量』（傳程黎奧諾維支，伊里奇主義問題四四二頁）。

所以，我們不僅應研究前於資本主義形態的與資本主義的法則，還應研究蘇聯經濟之發展的法則。

前於資本主義的形態之研究，不僅對於社會發展之已往的形態之瞭解（最重要的尤其是對於社會發展的各個形態的地位之瞭解有很大的意義），而且對於保有前於資本主義關係之極落後性的地方之階級鬥爭的特性之瞭解，有意義。這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舊的封建關係頗有力的地方，殖民地奴隸的各種形態很發達的地方，現在尚有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地方——之無產者革命的鬥爭有很大的意義。

第四節 政治經濟學的黨派性 政治經濟學的伊里奇階級

由於我們上述的關於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很容易明白，這種科學在無產者底階級鬥爭中有怎樣的作用。

『這理論——伊里奇在九十年代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時說——直接以揭示近代社會的對抗與剝削之所有形式，探求其進化，指示其過去性，及其轉化為別的形式之不可避免性，且啓示無產者怎樣才能很快且很易終結其所有的被剝削，為其任務，……』

依馬克思，科學的直接任務，就是給鬥爭以真實的口號，即明白這鬥爭客觀上是生產關係各個體系的產物，明白瞭解這鬥爭的必需性，其內容，發展的進程與條件』（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二一八頁）。

除外革命的實際，則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革命理論是無意義的，理論由實際中發生且為實際而發揮的，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是把其理論看做階級鬥爭之指導原理——同時，妨害無產者的布爾喬亞的科學，則剛相反，愛說『公正的』『客觀的』『超階級的』科學。

實際上，『純正的』『超階級的』科學之這種宣導表示出布爾喬亞的階級利益之擁護。在階級的社會中是不能有『非階級的』『公正的』科學的。這一點對於任何科學皆可信的，對於政治經濟學更為可信。研究生產關係，揭穿階級矛盾與階級剝削的根基的政治經濟學直接抓住了近代社會之極深切的階級利益。

指出資本主義剝削的根基，揭示資本主義之歷史上的過渡性與發展之內在的法則，指出其滅亡的必然性，揭示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建

設的法則——這一切只有為馬克思與昂格思所建立成的且為伊里奇與俾殺黎奧諾維支所發揮的無產者的政治經濟學才能作成。

固然，在資本主義發展之最初階級上，那時布爾喬亞還是先進的階級而且無產者反對布爾喬亞的階級鬥爭尚很薄弱，布爾喬亞中發生出許多經濟學家（如白蒂，斯密士與李嘉圖等的所謂『古典派』經濟學），他們力圖發揚資本主義之內在規律性且作成許多可貴的科學的發明。但布爾喬亞科學之最好的代表在這些科學的發明上尚印上布爾喬亞的階級利益與布爾喬亞的有限性；這可以由古典派認為資本主義法則是永久的唯一合理的這一點看出。

由於資本主義與無產者階級鬥爭的往後發展，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遂完全失掉其科學性了。『現在——馬克思說——對於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問題已不在乎這種或那種理論之正確與否，而在於牠對於資本有利或有害，合宜或不合宜，合於政治的理由與否』（資本論第一卷）。

凡是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之公開反動的派別以及給科學戴上『客觀性』『公正性』之假面的人，於字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於事實上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人，皆如此。

在日下，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時代，在資本主義的矛盾極端緊張，資本主義體系非常動搖以及革命危機發展的條件之下，布爾喬亞為了保持其統治而採行獨裁之恐怖的方法，採行法西斯主義。布爾喬亞在這種法西斯主義之下動員其力量於理論上與馬克思——伊里奇主義鬥爭。聲言『撲滅』馬克思主義，焚毀馬克思，昂格思，伊里奇，俾殺黎奧諾維支的著作，殘酷地壓迫『危險思想』的人們。法西斯主義者同時力圖以其理論去對立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按其內容的貧乏，任何科學的喪失，這種法西斯的理論重複了且發揮了為無產者的猛烈敵

人，布爾喬亞反動的代表所早已闡明了的反動理論。企圖向大眾掩蔽其理論之雙重反動性，力圖給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的及其法西斯的獨裁保證小布爾喬亞層的大眾基礎，力求深入勞動階級，法西斯主義者以關於資本主義之「批判」的巧妙的說話去掩瞞其反動的理論。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以欺騙大眾為目的，把其法西斯主義叫「國家——社會主義」，事實上「如仔細考察起來，在那裡連社會主義的原子皆找不到」（俾殺黎奧諾維支：第十七次聯共黨大會報告書，一一頁）。

與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尤其於政治經濟學上與之鬥爭是馬克思—伊里奇科學的最重要任務之一，與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及其獨裁的鬥爭之首要部份之一。

布爾喬亞理論最危險的表現之一就是現代社會—民主派的理論。

社會—民主派的代表早已公開地要求於布爾喬亞理論的精神上去「修正」，審查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社會—民主派的大部份有名代表（致茨基，費爾希丁，俄國的少數派等等）以承認馬克思主義的說話去掩蔽其背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實則他們已曲解了牠。第二國際的這些「理論家」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變成了死的靜止的信條。他們解釋馬克思學說的「字義」，抽取了其中的革命精髓，他們承襲了傳統的布爾喬亞科學，使理論與實際分離。

自大戰及戰後以來，社會—民主派更前進一步背判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更堅決地拒絕了馬克思學說且處在布爾喬亞之新「流派」的立場上了。為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理論而鬭爭，為無產者制勝其階級敵人而鬥爭就需要與以勞動階級的利益之擁護者自命的社會—民主派的布爾喬亞的理論作無情的鬥爭。

在社會—民主派中之最危險的表現者為奧大利派（奧大利馬克思主義），其代表巧妙地以「左的」說法去欺騙革命的大眾。奧大利馬克

思主義派——費爾希丁，鮑威，萊熱，伯樂五泰等——創造其以觀念的理論去替換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蘇聯企圖傳佈這種見解者為少數派——有害者，魯平。在其馬克思主義之冒牌的理論中，分離了理論與實際，極確切地抽取了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的內容。

在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理論佔統治的蘇聯，與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理論之曲解作鬥爭是非常重要的。在政治經濟學界以及在其他理論戰線上，無產者及其黨於階級鬥爭的現階級上進行着與互相決定且互相結合的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理論的曲解之二種形式——與為右派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之機械論的修正，以及與觀念論的修正作鬥爭。

二種修正的形式皆以同一根源——第二國際的反馬克思主義修正的草案為其基礎；這種形式孕育着那種形式而且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則互相結合着。反對一派的徹底鬭爭是不可能的，如不反對另一派與之調和起來。

政治經濟學界的馬克思—伊里奇主義之機械論的與觀念論的曲解之影響，於前幾年才結束的經濟學爭辯時明顯地表現出來。

爭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表現出階級上有害的觀念之重大的影響。帶有抽象——煩瑣哲學性的，經濟學家的注意力皆忽視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這次爭辯的結束，是承奉在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直接指導之下的黨的意旨的。以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為領袖的黨指示出辯論方向的錯誤，揭穿其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且表示出克服這些錯誤的力量。但政治經濟學界的這些機械論的觀念論的危險性尚未被消滅。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繼續着而且將來還繼續對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理論之新的進攻，其曲解之新而更隱晦的企圖，所以，與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經濟理論之任何曲解作鬥爭是我們底最重要的任務。

在其「論多數黨史的幾個問題」的歷史的信中，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提起黨必需注意到與托洛茨基主義叛徒之所有形式以及與陳腐的自由主義作強有力的鬥爭。這封信引起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加強提防着在政治經濟學界反馬克思主義與反伊里奇主義的見解之出現。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級上，此時階級的敵人拋棄其固有的立場而採取新的更隱晦的鬥爭法，在鬥爭的所有部份上，其中尤其是在理論戰線之經濟學部份上應特予以提防。

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正確地指出，在現階段上，不僅於經濟上甚至在人們意識上與資本主義的殘餘作鬥爭有怎樣的意義。

總之，除非與有害的理論作鬥爭，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沒有意思的，在任何形式上牠皆不能體現出來的。

生於階級鬥爭中，在這鬥爭裏為無產者之武器的且在其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鬥爭的革命的，實踐的科學。

由第二國際的與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營壘中所發生出來的，足為馬克思主義的冒牌者之特徵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的黨派性之否定與忽視，密切地與他們的否定且抹殺當作馬克思主義發展之新階段看的伊里奇主義之意義這一點相結合着。

否定當作馬克思主義發展之新階段看的伊里奇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死的靜止的學說，變成概念之空洞的遊戲，掘棄了無產者之革命的鬥爭。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界上伊里奇主義之徹底的否定乃魯平的反革命的學說之特徵。當作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之新階段看的伊里奇主義之否定，乃在哲學上以及許多其他科學上的少數派，觀念論之特徵，也足為右的機會主義者與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之特徵。

蕭清在經濟學爭辯時——此時經濟學家的注意全在於空洞的煩瑣

的辯論——所深刻表現出來的在經濟理論與革命實踐間的鴻溝，集中自己底注意力於最後的帝國主義的與蘇維埃經濟的問題之理論的改造上，在二條戰線上進行徹底的鬥爭：與機械論的與觀念論的曲解作鬥爭——在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政治經濟學前面的所有這些任務只有在容納伊里奇主義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新的基礎上才能執行。

爲馬克思主義之承繼與發展的『伊里奇主義發生於且形成於帝國主義的條件下，此時資本主義矛盾已極深化，無產者革命已成爲直接行動的問題，勞動階級準備革命的舊時期已成爲直接撲滅資本主義之新時期』（伊里奇主義問題，六——七頁），引導勞動階級去撲滅資本主義，掌握無產者的專政與社會主義的建設，伊里奇主義揭穿帝國主義法則之特徵，資本主義衰落與滅亡的時代；牠在馬克思與昂格思的關於無產者專政，關於過渡時期，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學說之更發展的基礎上指示出無產者政權之獲得，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的進程與方法。但這絕未全行包容新的連同伊里奇主義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帝國主義時代與無產者革命的一切經驗之基礎上，在與妨害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鬥爭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伊里奇主義，提升全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於更高的階段上且深化了，發揮了所有牠的主要論點。

馬克思與伊里奇的經濟學說（及全部馬克思—伊里奇主義學說）之往後的發展，可於黨的決議及其領袖——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的著作中得到。

伊里奇的最優門生與贊同者，其事業的承繼者，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更發展了伊里奇的關於當作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看的帝國主義的學說，且發展了關於資本主義一般危機時代與二重體系之鬥爭的學說。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更發揮了馬克思與伊里奇的關於無產者革命與

關於過渡時期的，關於在無產者革命時代與過渡時期的無產者及其黨的任務的，關於肅清階級與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的路線的學說。與社會—民主派和機械主義作無情鬥爭的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由曲解中拯救了馬克思，昂格思與伊里奇的學說且更發展了牠。

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應根據馬克思，昂格思，伊里奇與俾殺黎奧諾維支的著作與吾黨的決議。

第五節 在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中機械論的與觀念論的曲解之批判

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機械論的與觀念論的曲解在其解釋這門科學之對象時已表現出來了。

觀念派修正的代表，尤其是費爾希丁早已修正了關於廣義政治經濟學之馬克思—伊里奇的學說。依費爾希丁的意見，政治經濟學應僅限於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法則之研究。在本書上有時也曾容納了類此的觀點。其熱烈的宣導者是企圖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捨棄研究之鬥爭的任務與蘇維埃經濟問題之闡發的魯平。

在這問題上費爾希丁與魯平的觀點為托洛茨基派所採取，後者在其理論中綜合了馬克思主義之觀念論的與機械論的曲解。限制政治經濟學於資本主義的領域，本質上為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家潑拉奧佛拉繩斯基所擁護。

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類此觀點還有布哈林，在這個問題與許多其他問題上的他的機械論的見解與觀念論的相契合〔註〕。

〔註〕已故的女革命家羅紗盧森堡於政治經濟學對象上也有類似的見解，她的

半少數派的錯誤現在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伯蘭拉耳派等所力圖利用。

限制政治經濟學於資本主義領域的這種觀點之贊同者這樣主張：政治經濟學僅能研究這樣的經濟——在那裏存在着交換，在那裡為市場的盲目法則所統治着。在沒有盲目的市場交換，人們的關係極『單純』的那種形態中，沒有為政治經濟學所能研究的材料。

這種見解的第一種錯誤是，以交換的現象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之基礎。我們已知（第二節），交換是在生產的基礎上發生出來且為後者所決定的。往後我們將詳加闡明，市場交換的必然性為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生產之特徵，在物質生產中的人們的關係所決定。以交換領域為經濟基礎的社會——民主派，想使勞動者捨棄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滋生出來的矛盾，退出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革命的撲滅而進行的鬥爭。

第二種錯誤在乎，以為凡是沒有市場交換的經濟形態不能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我們已曾說明，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係之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的。資本主義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於原則上當然與其他形態的法則不同，但其他形態也有其發生，發展與衰落等特殊法則，這也能够且應該為研究之對象的。

伊里奇批解，認為『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結束，政治經濟學也將終結』的布哈林時曾指出，甚至在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裡，也有政治經濟學的材料。比如，伊里奇指出，那時應研究在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手段的生產間關係的法則，積蓄的法則等等。

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否定之最有害而危險者是，牠引申到蘇維埃經濟底規律性的理論研究之否定。同時，如無在我國內進行的過程之理論的思考，則為社會主義建設之往後勝利的開展而進行的鬥爭就不能成功。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可捨棄現代鬥爭問題之研究的魯平，出台反對廣義經濟學，不是偶然的。

認為不應限制政治經濟學於資本主義的領域，同時又應指出，承認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機械論者，尤其是卜格唐諾夫與斯尺潑諾夫解釋地時是根本錯誤的。假使卜格唐諾夫與斯尺潑諾夫承認政治經濟學於資本主義形態外還應研究其他形態的，那末，在這裡他們力圖把某一形態的法則引用到別的形態的法則去；在此把資本主義的法則機械地轉移到其他形態上去且轉化為永久的法則(註)。把資本主義法則之永久化的廣義政治經濟學之類此的「解釋」與揭穿各種形態的每一法則之歷史性的，指出每一形態皆有其發生，發展與滅亡的特殊法則的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然沒有任何共同點。

「註」往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法則時，我們當然要指出機械論者怎樣把商品

——資本主義的各個法則永久化且把牠轉移到別的形態上去。

政治經濟學對象之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瞭解之機械論的與觀念論的曲解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解釋的曲解相關聯。

把社會法則歸結自然法則的機械論者，把生產力引申到技術；他們把生產力當作『自然』物的積存，勞動者也被他們看做自然的物，『活的機器』（布哈林語）。機械論者把生產力本身與社會生產關係割開了。當作最主要的生產力看的勞動階級的作用，這裡降低了。機械論者又把生產關係瞭解在時空中人們的處理。在類此的解釋中忽視了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之階級性且否定在生產力發展中生產關係之積極的作用。至於說到蘇聯經濟，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機械論的解釋引導到生產力發展之放任的宣傳，在其發展上無產者及其黨之勿干與，實則就是宣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自由發展。

錯誤地解釋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以後，機械論者就作出政治經濟學之錯誤的定義。依他們的意思（在經濟學論戰時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經濟學應研究當作『平等』對象看的生產力，除開生產關

係而外。在這種解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遂轉化為二羣獨立的互相分離的概念，研究其中的這個可以除開那個的。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被機械論者由處在經濟形態底發展與滅亡基礎上的物質生產之後一過程的內在矛盾轉化為外在矛盾了。真的，如果機械論者也說及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那末他們把這些矛盾引申到在社會與自然間的矛盾。物質生產之內在矛盾，尤其是階級矛盾被他們忽視了。

此外，把生產力包含於政治經濟學中當作與生產關係相平等的對象，同時又把生產力歸結到技術的機械論者，混同了研究生產之社會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對象，與研究生產力各因素(勞動手段與工具)之自然特性的技術科學的對象。

把生產力歸結到抽去生產關係之階級內容的技術也是馬克思——伊里奇主義之觀念論曲解的特徵。

依觀念論者的解釋，被他們與技術相混同的生產力，屬諸自然現象的領域。屬諸社會現象之領域的生產關係也被他們轉化為非物質的精神的現象。如魯平所說，在那裡「我們找不到一點物質的原子」(魯平，馬克思價值論概要，一四九——一五〇頁)。

這樣由生產關係抽去其物質內容，把牠與生產力分離，社會——民主派費爾希丁，魯平，萊熱等遂把生產關係歸結到交換關係或法權關係。

魯平由此作成結論，研究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應捨象了生產力。

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種觀點很明顯地有害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由政治經濟學抽去了生產力——這就捨象了生產的社會過程之內容，這就由政治經濟學掘棄了決定社會形態之發展及其革命之替換的，

生產過程之內在矛盾，這種說法完全與反對無產者革命，擁護資本主義且掩瞞其內在矛盾的，國際少數派的立場相吻合。

研究人類社會生產關係之發生，發展與衰落的法則的馬克思——伊里奇政治經濟學，如我們所已指出者然，應研究生產力發展的法則，揭穿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矛盾的發展與增長，指示出，這種增長怎樣引導到經濟形態之革命的替換。

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係不是如觀念論者所說的失掉任何物質的，觀念的精神的關係，而是特殊的物質的關係；如伊里奇所說者然，這種關係的存在『不依存於人們的意識，剛相反，而是後者依存於牠』（全集第一卷五九頁）。

把生產關係歸結到法權與交換的社會——民主派向工人隱瞞，交換形態與法權本身也由生產制度去決定的這一點。社會——民主派想以其『法權的』與『交換的』概念使勞動者捨棄了為布爾喬亞政權之毀滅與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之消滅而進行的鬥爭。由生產關係，由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分離出生產力的少數派，想宣傳在我國內生產力發展的放任，他們想給我國的資本主義關係之發展開闢『園地』，給無產者專政之毀滅與資本主義之復興造成條件。

低等靈長類的公認性，且是部分已既在進化中
相節著，而根本沒有負責之類之存在，所以在此種
論中，這樣的社會條件，便稱之為自然經濟。

第一篇 前於資本主義的構造

第一章 原始共產主義

第六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發生，

第一(前於氏族)時期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於千萬年前由高等的類人猿羣中發生出來的。由類人猿而社會人類的演化是因勞動在長時期過程的結果中發生的。

類人猿生活的條件，攀騰樹木與跳躍，必然會引導到這種猿類的前肢(手)能執行與後肢(足)的功能不同之特殊的機能；由此類人猿能立行。由類人猿的已解放出來的手在勞動過程中能執行較複雜的動作，能使用原始的工具，如石與棒，然後又能精製與使用較複雜的工具。

勞動的發展，手的完成與立行皆反映到人類的所有機構上去，同時，勞動遂進展到人類的基準。促進人們在社會之大大遇合的勞動，又引起語言之需要。『需要形成了器管：類人猿的不發達的喉頭發音很遲緩，但清晰，……口的器管逐漸一一學習單音』(柏格思，自然辯證法，五二頁)

勞動與單音語的發展引起人類的腦子及其神經器管之發展。

與動物不同，能製造精巧的生產手段且於勞動過程中使用牠，人類已能積極地在自然界活動，且改變自然。動物只能消極地適應自然，同時，人類則以克服自然俾滿足自己需要為目的而積極地在自然界活動。因此，人類不僅改變自然所提供的東西之形式且實現了其自覺的目的。『人們與動物……愈是不同，則他們在自然界的活動過程愈採取預期的，有計劃的，傾向於特定的，預計目的的行動之特性』（前書，五六頁）。

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上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怎樣的呢？

在這階段上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準以勞動之極原始的工具及因此而發生的其生產性之極低下為特徵。粗製的石器，尖棒就是用以獲得食物與抵禦環繞在原始人類之周圍的許多敵人的工具。這時期的人們生存在熱帶的與近帶熱的森林中，大部份則在叢林中，採取水菓，乾菓，捕獲小獸與飛禽以充饑。這時期尚無分工。僅存在着勞動單純合作之極原始的萌芽，幾個人在抵禦猛獸或採集食物等等時之共同的勞動。這時期的特徵是性關係的完全自由，其原則為：『任一女人屬於任一男人，而任一男人也屬於任一女人』。生產力之非常低下的水準使這些原始的人羣很不固定。其範圍與人數依存於該地方的菓品之豐盈，人類的移動也依存類似的條件。因無弓與矢，故狩獵帶有極原始的性質：原始人搜尋病的，老邁的，少的野獸，以石，棒擊殺之。由於生產力水準之極低下，由於生存競爭之無保證，不確定，遂發生人吃人，老幼之處死，其勞動力不能利用的俘虜之宰殺等的現象。

原始社會的每個個人均難制勝其周圍的自然，且不能單獨為其生存而鬥爭。這樣，生產力之低下的水準決定了尋獲得生存資料之集體的方法，而後者又決定了適應於牠的共產主義的分配。結合其勞動的

努力：共同獵獸，共同抵禦許多強人，抵禦自然之不利的現象，原始人在其安排中獲得了由許多個人力量之結合中所發生出來的，新的社會的生產力。由許多人共營社會勞動所發生出來的，提高原始人之能力的競賽也有很大的作用。

使原始人與自然作鬥爭，發展生產力的刺激物是對於消費滿足之企圖。馬克思與昂格思在『德國的觀念學』中曾指出，『第一歷史的事實，這就是為消費滿足所必需的手段之生產』。

第二種事實是，被滿足的第一種消費本身，滿足的行動及已獲得的滿足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馬克思與昂格思，全集第四卷，一八頁）。

家庭——血統的關係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上有特殊的作用。馬克思與昂格思把家庭——血統關係看成與勞動相等的地位。這仍可以生產力發展之極低的水準去說明之。

依昂格思的話說，人類社會的發展究竟以『直接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為基礎的。『但其本身有二種。一方面是生存資料，食，衣，住以及為這些工具所必需的東西之生產；他方面是人類本身，人種延續之產生。特定的歷史時期與特定國家的人們所由生活着的社會秩序是決定於這二種生產的：一方面，勞動，他方面，家庭之發展的程度。勞動愈不發展，其生產品的總額以及社會的財富愈有限，則血統關係在社會制度上愈表示出有統治的影響』（昂格思，家庭，私有權與國家的起源，第五——六頁，一九二三年版）。

這歸結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發展本身是在家庭，血統關係發展的形態中完成的。例如，如我們後面所見者然，原始的分工以性別與年齡為其基礎。

原始共產主義發展的第一個時期是前於民族的時期，是如我們所已指出那樣的無秩序的性關係的時期。伊里奇曾用『原始人群』這術

語於這個時期上去。

原始社會的往後發展，首先是按照勞動工具之大大地進步的路線而進行的。開始造成了擦皮的、磨石的、修理生產工具的等等之工具。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之最重要的步驟就是火的發明。昂格思曾說火的發明，『按其解放人類的意義說』實大於蒸汽機的發明。依昂格思的話說，火的發明，是『人類統治特定的自然力之第一件事情，因而徹底地使牠們由動物界分離開來』。

除掉砂石的工具外，又發生了骨器。用骨造成了骨簡，骨針，骨刀等等。弓與矢出現了。因而改變了尋獲生活資料方法的本身。遂能狩獵大動物了。

除狩獵外又發展捕魚的事情，其所用的工具則與狩獵的相同。因此，遂大大地發展了當作主要生產力看的人類自己。石器管進步了，腦子發達了，在很複雜而精確的手工生產中，主要的勞動器官——人類的手已很精巧了。能提高人類勞動生產性，提高當作生產力看的人類的意義的，新勞動習慣與方法形成了且堅定了。

生產力的成長在某種分工的發生中體現出來。這種分工是按照性別與年齡的路線而行的。如：漁獵由男子擔任，而採集菓食則由女子擔任。成年男子與兒童間的分工，也按照這同樣路線而進行的。以年齡的觀點看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開始分爲三群：青年群，凡未達到成年的兒童均加進這裏；成年男女群；聯合長輩的老人群。這種成爲所謂性結合之主權的年齡——性別的分類同時又是生產的分類。在年齡不同的人群之代表間的性的關係是被禁止的。但每一人群之內部則存在着自由的性的關係。這樣遂完成了由無秩序的性的關係而群婚制的轉變。這一轉變對於原始人類底生理的與生物的性質之改良表示有利的影響，而且提高當作生產力看的他底的质量。

由此又開始發生了交換關係之萌芽。在這裏，交換帶有偶然性。牠發生於各家庭，血統的人群間；那時在各個人群裏，爲自己而生產出來的生產品，偶然成爲過多的數量。這種在各群間偶然過剩物的交換尙未激起在本群的成員間之關係。

我們已知，單純的合作，即許多人之勞動努力的聯合在原始社會中協助着生產力之發展，而生產力的增長又鞏固了且發展了原始共產主義的關係。這很明顯地可以狩獵說明之。開初，武器很弱的原始人，僅能獵得小動物，至於大動物僅能獵得衰弱的，幼的，離群的。勞動工具的改良，尤其是弓與矢的發明遂形成了狩獵大獸——生活資料獲得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原始人住過的各個地方，發現了足以証明千百死象的殘骨。但狩獵大獸，例如巨象，野牛等等，就需要首先按照年齡與性別的符號之路線而進行的分工。

這樣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之發展引牠到所謂氏族時期，或依墨耳剛的有名學說的說法——野蠻時期。

第七節 原始共產主義發展的第三(氏族)時期

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家族——血統關係的發展，如我們所已知，是按照互相參加性聯繫的人群之較大聚集之路線而進行的。由群婚制過渡到所謂彭那魯亞——家族，這裡不許父母與兒女結婚，姊妹與兄弟結婚。昂格思描寫這種家族爲『特定家族周圍內部的夫婦共同體，然而由此派分出妻底兄弟，起自至親的，終及旁親的，夫底姊妹也如此』（家族，私產與國家的起源，第三九頁）。發生了母權制，即世系與承續皆按母系而被承認的這種家族——性關係的制度。

『在母權制下——昂格思說——那時，世系，當然僅按母系而被承認，而且根據承繼之原始的秩序，死去的族員為其女兒所承繼。財產應留在族內，不重要的東西可傳給至親的女輩，當然也可以傳給其母系的親房。但已死男人的孩子則不屬於其父族，而是屬於其母族；起初他們與生母的其他至親共同承繼她，後來，則可以最先承繼之，但他們不能承繼其父親的，因不屬於父族，而其財產應留其族內的。所以，如尊長已死，其群應首先轉移到其兄弟與姊妹，其姊妹底兒女或其姨母底後輩。其自己底兒女是沒有承繼權的』（前書，五五頁）。

母權制的存在可由二方面去說明之：一方面，由於在『特定家族群的夫婦共同體』之下決定生父的困難，他方面，由於此時婦女在生產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如婦女所經營的植物食料，於原始人的糧食手段之保障中佔很大的比重。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氏族期之特徵是促使人類定住的農業之發生。在農業中形成了所謂遷移的體系，這種體系是這樣的，耕種某一方土地，然後放棄再去耕種別方土地等等。

假使在前於氏族時期中僅存在着在這種意思——婦女埋植槐根且因而生長出一些植物——中的農業之萌芽，則現在很進步了：由槐根的埋植轉變到種子的散播，由用棒掘土轉變到所謂用鋤的農業，而在更前進中又由鋤進展到犁或耙。

在這時期中，我們又可看到牧畜的發生與發展，這開始是依據小動物的捕獲之循序而進行的：犬，山羊，綿羊，豬，然後及其他的大動物。

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又促成了由石器到鐵器的轉變，手工業萌芽了：鐵器的發明，陶工生產之發展等等。

所以生產力的大大發展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氏族期之特徵

。然而生產力的一般水準仍繼續留在需要保存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極低水準上。因而在氏族期中，我們看到生活資料的採集及其分配的集體方法之統治。

這就是敘述農業發展初期的土地耕種法的例子。

『二三以上的男子排成一列，以尖棒掘着地，每掘一下土即隆起一大塊。如遇硬土，則於同一地方再掘一下，土也就升起了。男子後面，隨着緩慢地膝行的婦女，她們手握堅棒擊碎為男人所掘起的土壤，在她們後面又跟着年齡不齊的兒童，以手碎土。這步工作以後，婦女以小棍於土上鑿成小孔且播以種子或根苗』（『原始社會』，『世界通史』文選，『氏族公社』章，一六五頁）。

這又是描寫捕魚的另一個例子。

『在奧洲的大河中——某個旅行者說——河水淺且清，大批漁人約有四十——五十人，每人皆以木製成的長可六呎一端甚尖の木標抓魚。他們圍成半圓形，連衣褲下水且在水中停留甚久。著者偶然看到三十人一批的漁翁，每小時中能抓到七八條魚，皆不下十五磅，有許多則在十五磅以上』（前書，一六八頁）。

狩獵，尤其是捕捉大獸也係如此的。

集體的生產方法決定了適應於牠的分配。再舉幾個例子看看吧。

『凡是家人——墨耳剛論依牢開氏人時說——狩獵與捕魚，耕種所獲的東西，全放在大庫房中；家人即依堆積着的物品為生。在每家中皆有火爐，普通每四間即有一個；火爐安放在走廊中且沒有煙洞的。每家經濟皆為主婦所指導。在各火爐旁準備妥當食品之後，即請她，而且她應把食料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於他們間』（前書，一七一頁）。

關於房子也復如此。房子由許多人，有時甚至由整千人建築起來的，在此且糾集了所有宗族。這一方面，可說是原始共產主義的消費

方法，而他方面，可說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因在原始的生產之下，這種房子只有許多人大衆努力才能建築成。

共同宴會，共同吃食以及其習慣，皆可說是共產主義的消費方法與分配方法。

生產力的繼續發展是在增大分工的基礎上進行的。除掉自然的，性別與年齡的分工外，又發生了在牧畜的宗族與農業宗族間的分工。牧畜族生產出肉，皮毛與牛乳等生產品。農業族生產穀類與各種植物的食料。交換因而發展了。假使起初，交換帶有偶然性，那末，由於各族開始了對於特定物品生產的大大專門化，交換遂成爲大地有系統的了。在被交換的生產品中，發生出，爲某族所不够開始與之交換而由別族生產出來的東西。由此逐漸發生出開始形成貨幣作用的東西。在許多族中，牲畜就形成了這種作用。

生產力的增長於族內分工的發達體現出來，族內分工引申到手工業的發表，手工業初則與農業相聯結，後乃與之分離。

氏族制是民主組織之最高階級。各姓皆選出酋長與軍長，但他們並無特權，有時且能爲本姓人與酋長評議會所撤換。

這種組織的最明顯的例子可於依罕開氏(在美洲)的宗族中看到。一族分爲八宗，每姓皆有爲其所選出的酋長與軍長；酋長的職務不是世襲的，在某時期內評議會或宗可以撤換他。在同姓間的配偶是不准的；僅允許在各姓的成員間之婚配。同姓中密切地結合着，休戚相關着，且爲了每一點侮辱，或爲了同姓中有人被害而發生共同的報復與復仇。因而往往發生流血的慘劇。姓評議會是成年人之最民主義的集會，男女皆可參加。然後由許多姓結合成宗，由宗的同盟組成族。

沒有壓迫，且統治着自由與平等的關係。

例如，墨耳剛說：『所有其成員皆是自由人，彼此應保持着自由

；在私權關係上是平等的，無論酋長，無論軍長皆不以任何財產自期；他們組成了聯合下輩的友愛，自由，平等，友愛是姓的主要原則，雖說任何時候皆無明文規定，而姓又是全社會體系之主要的細胞，有組織的印第安社會之基礎。這說明了自立性與個人財產之不偏不倚的感覺，這是每個印第安人皆應承認的』（引文根據昂格思真家族·私有權與國家的起源，一九三二年版，八八頁。

氏族制的進化經過偶然成對的家族而終結於一夫一婦制。故氏族關係的發展由群婚制進展到單婚制。

同時又完成了由母權制而父權制的轉變。『由於財富之增加——昂格思說——他們一方面，使夫在家中的地位比妻更為重要，他方面，又傾向於利用這優越的地位以改變其兒女承繼的秩序，這是不能達到的，當世系尚按母系而決定的時候。後者是應廢止的，而且牠已被廢止了』（前書，五五頁）。

為其基礎者乃在生產過程中婦女作用之減少。在生產技術發展與勞動生產性提高的影響之下發展了專門的男子的事業，如漁獵。由狩獵發展過來的畜牧也成為男人的事業。假使在當時，女子於農業中形成特殊用作的話，那末，由於種地工具的改良與家畜力的應用於農業，這些事業與手工業遂也愈益轉變到男子手中去了。以前在生存競爭中形成很大作用的家庭經濟的保存，現在成為從屬的意義，且減低了婦女的作用。他方面，初則趨於偶然配偶的家庭，繼則趨於一夫一婦制的轉變，又促成不能不按父系而計算世系。

這樣，就發生了昂格思所謂的婦女之舉世史的慘敗。

第八節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瓦解

如我們所已知，在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積極作用之下完成的生產力之增長，由分工的增長體現出：初則在男女間的，成人與兒童間的分工；繼則在牧畜族與農業族間的分工，終乃係在手工業與農業間的分工。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界限以前，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保存與發展尚屬必要的。但達到了這界限以後，原始共產主義體系的生產關係就開始阻碍生產力之發展了。同時就開始原始共產主義關係之瓦解過程。於分工增長中體現出來的生產力之增長引申到交換關係的發展。這已不限於在姓與姓間，族與族間外在關係的範圍，而發生於姓的內部且開始其分化。這種變化的結果，在氏族社會中開始了增大且鞏固趨於個人生產的，趨於私有權的傾向。

試以農業為例說明之。我們已知，以前牠使用怎樣的原始方法以及牠所需要的多少勞動量。事情根本不同了，當耜耨已出現且已開始使用家畜之大力時。以耜耨種，非二三十歲的男人是辦不到的，次則，因勞動生產性之提高，一小方土地能獲得較多的收穫。這造成了姓分化為更少的經濟單位的趨勢——個人生產的趨勢。

姓分化為許多家，這些家互相分離且開始獨立從事生活資料的尋獲。獨立耕種的土地開始轉變為私產。

各自的，獨立的家底總和組成了農村經濟的公社，其基礎已非氏族關係，而是經濟的與地域的符號。

農村經濟公社按其本質有二重性。一方面，牠保持了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殘餘，主要的為土地之公有。曠野，原林，喂牲口的草地皆為大家所公用，耕地雖分散於各家間，但並非這些家的私有物，而只一時為他們所使用且有一定的期限。他方面，在農村經濟公社中的每

一家又把其私的個人的經濟看作私有財產的基礎，看作生產的手段。房基，房屋，地上的建築物，農業經濟的收成，牲口——這些皆為家底私產。當然被生產成的物品也為家底私產。所以，我們於這裏看到個人生產與適應於牠的私的佔有。

這二重性：一方面，原始共產主義關係，他方面，滋長了個人生產與私的佔有之統治，這二方面的滙合引導到公社的瓦解。

『公社——馬克思說——在其胸臆中帶有促進牠的因素。土地私有權已以房屋與村落的形態浸潤其中了，並且牠還是會促使公有土地沒落的舞台。……當然，這是當作私的佔有之根源看的分散的經濟。牠給動產，例如牲口貨幣，有時甚至奴隸或農奴之集中以地盤。……』

為社會的原始結構之最後形式的農村公社，同時，又是到第二種結構的過渡形式，即由基於公產的社會到基於私產的社會之過渡形式。當然，第二種結構包括着基於奴隸與農奴上的許多社會』（『馬克思與柏格思文錄』第一冊第三版二八四——二八五頁）。

這就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路線。如根據上述而作成這樣的結論，原始的氏族公社無論何時且在任何條件下僅能發展到奴隸制，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這方面去，那就錯誤了。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在無產者專政的條件下，在其前面已開闢了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

說到喘息於資本主義的分化，瓦解過程，且保存着封建的特徵與在例如土地公有形態中的集體性的殘餘（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殘餘）的俄國公社時，馬克思曾認可『牠能不通過其康伏琴的險徑，而被由資本主義體系所作成的一切積極的利益而利用』（前書，二八五頁。）

然而，依馬克思底話說，『可由俄國革命而拯救在這種意義上的俄國公社』。這裡馬克思係指無產者革命說的。

馬克思底這種偉大的預言，光榮地在我們農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上，在集體化的經驗上証實了。

第九節 關於原始共產主義問題的布爾喬亞

亞理論與修正派理論之批判

在人類社會的曙光期，原始共產主義的存在，很明顯地證實了，私有財產與階級剝削不是在人類社會中任何時候皆存在着的而且只是在社會發展中歷史上過渡階段之特定的產物。

這就是企圖永久化財產私有權與階級剝削的布爾喬亞學者，力求以種種方法證明，原始人自其發生的第一天起即是財產私有者，而且他們又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型樣去描寫原始人的社會制度之所以然。例如布爾喬亞學者廷海肯定地說，原始人的勞動活動在於個人的尋求食物。拍拂爾在古代勞動工具研究的基礎上『証實了』原始人已知私有財產的原則，階級等等。

假使布爾喬亞科學是一致地否定在人類史的曙光期上原始共產主義關係之存在的。那末，牠在這種關係上爲於掩蔽的形態中闡揚布爾喬亞理論的社會民主派所重複。例如顧諾夫把原始共產主義解釋作消費共產主義而否定在生產過程中的共產主義關係。『毫無疑義地——他說——於奧洲的宗族中往往可以看到所謂消費共產主義。擊斃猛禽携回家的幸運的獵夫不能不把其中之相當部份該與遊民的成員。他底饑餓的朋友要求他允許他們共同吃食，而且在他不願意給他們或給他們太少的這種情形下，他們就會襲擊他，且向他強佔其所獲之大部份』。這裏顧諾夫很粗略地說明原始共產主義。其實，原始社會的消費共產主義本身也建立在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上的，而後者所以是

必然者又由於生產力水準之太低下。

反對原始共產主義存在之不可爭辯之事實的猛烈鬥爭的階級意義已由顧諾夫自己流露出來了，他把其原始共產主義的否定與「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勃興起來的革命工人運動之共產主義派」相聯成一氣。馬克思論及研究原始公社的布爾喬亞歷史學家時說，「他們甚至不止於欺騙」不是偶然的。布爾喬亞科學的罪惡與活怨毒因現代強有力地擴大了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增劇，布爾喬亞學者爲了要抹殺在人類發展的曙光期上原始共產主義關係存在的事實，不止於欺騙。

卜格唐諾夫在其著作中給原始共產主義以反馬克思主義的，機械論的解釋。

首先卜格唐諾夫不正確的限制原始共產主義於前於氏族時期，而把原始社會發展之後一階級看做與原始共產主義有別的，特殊的新形態(家長——氏族制)。

次之，卜格唐諾夫以所謂絕對人口過剩爲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狩獵人口的密度，例如一平方哩達到二十人，如果人口再行增加，即爲過剩，而這些增加的人口，就要遇着缺乏生活資料的問題。這就叫做絕對的人口過剩。

絕對人口過剩，引起饑餓，疾病，死亡率增加等一切災害。災害之力可以相當打破沒有生氣的不活潑的習慣，並使技術進步也有可能』。(經濟科學概論，二二頁，周譯本二三頁)。

這種提法所以不正確者，因實際上，並非人口法則決定了這種或那種生產方法，而是相反，生產方法形成了適應於牠的人口法則。

『一切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法——馬克思說——實際上，統攝了有歷史意義的特殊的人口法則，絕對的人口法則僅存在於動植物界，因這理於歷史上並無人類參加』(資本論，第一卷，一六五頁)。

此外，也不能以饑餓與死滅去說明生產力的發展。由這樣的說明，可以推論出，原始人愈益發展了生產力，即愈益由因饑餓而死的恫懾中解放出來，就更低落了且減弱了發展生產力的刺激。但事實上我們所見的則剛相反，人類愈益發展了生產力，愈由餓死的直接危機中拯救出來，更加速了生產力發展的速率。

第二章 奴隸制

第十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瓦解與奴隸制的發生

奴隸制是發展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瓦解的廢墟上的。決定奴隸制有發生之可能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達到的生產力之增長。這一增長使利用轉化為奴隸的俘擄底勞動力成為有利。

奴隸的第二個前提是出現於姓內的財產之不平等。兒子對於父親財產的承繼權引申到各家意義的加強與別家的財產之集中在這些家中。財富不平等的繼續成長又引申到家中成員的分解。債權者有出賣債務者為奴隸甚或擊斃的權利。貧窮的家人因而成為奴隸的來源。

在第一時期存在着所謂奴隸之家庭的或家長的形式。生產是在家長的家庭之消費的比較有限的狹隘的範圍中進行的。奴隸是家長家庭之最下層的組員。主人與奴隸共同執行着生產的勞動。所以，奴隸剝削帶着較和緩性。

但奴隸的利用擴大了個人生產的範圍。大大地增劇了且加強了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發生了不以消費之滿足為其任務的生產，而以交換為目的之商品的生產。由於分工的成長，生產力的成長而增高了且發生了貿易。最後，原始共產主義的家族經濟也被消滅了。如昂格思所說

，第三種分工發生了，這種分工是這樣的，即發生了特殊的人群——商人，貿易者，他們不從事於生產品的生產，只經營生產品的交換。

由於生產力，分工與貿易的發展，在富家中的奴隸由家長家庭之助理員轉化為替其主人創造剩餘生產品的主要生產力。同時又加強了採取更殘酷形態的奴隸剝削。

『可怕的——馬克思說——是成為古代的過分勞動。……強制的勞動，鞭笞工作者，這裏是過分勞動之『合法的形式』（資本論，第二卷，一六五頁）。

這就是引導到原始共產主義關係之瓦解與引導到社會階級分化之發生，引導到主人與奴隸，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發生的路綫之特徵。

在由原始共產主義的無階級的社會到有階級的社會轉變之下，任何民族均曾採取過這種或那種形態的奴隸制。當作獨立的經濟結構的奴隸制差不多於二千年以前存在於希臘與羅馬，牠們在當時不但統一了現代希臘，意大利以及在地中海濱的那些國家之領地，且佔領了西歐，北非的大部分與亞洲的一部分。

到奴隸制的轉變不是和平地進化的而是以革命的方法推進的。

原始共產制之瓦解與家長奴隸之發生的古希臘時代還保存着氏族
的組織。同姓者為親屬所承認且以被選出的族長為首而有一般的組織。
。土地為同姓所共有且僅分配給他們以供一時的使用。姓休戚相關地
應和着其成員之舉止，同時又為其保護者；管理着普通的慘案。但
這已不是昂格思所說的民主的氏族制。現在已有充分地深刻的財產分
化。產生出於經濟上更強有力的民族的貴族，他統治着其他大眾。權
柄大大地轉化為族長評議會，氏族貴族的代表所有。族民大會已成過
去的了。在其手中握有特權的民族的貴族利用這種特權以增加其財富
：她加強了奴隸剝削，使經濟上力弱的家庭依賴自己且破產了他們。

牠訓練了海上的戰士。氏族貴族底財富與經濟力之增長對立着不能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貧民之破產。

結果，氏族制於實際上已瓦解了。

在增進分化的基礎上發達了非氏族貴族群的新富有的家族。奴僕由於分工的增長，由於交換的成長突破了家長的奴僕之界限。爲氏族貴族所破產的許多小生產者也不願意與轉化爲在氏家族貴族手中的壓迫和剝削工具的氏族組織之存在相妥協。所以爲氏族貴族所小心地保存的氏族組織的殘餘極尖銳地對立着發展着的分工，貿易，大奴隸所有權。建立在氏族傳統上的氏族貴族制處在生產力發展的道路上，處在奴隸經濟成長的道路上了。牠於紀元前七——六世紀時已被革命的變更所廢。反對沮止個人生產，貿易與大奴隸經濟之發展的氏族殘餘與氏族貴族者，一方面，是於經濟上日益抬頭的奴隸主，他們於這次革命中形成領導的作用，他方面，有已破產的與難免破產的小地主大眾。

革命變更的結果，是自由處理財產，有權把他傳給非同姓者，國民之地域的分配已代替聚族而住；聚族而住的原則取消了，引用合法的處罰，禁止以借款者人格抵押的放款。所有這些革命的辦法均給氏族制以打擊且給大奴隸生產之發展造成路途。

所以雖說參加反對氏族貴族之革命鬥爭的不僅是新形成的奴主，還有大批小地主，但利用勝利之成果的却是奴主。

隨氏族貴族之消滅開始了伴同着小生產者大眾——他們不能制勝廉價的奴隸勞動之競爭的——之破產的奴隸生產之勝利的前途。

第十一節 奴隸制的生產方法之特徵。在希臘與羅馬帝國中的大奴隸生產之發展。

奴隸剝削的特徵是，奴隸沒有生產手段且無權支配其勞動力。他自己及其勞動皆屬於奴主，奴主以非經濟的強制方法迫使奴隸工作。

奴主佔有奴隸全部剩餘生產品。一切生產工具——土地也在內，在奴僕的原始形態下，連直接生產者也在內——的私有者，由工人身上直接榨取全部剩餘勞動，這種勞動，這裏，已物化於剩餘生產品上了。（資本論 第三卷五七九頁）。

奴主力圖於極短期內由奴隸身上榨取出為勞動力再生產所不允許的剩餘生產品之最多的數量。

『奴主購買其勞動者與他購買其馬一樣。與奴隸相關聯，他又費了資本，這是用在奴隸市場的新支出。……能為人們的以奴隸流通的一定契約的——因他們混同了主人利益與奴隸的保存——經濟緣由，隨奴隸貿易之施行，反而轉化為對於奴隸的極殘酷關係之原因。既然他能由販賣黑奴者購得新奴隸，故奴隸生命的延續成為次要的了，比之當他活着的他底生產性。所以，在奴隸進口國家的奴隸經濟的法規是這樣的：最實在的經濟在乎：於盡可能的短時期內由人類牲畜 (human cattle) 榨取盡量大的勞動量』（資本論，第一卷，一九二頁）。

既然奴隸是與為他藉以工作的工具很少不同的物品，工具，那當然，高度的勞動生產性是說不上的。

『這就是——馬克思說——昂貴了基於奴隸的生產的原因之一。勞動者，按古代之正確的說法，僅當作 *instrumentum vocal*（能說話的工具）與當作 *instrumentum semivocale*（叫囂的工具）的動物不同，與當作 *instrumentum mutum*（無音的工具）的無生物的勞動工具不

同的工具。但工人自己則能感覺到動物與勞動工具，他不與牠們相似，他是人。臭惡地隨牠們，適應於其損失的真實的淫逸而流動，他能明白與牠們的區別。因而為經濟原則所認可的這種生產方法只能採用極粗的，極蠢笨的勞動工具，就因其極粗劣與蠢笨性更難附合損壞了！（前書，一三四頁）。

在古希臘，例如紀元前五——四世紀，奴隸勞動的剝削達到很大的發展，在農業，工業，商業，家庭經濟中皆以僕役等的性質而採用奴隸。獲得大普及的奴隸的工業企業，是有幾十奴隸且用極粗劣的原始技術的手工作坊。奴隸不能信任某種複雜機械的，因他們憎恨自己的不自由的勞動，不經意勞動工具且往往故意損壞。

在羅馬帝國，奴隸的工業企業還比不上農業的發達。工業品的大部份皆由希臘獲得的。在羅馬，大奴隸生產之較大的發展，在城市的，建築的與軍事的工業中達到了。這裏在農業中發展了主要的大奴隸生產。例如，四世紀末，羅馬帝國造成了採用大批奴隸的大奴隸的工作場。凡是有整千奴隸工作的地方就是大工作場。在意大利的有些地方，每一自由民家皆有十個奴隸。

發展了的大奴隸生產比之小獨立生產者底生產有許多優點。與資本主義社會——那裏大生產的優點以較高的技術與較高的勞動生產性體現出來——不同，在奴隸社會中，大奴隸生產比之獨立小生產者底生產之第一的且主要的優點在於勞動力之相對的低廉。第二原因應於奴隸之野蠻的剝削中去找。此外，大奴隸的生產，技術雖低，而規模則比小生產大，故有可能利用許多一塊勞動的優點，減少靡費，進行分工等等。更注意到，大奴隸生產對於商業——高利貸資本——這破產了農民與手工業者底小生產——依賴性極小。

大奴隸生產的發展伴同着小生產者——貧民，他們最後轉化為所

謂流氓無產者——大眾之破產。

『開始——馬克思說——這是在其自己土地上耕種的自由農民。在羅馬的歷史上他們逐漸被剝削，同時，使他們與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那種運動本身所牽引出的不僅是大土地私有權之形成，還有大貨幣資本之形成。總之，在這曙光期中出現了，一方面，除掉對於勞動的能力以外，喪失一切的自由人，他方面，這勞動的剝削者，獲得一切財富的所有者。怎樣進行的呢？羅馬的無產者並不成爲僱傭勞動，而是成爲甚至比北美南部『赤貧者』(Poor whites) 道德水準還要低下的流氓 (mob) 同時，發展着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而是奴隸的生產方法。』。(馬克思與恩格斯，信集，三一一頁)。

總之，大土地私有權的所有者之成長，一方面，引導到大奴隸企業之形成，他方面，引導到特殊的流氓無產者，憎恨勞動的流氓階級之形成。

第十二節 商業與貨幣高利貸資本在奴 隸社會中的作用。在奴隸社 會中的不生產者底消費

我們已知，商業在大奴隸生產之發展中形成不少的作用。造成大量剩餘生產品的大奴隸生產，又爲了這些生產品的實現而要求市場之大大發展。真的，在希臘與羅馬，我們看見了商業之大發展。在希臘某幾個商港每年的貿易額達到幾百萬元，而希臘一般的貿易額，每年達到萬萬元之鉅。希臘的進口貨大都爲穀物，牲口，魚，皮，木材，象牙等等；出口貨爲手工業品，工具，奢侈品，葡萄酒，橄欖油等等

。集中在希臘城市的國內商業也獲得很大的發展。在羅馬帝國，尤其是在意大利進行着與東方各國之大的貿易。這裏，進口的主要物是奢侈品。

商業本身是不能造成任何新的生產方法的，牠分解了國內經濟且協助着商品生產之發展。『但牠影響到舊生產方法之瓦解上去的程度如何，這首先就依存於其堅定性與國內的制度的。至於說，這瓦解過程引申到什麼，即以那種新的方法去代替舊的方法，這不依存於商業，而依存於這舊的生產方法本身之特性』（資本論，第三卷，二三二頁）。

商業怎樣影響到奴隸制的生產方法上去的呢？

在牠協助大奴隸生產發展以前，牠造成了加強剝削奴隸的刺激且促進小生產者之破產。

大奴隸生產與商業之發展又引起貨幣—高利貸資本之發展。發展了地域的與外國的商人之貿易活動。隨商人的貨幣積蓄，開始採取高利貸。由這些商人中發生出更富有的，這乃形成了大交易所。開始抵押放款，且保藏質物給予質券以完成典質的行爲等等。因而又形成了有時有千萬元資本在其支配下的銀號。貨幣—高利貸資本在羅馬帝國形成偉大的作用，在那裡牠爲其發展找到順利的地盤——這首先就是由於爲牠所奴視與剝削的廣大地發達的小地主。他方面，貨幣—高利貸資本的發展資助了廣大可能的租借體系，即羅馬國家交付放款與牠的人以租稅徵收權。『高利貸——馬克思說——不曾改變生產方法，但如寄生蟲一樣在侵蝕牠，且使他完全死亡。牠吸吮其血汁，吸盡其血汁且使之在極可憐的條件下完成再生產。故對於高利貸的增恨，極普遍於古代世界，那裡，生產者對於其生產條件的私有權，同時，又是政治關係的基礎，公民底政治獨立性之基礎』（資本論，第三卷，四二

八頁)。這種高利貸資本使奴主依賴自己且剝削了小生產者，高利貸迫使奴主走上盡量加強剝削奴隸且盡量加強剝削小生產者，農民與手工業者的道路。

『奴隸或封建紳士——馬克思說——吸吮得債務很大，因其自身吸吮出很大。或者，他底地位最後為高利貸者所篡奪，後者如古羅馬之騎士似的成為地主與奴主。在剝削多少帶有家長性——因主要的工具是政法的權力——的舊剝削的舞台上出現了粗暴的不速之客。但生產方法本身則未變更』(全上)。

雖說商業——貨幣關係的比重很大，但奴隸的生產方法之基礎則仍屬於經濟之自然形態。

為奴隸剝削之基礎的，首先就是非經濟的壓力，或如馬克思所說，『以直接生理的壓力的方法對於別人勞動力之自然的佔有』。這是與資本主義經濟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工人是以其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的。

次之，奴隸經濟所生產出的生產品之大部份消費於其經濟中，尤其是農村經濟。出賣的首先為剩餘生產品之餘額。

假使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統治趨勢是生產擴大與生產消費之成長，那末在奴隸經濟下統治着所謂非生產的消費。奴主把生產品的大部份用在不生產的支出上，譬如用在奢侈品，大紀念物之建築，宗教事業上等等。這裡是為統治階級的特徵的是愚笨的靡費，非凡的宴會，空虛的生活，剛愎等等。所有這些奢華皆與剩餘生產品——就是盡量由剝削奴隸而得到的——之不生產的消費聯結着。

所以，奴隸制的商業——貨幣關係的發展水準雖高，作用雖重要，但我們有一切理由，認為奴隸的生產方法主要的是自然的生產方法，在這裏，商品——貨幣的關係僅有次要的作用。

第十三節 奴隸社會的階級矛盾

奴隸社會之主要階級是奴主與奴隸。

這些主要階級以外，還有農民，他們或者是自由的地主（有時則握有出租的土地）；或者依賴大地主；他們以外，還有小而獨立的手工業者與破產的沒有財富的自由公民（流氓無產者）。

這些階級的地位是怎樣的呢？

說到奴隸，那末，如我們所已知，他們並不被視為人，而是『能說話的工具』。其地位是等於載貨的牲口的地位，有時還不如，假使牲口的私有者尚留意到牲口之再生產的，那末在羅馬帝國的條件下，因為隨時可以獲得奴隸或廉價購買奴隸，故奴主從未想到奴隸的再生產。按照對於奴隸的關係，什末樣都可以的。奴隸的觀念是對於家長的氏族關係之迴想，甚或對於小生產的繫念。

至於說到自由民，小農與手工業者，那末，他們已在大奴隸生產的競爭的影響之下破產了，處在奢侈者的羈絆之下，担負一切戰役與賦役的重責。

再沒有嚴重於流氓無產者底地位了。如果在羅馬與在大城市中心地，他們參加着政治鬥爭且依富有者的殘飯餘湯以生存的，則在邊省中，他們底地位更為嚴重了。無棲處無食物，他們扶老携幼遍行全國以求乞。他們是特殊的人，無論如何不會注意到自己階級的利益的。喪盡生產的勞動，以殘飯餘湯為生，他們獲得了不勞而獲的寄生的心理。在他們與奴隸間很少共同點的。他們牽進政治漩渦，生活於富人的殘飯餘湯的這種情景，引導到，在許多情形下，他們準備與其「慈善

家」合力去反對奴隸。他方面，他們所處着的——尤其是在邊省——嚴重的地位，又引導到，他們只能掠奪，但這是沒有多大效果的。

至於說起統治階級，那末，我們在那裏看到，對於糜費，對於愚蠢的奢侈之無厭的追求，完全脫離一切生產的勞動，以勞動為奴隸的事業，非自由人所應執行的。不僅體力勞動，連領導的機能，甚至文化與科學的業務，皆叫奴隸，尤其是叫希臘人去執行。因而更發展了奴隸社會的統治階級之寄生主義與末落了。

第十四節 奴隸制之滅亡

我們知道，奴隸制比之為他所廢棄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更使生產力往前發展了。奴隸生產比之原始共產主義生產與小的個人的生產有許多優點，牠能採用大批廉價的勞動力且極慘無人道地剝削牠，牠能採取單純的與局部複雜的協業。但因奴隸制並未造成使奴隸提高其勞動生產性的任何刺激，故牠不能使技術有多大的發展。依馬克思底話說，大體上，奴隸制尚未超脫徒手勞動。所以，奴隸制能進步地發展的界限，是極有限的。

加強奴隸剝削的一切可能性，在大奴隸生產中共同勞動的新形態之採用，已被利用了，則繼續發展只有按照生產技術本身之提高的路綫才可能。但奴隸制是不能走上這一步的。因了包含於奴隸剝削體系本身中的矛盾——這種剝削使統治階級把一切生產的勞動當作非自由人所應執行的事業，而對於奴隸又不能造成使他走上提高勞動生產性的道路的任何刺激。

奴隸制的生產方法已達到其發展之充分階段了，牠已不能在很少

生產性的奴隸勞動的基礎上更往前發展了。大奴隸生產遂成爲很少利益而很多害處了。

『古代奴隸——昂格思說——殘存着，無論在大的農村經濟中，無論在城市手工業中，牠皆得不到足以彌補已耗費掉的勞動之收入』（家族，私產與國家的起源，一九三二年版，一五一頁）。

這種情形由大的羅馬的農業之瓦解，由在奴隸與奴主間的，在大奴隸生產與小生產者——農民，手工業間的階級鬥爭之激化體現出來，最後由在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之叛亂體現出來。

大的奴隸工作場分解爲小方土，奴主把這些方土於特定的條件下給與小農，因而這種小農就由自由的小生產者轉化爲殖民，不獨立的農民——農奴的前身。

『在帝國時代的羅馬農村經濟之發展，一方面，引導到面積很大的牧地之擴大，引導到國家之分割，他方面，又引導到地產之劃分爲移入殖民的小租地。——昂格思說——這種發展的結果，形成了不獨立的農民——後來農奴的前身之卑下的經濟，因而就形成了這樣的生產方法，在這裏萌芽着統治中世紀的生產方法』（昂格思與考茨基，合法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一九二三年第一期五七頁）。

所以，在奴隸制的胸膛內萌生出封建的關係。

使奴隸制崩潰之決定的因素是奴隸之革命的暴動。

暴動走遍了奴隸的生產方法之全部歷史。其中有幾次的暴動，例如抓住大批被壓迫的大衆的斯巴達的暴動，轉化爲直接的戰爭且動搖了羅馬帝國的強有力基礎。在許多情形下，奴隸暴動皆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暴動，最後甚至與殖民的暴動相聯合。在他們間大大地形成了共同的語言，因在奴隸生產方法之下，他們皆是被剝削的。然而，奴隸階級與小生產者——農民與手工業者——皆不能成爲新生產方法之

担負者的階級：他們底暴動帶有盲目性，無組織性，不是且不能是那能推動這運動且按照別的路線去引導牠的領導的力量。

但奴隸暴動究竟是奴隸制瓦解與滅亡之決定的因素，農民暴動形成資助的作用。與羅馬帝國之瓦解同時，又大大地開始，當兵的日耳曼民族，希臘人與羅馬人對外族人所叫的『野蠻人』之進攻。結果，減少了奴隸的支流。日耳曼人的進攻羅馬帝國，得到羅馬社會的各級人等，首先為奴隸，農民，手工業者，尤其是殖民之大大的同情。

勝利本身不能產生任何生產方法的。他只強化或沮止包含於這種或那種生產方法中——在該種情形下，係包含於奴隸生產方法中的趨勢。日耳曼人戰勝羅馬帝國的事實很速地發展了封建的趨勢，這種趨勢原已發生於且發展於日就衰落的羅馬帝國的胸膛中，與日耳曼民族的胸膛中。

『封建主義——昂格思說——完全不是以現成的形態，由日耳曼人轉移過來的；牠的發生根源於勝利時之野蠻軍隊之軍事組織，僅在勝利以後……才發展到現在的封建主義』（馬克思與昂格思，全集，第四卷，六四頁）。

這樣，軍隊組織的本身帶着封建主義的種子且以其助力加速了早已存在於羅馬社會的胸膛中與日耳曼民族的胸膛中之趨勢。奴隸革命與日耳曼人戰勝羅馬帝國的結果，遂強度地發展了封建主義的生產方法。

奴隸組織是人類社會發展之必需的進步的階級，昂格思曾以下列的話闡明了這點：

「奴隸制……曾為由舊的公社生活轉化過來的一切民族底生產之統治的形態且包含着主要的原因使之末落。只有奴隸制才能造成在農業與工業間之廣大的分工且因牠才繁榮了古希臘世界。如無奴隸制就

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文化與科學；如無奴隸制就不能有羅馬。而且如無萌芽於希臘與羅馬的基礎，就不能有現代的歐洲。我們不應忘記，所有我們底經濟，政治，精神之發展皆由過去的情況蟬變過來的，而在過去的情況下奴隸制又屬必要，這是誰都承認的。在這種意思上我們有理由說，如無古代的奴隸制就不能有現代的社會主義』（駁杜林論，一二九頁）。

第十五節 關於奴隸社會底布爾喬亞見解之批判

各學派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均極注意奴隸社會問題，且以種種方法去擁護資本主義。例如貶海根據其經濟史的行程——生產品由生產者到消費者所由進行的——之解釋，把奴隸制描寫作一成不變的『家庭經濟』，又以同樣的方法，把資本主義當作能無限制地發展其生產力的經濟體系。

我們知道，與貶海底理論相反，為經濟底主要的自然形式的奴隸制，同時有很發達的（比之原始共產主義）商品——貨幣關係，在奴隸社會中的生產力比之以前的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也達到很大的發展，於此包含着人類社會更發展的始基。

別個布爾喬亞的學者——梅拉，根據奴隸的生產方法，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等，証明，大體上人類社會是循環地發展着的，在其發展中牠不能不——再次重演。本質上，由梅拉底見解，可以推論出，由資本主義重新回復到野蠻時代，然後再度開始這循環的可能性。否定人類社會之進步發展的梅拉，力圖永久化剝削，証明共產主義的不可能且於觀念上解散生產者。這就是其理論的階級意義。

梅拉忽視了在基於非經濟的強制之奴隸剝削與基於工人出賣其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剝削間之根本的原則的區別。

與梅拉所承認的相反，人類發展的歷史所忠實地告訴我們的不是循環性，而是人類社會之不斷進步的發展。以這種觀點看去，原始共產主義，產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皆是引導人類到為蘇聯所建設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梯階之史上必需的階段。

由種族論出發的法西斯『學者』以羅馬種族的優秀份子之死亡——由於文化皆為羅馬社會的下層人所執掌——為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依他們底意見，進步的救主是戰勝羅馬帝國且創造新的中世紀文化的日耳曼人。我們知道，問題不在於這或那民族之種族的特徵，而在於使奴隸制滅亡而且應由新形態——封建主義去代替其地位的經濟發展的法則。以日耳曼人為人類救主的說法是法西斯者為宣傳愛國主義，為與共產主義鬥爭，為準備大戰所必需的。

社會—民主派在其解釋奴隸社會時曲解了馬克思學說。例如，考茨基以戰爭為奴隸社會發展與滅亡之主要因素。『最後——他說——我們又可以戰爭為獲得必需的廉價勞動力之工具。希臘國家與羅馬的歷史明顯地證明，文明的提高最後又依存於其戰鬥力的大小』（史的唯物論，第二卷，二三九頁）。

考茨基底見解純是機械論的，牠不以奴隸的生產方法之內在矛盾，而以外在因素——勝利為出發點。我們曾說起，戰勝當然可以是加強為該種形態的經濟所有的這種或那種趨勢的因素，但不能產生新的生產方法。因在奴隸制底胸膛中已發生封建關係的趨勢了，故戰勝資助了這種關係的發展。但牠本身則不能產生封建主義。

在社會—民主派的『科學』中我們又看出了奴隸暴動所形成的革命作用之被忽視。俾殺醫奧諾維支在其在集體農場，突擊隊員大會上

的演說中指出奴隸革命在奴隸的生產方法的末落中怎樣形成偉大的作用，不是偶然的。

在資本主義體系底普遍危機與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目前條件下，布爾喬亞學者企圖以奴隸革命比作無產者革命，想『於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証明，多數黨不能創造新制度，僅能破壞布爾喬亞的文化而已。尤其傳揚，無產者革命與古代革命頗類似，牠們皆無任何根基。

無產者革命並非發生於為奴隸制的技術基礎之手工業上，而是發生於為社會主義建設之先決條件的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與社會化的大生產上。不是無前途的，迴念着家長氏族制的奴隸階級，而是高呼着覺悟其階級利益與其偉大的歷史的任務——無產者意識之將來的無產者革命。不是叛徒的烏合之衆，而是世界的共產主義的黨。不是散漫的無組織的奴隸暴動，而是不偏不倚地且不屈不撓地日益開展着的世界無產者的革命。最後，又有促使無產者革命勝利的牢不可破的柱石——蘇聯。所有這些皆是說，英雄地與法西斯的反動相鬥爭的世界無產者不與且不能與古代奴隸相同。牠勝利在全世界中，粉碎了資本主義奴役的地盤，建立其無產者專政且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改造世界。

第三章 封建主義

第十六節 封建的剝削形態之一般特徵

如我們所已知，封建主義由於奴隸制之瓦解而發生。

封建剝削的基礎是封建的土地私有權。封建主佔有直接生產者底——在地租形態中的奴役的農民底全部剩餘生產品。

『土地私有者底收入——馬克思說——不管叫牠做什麼，為牠所佔有的自由的剩餘生產品這裏皆是通常的與統治的形態，在此直接佔有了所有不支付的剩餘勞動，而土地私有權乃為佔有的基礎』（資本論，第三卷 五七九——五八〇頁）。

我們可以伊里奇底話，說明封建剝削本質之古典的特徵。

『農奴的或徭役的經濟體系——伊里奇說——在某點上與資本主義體系是一樣的，即在這一種體系中，工人均僅獲得必需勞動的生產品，而把剩餘勞動的生產品毫無代價地給予生產手段的私有者。農奴的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的體系之區別有下列三點。第一，農奴經濟是自然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是貨幣經濟。第二，在農奴經濟中，剝削的工具是工作者對於土地之繫屬……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工作者底由土地解放出來。為了收入（即剩餘生產品）之獲得，封建——地主

於其土地上應有握有農具，家畜的農夫。無土地的，無馬匹的，無經濟的農夫——就無農奴剝削之有利的對象。爲了收入（利潤）之獲得，資本家在自己底面前應有無土地的，無經濟的，不能不在自由的勞動市場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工人。第三，分得土地的農夫於人格上應依賴地主，因握有土地，他僅能在強制下進行徭役的工作，這裏經濟體系發生出『非經濟的強制』，奴役，法律的依賴性，不平等，等等。反之，『意念的』資本主義是在自由的市場上，在有產者與無產者間的契約之完全自由』（全集，第十二卷，二二六，二二七頁）

所以，伊里奇在此指出封建剝削之三種主要特徵：第一，農奴經濟是自然經濟，第二，封建的農夫是生產工具與手段之所有者或私有者且由地主方面領得必需的土地，最後，第三，封建的農夫處在對於封建主的『非經濟的』，法律的依賴性中。

如我們所已說過似的，封建主於非資本主義的封建的地租形式中佔有了封建農夫的剩餘生產品。這種地租與資本主義的根本不同。區別在於，資本主義的地租不外是放進地主口袋中的，平均利潤的餘額（註）；而封建的地租則包含着封建農夫不能不給納其封建主的剩餘生產品的全部，甚至還有必需生產品的一部份。

〔註 在論及資本主義地租的那篇中，我們將詳細地闡明這個問題。〕

馬克思把前於資本主義的地租分爲三種形式：勞役地租，生產物的地租與貨幣地租。

在勞役地租下，農夫應以一部份時間在地主與地主的土地上工作，以一部份時間爲自己工作。所以，他以於空間上與時間上不同的勞動之直接形態支出其剩餘勞動。

地租的第二種形式——生產物地租。在這下面，農夫底全部時間皆在分給他的那方土地上耕種且以地租（勞役）的形態，把爲他所生產

出來的生產品之特定部份給予封建主。以剝削之本質的觀點看去，這裏並無什麼變化。這裏的區別，第一，生產物的地租証明了生產力發展的水準之較高，勞動一般發展的程度較高。第二，生產物的地租是以直接生產者——封建的農奴農民——較自由地支配其勞動為前提；這裏，封建的農民能較自由地支配其時間，僅應以特定量的生產品，免役賦，給予封建主。

非資本主義的封建的地租之最後一種形式是貨幣地租。在這種形式下，生產者給予地主的已不是生產物，而是貨幣，為此應預先在市場上出賣為他所生產出來的生產品之特定部份；同時，封建主所得的也不是生產物本身而是這部份生產物底價格。

地租之貨幣形式的發展，是以發達的商業，多少發達的商品——貨幣關係之實現，結集的一般價格之實現為前提。地租的這種形態乃封建的生產方法已瓦解的階段之特徵，這時已發生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在其繼續發展中——馬克思說——貨幣地租必然會引導——處在中介形態中的，例如，小農承租者的形態——到土地之轉化為自由的農民的私產，或者引導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形式，引導到由資本主義承租者來支付的地租』（資本論，第三卷，五七五頁）。

由我們所舉出的地租的三種形態往往同時並行：勞役地租與生產物地租並行；貨幣地租與上述二種形態地租並行。但在封建主義發展的各種階級上，重要作用則屬於某一種特定形態的地租。所以，如馬克思所說，形態的發展有一定的承續性。

地租的三種形態體現出封建關係發展的三個階段。

封建的剝削比之奴隸的剝削是較進步的形式。假使奴隸剝削並不包含着對於提高勞動生產性的刺激，則封建的剝削已包含着使農民發展生產的一些刺激——雖很有限。

我們已知，農奴底一部份時間在地主土地上工作，而他部份時間則爲自己而工作。他以以最大的生產率利用這第二部份的勞動時間爲有利。

『爲直接生產者自己所支配的一星期中其他幾天的生產性——馬克思說——是可變的大小，這必需發展於其經驗過程中——爲他所知道的極新的慾望，能提高其勞動力這一部份的利用之保證的，其生產品的市場之極擴大均係加強勞動力緊張性的刺激，但不應忘記，勞動力的這樣利用絕對不限於農業，而且包括着古代的家庭工業。所以，這裏有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自然是依存於多少順利的環境等等』（前書，五七二頁）。

由於地租的某種形式到他種形式的轉變，農民底利益遂隨其勞動生產性之提高而增加。然而，這種利益是極有限的，因地主的願望，其剝削均引導到，他所佔有的不僅是農奴之全部剩餘生產品，而且還有必需生產品的一部份。所有這些，皆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樣，『這裏有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第十七節 封建社會的發展 在封建主義下的城市 商業的作用

由奴隸制到封建主義的過渡，起初的確降低了生產力的水準，破壞了文化。這是與奴隸生產的瓦解相聯貫的。『羅馬帝國的末期與野蠻人戰勝羅馬的時候——馬克思說——破壞了許多生產力：農業落衰了，工業因銷路的闕如而緊縮了，商業停滯了』（馬克思與昂格思，全集，第四卷，一四頁）。在奴隸制的廢墟上生產出來的新的封建主義的生產方法不能立即把包含其中的發展的可能性全行發揮出來。所以，足爲封

封建主義的第一階段之特徵者是趨於濟濟的自然化與均田化之趨勢。甚至上等人——封建主底消費均較粗劣。在其破碎中新發生的經濟體系是自然形態的經濟，這種經濟本身以其自己的生產來滿足一切消費。在大封建主義的宮庭中，有其工匠工作着，女僕紡着紗，疏着麻，織着布，縫着衣服。封建地不自由的農民以其勞動與現物給封建主以種種的貢納。有其自己的鞋匠，織布匠與其他的手工業者。

所有這些決定了封建經濟在其經濟的第一階段上的自然性。因而手工業是附屬於農業的生產。

在封建的階層中也有着特殊的法律的等級：較老的諸侯，新起的諸侯，及其家臣等等（在我們中國中古時代，則分爲公，侯，伯，子，男等爵——譯者）。在這種法律的等級的基礎上橫陳着封建的私有權之合法的崩潰。握有大量土地的較大的封建主列爲最高的等級，領地較少的封建主則降爲依存於前者的家臣且佔低下的地位。

在封建主與隸屬於牠的農奴間進行着不斷的階級鬥爭。在鬥爭過程中封建主再三地克服了農奴大眾。他方面，又進行着封建主間的鬥爭。由此，大封建主按排了不大的封建主底與小封建主底家臣的依附性。

封建關係的發展是按照分工的增長，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這路綫而進行的。

『以商品交換的方法而實現的主要的所有較發達的分工——馬克思說——是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可以說，社會底全部經濟史概括在這對立性的運動中』（資本論，第一卷，二六六頁）

最初，手工業完全與農業相聯結。後來，在封建領地中的分工之增長與商品關係的發展促使手工業與農業分離的增長。發生了分離出的手工業。一部份手工業由於封建主的許可傾向於分離的工業，由這

領地到那領地，由這村到那村。手工業的發展引導到與之密相關聯的銷售市場的必要。這種銷售的市場是最大封建主的所在地，寺觀的所在地，於此大大地吸引了手工業者。在銷售市場的周圍開始造成市場的中心。在這些城市的中心，手工業者找到了其手工業發展之較便利的條件。原來爲這個或那個封建主所私有的城市，由於自己底成長，遂大大地由封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免除了許多義務。城市迎集了流動的農奴的手工業者。在中世紀有句俗語「城市空氣給人以自由」，並不是偶然的。

在封建的城市中有着各種社會的集團：第一，所謂拍特里枝，其中包括大商人，高利貸者等等；第二，由作頭，中小商人組成的中等市民，第三，工匠，學徒等大衆。

在封建城市中的手工業有行會的組織。各行會皆聯合了同一職業的手工業者。行會不僅干涉手工業者底經濟生活，且干涉其私生活。這是高度的等級組織。爲免除競爭計，行會制約了商品底價格，決定了在手工作坊中的工匠的人數，爲各手工企業所許可的生產品之質和量。行會規定了在作頭與工匠間的關係。手工作坊的內部組織是這樣的：手工作坊的領袖是其所有者——作頭。二——三個學徒或工匠在那裏工作着。學徒與工匠應依一定的層次而升，其年限爲行會所規定。根據一定的年限，工匠可升爲作頭且有權開設其作坊。本質上，行會是作頭的組織。作頭有大權統治學徒與工匠。行會的章程於作頭的利益上規定了工匠的勞動條件。行會——章程不理學徒或工匠方面的控訴。事情甚至達到這地步，作頭有權扣除學徒或工匠之相應的報酬以轉與他人。

所有這些以非經濟的方法決定手工業生產底嚴格的且極瑣碎的規約，這種生產內部的法律（作頭，工匠，學徒）在各手工作坊間自

由競爭的例禁皆證明着城市行爲手工業的封建性。

『在…封建社會中——馬克思說——工業本身，其組織及適應於牠的私有權的形式多少帶有土地私有性；〔社會〕，或如古羅馬時代，完全依存於農業，或如中世紀把農業組織的原則轉置於城市與城市關係中去』（政治經濟學批判，四四頁）。

這樣組成封建的生產方法之有機部份的中世紀的城市，如我們所已見，是封建主義崩潰底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發生底最要因素之一。

在封建主義時代，商業達到重大的發展。在封建主義底初期，商業主要的是對外的且未深入封建領地底經濟關係之內部。商業底主要對象是由東方各國運入的生產品，而且最重要的是奢侈品，例如，珍貴的織物，武器，寶石，香料等等。商業由行旅的販賣者經營，他們由這個地方而旅行到別個地方以奢侈品供給封建主。商人均成群結隊攜帶武器而旅行，以防禦強盜，封建主的襲擊。所以在強盜與封建主間往往很難決定某種區別，因對於封建主，掠奪往往是其主要的職業。

隨生產力的成長又增進了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同時，又大大地發展了商業，商業開始少受約束且使手工業生產依存於自己。

在封建主義的後期，商業關係大大發展之下，我們看到了貨幣，信用，高利貸的更大發展。

雖說城市與鄉村分離與商品——貨幣關係有較大的發展，但封建主義與奴隸制一樣，主要的還是自然經濟。在其基礎上橫陳着爲消費之滿足的生產與基於非經濟的強制的，剝削方法。

第十八節 封建主義底崩潰與滅亡。

原始的資本積蓄

在封建的生產方法發展之基礎上橫陳着在握有產業的直接生產者底小生產與大的封建的農業間之矛盾。如果奴隸制是不能予以提高勞動生產性的刺激而且應按照利用奴隸勞動的大衆協業的優立的道路前進，那末封建制，如我們所已指出似的，其自身包含着某種能刺激小生產者去提高勞動生產性且建立小生產的因素。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體現於封建領域內部分工之擴大中，體現於在農業與手工業間的分工中，而後者又引導到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在封建主義發展中形成很大作用，然而牠是由封建的生產方法之主要矛盾——在小生產與大農業間的矛盾中滋生出來的。大封建地主，一方面；與鄉村中的小生產者——農奴進行鬥爭。他方面，又與城市中的小生產者——行會手工業鬥爭，同樣又與在小商品生產增長的基礎上滋生出來的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鬥爭。

在促使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城市與鄉村分離的，生產力成長的基礎上，發展了商業資本，這在鄉村的自然——封建關係的崩潰上與在城市的封建——行會制的崩潰上形成最大的作用。結果，遂由城市與鄉村的小商品生產中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生產。

先來研究在封建鄉村中所發生的過程。商品生產的發展大大地開始瓦解鄉村中的自然——封建的關係。封建主開始尋求貨幣。爲了想獲得貨幣，他開始以貨幣地租去代替生產物的地租。這迫使農奴把自己勞動底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爲的想以出售其生產品的方法而獲得貨幣，藉能給地租於封建主。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加強了封建主對於商業——高利貸的依賴性。這些迫得封建主走上加強剝削農奴的道路，而後者由於其嚴重的負擔遂陷入於經濟更弱的農奴層了。到貨幣地租的轉變，同時又給經濟上較富有的村民之富裕以很大的可能性。所有這些皆加強了農奴之分化的過程。其中發生出少數上層富農，

而大眾則破產了，轉化爲半無產者了。因而破產了的貧農遂呻吟於封建主與富農的雙重壓迫之下；無力支出貨幣地租的貧農墮入富農——高利貸份子的陷阱中了。上層的富農最後捐免了其封建的義務，而且由此發生了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而貧農最後破產了與無產者化了。

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着的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要求封建主使其封建經濟適應於市場。這種適應性是在各種形式中進行的。大部份的封建地主——如俄國所曾發生的那樣——僅加強了農奴的剝削法，以在市場上的麵包與其他生產品的生產爲目的而採用大的均分的經濟。當然，這是不能阻止在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之發展的，但毫無疑地是這個發生之大阻力，因而農奴分化過程遂帶着極殘酷而悲慘的性質。

在英國發生了在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與封建主義瓦解之新途徑。發展着的工場手工業對於羊毛表示出很大的需求。變耕地爲牧場成爲很有利的了。這引導到，英國的封建地主走上強佔農民耕地的道路。爲了開闢喂羊的牧地遂強奪且圈佔農民大眾的土地。

大部份封建主把土地租給承租的庄家，他們在這上面組織了基於僱傭勞動之剝削的資本主義的農業。

最後，小部份的封建主在其土地上親自從事資本主義農業的組織，因而成爲資本主義的農業家了。這樣進行着在鄉村中的封建主義之瓦解且發生了資本主義關係，

我們又可於行會手工業中看到封建關係的瓦解與資本主義底發展之相同的過程。處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的生產力之成長大大地引導到，手工業應由承命的工作轉變到爲市場的工作。由於市場的擴大，手工業者喪失直接與消費者發生關係的可能性。必然發生中介者——販賣商人，他們於手工業者購得商品且轉賣給直接的消費者。因

此在手工業者與消費者間沒入了商業資本，這開始使手工業者依賴自己且佔有其剩餘生產品的大部份。隨着生產的成長與商品關係的發展，商業資本家遂更浸潤進手工業過程的本身，且已變成了商工業的企業家。手工業者對於商業資本的依賴性之成長，商業資本對於手工業者的剝削之成長引導到，作頭又加強剝削學徒與工匠：延長學習的年限，初則困難了由工匠而作頭而轉變，繼則這種轉變幾成爲不可能，延長勞動日，減低工資——一言以蔽之，學徒與工匠轉化爲無產者的地位了。同時，破壞了那能阻止大的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發展的，而且首先就限制手工業者所能有的學徒與工匠的人數的，一切行會的組織。在作頭中發生了很少依賴商業資本的富有者，主要的是由生產製成品，而非半製品的那種作頭中發生出來的。他們擴大了其企業，且於商人外，成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了。手工業者底基本大眾全破產了。這樣無論在城市中與在鄉村中我們均看到了封建關係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封建主義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底過程因美洲與通印度的航路之發現而更加速了。

新市場的發現成爲加速度崩潰手工業與造成資本主義企業的過程之刺激。新發現的大陸成爲強奪與奴役的對象。尙生存在家長氏族制的條件之下的美國底印第安人之被掠與剝削，逾越了全境。土人實際上被慘殺了，轉化爲奴隸了。在奴隸勞動的協助之下培栽了棉的，糖的與其他的植物。以暴力襲擊土人，施以要挾。利用土人的散漫性，其野蠻性，『殖民者』欺騙了他們，賣他們以一切華而不實與無用的商品，而獲得金與其他商品。

這種猛烈的剝削致使殖民地國家底奴隸化的人民之死亡。開始獵得黑人，這是大批地由非洲運進美洲且轉化爲奴隸的。奴隸貿易成爲

最有利的事業之一，且達到了極大的展發。

商業資本底最豐富的根源是在新發現國家中的金銀與銀礦之發現。這又使操在商業公司手中的財富之可驚的成長。他方面，貴金屬的運回歐洲又引起價格革命。因金子大批流入歐洲市場，遂使金子價格低落與一切商品底價格高漲了。由於這價格的高漲更大大地破產了農民，手工業者與城市和鄉村的一般貧民。所有這些更大大地加速了城市與鄉村的小生產之解瓦過程且飛快地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

這樣，與封建主義的瓦解同時，發生了生產手段與生產者分離的強制過程。積在商業資本家手中且富庶了工業企業的大量財富給組織大工業企業以可能性，而被掠奪了的且被破產了的小生產者——農民與手工業者——大眾則給新組成的資本主義企業形成了無產者底基礎。由握有私的生產手段且以自己底勞動造成到市場去交換的生產品的，各個破產了的生產者底小商品生產，滋生出大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這裏生產手段與工具全為資本家所獨佔，而生產者則轉化為喪失私有權的，不能不出賣其勞動力給資本家的「自由的」無產者。

「個人的且散漫的生產手段轉化為社會——集中的生產手段，當然，多數人底些小的所有權轉化為少數人底龐大的私有權，收奪了國民大眾底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國民大眾底這種悲慘而困苦的掠奪組成資本之史的序幕」（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二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萌芽底，其發展的條件之造成底以及生產工具與生產者的強制分離底時期叫做原始資本積蓄的時期。如我們所已見，這種積蓄伴同着國民大眾之悲慘的災難，「直接生產者底掠奪——馬克思說——以殘酷的汪達爾主義而完成，其原動力是極鹵莽的，卑鄙的，可憎的與瑣碎的奢望」（全上）。

這樣，在崩潰的封建主義底胸膛中滋生出新的資本主義的角部，

這經過布爾喬亞的革命轉化為獨立的社會——經濟的構造。

在封建主義之革命的毀滅中之決定的作用則屬於農奴的暴動。在其發展底全面上的封建社會的歷史滿佈着許多次農民的暴動，這轉化為反對統治階級的現存戰爭。

例如，德國於十五世紀末開始了擴大為偉大的農民戰爭且佔有全德國的極大的農民暴動。在俄國暴發了壯麗的農民暴動：拉氏暴動與普加乞夫暴動。這種暴動又發生於法國與英國。所有這些暴動均帶着偶然性且終於農奴制的覆滅。

當作小生產者底階級看的農民以小生產的永存為自己底目的。但，為小生產的保存而與封建主義的鬥爭，牠於客觀上形成了瓦解封建關係且給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開關道路的革命的作用。

『農奴底革命——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在全蘇聯集體農場員——突擊隊員底第一次大會上說——肅清了封建主且消滅農奴的剝削形態。但牠却使資本家與地主去代替封建主底地位，以資本主義的與地主的剝削勞動的形態去代替農奴的剝削形態。以別個剝削者替換了這個剝削者』（伊里奇主義問題，第九期，五三百）。

故農民與破產了的手工業者為於封建主義毀滅中起領導作用的大布爾喬亞而鬥爭。

於此應鄭重地指出，為伊里奇與俾殺黎奧諾維支所發揮出的，在布爾喬亞革命與無產者革命間的區別。伊里奇說，布爾喬亞革命與無產者革命之不同在於：甚至在封建主義底政治統治毀滅以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早已萌芽於且發展於舊的封建社會內部，同時，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則只有在無產者於革命中撲滅了布爾喬亞底統治且獲得政權以後，才孕育起來且發展開來。

這種意思更為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所發揮，他說，布爾喬亞革命

是在封建主義底政權毀滅以前，即已發生於且滋長於封建社會胸膛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多少於已成形態的實現之下勃發的；而無產者革命則在社會主義關係的已成形態闕如或差不多闕如之下就開始的。在這種意義上說，布爾喬亞革命完結於資本主義角部轉化為統治的生產方法。布爾喬亞革命完結於封建主義底政治統治之消滅與布爾喬亞底政權之獲得。同時，在無產者革命中，布爾喬亞底統治之撲滅與無產者底政權之獲得，才開始了無產者革命；只有獲得政權以後，無產者才建立了且發展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

第十九節 關於封建主義底反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之批判

封建主義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底現代性，對於在資本主義底胸膛中發生出來的殘酷的階級鬥爭有密切的關係。在布爾喬亞的歷史學家中，我們可以首先看到封建主義底辯護者，他們歌頌了，理想化了封建的生產方法。例如，葛特弗魯，古爾特堅信，『中世紀結束了奴隸制且喚醒所有人們到自由之路』。他於，封建主義把教士變成『全世界最敬重的創設者』這一點看出封建主義的其他功績。次則，他作成這樣的結論：『沒有中世紀；存在着的只是不與自己發生的時代相同的且為伊凡格里底子孫的現代社會』。

結束奴隸制的封建主義，不僅未給人們以自由，且以封建剝削的形態施行新的奴隸制，其本質已為我們於上面闡明了。至於說到教士的尊崇，那末，其動機是很明白的，如果回憶到，教士是封建剝削的最重要的工具。

勃興於資本主義體系之一般危機底與帝國主義底矛盾之極端深化

底時代的，於極明顯的形態中表現出資本主義之末落的現代法西斯主義，大大地企圖回轉到中世紀，回轉到封建主義。理想化了封建主義，德國法西斯者處在封建主義底發生，發展與本質之日耳曼主義的見解上。根據這種見解，當作戰勝馬羅帝國的最高人種之代表看的古代德國人是新的封建的文化之創立者，這種文化為現代布爾喬亞的文明所承繼。

依封建主義底法西斯之歌頌者底信仰，想逃避現代矛盾的火坑，只有回到封建主義。

例如，奧大利的法西斯經濟學家煦班說，在布爾喬亞與無產者間的矛盾能把他們聯合於行會中以消滅之。與煦班相似，弗棋南持，海孟思認為可以中世紀的等級制之復興的方法去消滅階級鬥爭。

『經濟生活——他說——將按照現代嘉特爾的型樣，而組織於較現在更大的範圍中，但無新對抗的不斷的鬥爭。新組織，與中世紀的行會相似，以反對經濟改良的鬥爭為其任務的一部份，因新配合的造成會再次改革了全體經濟。

工人階級也不致因經濟的層階(變動的均衡)而更受痛苦。各個工人老在他所工作的企業中；甚至其在企業中的地位可以世襲}(引文根據「馬克思回憶錄」，一九三三年，一三四頁)。

自然，所有這些關於以按照中世紀的行會的型樣去改組職工會與嘉特爾企業家的方法而消滅在布爾喬亞與無產者間之矛盾的幻想皆是反動的烏托邦。

事實上，關於回復到封建的『行會秩序』的法西斯的綱領表示出欺騙工人，辯護為現代布爾喬亞所廣泛地採用的強制勞動。為法西斯者所宣傳的奴視工人的封建的方法，顯然証實了，現在布爾喬亞已無力以舊方法保持其對於工人階級的統治。他証實了資本主義矛盾的極端。

深化——這只有在無產者革命的道路上，只有在無產者專政的協助之下，才能解決。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完成徹底地肅清資本主義分子及階級一般的蘇聯，就是說明這一點的實例。

除封建主義底公開的布爾喬亞的見解而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關於封建主義之馬克思——伊里奇學說的許多曲解。

例如，以其機械論的見解出發的卜格唐諾夫，以所謂封建主底『組織的機能』為封建剝削存在的原因。

人世間的封建主對於生產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卜格唐諾夫問且答道——其主要的作用在於，他們是保衛在其統治下的共同體之軍事的組織者。他們以賦役或租稅的形式佔有了農民的剩餘勞動。……因為封建主底經濟於經濟上的力量更大於農民的經濟且能建設甚至為富有農民底力量所不能及的社會——必需的企業：製造所，麵包房，尤其是道路，橋梁等等。在饑荒，瘟疫及其他不幸的時候，封建主以自己底積蓄與手段拯濟農民且幫着他渡過嚴重的時期，當然，以後強求他以過量的耗費。在這些上面，建立了封建主底權力」（政治經濟學初步，一九二一年版，四七頁上）。

至於說到僧侶的封建主，則依卜格唐諾夫，他們是『社會經驗的保存者』——『執掌着社會勞動力的保存』，『領導了青年的教育，即為共同體準備了且由成長的種族中選拔出新的成員』。

在當時封建主義與封建主於生產力發展上形成進步作用，這種事實，並未給我們絲毫根據，去歌詠式地描寫在封建——地主與為他們所剝削的封建農奴間之相互的關係。

其實，製造所的組織以及所謂在饑荒等等時候的『幫助』，不外是封建的剝削的不同方法。他方面，如我們所已知，封建的剝削並非建立在所謂封建主底組織機能上，而是建立在以封建的土地私有權為基

礎的非經濟的強制之實現上的。

此外，完全不正確地瞭解社會——經濟構造之本質的卜格唐諾夫，又於各個構造中分出「商業資本主義」，單純的商品生產等等。如我們所已知，商業資本是不能組成獨立的構造的，因在構造的基礎上橫陳着決定適應於自己的分配與交換之形式的生產方法。商業資本僅能協助已萌芽這種或那種生產方法上的趨勢之沮止或發展。單純商品生產也復如此，我們於各種構造中所看到的單純商品生產，任何時候皆不會是獨立的構造；而是未來的資本主義——這是由單純商品經濟發展中滋生出來的——底萌芽。

反對卜格唐諾夫底意見的在當時有屠物牢夫斯基。批判卜格唐諾夫的屠物牢夫斯基本質上處於前者底立場上且闡揚出獨自的所謂農奴的結構。依屠物牢夫斯基，農奴結構的特徵是地租的勞役形式；而封建的結構之特徵則為生產物的地租或免役稅。

這樣以二種不同的地租形式為結構分類的基礎。屠物牢夫斯基允許了馬克思——伊里奇主義之深刻的曲解。由二種不同的地租形式不能推論出二種不同的構造。構造絕對不能由地租的形式去決定，馬克思曾再三指出，在由某種地租形式到別種形式的轉變下，封建剝削的本質並未改變。因而我們不能說當作獨立的社會——經濟結構看的農奴的結構。農奴制本質上仍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伊里奇於同一意義上使用了「封建主義」，「農奴制」這二個術語。當發展了商品關係且與商品關係的發展相聯又發生了剝削之更殘酷的形式時，為了封建主義的認識而有時使用「農奴制」這個術語。例如波克牢夫斯基就於這種意義上使用這個字。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又可看到昂格思用這個術語。

有幾個歷史學家承認曾統治許多古代東方專制國家（埃及，安息，巴比倫等等）的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獨立的構造。

毫無疑義地存在着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與歐洲封建主義的不同的一些特點。例如，在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統治之下，有土地國有底與被統治階級底剩餘生產品爲國家所佔有底實現。所有這些當然給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以一切獨具的特徵，可以說在亞細亞的專制國家中的封建主義之異樣。然而還不曾給我們以絲毫理由說當作獨自的社會——經濟構造看的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爲以統治階級對於土地的私有權與爲生產手段私有者所生產出來的剩餘生產品之被非經濟的佔有爲基礎的封建主義之特徵的勞動力與生產手段之結合的方法，即在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下也有地位。而且專制的亞細亞的國家徵收亞細亞的農民的賦稅，本質上不外是等於地租的剩餘勞動之一般形式。

首先以資本主義底發生與發展，其消滅已爲排在世界無產者前面之最重要日課這一觀點看去，封建主義的研究對於我們有極真實的意義。封建主義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成立絕對不能說封建農奴的關係已完全肅清，如我們所已知，封建地主使其封建的經濟適應於新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力圖保存農奴剝削的基礎。結果，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在落後的諸國中，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封建——農奴關係的殘餘。這首先關於革命以前的帝俄，在解決布爾喬亞革命之任務——消滅爲封建——農奴關係保存之基礎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一九一七年無產者革命以前，牠們一直殘存着。但在這種關係上，革命前的俄國並不是例外。在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保加利亞，巴爾幹諸國等等內皆有半封建關係的許多殘餘。在所有這些國家中，與封建殘餘的鬥爭對於無產者革命的開展均有偉大的意義。在其中資本主義較發達的諸國中，開初當作無產者革命看的革命應消滅封建主義的殘餘。在別的國家中，開始當作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反對封建主義）看的革命應於高漲後轉變爲無產者底革命。最後還有許多封建——中世紀

的關係頗佔優勢的不獨立的殖民地國家，屬於這種國家的，首先就是印度與中國。壓迫這種國家的外國帝國主義者藉這些國家的封建之助以保持其在這些國家的統治。這就是在這些國家內無產者與農民為封建關係的消滅，為土地革命而進行的鬥爭，所以應轉變為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為民族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且與之密切聯繫起來的原因。在反對封建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鬥爭中把農民拉到這面來，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依據自己的力量與組織保證了由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轉變的條件。

第二十節 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

在考察封建主義瓦解的過程時，我們看到，怎樣由農民與手工業者底小商品生產經過其分化而滋長出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生產有許多與牠所由生長出的單純—商品生產不同的特徵。在單純商品經濟中，生產工具與手段皆屬於生產者自己，他們以自己的勞動生產出用以為其自己生產與生產繼續所必須的其他商品交換的商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工具與生產者相分離且為資本家所私有；工人以自己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且為後者所剝削。

除所有這些極重要的質的區別外，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還有一相同點，因牠們皆以生產手段的私有權為基礎。

『當然，小農的商品經濟——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說——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在其基礎上牠與資本主義經濟同型，因依存於生產手段之私有權上的』（伊里奇主義問題，四四六頁）。

單純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小生產——依伊里奇的話說

——不斷地，天天地，時時刻刻地，盲目地且大規模地生長出資本主義與布爾喬亞』（全集，第二十五卷，一八七頁）。

在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間的關係之正確的瞭解，不僅對於在封建社會底胸膛中的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之瞭解，就是對於在目下階級鬥爭中的小商品生產者底地位之正確的瞭解，都有很大的意義。

目下在資本主義諸國中有千百萬的小商品生產者，首先為農民。在布爾喬亞底政權傾覆以後，小商品生產還有相當時期保存在無產者專政之下。

按照其在產生過程中的地位，小商品生產有二重性質的：一方面，他是為資本家——工廠主，商人，高利貸者，封建地主——所剝削的工作者；他方面，他又是表現出商品——資本主義趨勢的財產私有者，力圖成為地主，資本家的財產私有者。

小商品生產，由於其散漫性，不能形成獨立的作用；小商品生產者，由於其二重性而動搖於布爾喬亞與無產者之間。無產者底任務在於：以精巧的政策使小生產者到自己這面來，成為自己底預備軍，同盟者。護得政權以後，為現在我們底革命經驗所光榮地証明了似的，無產者可以精巧領導的方法，與小生產者底商品——資本主義傾向作鬥爭，為了使小生產經過集體化轉化為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利用了當作工作者看的小生產者底他方面。

不瞭解小商品生產者底二重性乃托洛茨基派之特徵，他們混同了小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僅看到小生產者底商品資本主義的趨勢，因而否定了工人階級與勞苦農民的同盟，在無產者領導之下的小農生產之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不信農民之革命的可能性與無產者領導他們的能力，托洛茨基派否認了在我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

性。

右派機會主義者否定了單純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同一性；他們僅看出小生產者當作工作者看的這方面，但未看出其商品—資本主義底趨勢，而推闡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尤其在集體農場的運動中之自發的理論，在社會主義中富農增長的理論。這些理論事實上引導到資本主義底復活，當然又引導到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可能性。

只有由小商品生產的二重性之正確的瞭解出發，以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為領袖的我們底黨，粉碎了托洛茨斯主義者與右派，完成了大部農民經濟底集體化，轉化蘇聯為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國，且以日益增長的成功實現了集體農場之有組織—經濟的基石。他們底鮑爾雪維克化，轉化所有集體農場員為富有者。

因單純商品經濟於歷史上先資本主義底發展而存在且為孕育他的基礎，因小生產者底剝削是資本主義發生之必需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們在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時，始自單純商品經濟的研究。

世界勞動史要目：社會勞動的分配之報告
第一卷

社會勞動的分配之報告
第一卷
社會勞動的分配之報告
第一卷

第二篇 商品

第四章 商品及其二重性。

創造價值的勞動之特性

第二十一節 當作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以及當作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研究之出發點看的商品

小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很久以前早已存在了。

城市的手工業者底小商品生產之增長，貿易的發展，手工業者的分化，農民的破產，財富的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使小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生，先期帶有不發達的萌芽性的商品生產遂成為生產之一般的形態了。

在資本主義下，不是為自己消費而是為交換而生產的一切生產物就是商品，轉化為商品的不僅是勞動產生物，如在單純商品經濟中那樣，而且是勞動力。

這樣，商品生產遂統治着資本主義社會。依馬克思的話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是財富之原素的形式；牠是『經濟的細胞』，即資本主義產生之最初的萌芽的種子。基於資本家對工人之剝削，深切的內在矛盾之束縛上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難免引導這種方法趨於滅亡。這些矛盾早已以萌芽的形態隱含於各個商品中了。在小商品生產中

即已於不發^展的形態中有牠們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其轉化爲資本主義生產即表示出這些矛盾之增長與發展。

在研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時，我們底任務——指出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暴露決定其發展與滅亡的資本主義生產之矛盾。

因爲這個目的，我們就應研究商品的與單純商品經濟的矛盾，推演在由單純商品生產到資本主義生產的轉化過程中的這些矛盾之往後的增長與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這就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應由商品研究開始的所以然。

第二十二節 商品底二重性 使用價值與價值 當作價值基礎的勞動

商品的主要特徵如何？「商品是，第一，能滿足人類某種消費的物，第二，能和別的東西交換的物」（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一五頁）。

因物對於人能有某種用處，當其消費之滿足時，所以，我們說牠是使用價值。例如，麵是使用價值，因牠可以充饑，棉布是使用價值，因可以用牠做衣服，等等。

同一物品，對於人可以有不同的用處。例如人們不僅可以用布做衣服，且可以做口袋和舟帆等等的材料；米不僅可以做飯，且可以做釀酒的原料，等等。

隨着人們底社會生產與社會關係的發展，且變化了人們底慾望。人們能在某種物品中發見新的，以前不知道的屬性，這屬性使這物品能用於新的方面。例如，以前，主要的是用作買醉之飲料的酒精，現在於工藝上與化學上皆已被用作溶解劑，在醫學上用作消毒劑等等。

所以，依馬克思的話說，「具體的使用價值——至於何種使用價值則完全依存生產底社會過程之階段的——對立着在其發展之不同階段上的人類」（馬克思與昂格思底立論，一九三〇年，第五冊，三九八頁）。

任何生產品皆不能成爲商品，假使牠沒有使用價值，假使按其屬性，牠不能供人們利用，不能滿足人類的某種慾望。『使用價值的存在是商品的必需的條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六〇頁）。

但並不是凡有使用價值的一切生產品，同時皆爲商品。例如，在自然的農民經濟中爲其家族的慾望之滿足而造成的生產品就不是商品。想使生產品成爲商品，人們「不僅生產單純的使用價值，且應爲他人而生產使用價值，社會的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六頁）。

但並非凡爲他人而握有使用價值的生產品皆是商品，而是爲交換而生產出來的生產品才是商品。例如在封建社會中爲農奴所生產出來的麵包之一部份以實物的形態給予地主，因而爲地主而握有使用價值。但這些麵包並非商品。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有生產品對於全社會皆有使用價值，但皆不是商品。『想使成爲商品，則生產品應經過交換的中介轉給對於牠有使用價值的人底手中』（資本論，第一卷，六頁）。

某商品與別商品的交換因特定的數量比例而進行。假設，十公斤麥子可與五公升煤油或四公尺花布相交換。某商品與別商品的特定關係決定了商品底交換價值。

所以在商品經濟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之物的擔負者。

商品底交換價值依存於什麼的呢？初看去，可以說，各個商品的關係，其交換價值是外在的，偶然的：某商品今天以這種比例與別種商品交換，明天以另一種比例與第三種商品相交換等等。但如我們仔細注意到交換的行爲，那就不可信，交換比例只可說是偶然的。既是各商品以特定比例互相交換，那末，這就是說，商品的交換價值彼此

相等，牠們有某種共同的東西，給牠們有相等和交換之可能性。

一切商品之共同基礎不是牠們底使用價值，因在交換過程中彼此對等的商品有不同的使用價值。

商品底交換價值之共同的基礎是商品生產者底特殊社會勞動轉化於其中的牠們的價值。

在商品經濟中，各種商品由各所有者生產出來的。握有生產手段與工具，勞動生產品之私有權的各企業的每個所有者，可以根據其私的利益而擴大或縮小生產。在商品經濟中被製成的物品，依馬克思的說法，首先就是互相依存的『私的工作』的生產品。

但，事實上，這些『私的工作』不能完全互相分離而存在。在商品經濟中，各個私有者皆包含於社會分工之統一的體系中；因而每一個別的生產者是商品經濟的統一的社會勞動之一部份。

事實上，設有製造皮鞋的企業。其業主外表上無論如何獨立，他都不能不買為製皮鞋所必需的原料，製鞋器具，鞋釘等等企業的勞動生產品。此外，製鞋企業主為了食與衣又得依賴於麪包師，縫衣師等等。

每一企業所以能專門製造這種或那種商品者，僅因為除牠們外，還存在着製造別的商品的別的企業，僅因為在各企業間存在着分工。

各種工作的社會性隨商品生產的發展更加表現出來了，顯然，這時每一生產品已不僅容納下某個人的勞動，而是容納下參加其生產的許多人的勞動。例如，在由鞋匠製成的皮鞋中，不僅容下鞋匠自己的勞動，且容下製革的皮匠的勞動與製釘的工人的勞動等等。

總之，在商品經濟中，各個商品生產者底私的勞動同時又是統一的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因每個私的所有者在分工的基礎上互相工作着，其勞動不斷地由這部門轉投入那部門，本質上組成了統一的商品經

濟——不管其獨立性與分離性。

在溶化於商品中的商品生產者底特殊的社會勞動——該商品被這勞動的「代表」提供到市場上去——組成了與商品之使用價值不同的，商品的價值。(註)。

「註」「什麼是商品底價值？——馬克思問且答道：——耗費在其生產上的社會勞動之對象化的形態」(資本論，第一卷，四一七頁)。

總之，我們已知，商品有二重性，牠同時擁有使用價值與價值。

第二十三節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

假使商品有二重性的話，則造成商品的^(價值)勞動也有二重性。

在商品經濟中，每一商品首先就為私的勞動的生產物，因牠是由表現私有權的私的企業，且根據其與別個企業不同的私的利益，創造出來的。然而既然各個商品生產者造出不同的使用價值，那末，其中每一私的勞動應有獨自的形式，例如，鞋匠做鞋的動作與木匠製桌子的動作不同，前者用針，槌等而工作，後者用鉋，鋸等以勞動，他們所勞動的對象，以及他們所進行的動作都完全不同。

每個生產者底勞動，因牠(勞動)造成獨自的使用價值，故馬克思叫牠做具體勞動。但每個生產者底勞動不僅是獨自的具體勞動。各個商品不僅有不同的使用價值，且有為其所共同的價值。故商品生產者底勞動不僅是相異的，而且是相同的。

「日常的經驗告訴我們——關於這點，伊里奇說——千萬次的交換逐漸使彼此不同的不可比較的具有各種使用價值的東西均等化。在社會關係之特定體系內，逐漸互相均等的這些不同的物品間之共同的東西是什麼呢？在牠們間所共同的，就是牠們皆係勞動生產品。在交

換生產品時，人們比較了各種態的勞動。商品生產是社會關係的體系，在這體系內，各個生產者造成了各種生產品……而且所有這些生產品在交換中彼此均等了。所以，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東西不是特定生產部門的具體勞動，不是某一種的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人類勞動一般。在所有商品之價值總量中所表現出來的，該社會的一切勞動力是同此人類底勞動力】（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一六頁）。

總之，商品底使用價值是由商品生產者底勞動之具體方面造成的，同時，商品底價值是由勞動一般，是由抽象勞動造成的。

生
產
者
的
智
力
依
存
性
，
只
有
在
抽
象
勞
動
的
形
態
中
，
在
人
類
勞
動
力
之
單
純
出
支
的
形
態
中
才
表
現
出
來
。

在比較各個商品生產者底勞動時，我們見到，為她們所共同的是體力，神筋等等之支出。所以，商品生產者底勞動之社會性只有在當作『生理上的人類勞動力支出』（馬克思語）看的勞動各種態相等的形式中才能體現出來。

然而，各種態勞動之生理的相等，不僅在商品經濟中，就是在別的經濟中也能存在的，因為凡是人們從事各種工作的地方，他們都得支出其體力，精神等等。假使，在自然的農民經濟中，農夫種地，農婦織布，那末在生理關係上，他們的勞動也有許多共同點。但生理的相等，尚不能使農夫和農婦的勞動變成單一的抽象勞動

事實上，在自然經濟中，人們生產生產品皆以直接滿足其消費為目的，因而勞動首先呈現於其具體的形態中：在農民家庭中（在自然經濟下），每個工作者所以有意義者，因他執行了這種或那種特定的工作（耕種，收刈，紡織等等）；在交換發展以前，農民底勞動對於封建地主所以重要者，正因為當作創造為『封主』所必需的特定物品的

生
產
者
的
智
力
依
存
性
，
只
有
在
抽
象
勞
動
的
形
態
中
，
在
人
類
勞
動
力
之
單
純
出
支
的
形
態
中
才
表
現
出
來
。

自
然
經
濟
中
，
農
夫
種
地
，
農
婦
織
布
，
那
末
在
生
理
關
係
上
，
他
們
的
勞
動
也
有
許
多
共
同
點
。

生
產
者
的
智
力
依
存
性
，
只
有
在
抽
象
勞
動
的
形
態
中
，
在
人
類
勞
動
力
之
單
純
出
支
的
形
態
中
才
表
現
出
來
。

，具體勞動。

『又如中世紀的賦役或現物貢納。這裏造成社會聯繫的不是勞動的普遍性而是在其自然形態上的各個人的特定工作之特殊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六頁）。

假使我們以社會主義經濟來說，那末，這裏每個工作者底勞動之社會性，直接在為他所從事的勞動之獨自的具體形態中，在其為社會而執行的獨自的機能中體現出來。

所以在農民底自然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中，人們底社會勞動直接在其具體勞動的形態中表現出來。這裏，人們無須互相對等勞動之各種具體形態，俾表現出其社會性。因而這裏沒有勞動底二重性而且沒有抽象勞動。

在商品生產中，勞動直接表現作私的勞動，勞動底社會性隱含着。生產者底勞動之隱含的社會性，這裏只有在勞動底各種具體形態之相等中，即在抽象勞動中，只有在勞動生產品之價值形態中才表現出來。

抽象勞動——這就是僅足為商品生產之特徵的社會勞動之獨自的專門的形態。

『對於勞動的特定形態之同一性』乃商品經濟之特徵（政治經濟學批判，四一頁）。這同一性表現在：每個商品生產者，假使其具體勞動成為不利的話，就準備製造別的使用價值，轉變到勞動之別的形態。假使皮鞋匠十二小時勞動的生產品，在市場上的估價低於製麪包者十二小時勞動的生產品，則製鞋業必然會縮小：一部份鞋匠會放棄其事業而改做麪包。一切初學手藝的都將先去學習製麪包的工作。所以在商品經濟中，各種態勞動之單一性，即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之存在——不是如觀念論者與機械論者所說的，抽象的或表象的產物，而是現實

商品經濟
勞動是已好

性本身之客觀的事實。

人們對於勞動的特定形態之同一性——只是在商品經濟中，勞動如馬克思所說『不僅於範疇上且於現實上是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且由於特定的個別性而喪失其社會聯繫』這一事實的結果。(同前)。

自然，表現作在其特殊的布爾喬亞形態中的抽象的，即社會勞動的，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同時並不排擠具體勞動，勞動力支出之具體的特殊的形式：這就是二重性，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同時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

第二十四節 單純勞動與複雜勞動

在社會生產底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出勞動之各種具體形態，而且看出在無須任何預先學習的單純勞動，與須要某種準備教育的複雜（熟練）勞動間的區別。

可否說，做相同時間的勞動造成相同的價值？可否說，泥水匠一小時勞動的生產物，按照價值，等於旋盤工或著作家一小時勞動的生產物？

要養成旋盤工，不僅要由學者方面的勞動支出，且要由教者方面支出勞動。

支出在熟練工人學習上的勞動，加進，容納在由熟練工人所造成的商品內的，社會勞動裏，所以，無須準備的工人底勞動生產品的價值，小於熟練工人在同時間內所造成的生產品的價值。

以單純勞動的一小時為度量的單位。在度量旋盤工底勞動時，假設，他由二十歲至四十五歲，這二十五年間，完全做一個熟練的旋盤

工。再設，他在學習時，共費了四年，且在這四年內，別的老工人在教其學徒時費掉其工作時間的四分之一。統共費了五年的學習時間。故在旋盤工勞動的二十五年內應加上為學習而耗費的五年，即在其勞動的每一一年內應加上學習的五分之一年。顯然，旋盤工所造成的價值比同量（按時間）的泥水匠勞動所造成的生產品底價值，應大五分之一：其複雜勞動的一小時將等於單純勞動的一又五分之一小時（註）。

〔註〕這裡，當我們比較旋盤工勞動與泥水匠勞動時，我們注意到他們底勞動生產品的價值，且說，旋盤工一小時勞動生產品的價值所以大於泥水匠一小時勞動生產品之價值者，因前者是複雜勞動而後者是單純的勞動。

往後我們將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旋盤工與泥水匠皆把其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且其勞動生產品也不為他們自己所有，而為資本家所有。這裡應區別出工人在由他造成生產物時所費的勞動，與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他底勞動力。為旋盤工每天所製成的車輛的價值可以比泥水匠每天所做成的東西的價值大一又五分之一倍，但旋盤工所優得的工資比泥水匠的工資，可以不止大一又五分之一倍，譬如說，大一又三分之一——二倍。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在說到剩餘價值與工資論時，我們就會知道。這裏，我們只是指出這樣的事實，免得學者混同勞動的概念與勞動力的概念。

複雜勞動到單純勞動的簡化叫做還原 (Reduction)。『經驗指示出，這種簡化……逐漸完成的。商品可以是極複雜勞動的生產品，但其價值使牠對等了單純勞動的生產品。各種態勞動所由簡化到當作其尺度看的單純勞動之各種比例，由處在生產者背後的社會過程去確定之，然後乃成為習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九頁)。

第二十五節 個別勞動與社會——必需勞動

社會勞動生產性與價值

我們已知，在商品經濟中，人們底社會勞動在抽象勞動之特殊形式中表現出來。抽象勞動又創造了商品的價值。

爲這種或那種商品生產所必需的時間愈多，其價值應愈大。

但這結論應加以深一層的說明。

因工人的智愚與努力之不同，及其勞動條件——機械，原料等等的質——之不同，同樣的商品可以由不同的時間生產出來。

這是否就是說，如果每個工人在同樣商品之生產上費了不同的時間，則這些商品的價值就不同呢？這是否就是說，工人愈偷懶或機器愈惡劣，則爲他所製成的商品底價值愈大呢？

當然不是的。

商品底每一單位皆表現爲統一的社會勞動——這是全社會在該種商品總量的生產上所支出的——之代表。

『一切棉布在市場上皆當作同樣的商品，牠的每一幅只當作這商品之相應部份。實際上，每碼的價值只是同種人類勞動底同此社會上特定量的物化』（資本論第一卷六十頁）。

故同一商品的每一單位，在市場上，有相同的價值。

所有商品的一般價值，非由爲每一企業所支出的個別勞動，非由最大的或最小的個別勞動，而是由平均的社會——必需的勞動去決定的。

所謂社會——必需的者就是在生產之社會正常的條件之下，在對於該社會的勞動強度與資質之平均水準之下，爲某種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

因而，在勞動生產性低於該社會勞動之正常的社會的生產性的企業中，個別勞動將高於商品之社會的價值，反之也然：在勞動生產性高於社會的企業內，個別勞動將低於社會的價值。

如我們所說，社會——必需勞動及其所依以變化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為社會的商品生產的條件，社會勞動生產性所決定。但互相依存以工作的商品生產者，在商品生產時，是不能自覺地計算社會——必需時間的。

甚至假定，每個商品生產者，譬如為出賣而生產穀類的農民，知道，在每一啓羅格蘭姆穀的生產上支出了多少個別勞動，這也不能給他有決定社會——必需勞動的可能性，因為還應知道，全社會為穀類的生產而支出多少勞動，但在商品經濟的盲目性與散漫性之下，這是不可能的。

事情更為複雜者，就是，商品普通是許多工人的勞動生產物，其中每一個工人皆有商品價值的一部份。

因此，『在這些商品中存在着的社會勞動時間，所以說是在隱含的形態中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只有當生產已結束，商品提供到市場上去以後，才表現出先前隱含着的勞動之社會性且顯示出事實上在交換以前在生產過程中早已被決定的社會——必需時間。

為這種或那種商品生產所必需的社會——必需時間不是一下被確定且永不變更的。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勞動生產性的增長，必然會變化了社會——必需時間。

假設某個商品生產者（譬如做襪工人）進行某種能提高勞動生產性且減低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個別勞動的，技術的改良。當這些改良僅為一個襪工所獲得時，還不致反映到社會必需的勞動，因其企業在襪

子全生產中所佔的比重甚輕且其勞動生產性的提高還不致變化了社會勞動的生產性。

既然該機工的個別勞動將低於決定社會價值——在市場上，襪子就按此而出賣的——的社會——必需勞動，那末新技術之採用對於他是很有利的。襪子底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間的差額都放在他底腰包中了。這就是，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每個企業家所以力圖引用新機械，隱瞞為他所採用的改良，使別的企業不能利用他的，原因之一。然而，一旦新的機械為許多企業所採用，就改變了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此時，不僅減少了採用新機械的企業之個別的勞動時間，且減少了社會——必需時間，當然又減低了商品價值。

自然，此後，每個經濟將力求引用更新的機械。

如果這已成功的話，則在某時期內，這企業家將有一些利益，因在其企業上的個別勞動必將少於社會——必需勞動，但僅在這新機械未被普遍採用時，才如此的。

社會勞動的生產之盲目的提高與商品價值之減低，因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在那裏我們將看出技術增高的更快，比之單純商品經濟——而加速了。

一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開始很快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性，且減低了商品價值。

這樣，我們看到，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完成了商品經濟底生產力之盲目的發展。價值法則是商品生產之運動的法則，其生產力之發展的法則。

下面，我們再詳加闡明。

結論中應指示出，在說到社會——必需勞動時，我們是指抽象勞動之社會——必需量的。社會——必需勞動與抽象勞動並非勞動之二種

不同的形態：抽象勞動，即商品生產者底特殊的社會勞動，於數量上以社會一必需時間去度量。

第二十六節 結論 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

間的矛盾——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

當作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之體

現者看的商品之內在矛盾

商品底二重性與創造商品的勞動底二重性，是商品生產底深刻矛盾之體現者，這生產底主要矛盾——在商品生產者底私的勞動與這勞動之社會性間的矛盾之表現者。

我們知道，在商品經濟中，商品是在私的企業中生產出來的，在那裡生產手段與勞動生產品皆為企業主所私有。在私的企業中工作的商品生產者不與在別的企業中工作的別個生產者協議其行動。雖說他依存於別個生產者，雖說其勞動一開始即帶有社會性，但他與別個生產者相分離地生產着，而且不能預知，其勞動在社會勞動底全體系中佔有怎樣的地位。所以，商品生產者底勞動直接表現為私的勞動，其商品直接表現為私的勞動底生產品。商品生產底私的勞動之社會性一直隱含着，當生產品尚未出現市場且未與別的商品交換時。在市場上經過各個商品生產者底勞動生產品之比較，先前隱含着的東西才顯露出來：表現出，握有各種使用價值且為各種態具體勞動所造成的，被交換的商品，其本身包含着抽象勞動之相同數量且握有相同的價值。在市場上呈現出每個生產者底私的勞動在社會勞動中的地位。

為商品生產之特徵的，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底矛盾，體現於各個商品底二重性中。我們知道，每個商品皆握有特定的使用價值，這是

用以滿足各種慾望的。商品底使用價值，體現於該商品之獨自的物體的屬性中，體現於其獨自的自然的形態中。不同的商品握有不同的物的屬性與不同的使用價值，但商品不僅是消費的對象，而且是價值的担負者。各商品底使用價值無論如何不同，其價值則可以相同的。在這裡，與使用價值不同的價值並不依存於商品之物的屬性，而是表現出創造此商品的人們底社會勞動。『你可以任意去審察且實驗每個商品——馬克思說——其價值對於你是不可捉摸的』（資本論，第一卷，十一頁）。所以，我們知道，商品價值是與其使用價值不同的某種特殊的東西。但同時，如無使用價值，價值就不能存在。假使生產品沒有使用價值，假使造成牠的勞動不是有用的勞動，則生產品就不能成爲商品且握有價值。此外，商品底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之物的担負者：商品生產者底私的勞動之社會性，只有當牠物化於有特定使用價值的特定商品中時，才被呈現出來。

所以，商品底使用價值與價值統一着同時又對立着；這個矛盾體現出在商品經濟中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之矛盾。

對於生產商品的人們，商品不是使用價值；對於他，其商品是價值的担負者，與別的商品交換的工具。在其未售脫其商品，未把牠與別的商品交換時，不能表現出這商品底使用價值。

但某商品與別的商品的交換不僅呈現出商品底使用價值，且呈現出其價值；在交換以前，商品生產底動勞之社會性隱含着，商品價值也未呈現出來。

所以，雖說商品在交換以前已有形成其使用價值的屬性且已握有價值，但當牠尚未出賣時，其價值與使用價值仍互相對立着且不能結合起來。某個私有者生產商品看中其價值，且把牠當作交換的工具；對於別個私有者，這商品應成爲使用價值。

商品交換表現出商品底價值及其使用價值，牠們的統一與對立，牠呈現出以前隱含着的各個『私的勞動』之社會性，且顯示出在各個商品生產者底私的勞動與這勞動之社會性間的矛盾。

因為各個商品生產者任何時候皆盲目的生產着，不知道，為他們所生產出的商品有多少拿到市場上來，又有多少已找到消費者。故在商品經濟中難免發生這種情形，那時已製成的商品找不到銷路，那時，牠不能實現其價值與使用價值。

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之危機的時候，表現得更深化，那時，一方面，大批商品堆積着，找不到銷路，他方面，勞動大眾喪失必需的生活資料。

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是商品生產之主要矛盾。商品生產的與交換的發展引起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之發展與深化，同時又引起在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之發展與深化。

在每個商品底使用價值與價值間內在矛盾採取了在商品間的外在矛盾之形態。

轉而考察這個過程吧。

第五章 價值形態

第二十七節 價值實體及其外表

關於價值形態的一般概念

物化於特定商品中的抽象勞動，組成了其價值的基礎或實體。所以價值是物化於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價值大小隨社會一必需時間而變化。

商品價值怎樣表現出來呢？

商品經濟是由彼此並不協議其行動的許多私的企業組成的。因而在商品經濟中不能有能計算物化於其商品中的社會勞動量的機關。互相獨立地工作的各個生產者同樣不能計算物化於其商品中的社會勞動底部份。

物化於商品中的社會勞動與商品的價值一直隱含着，當這些商品尚未投入交換中，且未在市場上與別的商品碰頭的時候。

所以在商品經濟中，依存於物化在這商品上的抽象勞動量的，商品價值，不能直接用耗費在這商品生產上的時，分的數量去體現。某商品的價值只有經過其與別的商品之特定數量的比較才能被體現出來的。

經過別的商品之中介的，某商品價值的體現，叫做價值形態或交

換價值。

這樣，我們區別：第一，組成價值內容的抽象勞動；第二，物化於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價值；第三，價值底外表形態——各種商品的彼此間之關係。

價值與其外表形態不同，因物化於商品中的抽象勞動，與此商品對於別的商品的關係不是同一個東西。但同時，價值與其形態又統一着，因組成了價值的二方面：其中之一（價值形態）僅表現了已含在另一個中的東西。假使在商品中沒有已物化了的抽象勞動，即假使沒有價值，則商品是不能被交換的且不能實現價值之外表形態。

總之，價值及其外表形態形成統一的，但這統一物又對立着，因被物化了的勞動——價值，經過各種物品的關係，才體現出來。

第二十八節 價值之單純的或偶然的形態 價值之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

隨商品生產的與交換的發展，又變化了且發展了價值形態。

如我們所已知，交換萌芽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為其內部消費之滿足而生產生產品的每個部落，稀有地交換偶然對於牠成為過多的東西。

交換底這最初階段適應了價值底這種形態，那時，某商品經過其與某種別的商品比較而體現出其價值。價值底這種形態，叫做單純的或偶然的形態。

因部落之過剩品之偶然的交換過渡到專為交換的生產品之生產，且因商品經濟的與交換的往後發展，價值形態遂採取，反映商品生產的矛盾之更深化的，更複雜的性質。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中，握有各種

使用價值的無數商品，皆經過貨幣的中介而體現其出價值。價值底貨幣形態是價值底最發達的形態。但只有研究其由始自單純的或偶然的——這裡已萌芽着價值的一切形態之主要矛盾——，價值之別的形態而來的起源與發展，才能瞭解牠。所以先研究價值之單純形態開始。

價值底單純形態可以等式表示：

$$10 \text{ 公尺裸麥} = 1 \text{ 米特棉布}$$

參加這等式的二種商品是二個互相決定的契機，同時，又是同一價值體現者之二極，二個對立的尖端。某商品——上例中的裸麥——以別的商品體現出其價值。別的商品——棉花——體現出裸麥的價值；牠是一面鏡子，裸麥可以由此看出其價值。經過別的商品之中介而體現出價值的第一種商品，處在價值之相對形態中；為前者之等價物的別種商品，處在價值之等價形態中。

處在相對形態中的商品有其獨自的使用價值，這同時又是其價值之擔負者，物化於該商品中的抽象勞動之擔負者。

但造成商品的勞動直接表現為私的勞動。這勞動的社會性隱含着。

想顯露其價值，某商品應求助於與其自己底使用價值不同的，別的商品底使用價值。由此可以得出價值底等價形態之第一種特徵——獨自的使用價值，或如馬克思所說，等價物之獨自的「自然的外表」是商品底矛盾屬性即價值與別的商品的價值之表現形態。

既然某商品底價值需別的商品底使用價值去體現出來，所以可以說，別的商品能體現前者之價值者，因其物質的屬性。可以上述例子說明之，棉布的獨自的物的屬性給牠以體現裸麥價值的能力。然而我們知道，價值並非決定於商品之物的屬性，而是決定於物化於其中的社會勞動。互相交換的商品底「自然外表」之不同，為在其中所共有

東西的體現所必需。事實上，我們知道，組成價值之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的十公斤裸麥與一米特棉布互相間相等了。裸麥底價值可以棉布去度量者，因棉布，與裸麥一樣，也有價值，在這種與那種商品生產上支出了相等的抽象的人類勞動。

互相交換的商品底屬性證實了，他們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生產出來的。但如我們所已知，價值本身可以經過有不同的「自然外表」的商品之比較，而被體現出來。

因而得到結論，在商品經濟中的人們底社會聯繫經過各種商品底使用價值之不同的中介而被表現出來。這又可由在商品經濟中的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之矛盾，由勞動社會性一直被隱含着，在某商品尚未與別的商品比較時，這一點推論出來。

總之，價值底等價形態之第一種特徵是，等價物之獨自的使用價值成爲商品價值之體現的形態，而商品之獨自的「自然外表」顯現出隱含在二種商品之關係中的人們底社會關係，這一點。

由此推論得等價形態之另一特徵：其中的具體勞動成爲其對立性的抽象的人類勞動之表現形態。事實上，既然棉布底使用價值是裸麥價值之體現形態，那末，這就是說，製造棉布的織布者底獨自的具體勞動是物化於裸麥中，抽象的相同的人類勞動之表現形態。當十公斤裸麥等於一米特棉布時，農夫底勞動對等了織布者底勞動，表現出以前隱含着的農夫勞動之特性，即其勞動不僅是勞動之特定的具體的特殊形態而且是勞動一般，商品生產者底統一的社會勞動之一部分。

由此可推論得價值底等價形態之第三種特徵：其中之私的勞動成爲其對立性——社會勞動之表現形態。

農夫勞動的社會性，當他顯露出其與在其私的企業中生產其棉布的織布者底私的勞動相等時，才表現出來。沒有織布者私的勞動之獨

自的形態就不能表現出農夫勞動的社會性。這又可以證實了在商品經濟中的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之統一和矛盾。

因在任何商品之生產上皆支出特定量的社會勞動，故某商品經過別的商品，以特定的數量的比例，體現出其價值。假使十公斤裸麥與一米特棉布相交換，那末這就是說，在一米特棉布中所物化了的勞動，恰如在十公斤裸麥中所物化了的（這裏，我們暫把能使交換比例背離價值的供求之變動擱在一邊）。

社會勞動生產性的變化能引起這些數量比例的變化。商品價值的體現，於數量上，可以在這種情形下起變化：那時處在「相對形態」（裸麥）中的商品價值已變化了；以及在這種情形下，那時，這商品的價值雖仍和先前一樣，但等價物底價值則已變化了。在後一種情形下，我們知道，未改變其價值的商品，變化了其價值的體現，其交換價值。假使十公斤裸麥今天等於一米特棉布，明天等於半米特，雖說裸麥的價值並未變化，那末這適足證明：為價值之外表體現者的交換價值，同時又與價值不同，價值與交換價值統一着又對立着。

價值底單純形態及其組成的二極（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之考察，我們證明，價值底單純形態之本身已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商品生產底主要矛盾之體現者，在包含於每個商品內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之愈益的發展。在價值底單純形態中我們已見到，隱含在商品內部的在其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矛盾藉外在的矛盾——二種商品的關係體現出來。

某商品經過別的商品之使用價值決定了其價值。當裸麥尚未經過棉布的中介表現其價值時，裸麥底價值還隱含着；裸麥僅直接表現作使用價值。棉布以等價物的資格直接體現出裸麥底價值。因而得到結論：商品以其自己底商品軀壳體現出其使用價值，而其價值則由別的

商品體現出來。這又可以證明，商品本身的內在矛盾採取二種商品之矛盾的形態。

第二十九節 價值形態的發展

單純的價值形態僅適應於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之第一個階級。

『商品交換——馬克思說——發生於每部落已結束，其場所為別的部落或別的部落底組員所補充的那種地方』（資本論第一卷，四四頁）。開初，交換並未激起部落之內部關係，但以後，隨交換的發展，開始變更了內部關係。

由部落的過多生產品之偶然的交換過渡到為交換的商品之專門的生產。由為部落所生產出來的生產品中，派生出一種主要的與別的部落的各種商品相交換的生產品。

這樣，商品生產與交換之發展突破單純價值形態之範圍且暴露出其缺點。事實上，在單純形態中某商品僅以各個別的商品表現其交換價值；商品與別的商品的等式，在此找不到其體現者。暴露在現存形態與發達的交換間的矛盾，於價值之新的完全的或擴大的形態中找到其體現者。

隨商品生產的發展，一公斤裸麥今天與五箱火柴交換，明天與一百五十公分白糖交換，後天與四百三十公分煤油交換或與二十五生的米特花布交換等等。因某種商品可以與許多其他商品交換，故這個商品可以得到藉以知道其價值的許多『鏡子』；獲得了許多單純的價值形態：

1. 1 公斤裸麥 —— 0.15公斤白糖
2. 1 公斤裸麥 —— 0.43公斤煤油

3. 1 公斤裸麥 —— 0.25公尺花布 (註)

〔註〕這些比例(本章以下各節皆如此)略與存在於戰前最後五年間俄國市場上的交換比例相近(參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號的「經濟概況」一九四頁)。

隨着一公斤裸麥所遇到的且以之體現其價值的商品數目之增加，又增加了這形態的數目，但用一個商品可以許多其他商品體現其價值，故我們可以這樣表明之：

$$1 \text{ 公斤裸麥} \left\{ \begin{array}{l} 0.15 \text{ 公斤白糖} \\ 0.43 \text{ 公斤煤油} \\ 0.25 \text{ 公尺花布} \end{array} \right.$$

這樣，我們由許多單純的價值形態獲得一個新的形態，所謂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

雖說，這一形態比第一個的較複雜，這裏一個相對的價值形態由許多等價形態表現出，但其本質則與牠所由發展而來的單純價值形態一樣：這裏等價形態與相對形態統一着，同時又對立着。這裏，這二種形態同樣應握有不同的使用價值，而且牠們之所以能比較者，僅因為在參加等式的所有商品中皆物化了抽象的人類勞動。最後，這裏，以別的商品的，某一商品之價值體現也只是在人們間的一定生產關係之物的體現。

在單純的擴大的價值形態間的區別包含在：擴大形態體現出商品生產發展之較高的階級，在這裏，比在單純形態中，更明顯地表現出每個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對立着，是具體勞動同時又是抽象勞動。

這裏，種裸麥的農夫底勞動不僅與織布者底勞動排成一列，如在單純價值形態中的那樣。這裏，在市場的這「一熔爐」中投入無數人（農夫，鑛工，園藝者等等）底勞動，而且經過商品交換的中介發現出

許多私的勞動之社會性。因在擴大形態中每個商品獲得其價值之「無數的體現者，那末這適足以證明，如馬克思的話說，「商品價值對於他所藉以表現的一切獨自的使用價值是完全不關心」(資本論，第一卷，二三四頁)

這樣，在完全的形態中，我們看到了在單純形態中所已見到的矛盾之更發展的形態。

但由商品生產與交換之往後發展，價值形態也更發展了。

在擴大形態中已特殊明顯地表現出社會勞動之所有私的形態對於某些統一的傾向。但這裏尚沒有完全的統一。這裏，每個商品皆可以許多其他商品體現出其價值；一公斤裸麥對於火柴，白糖，煤油等等之特定數量比較。但所有其他商品底，例如小麥底價值也可以許多其他商品體現出來。這樣，我們可以獲得體現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之許多等式：

第一個等式：

$$1 \text{ 公斤裸麥} = \left\{ \begin{array}{l} 5 \text{ 箱火柴} \\ 0.25 \text{ 公尺花布} \\ 0.15 \text{ 公斤白糖} \end{array} \right.$$

第二等式：

$$1 \text{ 公斤小麥} = \left\{ \begin{array}{l} 0.33 \text{ 公斤釘子} \\ 0.54 \text{ 公斤煤油} \\ 0.34 \text{ 公尺花布} \end{array} \right.$$

每一商品(例如裸麥)可以找到無數東西去體現其價值，但裸麥底價值體現與小麥及其他商品底價值體現不同。

隨商品生產底發展，發生於單純價值形態中的商品生產者底勞動二方面之分離過程在擴大價值形態中也更發展了。由擴大價值形態發

展到第三種，一般的價值形態。

在第三種形態中，一切商品，無論牠們如何不同，皆可以某一商品為其體現者。這裏小麥，裸麥與許多其他商品，例如經過火柴，決定其價值；這樣：

1.00公斤裸麥	}	—— 5箱火柴
0.25公尺花布		
0.15公斤白糖		
0.43公斤煤油		
0.25公斤鐵釘		

「這種形態所以有更實現之必要者——馬克思說——由於參加交換過程的商品數目與樣式之增多。任務與其解決的手段同時發生。商品所有者藉以交換其自己底生產品與各種其他商品且使之互相對等的商品迴轉，如無各商品所有者底各種商品在其迴轉的界限內與同一第三種商品交換的這種方法，決不能完成。……為其他各種商品之等價物的這第三種商品，直接獲得普遍的與社會的等價形態（資本論，第一卷，四十五頁）。

初看去可以說，在一般價值形態與擴大價值形態間的一切區別只是在這種與那種中的等式二端之倒置。事實上：假使把在後一等式中的五箱火柴移到等式的左端，把其他各項移到右端，那就可獲得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實際上，在這些形態間的區別很深遠。在擴大的形態中，某商品有無數「鏡子」，在那裏牠能「看出」決定其價值的東西。相對價值形態只有一個，而等價物有許多。每一等價物皆體現出同一商品的價值。這裏，在一般形態中，一般等價物只有一個「照出」一切商品的所謂「鏡子」是一種商品，在上例中，就是火柴。在擴大形態中，每一商品能採取無數的「形態」。這裏，在該市場上的一切商

品皆採取同一「形態」：牠們皆以火柴體現其價值。勞動底一切形態之對等，當作價值看的一切商品之對等這裏獲得了更明顯的體現者。同時，在一般價值形態中，爲一切各別商品之共同等價物的商品嚴格地對立着其他商品。在上例中爲一般等價物的火柴直接與任何商品相交換，同時，其他商品彼此間是不能直接交換的；例如，想以裸麥換鐵釘，應先以裸麥換火柴，然後以火柴換鐵釘。所以在一般的價值形態中，我們見到了二個互相決定的同時又互相對立的極端：在一極處着有各種使用價值的一切商品，在牠極處着體現這些商品之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在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在相對形態與等態形態間的矛盾，這裏更明顯地體現出來。

但價值形態的發展及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矛盾不限於這些。

在發生一般價值形態時，開初，由這種或那種商品執行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但由於商品生產與交換之更發展，一般等價物的作用開始強固地固結於某種特定的商品。爲一般等價物者是由這種或那種方法——這主要的是在該地域中爲交換而發生出來的——而獲得的這種或那種商品。例如，在遊牧民族中，一般等價物底一切作用往往以牲口執行之，在別的情形下，一般等價物專門由毛，皮，金屬，矛等等執行之。

生產力之繼續增長，商業，發展爲突破地域市場之狹隘界限的世界商業。在某市場上形成一般等價物之作用的商品，在別的市場上只是當作單純商品對立着當地的等價物。

由於商品生產的繼續發展與在地域市場上當一般等價物的各種商品（牲口，毛，皮，矢等等）的貿易之擴大，遂大大地發生出握有一般等價物之獨佔作用的某種商品——由金屬：金，銀，銅（初爲自然物形態，後爲鑄幣形態）——做成的貨幣。一般的價值形態轉化爲貨

幣形態。現在裸麥，小麥，花布，白糖，火柴及所有其他商品皆以貨幣體現出其價值。這一體現可以下列的等式表明之：

$$\left. \begin{array}{l} 1.00 \text{ 公斤裸麥} \\ 0.25 \text{ 公尺花布} \\ 0.15 \text{ 公斤白糖} \\ 0.43 \text{ 公斤煤油} \\ 0.25 \text{ 公斤鐵釘} \\ 5 \text{ 箱火柴} \end{array} \right\} = 1 \text{ 角}$$

商品價值之貨幣的體現是該商品的價格。

貴金屬所以能執行一般等價物之社會機能者，因其與別的商品一樣有特定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因在其中物化了抽象勞動。而由一切商品中，一般等價物的作用所以歸之貴金屬者，由於其特殊的自然屬性：牠們便於移帶與保藏，不致因風雨而耗損，易於拚合與細分等等。

貨幣形態表現出交換的新階段。牠與在一般形態中等價物之區別，首先在乎：貨幣不僅在某地域內且在其界限外皆形成了等價物的作用。次之，在貨幣形態下，測定其他商品價值的能力始終結合着執行等價物作用的商品之自然體，而在一般形態下，這種結合是一時的。事實上，如果在一般形態中火柴執行了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但火柴的根本機能並不在此。在地域市場上一時執行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牠們，一旦跑出地域市場以外，就按其直接名號——火柴而被利用了。在貨幣體系下，一切商品不僅在地域內以貨幣測定其價值，而且測定價值的能力始終結合着某特定的商品——貨幣。

因貴金屬的轉化為貨幣，其使用價值就有二種：1. 牠們能以金屬的屬性被用作鑲牙，製裝飾品等上面；2. 其使用價值包含在，經過與牠的比較測定了一切其他商品底價值。馬克思叫貨幣商品底第二種使

用價值謂形式上的，因其由貨幣底特殊社會機能中推演出的。

貨幣成爲對立着所有其他商品的獨自的特權的商品。貨幣以外的所有商品均不能直接互相交換；牠們不能以自己，只能經過貨幣的中介去測定其價值。直接與其他商品交換且體現出物化於商品中的社會勞動的，只貨幣才能够。

這樣，一切商品界遂分爲二極：一方面處着有其不同使用價值的一切商品，他方面處着體現所有其他商品底價值的唯一商品——貨幣。

分爲互相決定的同時又互相對立的二極的商品界之分類是萌芽於單純價值形態中的矛盾之發展的結果。

第六章 商品拜物教及其神秘 價值—商品生產運動之主要的法則

第三十節 商品生產之社會關係及其物的體現 商品拜物教的一般概念

價值形態發展的考察，證明，價值及由牠所體現出來的人們底特殊關係，不外是經過價值形態，即經過物——商品的互相關係而表現出來。

事實上，握有價值的每一商品，其中皆物化着創造牠的人們底社會勞動之特定部份。但商品只有經過握有與牠不同的使用價值的別的商品底中介才能表現出其價值，創造牠的人們底特定關係。例如，裸麥價值以特定量的火柴，金等等體現出來。故商品價值，其社會本質只能以握有各種使用價值的物去體現。這必然由商品經濟底生產關係本質的本身，由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推演出來。

我們會再三指出，在商品經濟中，「消費對象所以成爲一般商品者，僅因牠們是互相獨立的私的勞動的生產物」〔資本論第一卷三十二頁〕。在商品生產者互相參加交換以前，其勞動的社會性仍隱蔽着。牠們不能直接表現出來。存在於生產中的人們間的聯繫僅經過交換的中介而顯現。只有參加交換的，只有以爲其所交換的勞動生產品的中介而結合的人們才於商品經濟中顯現出」〔其私的勞動之特殊的社會性〕〔全

上)。

故物的關係滲入人們關係之連鎖中：「人們互相間的獨立性為全面的物的依存性的體系所補充」（資本論·第一卷，六十頁）。

這個或那個人商品經濟中的其他人們間所佔的地位決定於為他製成的商品在其他商品間所佔的地位：人將生產些什麼，在什麼生產部門內他投以其勞動——這些皆依存於市場上的商品之命運。

人不能自覺地制約物的運動，因商品生產的法則盲目地，不管且往往違反人底意志地而進行着。

商品交換的比例「離開交換生產的人們底願望，預期，活動，而不斷地變化着。在人的眼中，其特殊的社會運動採物的運動的形態，他們處在物的運動規制之下，不是由他們去規制物的運動」（前書，三十三—三十四頁）。

如不依存為他所製成的物，人就失掉控制其自己底生產關係的權力。

生產關係的「物化」，「人的運動」對於「物的運動」之依存性——乃商品生產的特徵。

這特徵使商品生產的參加者發生錯覺，以為物本身天然握有支配人們的某種神秘性。人們本身底特定社會關係，由商品生產的參加者看來，採取物物關係之神秘形態。人們往往不能在商品關係背後去看出其自己底關係。由於物含有特殊的屬性，人們就開始忘記，商品本身只是「使人們看出其自己勞動之社會性的鏡子」（前書，三十一頁）。

物的關係遮蓋着人們自己的關係。

在最初的最單純的價值形態中我們已看到這根基。例如十公斤裸麥以一米特棉布體現其價值。假使棉布不握有與裸麥底自然形態不同的獨自的自然形態，那牠是不能體現裸麥價值的。等價物底獨自的自

然形態成爲相對形態的價值之體現。因而造成錯覺，以爲棉布所以能體現裸麥價值者僅因其有獨自的自然屬性。開始說，棉布能成爲等價物者僅因其自然屬性。

這種印象更加強了，當我們由單純價值形態進展到擴大的尤其是一般的與貨幣的價值形態時。事實上，當我們在研究單純形態時，棉布，一方面，是裸麥的等價物；他方面，對於棉布的所有者，裸麥是等價物，棉布則處在相對形態中。在一般價值形態中，所有商品皆以一個等價物測定其價值，而在貨幣形態中，這等價物不是同系列的商品，而是獨自的「特權的」商品。這裏，既然一切商品不是以自己，而是以貨幣體現其價值；遂以爲，商品價值並不存在於其自身，僅因以貨幣去測定牠們而發生，爲一般等價物的貨幣能力好像是貨幣底自然屬性，如重量等等。

其實，在分析單純價值形態時，已由我們指出，爲其他商品之等價物的，各個商品底能力，不能以等價物的自然屬性，只能以等價物，與其價值爲牠所測定的商品所由造成的社會關係去說明之。固然，貴金屬的自然屬性資助着，由牠去執行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但不是金底自然屬性本身使牠成爲等價物，金所以能測定其他商品之價值者，因金與其他商品一樣握有體現商品生產者底特殊社會關係的價值。

一旦人們把商品之自然屬性認作其可交換的且爲等價物的能力，那末，我們就可以說這是錯覺，即虛僞的表象。

由商品經濟之特徵發生出來的人們底錯覺，正與在爲人們自己所造成的物(佛^殊，鏡子，偶像)前跪拜，神格化牠們且給以神祕性的原始野蠻人的表象相似。

人們將手造的各物神格化，叫做拜物教。仿照野蠻人的拜物教之類似語，馬克思叫生產關係的「物化」，在商品經濟中人們對於其手

造的商品之依存性，謂商品拜物教。

能揭穿商品拜物教之根基者只有馬克思，他指示出在商品經濟中，物物外在關係的背後隱藏着人們底關係，物只是人用以體現其關係的「鏈子」。馬克思指出，在社會勞動直接表現為私的勞動的商品生產中，人們底關係不外以物底中介而體現，物就開始統治人們本身。馬克思以此暴露了且揭穿了人們底關於商品底獨自的內在特性的錯誤表現之根基。

當然，這種暴露並不消滅商品拜物教。生產關係的「物化」，人對物的依存性一直客觀地存在着，當商品生產與固存其中的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尚存在着的時候。只有隨基於私有權的商品生產之消滅，隨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之消滅，此時，生產者底勞動將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才沒有價值與商品拜物教。

在先商品經濟而存在的且喪失為商品經濟之特徵的矛盾的那種經濟形態中也沒有商品拜物教與價值。

試以曾為我們所考察過的農民家庭之自然經濟為例。這家庭「為自己底消費而生產穀類，家畜，紗，棉布，衣服等等。這種物，對於這家庭，雖係其家庭勞動的各種生產物，但牠們彼此均不是商品。創造這些生產品的各種工作：耕種，畜牧，紡織，縫衣等等，是其自然形態的社會機能，因這是，如商品生產似的，握有其自己底，因分工而自然發生的家庭機能。性別與年齡的大少，以及隨季節而變化的勞動之諸自然條件，制約了在一家人間的勞動分配與每個人的勞動時間。但以其時間之長短去測定的個人勞動力的支出，自始即給這些勞動以社會性，因個人的勞動力自始即僅當作全家勞動力的器管而作用着（資本論，第一卷、三十六頁）。

所以，雖說組織在農民家庭中的各成員執行了各個「社會機能」

，但他們間的關係並不採取物物關係的性質。這裏，勞動在其具體形態中直接表現作社會勞動。因而這裏，要表現勞動的社會性，無須比較各個具體形態的勞動，無須把牠們還原到勞動一般。因而這裏，沒有具體的與抽象的勞動剖析，也沒有使用價值的與價值的商品剖析。這裡，家長根據性別，年齡與季節預先分配勞動於一家的各成員間。所以，每個工作者勞動在全家勞動的全體中的地位，在勞動耗費於勞動生產物以前，已預先被決定了。

現在再來看看代替商品生產的生產方法，即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吧。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有生產工具與手段皆屬於全社會，每個生產者底勞動直接是社會的勞動。所有生產者底生產品，這裏，皆是社會的生產品。因而這裏，沒有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生產品剖析；直接是社會的，生產者底勞動並不採取抽象勞動形態。這裏沒有物對人的統治，因社會根據各生產部門自覺地且有計劃地分配各生產者底勞動且自覺地分配生產物。故這裏沒有價值法則之作用與商品拜物教的地位。

自無產者以革命的方法毀滅了布爾喬亞的統治且獲得政權這個時候起，就終止了商品生產之盲目法則的統治。在研究蘇聯經濟的規律性時，我們還可看見，我們底發展基礎不是盲目的法則，而是自覺地把自己活動趨向在資本主義份子之限制然後肅清上，傾向在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上，傾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無產者專政。所以在無產者專政之下，已驅除了價值法則的作用，消滅物對人的權力，消滅了商品拜物教。

第三十一節 當作商品運動之主要法則看的價值

我們知道，價值法則是僅固存於社會發展之某一特定階段——商品經濟的史的法則。

價值法則是商品生產運動之主要法則。始自其最單純形態且終於其最發達形態的價值法則發展之研究——就研究了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當我們才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我們尚不能於某種完全的無所不包容的形態中揭露出價值法則之豐富的內容。因由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某階段到別階段以至其滅亡的轉變，牠才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

但我們所已知的材料已能使我們瞭解，商品經濟及其矛盾的發展怎樣在價值法則基礎下進行。

在商品中以萌芽的形態包含着促使商品經濟發展的矛盾——在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在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在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

揭穿商品的主要矛盾，分析價值形態且指出其發展的馬克思，又指示出，商品生產的發展怎樣在這些矛盾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

後面我們將看到，怎樣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進行由貨幣而資本的轉化，商品的生產形態怎樣握有新商品——勞動力——且成爲一般的生產形態，怎樣在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基礎上發生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一方面，成爲富農，資本家，他方面，初則成爲半無產者，終乃成爲喪失一切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的無產者，同時，又發生了剩餘價值及其變形——利潤等等。

分析（馬克思的商品分析——著者）——伊里奇說——在最單純的現象中（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中）揭穿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

……一切矛盾的萌芽)。繼續的說明告訴我們這些矛盾的與這個社會的(其各部份之總和——著者)……由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伊里奇，哲學稿本，一九三三年版，三二六頁)。

當作運動法則看的價值法則的本質在乎，在其基礎上進行着始自其萌芽形態即單純商品經濟，終於其最後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帝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由價值是商品生產的運動與發展之主要法則這一點，推究出，價值制約了這運動與發展。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盲目地進行着，保證商品—資本主義關係之發展的，在各生產部門間勞動與生產手段之分配。

各商品生產者皆盲目地生產其商品，不預知，他人生產什麼商品且生產多少商品。結果遂使某種商品生產得過多，別的商品則生產得太少。

在商品過多的生產部門中，商品價格低落於其價值，生產自然會緊縮。在商品生產得太少的部門中，價格，相反地，高於價值，且給生產之新擴大造成條件。這樣，由於價格之不斷地背離價值，進行着在商品經濟中的各生產部門間的，保證商品之發展的，人們勞動的分配。

故各生產範圍不斷地傾向於比例性，但這比例性任何時候皆不能達到。由於在某部門中商品生產的無政府性，那裏昨天生產出過多的生產品，明天因價格低落生產遂緊縮了，商品將生產得太少；經過相當時間，由於價格的上升，這商品生產將再次過於擴大等等。[各生產範圍對於平衡的不斷傾向——馬克思說——僅當作這平衡之不斷破壞的反動而表現出來] (資本論，第一卷 二六八頁)。沒有當作比例性之不斷破壞的反動而表現出來的，對於比例性之盲目的傾向，商品經濟一

般是不能存在與發展的。

在體現商品經濟底特殊生產關係的價值法則基礎上進行着這經濟底生產力之發展。

在商品生產下追逐自己利益的各商品生產者，力圖保證商品出售之最有利的條件。既然商品價值是決定於社會一必需勞動的，那末，如我們所已知，在某企業上新機械的引用，極有利於其主人的，因此時新技術尚未普遍引用，商品底價值與相應的價格尚無變化。這刺激着企業主競用新的技術。但盲目的價值法則之作用，引導到新的技術將為別的業企所採用且普遍化，引導到商品價值之減低。這又要求新的進步技術之引用，這又將一直有利，當牠們尚未被大家所採用時，^備等等，這樣在價值法則基礎上完成了商品經生產力的發展。

總之，我們看到，價值法則決定了整個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路綫，在某階級上引導牠到革命危機的，這經濟底矛盾發展之一般路綫。同時，價值法則又是這樣的法則，在這法則基礎上進行着在商品經濟底各部門間的勞動分配及其生產力的一般發展。所以價值法則的作用盲目地，獨立地，且往往違反商品生產者的意志地實現着。

初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我們僅於一般形態中，僅以單純商品經濟為對象而考察這個法則。當我們由單純商品經濟轉化到資本主義經濟時，當我們在價值法則基礎上暴露出在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剝削之根本時，為我們所已指出的價值法則的作用，於更完全的且擴大的形態中徹底地表現出來。只有那時我們才能指出，在資本主義下，價值採取怎樣更複雜的形態。

第七章 關於商品的馬克思—伊里奇學說與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關於商品的馬克思—伊里奇學說之曲解底批判

第三十二節 布爾喬亞科學反對馬克思—伊里奇的勞動價值論的鬥爭 布爾喬亞學說底批判

以勞動去說明商品價值，這在馬克思以前，早已爲白蒂，斯密士，李嘉圖，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古典派之這幾位代表所發明。資本主義初期的布爾喬亞之這幾位進步的代表底史的功績在乎，他們不徘徊於經濟現象的表面，他們於人們底勞動後面開展出在商品經濟中的人們底關係，內在的聯繫。

但如馬克思所說，連這幾位最好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爲了其階級利益，認資本主義爲唯一合理的，永久的制度。因而他們又把商品生產的法則變做永久的超歷史的法則了。例如：他們以爲在任何社會中，勞動皆能造成價值；依他們的意見，甚至個人的漁夫底或獵夫底勞動也能造成價值。所以他們不瞭解創造價值的勞動底獨自的特性。他們不瞭解且不能瞭解這勞動底對立性與歷史性。

但自足以恫嚇布爾喬亞形態的無產者底階級鬥爭的發展與高漲那時起，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做頭做尾背叛科學了。甚至不想闡明布

爾喬亞生產之內在關係的，所有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爲了擁護資本主義而曲解且抹殺事實。企圖隱瞞資本主義的矛盾且「証實」其合理性與永久性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很顯然地攻擊承襲且修改古典派學說最優點的馬克思底商品論與價值論。

在反對價值論的鬥爭中，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往往根據這一點：在實在的現實性上，商品價格不與價值相吻合，而是依存於需要供給的變動而高於或低於價值。似此說明當然是極脆弱的，因供求的相互關係不能說明：在價格動搖底根抵上潛在着什麼？這個動搖以什麼爲中心？變動的供求關係，雖能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穀物爲什麼普通春貴而秋賤，而冬衣爲什麼春賤而秋貴。但供求的相互關係不能說明價格無論怎樣漲落，爲什麼麪包的價格通常只是幾分錢，而冬外套的價格則是幾十元。這只能用穀物的，冬外套的和與他們相交換的貨幣的（註）價值才能說明，即只有用在其生產上所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才能說明。

（註）在此是指完全價值底貨幣。我們暫時不談紙幣。

復次，用供求關係去說明價格的布爾喬亞學說，亦不能說明需要供給的變動是從何處發生的。忠實其布爾喬亞階級利益的他們，小心翼翼地蒙蔽商品經濟底矛盾，這些矛盾，滋生出在商品經濟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與需求的不斷變動。

以求供變動去說明商品價格的理論之脆弱性，已被馬克思與伊里奇所指出了。「供求關係——馬克思說——所能說明者，僅爲：一方面，市場價格對於市場價值的背離，他方面，趨於消滅這些背離的傾向」（資本論第三卷一二七頁）。

假使注意到在多少長時間內價格高於或低於價值的背離，那末，牠們是互相吸引的。故在研究價值法則時，我們可以捨象商品價格對

於價值的背離。捨象了每一交換行爲的動搖，我們深切地明白了該現象的法則，即包含其中的主要的現存的法則。「價值底抽象化——伊里奇說——全是科學的。……抽象化反映出深切的，可信的，完全的性質（伊里奇，哲學草稿，一九三〇年版，一六六頁）。『價值……比之求供法則，更是真理的』」（前書 一六八頁）。

除掉以供求的變動去說明商品價格以外，還有許多布爾喬亞經濟學家企圖過而且還企圖着以商品的生產費去說明其價格。例如他們對於皮鞋的價格，是用生產皮鞋時購買皮革，鞋底，釘等所支出的一定量貨幣，鞋匠自身的勞動應得的一定報酬去說明之。這樣說明，乍看好像有理，但實際上什麼也不能說明：一商品（鞋）底價格在此用其他商品（皮革，鞋底，釘等）底價格去說明，其他商品（如皮革）底價格又用第三個商品（獸皮等等）底價格去說明。但結局對於價格究竟依存于什麼這個問題，這裡仍不能得到最後的解答。不消說，像這樣的理論，更不能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價格上，除掉生產費外爲什麼還加有利潤。這一點，只有在價值底基礎上才能說明。

總之，生產費論對於價格也不能有任何說明。

最後，在布爾喬亞科學中極流行着，以某商品底效用程度，即以人類對該商品所感到的慾望來說明此商品的價格。這種說明之特別熱烈地的擁護者是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奧大利學派，該學派（代表者爲彭巴威克等）想用自己的學說去「粉碎」爲其所討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這種「效用」理論和與之緊密地結合着的供求「理論」相結合，而爲在現代布爾喬亞科學領域上佔支配地位的英美學派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所熱心地流布着，

可是在現實上，各種商品底價格是否能用其「效用」來說明呢？商品底效用，最先爲商品的自然屬性所決定。（這自然屬性本身在社

會發展各階段上被人們當作各種不同的用途)。但商品底自然屬性並不能說明其價格。如果生產條件變化，則商品底自然屬性雖照原樣不變，但其價格也會變動。並且，不同的各種商品，其自然屬性雖各不同，但在商品經濟裏，同時，各個互相交換和互相比較的商品又皆有某種共同的基礎，這種共同的基礎，如馬克思所說，「並不是各種商品之幾何學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任何自然屬性」。「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但布爾喬亞的學者不僅於自然屬性，且於人類對各種商品所感覺到的慾望上找到效用性的根基。據奧大利學派的領袖彭巴威克底學說，商品底價格「依存於某種物質的財富……對於主觀底幸福具有如何的意義」上。「彭巴威克著：經濟財底價值論基礎七頁」。根據這個學說，商品價值的大小，是以人類對於該商品底慾望，在他的其他慾望中所佔的地位如何為轉移。(註)

「註」根據這一學派底理論，在決定「效用」底程度時，要考慮一下這個

「財」底現在存貨 (Stock) 。因此，商品底效用性，也與商品底

供給相結合着。

所以，這派的主張，是以為應該在生產物對於人類個人的幸福的意義上，在人類對於該商品底效用性所加的主觀評價上去尋求價格的根源。他們說價格的根源，並非在商品經濟裏面獨立於人類的意志與意識之外的客觀法則上，而是在人類意識本身上。這種價格法則的觀念論的解釋，蒙蔽了資本主義底各種現實矛盾。這是完全沒有效力的，因為實際上如我們所看到的，價格並不能拿人類底慾望和意見來說明。商品主想盡量地高價出售，而購買者想盡量地廉價購買；但現實的價格則獨立於賣者與買者底意志之外而盲目地被決定。各種商品效用底主觀評價不能為價格基礎者，因為各種商品所具有的用處極參差

不等，發見一個單位——藉此才能衡量各種效用性，且將其相互比較的——是不可能的。有的商品對於甲很有用，而對於乙却很少用處。還有應當注意的，在商品經濟裏，有些人們購買商品，並不是從抽象的效用出發，而是從為他們所支配的各種手段出發。有巨額資本而榨取勞動者的資本家，與除勞動力外並無任何財產的勞動者，他們的慾望滿足法是完全不同的。這種差異底根源，只能在「效用理論」底信徒們所要審慎迴避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發見。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底主觀學派所以集中其注意力在主觀心理上，在於市場上他們買賣已生產出的商品之情態上，也就是因為他們想蒙蔽商品生產的矛盾及其發展形態——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

這樣側重經濟現象——使這些現象歸結到市場交換——，也就是社會民主派底特徵。

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在說明商品價格時，社會民主派現在也已完全公開地在布爾喬亞的立場上採取供求說和效用說了。

最有名的修正主義者柏倫什坦，早已努力採用奧大利學派底效用說以代替馬克斯底價值說了。他認為根據價值的各種商品之交換，只是「思想的標準」，交換雖然必然地有向着價值的傾向，但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口頭上「承認」價值的柏倫什坦（以及想把馬克思學說「抽筋換骨」的其他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否定了價值底現實存在。

至於現代的社會民主派則更是堅決地，公開地「揚棄」馬克思學說。例如伯樂五泰共在『現代經濟及其法則』一書中說；

「關於價格一般是依據什麼法則而形成的問題，不外有兩種理論——需求理論與供給理論，兩者間的矛盾現在緩和了，且正有許多想使這兩者結合起來的企圖。」（伯樂泰爾著：現代經濟及其法則（二六頁）。

伯樂五泰認為供給理論——他以為其中包含馬克思底價值理論——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失其妥當性，在現代資本主義中大部分商品的價格大小「並不是由勞動時間去決定，而是由需求的伸縮性去決定」。〔前引書 四三頁。布爾喬亞在這裏說的是關於商品底獨佔價格。我們將來在帝國主義篇上再論牠。它可以價值來說明的事實，到那時候再談。〕

另外最新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底著者奈爾丁兄弟，也作了同樣的結論，他們一面承認在觀念的「純粹社會」上的勞動價值，同時在實際現實上則認為諸商品底價格，不是由勞動價值決定……而是由「界限生產者」（即在該商品底所有生產者中，於最劣的條件下生產的，）底生產費去決定。（弗里慈高恩的社會法西斯主義底理論破產，「波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三一年第三號，五〇頁）。

總之，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價值理論不適合於實在的現實。與其他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提攜的他們，不欲在商品生產的各種矛盾關係——忠實於布爾喬亞利益的他們要深慎迴避的矛盾關係——中去求市場上價格形成之法則，而在交換過程中求之。

第三十三節 馬克思—伊里奇商品 論之觀念論曲解底批判

現在要批判社會——民主派與機會主義者——他們於口頭上自命是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則以有害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喬亞學說去替換牠——一方面的對於馬克思—伊里奇的商品論之觀念論的與機械論的曲解。

由觀念論的曲解之批判開始吧。

假使馬克思—伊里奇的商品論是暴露包含於商品中的內在矛盾且

指示出隨商品生產的發展，這些矛盾深化與增長之必然性的，那末觀念論修正的代表則力由馬克思學說中抽出這些矛盾。因而，他以價值與抽象勞動的學說去替換且限制，關於商品及其二重性，關於勞動的二重性的馬克思學說。「發揮」馬克思學說的，考茨基，魯平，費爾希丁，由價值而非如馬克思所做那樣由商品及其二重性開始研究，並不是偶然的。觀念論者不把在價值與使用價值間，在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看成商品及創造商品的勞動之內在矛盾，而把牠們當作在社會與自然間的外在矛盾之體現者。

「勞動的二重性——魯平說——反映出在商品的物質—技術過程及其社會形態間的區別……由這主要的區別推究出在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區別，這又體現於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性中」（魯平—馬克思底價值論概要—第三版—八三頁）。

依魯平（以及費爾希丁）底意見，具體勞動與使用價值是歸於產生的物質—技術過程，是屬於自然現象界的。具體勞動與使用價值對於「社會形態」，對於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沒有任何關係。推論出，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之內在矛盾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在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間的外在矛盾。

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之否定，及以外在矛盾去代替牠，觀念論者遂與機械論者——他們處處以外在矛盾去代替內在矛盾——脈脈相關。這種代替有特定的階段意義。不承認包含於商品中的商品生產之內在矛盾的觀念論者與機械論者又否定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這些矛盾之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的一切深切的內在矛盾及為其體現者的階級鬥爭，被否定了且被人類與自然的鬥爭所代替了。這僅有利於布爾喬亞，他們力圖藉助否定階級矛盾的理論以辯護其對於勞動階級的壓迫。

力圖掩蔽包含於商品中的內在矛盾的觀念論者，不僅以外在矛盾

去代替牠，且把這些矛盾解釋作僅存在於人們腦子中與表象裡的思維的矛盾。例如費爾希丁，說起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矛盾時，曾指出過，這只是考察的方法的矛盾。『商品——他說——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僅考察方法才是二方面的：當作屬於自然界的物，牠是自然科學的對象；當作社會的物，商品——社會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彭巴衛克——馬克思底批判者，一九二三年版，一三頁）。

實際上，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是，實現地不依存於人們見解地存在於商品經濟中的，體現為考茨荃，費爾希丁與魯平等所想蒙蔽的商品生產實在矛盾的，實在矛盾。

伊里奇嚴刻地批判了布哈林，當他企圖把人們考察社會現象的特定方法的觀點應用於社會現象去時。『問題不在於——伊里奇說——誰考察了』，於誰『有利』，而在於，那是不依於人類意識的』（『伊里奇遺集』第十一卷，三八五頁）。以考察方法去代替客觀法則的觀念論者，力使無產者放棄客觀現實性之改革的性務。

於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上批判觀念論者時，我們已知，他們分雜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且否定生產關係的物質性。在價值與抽象勞動問題上，我們又可看到這點。認為使用價值與具體勞動是屬於自然現象的『物質——技術的』範疇的觀念論者，同時，又把價值與抽象勞動瞭解作與物質生產沒有任何共同點的『社會』範疇。

『馬克思——魯平說——再三指出，價值是社會現象，價值的存在 (Wsrthgegenstandlichkeit) 有『純社會性』且其中不包含一個物的因子。由此推究出，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應瞭解作社會範疇，我們在這裏找不到一個物的因子』（馬克思價值論概要，一四九——一五〇頁）。

否定價值與抽象勞動之物質性的魯平，私改了馬克思。馬克思任何時候皆不曾說且不能說，價值在其自身中不包含物的因子。馬克思

是說，『在價值底……實體中不參加自然物的一個因子』（資本論第一卷十一頁。魯平於其私改中利用了不正確的譯文）。這就是說，體現生產者底特殊社會關係的價值，與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以及類此的自然現象根本不同。但如當作社會範疇看的價值與自然法則不同，那末，這絕對不是說，牠是非物質的。於價值中體現出的生產關係是獨自的特殊的物質關係；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也非存在於人們底表象中，而是存在於物質的，存在於客觀的現實性中。

否定了價值與抽象勞動的物質性，魯平及其他社會—民主派相信，價值與抽象勞動不在生產中而在交換中發生出來的。在這樣的解釋中，抽象勞動與爲牠所造成的價值真正沒有一點實在的了。事實上，假使如魯平所說，抽象勞動不形成於生產過程中，即非由勞動形成的，那末，抽象勞動怎樣能存在呢？

由交換推論出價值與抽象勞動的觀念論者力圖蒙蔽存在於商品生產過程中且體現於價值中的矛盾。社會—民主派想以其『交換的見解』向工人掩飾處在資本主義生產本身中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根基。他們在這種見解上建立其以在市場上流通之『制約』的方法由資本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無須社會革命，無須歸無產者國家的生產之國有化——之和平轉變的理論。其實，這種理論是以保衛資本主義制度，防禦無產者革命爲目的的。

與魯平和交換觀的其他代表相反，馬克思—伊里奇的關於商品與價值的學說指示出，交換在生產基礎上發生出來且爲生產所決定，僅能表現出包含於生產中的矛盾，而且只有隨商品生產的消滅才能消滅足爲其特徵的交換形態。

不明白商品底內在矛盾與價值底物質性的觀念論修正派的代表們又否定了商品生產的矛盾發展之歷史過程。

由商品開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法則之研究，馬克思揭示出在其曙光期上存在於單純商品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最單純的矛盾。分析了這些矛盾之發展，馬克思証明了，怎樣發展了商品生產，單純商品經濟怎樣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

依觀念論者底意見，由商品開始研究的馬克思，並非闡明商品生產發展之史的過程，而是進行着純邏輯的行爲。依魯平底意見，單純商品經濟不是商品生產發展之實在的史的階段，不是資本主義底萌芽，而是爲我們腦子所抽象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之一。魯平同樣把馬克思底價值形態之發展看做由別一形態推演出某一形態之純邏輯過程。伊里奇極明確地反對了馬克思底關於價值形態發展的學說之類此的觀念論的曲解。

這就是他所說的：「詳盡地分析了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之二重性，馬克思由價值形態之分析轉變到貨幣。馬克思底主要任務是研究貨幣的價值形態之發生，研究交換擴大之史的過程，始自其個別的偶然的行爲……終於一般的價值形態……乃至於貨幣的價值形態。此時，這些特殊的商品，一般等價物乃是金子……尤應指出，述說之抽象與有時所謂演譯的（即純邏輯的推論——著者）形式乃根據交換與商品生產與發展史之偉大的實際材料之復演」（全集，第十八卷，十六—十七頁）。

否定價值與價值形態發展之史的過程，觀念論者力圖把揭穿資本主義之實在矛盾的馬克思學說，以抽象的概念，轉化為空洞的遊戲。他們想以同樣的方法抽出馬克思學說——這指示無產者爲消滅資本主義及其矛盾而鬥爭的道路——之革命的內容。

第三十四節 關於商品與價值的學說之 機械論曲解底批判

『均衡論』與『勞動支出法則』之批判

足為馬克思—伊里奇主義之機械論修正的特徵的，是把一切社會法則歸結到較單純的自然法則。他們把生產關係看作技術的關係，同時某一形態之質的特徵被機械論者所埋沒了，且某一形態的法則被機械地轉置到別一形態上去。

體現商品生產者底生產關係的價值，被機械論者由社會的範疇轉化為技術的範疇。造成價值的抽象勞動被他們引申到勞動之「單純的」生理的支出：凡是人們勞動着且支出勞動能力的地方，依他們底意見，勞動皆是抽象的。抽象勞動之特殊的社會性，其歷史性遂被否定了。

否定了抽象勞動之質的特徵，機械論者把價值看作勞動能力之純數量的支出。

似此的觀點難免引導到價值與抽象勞動的法則轉化為適應於任何形態的永久的範疇。由此推論出，資本主義法則轉置於蘇聯經濟上去。所以永久化了資本主義法則的機械觀遂暴露出其布爾喬亞的本質。

抽象勞動與價值的歷史性之被機械論所否定，同樣表示出，商品及造成牠的勞動之內在矛盾的否定。轉化價值與抽象勞動為自然技術範疇的機械論者，同樣把使用價值與具體勞動看作自然——技術範疇。在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在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實在區別及其矛盾，這裏被抹殺了。

以機械論的立場去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少數派—有害者，逢依諾泰

夫斯基，引申價值到使用價值，引申抽象勞動到具體勞動，不是偶然的。公開反對馬克思的逢依諾泰夫斯基聲言，馬克思「錯誤了，以為價格性(價值)不與自然具體的勞動相聯繫。『造成價值的勞動——他肯定地說——也是具體勞動，只是不由其獨自的社會—效用屬性方面，而由一般的社會—物質符號方面去考察而已』。

否定了使用價值與價值，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之實在區別和矛盾，機械論者與觀念論的見解相接近，以為在他們間的區別是依存於考察法的：以一種觀點看去，勞動是具體的，由別一觀點看去，這勞動又可當作抽象的看。在這個以及許多其他問題上，機械論者與觀念論者相結合：他們皆否定商品生產矛盾之實在性且以同樣方法粉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把他解釋做失掉實在的內在矛盾的生產方法。

否定了商品底內在矛盾，機械論者與觀念論者相結合，進而否定在價值法則基礎上的這些內在矛盾之發展。他們以當作平衡法則看的價值之機械論的解釋去代替關於當作商品生產運動之特殊法則看的價值之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學說。

類此觀點的代表(在我們底經濟學著作中由卜格唐諾夫開其端，)是布哈林同志。馬克思在資本論序文中說，其著作的目的是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底「運動之經濟法則的發明」，而布哈林同志則相反，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這個社會的均衡法則之尋求，「尋求均衡的……法則——他說——是政治經濟學之主要命題」(布哈林、特形期經濟學，一九二〇年版，第一部，一二八頁)。既然為商品生產所統治着的社會存在着，那末，依布哈林底意見，這就是說，在那裏有「全體系的定特的均衡」(全上)，他的各部分彼此「互相適應着」。依布哈林底意見，商品生產均衡之強固的堅定的體系為價值(布哈林則說「價格性」)法則所確定着。「價格性法則——他說——是生產的單純商品體

系之均衡的法則」(前書,一二九頁)。

價值的似此解釋是馬克思底見解之直接的修正。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曾指出,「均衡論與馬克思主義,當然,沒有任何共同點」(伊里奇主義問題,四四三頁)。

在這種理論上首先明顯地表現出商品生產內在矛盾的否定。事實上,假使價值「適應了」商品經濟的各部份,把牠變為「強固的堅定的體系」,那就降落了商品生產內部的一切矛盾。這於邏輯上必然會引導到,以階級的均衡去代替體現包含於商品中之矛盾的資本主義生產之階級矛盾。所以均衡論難免引導到階級鬥爭的否定,階級和平的宣傳。次之,以商品生產為均衡之強固的堅定的體系,那末與隨其內在矛盾的否定抹殺了商品生產之運動與發展:隨其內在矛盾的否定降落了引導商品生產趨於滅亡的力量。

這就是布哈林所以難免進展到「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進展到,資本主義諸國的內在矛盾不能引起革命,革命僅能因資本主義諸國互相的外在戰爭對抗而發生,的原因。

在應用到我們蘇聯經濟時,這理論表示出階級鬥爭與進攻階級敵人的必需性之否定。

均衡論不僅為機械論者,且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商品及其發展之實在性的觀念論者所闡揚。

「科學研究的任務——依魯平底意見——僅在乎,確切地規定勞動分配與均衡的法則」(馬克思價值論概要,二百頁)。「價值法則是商品社會之均衡法則」(前書,十六頁)。

這種觀點又為魯平底外國同道,奧大利馬克思主義派之社會—民主主義者所闡揚。「馬克思—伯樂五泰說—在其勞動價值論中,並未放棄「均衡與相等性理論」的地位」(伯樂五泰:現代經濟及其法則,二九頁)。

均衡論又爲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所闡揚。

「體系發展與均衡之內合法則」——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家，潑拉與佛拉繩斯基說——經過滙合趨向之偶然性發展其道路，且只有在體系的主要法則及其表現形態之深刻批判的與抽象的分析底基礎上，即以價值法則，資本主義機構之自我制約法則底確定的方法，才能把握住它。

均衡論成爲在以康特拉夫，葛洛孟，把柴牢夫等爲首的許多布爾喬亞有害者底手中的武器，他們在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反對無產者專政的鬥爭中努力利用牠。

所有這些皆暴露出這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無產者的理論之階級本質，這在當時曾爲伊里奇所批判過。

在均衡問題上批判布哈林的觀點時，伊里奇曾指出，說在商品經濟中「某種比例性之必要」，是「確當的，可信的」(伊里奇選集，第十一卷，三八四頁)。這某種比例性之必要經過比例性之不斷破壞而表現。「對於均衡」之不斷的傾向——依馬克思底話——僅當作這均衡之不斷破壞而表現」(資本論，第一卷，二六八頁)。

由均衡原理出發，機械論者(尤其是布哈林)力圖把價值法則的本質推演到爲其所發揮的，依他們底意見，存在於社會發展之一切階級的其他法則——勞動支出的法則。

布哈林爲其見解的根據計，努力引證馬克思給古海孟之有名的信，在那裡馬克思說，在社會生產的任何形態之下皆存在着在生產各部門的「社會勞動以特定比例分配之必要」。布哈林把這種比例性的必要叫做「勞動支出法則」——「經濟生活之當然的與廣泛的制約者」

「經濟均衡之一般的與廣泛約法則」。作用於任何社會形態中且保證其均衡的勞動支出法則，依布哈林的意見，披上拜物性的外衣表演於

商品經濟中；在別的形態中，尤其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個法則無外衣地 赤裸裸地 表演着。所以在商品經濟中改變了法則之外表形態，其內容則一樣的。依布哈林，價值法則就是披上拜物性之外衣的勞動支出法則。

布哈林底見解不是獨創的。布哈林重複了卜格唐諾夫。『假使在資本主義之下——卜格唐諾夫說——主要的盲目的制約者是勞動支出，假使在過渡的形態之下，在較有計劃的形式中之制約者也是勞動支出，而且在社會主義之下，制約者應是勞動支出，那末你還不明白，這是一般的規律麼？固然，在資本主義下，牠有價格性法則的形態；在一種情形下，較盲目地，在他種情形下，則較有計劃地實現了該法則的作用，但皆是勞動支出法則，同一的關係』。

勞動支出法則的這種機械論的見解首先錯誤地把價值法則的作用只當作制約者作用。牠以此把價值解釋作保證商品經濟的各部份互相適應的，保證這經濟之堅定性的法則。其實，價值法則不是堅定或均衡的法則，而是商品經濟之運動，其矛盾之增長與發展的法則。毫無疑義地，價值法則制約了在商品經濟各部門間之勞動分配。但如所已指出的似的，這制約，矛盾地經過商品生產運動過程中的，在為這生產之特徵的內在矛盾之基礎上的比例性之不斷破壞而實現。這就是價值法則的本質不僅以商品經濟制約者為其作用的所以然。

同時勞動支出法則之機械論的見解又不正確瞭解在各生產部門中的勞動分配。

按這種見解推論出，在各生產部門間的勞動分配，本質上，在各社會形態中皆同的。假使在商品經濟中，在各部門間的勞動分配是在拜物性外膜的準則之下完成的，那末在共產主義下，我們有同樣的分配，僅無拜物性的外膜而已。推論出，各經濟部門的互相間的關係，

於數量上與質量上皆不應變更的。假使在資本主義下，我們有，譬如，在重工業與輕工業間的，在工業與農村經濟間的特定比例，那末，就是在資本主義滅亡以後，這些比例也應保存的，因不如此就破壞了按其本質是永久的不變的勞動支出法則。

所以，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得(不管如何謹慎)到結論，在我們蘇聯經濟中仍應保留着如在資本主義下的那種比例。依布哈林底意見，我們僅能預先，在生產過程以前，以社會主義的計劃，引導着且推動着，而在商品經濟中則於生產後在市場上盲目地表現出來。

依布哈林底見解，必應在保存比例性的名義下保持住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角部與資本主義角部間的均衡且不進攻富農。在布哈林底與其他右派機會主義者底這些見解之基礎上發揮了投降布爾喬亞的盲目性面前的許多機會主義的提綱。

與機械論的見解相反，馬克思——伊里奇的價值論認為，價值法則不僅按照形式，且按照本質，與其他經濟形態運動的法則不同。價值法則表現形態的特徵顯露出為價值所體現的那些生產關係的特徵。

當然在每一經濟形態中，勞動均應根據特定的基礎分配於各生產部門間。但在由這一形態到那一形態的轉變下，這分配的形態與比例本身於質和量上皆根本變更了。考察我們蘇聯經濟的規律性時，我們看到，由於我們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原則上的不同，在我們經濟中的勞動分配，各經濟部門的比例，也與在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分配，各部門的比例，原則上有別。

布哈林在與托洛茨斯基主義的理論家，潑拉奧佛拉繩斯基辯論時發揮了其勞動支出法則。然而絕對不能根據布哈林以錯誤的見解批判潑拉奧佛拉繩斯基這一點，就以爲潑拉奧佛拉繩斯基的理論便正確。在考察蘇聯經濟規律性問題時，我們看到，潑拉奧佛拉繩斯基在說到

蘇聯經濟時，以「充實」托洛斯基派的口號，「由無產者國家對於農民的剝削」為目的而發揮了所謂「二個制約的法則」。但與布哈林辯論的潑拉奧佛拉繩斯基並未駁斥勞動支出論的見解。在這問題上以及與此相密切聯繫着關於當作均衡法則看的價值問題上，托洛斯基主義的與右派機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互相提携着。

第三篇 貨幣

第八章 貨幣底本質及其機能

第三十五節 貨幣底本質

研究商品時，我們已指出，隨商品生產底及為其所固有的矛盾底發展，難免發生貨幣。

我們已知，在價值形態中，經過此商品與彼商品之比較，表現出耗費在商品生產上的勞動底社會性。然而，當某商品底價值以唯一的別商品（單純的價值形態）或以許多不同商品（由單純形態發展而來的擴大形態）體現其價值時，勞動底所有私的形態之統一，牠們底社會性尚未有一般的體現者。一般的體現者只有在一般的以及在貨幣的價值形態——此時一般等價物的作用為特殊商品，貨幣所執行——中才能達到。自此時起，商品界就分為二極：商品界與有特權的商品，貨幣界——所有其他商品均於此找到其體現者。這種分類以尖銳的與特殊的形態體現私的勞動與社會勞動底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底對立性。

由於貨幣底特權的地位，遂發生了幻覺，貨幣按其自然性而擁有某種獨自的神秘的特性。其實，貨幣底獨特作用是由為牠所體現出來

的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

當作一般等價物看的貨幣底特性只是在單純價值形態中的等價物底特性之更發展。貨幣體現出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底社會性；牠能執行一般等價物底作用且體現出社會勞動者，因其本身也是物化於其中的社會勞動底特殊生產物。

所以，貨幣並不是人們爲保證交換之方便而造成的單純技術的手段，如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經濟學家所堅信的那樣；貨幣並非按照人們底願望或按照他們互相約定而被造成的。貨幣底必需性是必然地由商品生產的矛盾，由私的生產者底生產之社會性之被表現且只能經過交換，經過物化於商品——等價物中的私的勞動之中介才能被表現，這一點產生出來的。

由此可以明白，認爲在商品生產保存之下可以取消貨幣且直接以勞動時間去體現價值的理論是錯誤的。這種理論於爲小布爾喬亞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葛累與歐文所發明的「勞動貨幣」的草案中表現出來。葛累提議創設特殊的銀行，每個生產者均能把自己底商品交給牠而取得證券，這證券則已註明他於商品生產上所已耗費了的時數。這種證券或「勞動貨幣」當然不是確切字義的貨幣，因這裡勞動直接於勞動時數中體現出來。顯然，在商品生產之下，不能有這種「勞動貨幣」的，因這裏，各個生產者底勞動直接是私的勞動，且在這商品與別的商品交換以前，物化於此商品中的社會勞動是不能決定的，以特殊的「公平的勞動交換底制度」之組織且以特殊的「市場」去實現「勞動貨幣」的觀念——歐文底這種企圖終於破產，並不是偶然的。在爲歐文所組織的「市場」上去決定物化於商品中的勞動量，是妄加猜度的。因而某種商品（爲「市場」所規定的此商品的價格高於其價值）很踴躍地送進來了，而別的商品（其價格低於價值）則沒有人送來。結果，差不多

存在二年的「市場」關閉了，使歐文受到很大的損失。

目下美國「技術派」的主張者發表了取消貨幣且以能力的單位去代替貨幣計算的草案；他們主張把權柄轉給工程師且以「能力元」去代替金元(註)。事實上未實現的類此的草案又為布爾喬亞的代表以籠絡為目的而發揚開來。他們想以批判幣制的缺點以及改良牠的草案，使大眾發生這樣的思想，勞動者痛苦的原因僅在於幣制的缺點，而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體系。

(註)以能力單位去代替貨幣的類此的理論，不久以前又曾為德國法西

斯者，克拉海斯所闡揚

為商品生產與固存於此生產上的矛盾之必然產物的貨幣帶有歷史性，過去性。在交換與商品生產的發生與發展以前，貨幣是沒有的。在蘇聯經濟中的貨幣，如我們所知，是於原則上不同的貨幣。在社會勞動將直接以勞動時間計算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時，貨幣將不用了。

第三十六節 貨幣底機能 當作價值尺 度看的貨幣 價格與價值

貨幣底本質由其於商品經濟中所執行的機能體現出來。

我們此刻應轉而考察這些機能。此刻，我們僅以金子當作貨幣的物材。

既然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一般的等價物，那末其第一種主要的機能就在於，牠是價值底尺度，一切其他商品皆以這為中介而決定其價值。

一切商品都以黃金來衡量其價值，且相互比較。因此，便發生了

這種錯覺，以為各種商品只有用貨幣才能相互比較。實際上，其原因並不潛在於黃金本身中，而在於，凡用黃金才能相互比較的一切商品，以及衡量商品的黃金本身，都對象化了耗費在其生產上的特定的社會——必需的抽象勞動。如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下，支出在這個或那個商品生產上的勞動越大，則用以表示其價值底黃金量也越大，即牠的價值越高。反之，在其他相等條件下，生產黃金所支出的勞動越大，則用黃金來衡量其價值的商品之價格就越低。

以黃金為媒介的各個商品價值的測量，在商品與貨幣交換前就已能存在，且現在還存在着。商品主在出賣商品以前，就把自己底商品定了一定的價錢；即把商品的價值，在腦海中，如馬克思所說，在「觀念上」，用黃金算定了。「以其當作價值尺度看的機能——馬克思說——貨幣執行了是在觀念上表象化的或理想化的貨幣。」（資本論，第一卷，五十頁）

然而，如果貨幣不是實在地流通於交換過程中，如果貨幣不是客觀地離開我們的意識而獨立地具有價值，不是商品生產者底勞動生產物，那末，這個觀念的衡量就絕對不可能。如果我們想用黃金在觀念上表現一噸鐵的價值，那末，牠將表現於貨幣商品的某一分量中。假使我們想於觀念上以白銀來測定一噸鐵的價值，那我們將以貨幣商品另一完全不同的數量來表現這價值；因為黃金與白銀是離開我們的觀念和見解，而獨立地具有一定價值的；因為生產同一分量的黃金與白銀，需要不同分量的社會必要勞動。

如我們所已見，事實上，各種商品相互交換的比率，是由一種自然力決定的；每個商品生產者均想把自己的商品多多換得別人的商品，但商品經濟底自然法則是離開他們的願望而獨立地規定價格。當我們想在觀念上用貨幣去測定這個或那個商品的價格時，我們計算到，

在市場上已經離開我們的觀念而獨立形成的且為商品和貨幣底價值所決定的商品底交換比率和物價。

因此，貨幣底能力——充當商品的一切價值尺度這能力——，可以依據貨幣與其他商品同樣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的價值這點來說明。

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組成了這個商品的價格。

商品所有者因出賣其商品而得到的貨幣量，既依存於物化於此商品中的勞動，復依存於物化於貨幣中的勞動。假定一公斤裸麥是社會必要勞動五〇分鐘的生產物，一分黃金則物化於自身中社會必要勞動的五分鐘，那末一公斤裸麥底價格表現為一錢黃金。如果因為農業技術改良，農業上的社會勞動生產性增大的結果，生產一公斤的裸麥平均只需要二十五分鐘；那末價格就會變動而表現為五分黃金。但是生產裸麥所需要的勞動量雖然不變，其價格也有變動的，如採金所需要的勞動量變化的時候便是。如果技術進步底結果；社會的採金變為容易，那末各種商品價格，假使其他條件不變，便要騰貴。因為物化在每一分黃金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比以前少了。

商品價格，同時由於兩個原因——即一方由於貨幣價值的變動，他方由於商品本身價值的變動——而變動，當然也是可能的；在此，商品價格，由於這兩個原因底結合如何，在某場合高漲，在某場合低落。雖說如此，但在每個特定的瞬間上，在社會勞動生產性底一定狀態下，這個或那個商品底一定分量，是用一定量的貨幣表現其價值的。

當說及以其他商品為媒介的一個商品之價值表現，即在價格上的價值表現時，我們是從商品相互交換的比率，他們的價格嚴密地與他們的價值一致這個假定出發的。

顯然，在實際上，事態較為複雜些。因為商品生產是無政府狀態

的，不是在購買者的購買力以上而生產，就是在購買者的購買力以下而生產。所以各個商品價格，不是比價值高就是比價值低。需要供給不斷變動的結果，各商品底價格遂不斷地漲落。

但爲這些動搖所依以發生的中心者却是價值。隨着生產各個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之減少，就減低此商品的價值且改變了這個商品價格變動的中心。這樣經過不斷的漲落，「價值法則遂指揮了價格運動」（馬克思語）。

如果我們把價格的動搖在相當繼續的期間上看，這價格有時漲到價值以上，有時落到價值以下，這些漲落因相互補償而相互抵消。這就是我們可以捨棄價格脫離價值的經常背離且從價格與價值一致這個假設出發的理由。

第三十七節 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 本位看的貨幣機能

含有不同價值的各種商品，均於不同量的黃金（或其他的貨幣物材）體現出來。因而必然產生了貨幣物材底測度底特定單位。

一切測度均藉助特定單位而進行的：例如：量長度遂用米特，碼，英尺；衡重量則用啓羅格蘭姆，磅等等。

用以測定貨幣物材底各種數量的特定單位叫做價格本位。

在各國，用以體現商品價格的貨幣單位，也不相同的。

在鑄幣施用以前，商品價格直接以黃金的或其他貨幣物材的重量單位：鎊，曹半特尼定(Zlotnik) 特拉黑麻(Drachma) 等等體現出來。因此起初商品與碎金相交換，金的重量則臨時秤定，只有隨交換的發展，交換才被熔成有一定重量的金塊，起初，不僅國家，就是大商

人，寺院均可鑄鑄金塊。後來，這才成爲國家底特權，國家發行了有特定重量的貨幣。同時，確定價格本位權也落入國家底手中了。

隨貨幣的發展，具有測定價格之單位作用的，重量金屬的貨幣名稱與原來的重量名稱相分離了。在許多國家，例如在古羅馬，隨着較發展的交換，由別國輸入外國貨幣。外國貨幣的名稱不與在該國內所通行的重量單位相吻合。此外，隨着社會底發展，以前仍充當貨幣的比較不甚貴重的金屬又爲較貴重的金屬所排擠：銅爲銀所排擠，而銀又爲金所排擠。新貨幣已不復能有爲以前重量所有的重量的名稱。例如，英國的貨幣單位——金鎊——以前是銀子按其重量的真實的鎊。當銀鎊爲金所代替時，仍保持鎊名稱的金的鑄幣中所含的金已極輕於一鎊（銀價值比金價值少幾倍，則金鎊也比鎊輕幾倍）。外此，鑄幣底重量名稱與其實在重量的分離，又可以封建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底貨幣貶價去說明之。由原來的重量貶價的結果，鑄幣僅保有名稱了：例如，英鎊，貶價的結果僅保有其原來重量的三分之一，最近美國的布爾喬亞政府減低了美元的金內容，以前法國政府減低法郎的金內容，僅及戰前的五分之一。

在各國，依據許多歷史條件而規定各種貨幣與相應地的各種價格本位。

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包含○，九公分純銀的法郎，被制定作單位。目前，法郎的金內容縮小爲戰前的五分之一，且差不多含有○·六公分金子。每法郎又分爲百個森底。在美國，貨幣單位是在不久以前差不多包含一·五公分金子的美元，每個美元又分爲百個村底；英國的金鎊差不多含有七·三公分黃金；俄國的盧布差不多含有○·七七五公分金子，等等。

自爲國家所承認的貨幣尺度的特定單位規定以來，商品價格即以

這些單位來體現。同時應指出，等於鎊，曹半特尼克，或金格蘭姆之特定數量的商品價格，我們又可以美元，盧布，法郎等等去體現出來

『所以，商品於貨幣的名稱中明白了自己所值幾何，而且貨幣皆用作計算的貨幣了，當要求當作價值的某種物體，即以貨幣形態，來執行的時候』（資本論第一卷五四頁）。

同一商品底價格，依存於我們以曹半特尼克金或以格蘭姆金去體現牠，以金盧布或以金元去體現牠，而有不同外觀。當然，商品藉以體現自己底價值的，金底一般總量則將是一樣的，並不以我們以曹半特尼克或盧布去測定牠而有所改變的，但價格所藉以體現的單位的數量，則各不相同了。

可是，因依存於採金技術而發生的黃金底價值的變動，不致反映到當作價格本位看的黃金底作用上去。例如含於一盧布中底黃金價值即或低落一半，但作一定貨幣單位底一盧布，則仍然是一金采芬慈底十分之一。

由某國鑄幣所表現的價格能容易地改變成爲他國鑄幣所表現的價格。只應注意到處在每種鑄幣中的黃金量就可以了，且以此決定了所謂金幣的行市(註)。

〔註〕在進行某國的金鑄幣與別國的金鑄幣交換時，除鑄幣底重量外，還

得加上由這國到那國的鑄幣輸送費，或這國的金鑄幣改鑄成那國底鑄

幣之改鑄費，假使改鑄費還低於輸送費，

總之，只有藉助特殊單位，或特殊的價格本位，貨幣才能執行其價值尺度底機能。不應把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機能與當作價格本位看的貨幣機能——這價格本位是和價值尺度密切關聯而且依存於價值尺度的——混淆了。

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作用，是不依存於人類底條件與協定的。

假定該商品體現了一定的勞動，那末牠就能以一定量的貨幣，一定的金塊來表示自己底價值，這一金塊底總量，並不依存於由之構成的塊數或單位額數；在該商品底價值之下牠只是由黃金價值去決定的。但爲了衡量這一金塊底數量，我們可以約定這個或那個單位，價格本位。這些測定的單位可以立法的方法而任意變更，如法國的某種衡量單位(戰前的舊佛郎)，可以由法律使另一衡量單位(新金佛郎)去代替之。土耳其，奧大利，以及其他各國，制定了從前沒有過的衡量價格底新單位，這是我們最近親眼看到的實例。

政府雖然可以隨意用立法的手續來制定新的價格本位，但不能由此以爲，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機能也可以任意地按照人們底協定而更改。無論人類有如何的協定或法律，均不能增減體現商品價值的金塊，假使生產商品時所費底勞動量以及黃金本身底價值仍然沒有變化的話；如我們所用的單位有了變更，那末，測定金塊的外觀上的單位個數雖變動了，但金塊本身並沒有變化。正如我們用公尺來衡量一疋布(假定布爲二公尺)，或用英尺來衡量這一匹布(六，六英尺)，客觀存在的長度並沒有變化一樣。表示商品價值的貨幣塊物材底數量，只有在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上，或是在生產貨幣的必要勞動上，有了變化的時候，才能變動。所以馬克思說：『貨幣執行了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與當作價格本位看的二種完全不同的機能。即貨幣本身，如當作人類勞動之社會體現者看，是價值尺度；如當作被確定的金屬重量看，是價格本位。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用於把無限多樣商品價值轉形爲價格，轉形爲觀念化了的金量；當作價格本位看的貨幣則衡量這各種金量。』(資本論，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三十八節 當作流通手段看的貨幣 商品底變態

商品底價值，就是不和貨幣交換也能够在觀念上用金來衡量。不過顯然地，商品經濟裏底貨幣機能，並不是只限於當作觀念的價值尺度和價格本位。觀念地用黃金來衡量商品價值，實際上，正是因為在過去不止幾千萬次的交換行爲中，各種商品與現實的黃金交換才可能的。因此，我們理解貨幣底其他機能，最好先看一下牠在交換過程上的作用。

在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底初期階段上，在單純價值形態和擴大價值形態支配着底時代，生產者以自己底商品，在市場上直接換取滿足他自己慾望的其他商品。假使某原始共同體，如以偶然地生產出過多的毛皮與恰爲此共同體所需要的矢交換，則商品交換是採取以下的形態，第一商品——第二商品，或是： $W_1 \text{ --- } W_2$

由於商品生產的繼續發展與貨幣的出現，商品已經不是直接與他商品交換，須經過貨幣而交換。生產五穀需要煤油的農夫，這裡並不是以自己的五穀與煤油直接交換；他先賣掉五穀取得貨幣，然後再用貨幣購買煤油與爲他所必需的別的商品。在這種情形下，商品流通是採取下面的形式：第一商品(五穀)——貨幣——第二商品(煤油)，或是， $W_1 \text{ --- } G \text{ --- } W_2$

貨幣，在此是用作各個流通商品間的媒介體，而執行了流通手段底機能。

在以貨幣爲媒介的這種商品流通過程上，於此商品與他商品直接交換時早已存在着的商品生產的矛盾，表現出更發展而複雜的形態。

爲了闡明這些矛盾，讓我們更進一層研究從此商品到貨，貨從貨幣到他商品這些轉形過程吧。這一過程，是由下面兩個階段組成的，一， $W_1 \rightarrow G$ ，即從此商品到貨幣底轉形過程；二， $G \rightarrow W_2$ ，即從貨幣到他商品底轉形過程。

第一過程 $W_1 \rightarrow G$ 不外是商品底出賣過程。這一過程，是以貨幣爲媒介從此商品到他商品底總轉形過程上的極重要契機。雖說商品在其售脫與轉形爲貨幣以前，已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但在牠未賣掉時，牠的使用價值是不能表現的而且牠的價格——其價值底貨幣體現，也是不能實現的。

在商品經濟中從商品到貨幣底這一轉形，有相當的困難，因商品生產者不能預計到對於該商品的需要，究竟有沒有，他究竟能賣出多少，別個商品生產者，究竟生產了多少同樣商品。所以，馬克思說，由商品到貨幣的轉形是“Saltomortale”即非常危險的飛躍。

但假定從 W 到 G 底這一轉形已經完成；農夫已把運到市場去的五穀換得貨幣了。顯然，農夫既然是賣掉了五穀，那末，當然就是另外一個人已經買去了這些五穀，在農夫方面看來，他出賣五穀是流通的第一階段，即形成了 $W_1 \rightarrow G$ 底過程；在對於另外這個以自己底貨幣購得農夫的五穀的人（假設，鞋匠），這一過程就是 $G \rightarrow W_2$ ，即是購買五穀的形態。購買五穀的鞋匠，已完成了由以前爲他所賣掉的鞋到他商品——在滿足他的慾望上所必要的——轉形過程。農夫則才開始轉形過程，因爲他剛得到將來可以買爲他所必需的煤油的貨幣。總之，某人出賣商品，在對方看來，同時就是購買。然而，假使商品流通是用貨幣來完成的，那末，某商品生產者（農夫）出賣商品，是他所生產的商品（五穀）底轉形過程的開端，但同時，在另一商品主看來，這是購買過程，即他所生產的商品底轉形過程（即從鞋到五穀）

之終結。

由此可以理解商品轉形過程底第二階級； $G \rightarrow W_2$ ，即農夫的貨幣轉形為煤油是什麼。農夫完成了為他所生產出的商品之轉形過程且取得為他所要消費的生產物，同時，又開始了從這商品到那商品的另一轉形過程：煤油主把自己的煤油與貨幣交換，然後用這個貨幣於交換中購買其他的商品等等。

如我們研究一下以貨幣作媒介的從這商品到另一商品底總轉形過程，即 $W \rightarrow G \rightarrow W$ ，那末，我們可以知道，牠是「由二個互相對立的，互相補足的運動，即 $W \rightarrow G$ 和 $G \rightarrow W$ 組成」（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但這些運動底各個本身，也是矛盾的，因為在此商品主看來，是出賣過程與他的商品底轉形過程之開端；同時在對方看來，是購買過程，是他的商品轉形過程之終結。所以馬克斯說：「商品底總變態，以四個極端和三個登場人物（Personal dramatic）為前提。」如按上面的實例來說，就是以鞋舖，農夫，煤油商人為前提（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但在此商品與他商品直接交換時，事態就更簡單了。那時，事情只由兩個人表現。他們交換商品後，商品馬上就進入消費場面，即交換過程上除了這兩個人外，不與任何人發生關聯。但現在，農夫之所以能賣掉五穀，只是因為以前鞋舖賣掉了自己的鞋而得到了買五穀的貨幣。復次煤油商人底商品運命，依存於農夫五穀底運命等等。鞋舖也許不久就吃完從農夫手裏買來的五穀；農夫也許不久就燒盡用貨幣（從鞋舖那裏獲得的）買來的煤油。但是貨幣仍然繼續服務於商品底流通過程上。在五穀到貨幣底轉形過程上牠已經服務過了，落於煤油商人手中的這個貨幣，又開始從他的煤油到另一商品（如洋呢）底轉形過程；這樣落於洋呢店手裏的貨幣，又開始從洋呢到另一商品（如

毛皮)底轉形過程等等。

在商品—貨幣這種流通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各商品生產者間的深刻關聯與相互依存。關於這點，馬克思曾像下面那樣說：「商品交換，打破了生產品直接交換之個人底和地方底限制且發展了人類勞動一般底物質代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因此，展開了不是爲人類自覺的意識，而是爲商品經濟底自然力所調整的「社會關聯底複雜線球」；同時，各種矛盾之極複雜的線球也展開了，因爲隨着社會關聯的成長而增長了商品生產底無政府狀態。

我們已知，假使某個商品主在從商品到貨幣底轉形過程上是賣者，那末，同時，他方就是買者。但一方的賣者用自己的商品換得貨幣後，可以暫時不買其他商品。以前，當不用貨幣的媒介的商品與商品直接交換的時候，出賣某商品而不購買別商品是不能的。但在商品——貨幣的流通下，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如果某商品主把其商品賣得貨幣而不買另外的商品，那末，另外的商品主，便不能賣掉自己的商品。結果，一聯串的其他商品主也要不能買賣自己的商品。

在資本主義的恐慌時代，這個現象具有普遍性。雖然這種現象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裏才有，在單純商品經濟上是見不到的。但，恐慌底可能性，早已潛存於商品底生產關係——在商品—貨幣流通過程上所表現出的——裏了，因爲在這裏，很明顯地，如果一個轉形過程，停頓於商品到貨幣底轉形階段上，那末，相互依存的商品生產者，就被阻止了貨幣到商品或其相反的轉形過程。

第三十九節 貨幣流通 爲流通所 必需的貨幣量

參加商品—貨幣流通的貨幣底作用與命運，和爲貨幣所媒介的其他商品底命運不同。

一切商品，我們買來後，都用以滿足慾望。買來了五穀，我們便吃，買來了衣服，我們便穿。但我們賣掉五穀而獲得貨幣。這個貨幣後來究竟變成怎樣呢？我們可以說是同樣地把牠消費。但貨幣當作這種東西（並不是單純地當作金塊，而是當作貨幣）來消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便是用來購買什麼東西，例如用牠來購買煤油。所以，貨幣不能被吃掉，也不能變成「無」，只是轉移到他人的手裏去，例如轉到煤油商人的手裏去。但煤油商人又用這個貨幣購買了洋呢，因而貨幣「再消費了」。轉移到洋呢主手中的貨幣又完成了新的商品回轉等等。這樣，當作流通手段的貨幣手轉手地轉移着且能於一天內完成好幾次回轉，即參加了好幾次 $W \rightarrow G \rightarrow W$ 過程。

發生問題；在各個瞬間，爲流通所必需的貨幣倒底是多少。

因一切貨幣流通，都是服役於商品流通上，所以爲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首先就依存於流通商品底價格總額。

假定在市場上，有總額一千元底商品。那末，爲了保障正常的流通是否需要一千元底貨幣呢？絕對不是。一元底貨幣，不是在一天內可以回轉數次，可以服役一元以上底商品嗎？假定農夫賣掉一元五穀，而當場就買了一元底煤油。煤油商人又用這一元貨幣買了洋呢，洋呢店又用這一元買了絨毛。假設這一元底貨幣就在此停止了牠在這一天的流轉。那末，結果如何呢？在一天內，同一個一元底貨幣，服役了以下的這些商品。

一元五穀

一元煤油

一元洋呢

一元絨毛

合計，四元商品。

所以如此者，因一元貨幣流轉了四次。貨幣的流轉越快，而越服務更多的商品。市場上的每元貨幣，並不是用同一的速度流轉。但，如求每元貨幣(及一般的同位鑄幣)底平均流轉的速度，那末就很容易得到以下的結論，即為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是等於用同位貨幣底平均流轉速度去除流通界上存在着的全商品價格底總額。假定每個一元貨幣，平均一天有五次的流轉，那末，按上面的實例，就可以知道市場上並不需要一千元，而是需要五除一〇〇〇的貨幣量，即需要二百元底貨幣。

第四十節 鑄幣 當作價值標誌的貨幣 虛價貨幣與紙幣之發生

為貨幣所執行的流通手段的機能必然會產生出鑄幣。當金幣以塊形按其重量服役於商品交換中時，難免發生技術的困難。為了免除這些困難，貨幣就開始鑄成有特定形式，重量與相當的計算的名稱之鑄幣。鑄幣的鑄造與價格的規定同時操在國家底手中。

為這種或那種鑄幣所表現出的價值初與包含其中的黃金重量的價值無別。然而在鑄幣的流通過程中表現出在包含於鑄幣中的金價值與其在流通過程中所代表的價值間之區別。

鑄幣從這人手裏跑到那人手裏，不可避免地要有少許消耗；貨幣少許地消磨着，減少着其重量的一部分。因此，當然消失了體現於鑄幣中底一部分價值。不過，鑄幣底價值雖消失了一部分，但鑄幣並不能因之馬上就脫落於流通界之外。在貨幣只是消失其重量的一小部分

，其所包含的金屬內容尚未減到特定的最少限度(普通由國家規定的)以下時，磨損的鑄幣與未被磨損的鑄幣是平等地通用于市場上的。

所以，用鑄幣底稱號和在其稱號的基礎(或一般所謂鑄幣的名目價值)上可以這鑄幣在市場上所買來的商品分量，和這個磨損的鑄幣中所體現的實在價值分離了。

以磨損的鑄幣形式而停留於流通界的黃金，已不能形成各種商品底實在價值，價值的實在尺度之作用；牠雖然服務於商品流通，但牠只是價值底標誌，只是完全價值貨幣底暫時代用者。

特別應指出，完全價值貨幣正因為有當作流通手段底機能，所以，暫時可以用不完全價值底價值標誌來代替。因貨幣，在流通過程上，只是暫時停留在某商品主的手裡，而馬上就要轉移到他人的手裏，因農夫得到貨幣後，馬上就轉移到煤油商人的手裏，而煤油商人又轉移到採油業者的人手裏等等；所以在這樣一個時間內，停留在自己的手裏的貨幣，究竟是否完全價值底貨幣，抑或是代用底不完全價值底貨幣，這些問題，在他們看來，並不如何重要。但是，如果不完全價值的磨損的金幣，在流通過程上，能夠代替完全價值底金幣，那末，不用黃金而用其他金屬所製成的不完全價值貨幣，或用紙幣來充當這一脚色，當然也可以。

「貨幣的流轉本身，既使貨幣之實在內容離開其名目上的內容，既使其金屬上的存在離開其機能上的存在，則貨幣流轉中便潛在地包含着：在鑄幣機能上的金屬貨幣有被其他材料造成的符號或單純的象徵所代替之可能性。」(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銀幣，銅幣，白銅幣與其他輔幣，按其包含的金屬內容上說，比牠按其名目所代表的金幣數量更低得多。至於能夠代替完全價值貨幣

底紙幣，其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祇是代表特定黃金量的單純的象徵和有條件的標誌而已。

虛價貨幣與紙幣，既然只能一時在流通過程上代替完全價值的貨幣，因此，其數目不能超過當時流通上所必要的貨幣量。

假定不保守這個條件，紙幣底每單位將會低落到為其名目所表示的價值以下。（例如在這一場合，一元紙幣表示着比一元金幣更少的價值）。

關於紙幣的問題，我們於後面再詳加分析。

現在僅應特別指出，紙幣與輔幣在流通過程上，只是金幣之一時的代表者而已。紙幣數量，如超過為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時，無論其行市如何變動，其能購買的商品分量則恰如在流通上為牠所代表的金幣量所能購買的商品量。例如在商品的某種價格，在同位紙幣的某種流轉速度上（註），假定商品流通需要一億元底金幣，而現在有「一元」底紙幣二億張在市場上流通着，那末，這二億元紙幣所能購買的商品量，等於以金幣一億元所能購買的商品量，每元的紙幣僅代替了 $\frac{1}{2}$ 元的金幣。

〔註〕其他條件我們尚未討論，暫時不提

第四十一節 單本位制與複本位制 自由鑄造與強制鑄造

在某國內形成實價貨幣的作用，且以鑄幣的形態充當價值尺度，一切商品底真實等價物的金屬，叫做標準的金屬。

目下，差不多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唯一的標準金屬皆為黃金。銀幣，鎳幣，銅幣，青銅幣僅形成了輔幣的作用。僅在中國，目下，

以銀為標準金屬。在十六，十七世紀，在歐洲的許多國家中，以銀為唯一的一般的等價物。於標準金屬中佔有特殊地位的金子並非一下排擠出白銀的。在英國於十八世紀，在法國，保加利亞，意大利，瑞士，德國與美國於十九世紀中葉，黃金長時地與白銀平等地形成價值尺度的作用。由二種金屬平等地執行價值尺度之作用的貨幣體系，叫做複本位制；由一種標準金屬執行價值尺度之作用的貨幣體系，叫做單本位制。

在複本位制下，商品底價值有二種獨立的體現者：黃金與白銀。既然黃金價值與白銀價值能起變化且不平衡地起變化，同時又改變了其互相間的交換比例，那末，在複本位制之下，同一商品的價格，以黃金與白銀去體現，將有不同的變化。例如，十九世紀中葉，在銀價值與金價值間的比例差不多等於 1:15. 而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尤其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以後）這比例改變了，金比重提高了。在一九〇〇年，銀價值與金價值的比例差不多等於 1:33 $\frac{1}{2}$ ，就是說，假使在十九世紀中葉，值一金法郎的商品，同時，又能以十五倍重的銀法郎體現出其價格，那末，到十九世紀末，值一金法郎的商品，將以更多的白銀體現其價值。

在複本位制之下，銀價值與金價值的比例之不斷的動搖，造成了價值測定的二重性——這對立着當作一般等價物看的貨幣的作用。這就是複本位制所以不能長久存在的原因。『凡是按照法律有二種商品執行價值尺度之機能的地方，事實上，這種作用往往僅由其中的一種所執行』（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複本位制之下，政府規定了銀價值與金價值之一定的比例。但隨這二種金屬的價值之實在比例的變化，其價值相對地增高的金屬被其價值相對地低落的金屬所驅逐，假使銀價值低於為法律所規定的比

例，則事實上因金而支付的將比為法律所規定的多些，金貨幣的所有者在出售金子時將獲得回扣，即大於為法律所規定的在金貨幣與銀貨幣間的比例之餘額(註)：因而在流通中泛濫着完全價值較少的銀幣，而金幣將斂跡了。所以，事實上，在流通中僅餘下銀貨幣。

「註.所獲得的是銀的回扣(例如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與戰後，印度就曾發生過這種現象)。

總之，商品經濟的自然法則本身使價值尺度的機能凝結於某種金屬。隨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機能凝結於黃金，而銀幣僅成爲於流通過程中，代表黃金的輔幣。

在革命前的俄國，存在着下列幾種輔幣：1. 高標準的銀輔幣——銀盧布，銀五十哥比，銀二十五哥比；牠們皆用百分之八十三，五純銀鑄成且含有差不多等於爲牠所代表的名目價值的百分之六十七的純銀；2. 低標準的銀輔幣——二十，十，五哥比，由百分之四十八純銀鑄成的；3. 五，三，二，一哥比的銅幣。輔幣的發行數量比較不多且限制了兌換。如帝俄時高標準的銀輔幣兌換以二十五盧布爲極限。

鑄幣的鑄造有自由的與強制的(直譯則爲公開的與秘密的——譯者)。在自由鑄造之下，政府不僅以自己底金子鑄造貨幣，且可替私人把其散金改製成鑄幣；在此，以散金請求政府改鑄的人獲得與其散金的重量相等的鑄幣(改鑄費是極輕的(註一))，在強制鑄造之下，政府僅以自己底金屬鑄成貨幣，不替私人改鑄。

國家僅允許有完全價值的貨幣之自由鑄造，至於虛價的貨幣之自由鑄造，國家是不允許的。

假使國家允許低標準銀輔幣之自由鑄造，則有值三百六十金盧布的銀子的人，會因請政府鑄造輔幣而獲千盧布。在強制的鑄造之下，按其真實價值而買銀，鎳，銅等等且按其名義價值(即按照爲牠代替

的金子底價值) 把牠使用於流通中的國家，因有利地鑄造輔幣而獲得特殊的收入(註二)。

「註一、例如，在戰前的俄國，改鑄費為金價值的，千分之五。

「註二、完全價值的鑄幣之自由鑄造，為政府所允許者，只有在這種鑄幣投進自由的流通中的時候。凡是沒有這種情形的地方，例如在不兌現的紙幣流通之下，自由鑄造是不允許的。在有些情形下與在金銀幣自由流通之下，其鑄造皆是強制的。

第四十二節 在字之本義中的貨幣 當作儲存物看的貨幣

我們考察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機能時，貨幣能執行其於思想上「當作觀念的貨幣看的，當作存在於表象中的貨幣看的」(馬克思語)作用。在其當作流通手段看的機能中，實在的金幣能以價值符號去代替。但貨幣的有些機能，則需要實在的金幣，其價值等於能以牠購得的商品底價值。在這種情形下，如馬克思所說，金子已充當「與其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與當作鑄幣看的機能相反的，在本義中的鑄幣」(資本論，第一卷，七八頁)。

我們應轉而研究在字「底本義中的貨幣」的機能。

服務於商品流通且其本身是流通手段的貨幣時常從這人手中轉入那人手中。但有時牠們能退出流通界，對於流通成為過多的且被保存於或人底口袋中。

我們已知，為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決定於商品價格總額與貨幣底流通速度。但市場上的商品量及其價格並不是一定不變的量。隨着生產某種商品所必要的社會勞動的變化而變動了這些商品底價值，隨

着價值的變動，牠的價格也要變動。假定市場上的商品數量減少了，或者鑄幣底流轉速度增大了，因而一部分底貨幣就多餘了。那末這一多餘部分底貨幣，究竟怎樣辦呢？一部分的金幣就改鑄成耳環，戒指，金牙等，以滿足其所有者的直接需要。且停止了貨幣的機能。但形成這樣結果的，普通只是貨幣的很少部分。

退出流通過程的，大部分貨幣是以保持其貨幣形態為原則，暫時收藏在保險箱裏，錢匣裏，床底下，因此這些貨幣，遂由流通手段轉變為儲藏物了。

普通只是過剩貨幣底一小部分，轉化為金製品和消費資料，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今天在商品流通上所不需要的一部分貨幣，也許明天在流通上為了購買各種商品而變成需要。且在商品經濟中的貨幣作用本身，產生出儲藏與積蓄貨幣的要求；貨幣在商品經濟裏具有驚人的權力。在這裏，貨幣能買一切。人在為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所支配的社會裏，越有貨幣便越有勢力。

積蓄作儲藏物底貨幣的這種傾向，在商品貨幣交換底初期階段便已有萌芽形態。當慾望範圍比較狹窄的時候，人們的慾望可以較少的生產品來滿足。生產超過這一數目的生產物，能夠完全與當作儲藏手段而積蓄的黃金相交換。

以後，隨着商品生產之日益發展，而發生儲藏貨幣的要求，為的想保障商品生產者底經濟，不受一切可能的偶發事件——在商品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下，幾時遭遇都說不定的偶發事件——之影響。

商品生產者，因為沒有確信能夠賣出自己所生產的商品，所以常常儲藏多少貨幣，以備在賣不掉自己的商品時候，也可以購買滿足自己慾望的必要生產物。作儲藏手段底貨幣之一時的積蓄，常常是因為以下的必要而發生，即，為了購買某種物品需要一定的款額，因此，

在某個期間內要少許地逐漸貯蓄起來。例如農夫想購買一匹馬，必需一點一點地積蓄他賣農產物所護得的錢，一直達到必要的款額。

貨幣之一時的停頓，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即有時，用出賣自己的商品得來的錢，稍過些時購賣商品比馬上購買有利。

隨着商品生產與貨幣權力的成長，發生了沒有止境的積蓄欲求。要盡量多保存黃金，必須盡量多生產商品，把這些商品與貨幣交換，在這些貨幣中盡量少拿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馬克思說：「因此，儲藏者便犧牲肉慾的享樂於黃金物神之前。……他方面……他生產的商品越多，便能賣越多。所以勤奮，節儉，和吝嗇成爲他的主要美德。」「資本論，第一卷，八一頁」。

第二十五節 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

我們在上面討論商品貨幣流通時，我們從事於這種情形，即那時都是用金來進行一切商品買賣的。在商品與貨幣底初期發展階段上，事實是非如此不可的。但隨着商品生產和商品—貨幣流通的發展，展開了以下的各種條件，即，貨幣從買者轉移到賣者，與商品從賣者到買者這二種過程分離了；換言之，在這一基礎上商品的轉移完了以後，要經一個期間，才開始貨幣的轉移。這便是信用交易。

假定農夫在夏天需要商人所出售的棉布，但在這個時候，他沒有那樣多買棉布的現款。這一筆款，到秋天，賣掉他新收獲的五穀時，是能得到的。在這種情形下，商人可以除他棉布，且約定，農夫在秋天賣掉五穀後還錢。這裏，貨幣的支付，於商品早已通過了流通過程以後，才完成的。在這種情形下，貨幣所執行的不是流通手段的機能

而是支付手段的機能了。

在已發展的商品經濟裏，每天締結很多各種期限的信用合同；以前締結的合同的支付期限，有許多在同一天滿期。又有同一個人在同一時間，以信用購賣他人底商品，而又以信用出賣商品於第三者。因此在同一天到期的各種支付可以相互抵消。例如，甲在今天必須付乙百元，但乙在今天又必須付丙百元，因此相互計算的結果，甲必須直接付丙百元，總之，兩個百元的支付，只有一個百元就完事了。

抵消各個債務者的支付的計算，實際上不光是由債務者本身去進行，同時，常常由銀行和特殊計算所去解決。因此，對於現款的需要，很顯著地減少了。

假如甲因某種理由，今天沒有實行支付。那末，會發生什麼影響呢？乙因為曾用信用把商品賣給他，所以乙最先感到麻煩。但乙本身也必須在今天支付對丙的負債。同時，乙也許認為甲在今天一定還錢；因而拿這個合同給丙，這種事常常有。這時，乙也要不能支付對丙的負債。這樣一來，丙也同時感到麻煩，因此，我們曉得當締結信用合同時，這些人物完全是一開始便相互依存着的。

同時，在此很清楚地表現出：「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機能包含着一個直接的矛盾」。「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實際上，在互相對等且抵消各債務者之支付的地方，並不需要現金。在這裏，如馬克思所說的，貨幣「只是在觀念上當作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前引卷）。例如在上面的例子裏，結束了總額二百元底信用合同，但相互抵消的結果，只需要貨幣百元就夠了。相抵消的其他一百元，並不需要現實貨幣，只是在計算中表現了觀念上的姿態。但，同時，只要在現實上需要支付，便需要實在貨幣；在此，貨幣既不是在腦海內計算的觀念的價值尺度，同時也不是與他商品當場交換時的

流通手段： W_1 不是早已與 W_2 交換過了嗎：現在是需要補償以前所賣出的商品的現實金幣。

總之，由於完成當作支付手段的機能，貨幣暴露出兩種矛盾的性質：貨幣要同時表現作現實底金幣，和作觀念底計算貨幣。在這二者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恐慌時期和金融恐慌時期，極尖銳地表露出來。在該時期以前，在未到支付期限時，資本家是打算着抵消相當多的負債部分，而相互以信用買賣商品的。但是，恐慌的襲來，使這抵消在中途就不可能了。各個資本家，都發狂似地想取得現款。貨幣突然而且不經過中間媒介，而從計算貨幣這種純觀念形態，轉變為現款的貨幣；（前引書）所以恐慌的可能性潛在於貨幣底機能中；且這個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轉化為現實性。

闡明了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機能以後，對於我們以前所說的為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應稍加補充幾句。

我們知道，為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主要的是由現在流通着的各種商品的價格總額去決定。假使商品的一部分並不是用現金買去的，而是用信用買去，那末，在當天，並不需要對這些商品支付貨幣：所以用信用買去的商品價格，必須要從為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除去，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不僅如此。如昨天，一個星期前，一個月前，以信用買來的許多商品的支付期限，有在今天完全到期的。這些商品已退出於流通界之外，而今天為了償還負債，必須現金。同時還有對其他各種債務（對於納稅貸款等等的支付）所需要的支付，也同樣需要貨幣。所以為這種支付所需要的貨幣量——今天到期的——也必須加到流通必要的貨幣量上，這是很明顯的。

但是，限期支付的一部分，由於債物者的相互計算；不用現金也

可以相互抵消。相互抵消的支付，是不需要現金的。相互抵消的支付總總，不待說是應當從流通必要的貨幣量除去。

總之，為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第一，現在市場上所流通的各種商品價格越多便越多；第二，當天以信用買去的商品越多便越少；第三，限期支付總額越多便越多；第四，相互抵消的支付額越多便越少；第五，市場上同位貨幣流轉速度越大便越少。

茲用公示式表如下：

$$\text{為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 = \frac{A - B + C - D}{G}$$

A 表示現在流通着的各種商品的價格總額，B 表示以信用買去的商品價格，C 表示到期支付的總額，D 表示互相抵消的支付額，G 表示同位貨幣流轉的速度。

第四十四節 信用貨幣的發生

信用貨幣與紙幣的區別

我們已經曉得，商品不僅用現金可以買，而且用信用也可以買。在上面的實例上，農夫在春天買商人的棉布，在秋天賣掉自己的五穀，才能支付這筆欠款。賣棉布的商人，普通是向農夫要一張借據。現在，再設商人在農夫未償還欠款前想買某種別的產品，例如想買工業家的物品，他可以不必另寫借據給工業家，只把先前那個農夫所寫的借據給他就可以；工業家又因為要棉花，所以又把借據轉讓於另外一個農夫。因此，買棉布底農夫的借據，一時代替完全價值貨幣，從這個人手裏轉移到另外一個人手裏。但是農夫這個借據，只在很少數的人間通用。後來，發達了大銀行，而各種債務借據（普通，把這些借據稱為期票），可以完全在銀行中貼現。銀行把自己的銀行券和商人

，農夫，工業家等的期票交換。資產階級政府，用特別法律規定銀行適應着現存的黃金與個人的債券而發行的銀行券數量。

這銀行券可以自由流通，而且暫時可以代替完全價值貨幣。這樣從這個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底機能產生出信用貨幣。

信用貨幣與由當作流通手段看的貨幣機能產生出來且於流通中形成價值標誌之作用的紙幣不同。銀行券是銀行的證券，銀行發行牠且以之與別人的證券(期票)交換；紙幣則由國家發行發，發行時並不與別人的任何證券交換。

紙幣是由國家發行用以彌補其支出的手段和以隱蔽的形態而剝削勞動者的工具——尤其在戰爭，革命，危機等等時是如此。紙幣的流通帶有強制性，在大多數情形下他不能與實價貨幣相兌換。

信用貨幣能執行其出現於流通中的債務證券之作用者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才可以，即假使牠能由發行牠的銀行兌換任何鑄幣，實價貨幣。所以銀行不能強制地把信用貨幣投入流通界中。出現於流通界中的紙幣數目是可以由國家任意地增加的，而由銀行發行的信用貨幣的數量則有一定的限度：這限度為實價證券——銀行發行銀行券與之交換——的數量去決定的，假使銀行券的數量增到千萬元，那末，這就是說，銀行已由別人處接受同數量的債務證券(期票)。既然於這些期票後面隱含着特定商品之信用買賣，那末，這就是說，國內的商品回轉已增加到同樣的數量了。反之，假使出現於流通界且引起期票與信用貨幣之活躍的商品總額縮小了，例如，假使這些商品的一部份已售脫，為他所引起的期票也有相應部分付清了且銀行券也將回到銀行裡去。

但信用貨幣的流通不是和諧地沒有任何矛盾地完成的，顯然在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機能中已潛伏着危機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了。危機的恫嚇必會引起銀行券的

擠兌。在無危機時銀行券的大部分是一手一手地轉遞，並不與金兌換，銀行可以發行較多的銀行券比之其所有的準備金，但當危機時，每個資本家皆力圖把債務證券換成現金，以前並未去兌換的大批銀行券都到銀行去兌換了。這遂形成了擠兌的危機。

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增加了互相以債務證券相關聯的人數。其中任何一環底支付力停止就瓦解以債務證券互相關聯其他的環。

第四十五節 世界貨幣

貨幣不僅流通於某一國內，且能由這國流轉到別國去。因而，牠在各國內所具有的特性完全失掉了。

首先具有一定模型與重量的在本國內充當價格本位的貨幣，一流出本國國境，馬上便不是價格本位了。在國際商業上的各國貨幣單位，是用自己所包含的金屬重量相互比較，因而各國貨幣只是有某種重量的金塊。

舊金幣，或不完全價值的輔幣，在國際商業上已不能表現為完全價值貨幣的代替者和價值標誌了；換言之，磨損的金幣，銀幣，銅幣等，是按他們的重量和物化於其中的實在價值來計算的。

以其原來的貴金屬金塊形態到世界市場上去的貨幣這裏充當「一般支付手段，一般的購買手段·財富一般之絕對地社會的物質化」（資本論·第一卷，九十頁）

在國際結算後而清償支付時，世界貨幣就以一般支付手段的資格而出現了。隨着商品生產與在各國間的交換之發展，發展了國際的信用關係：某國資本家以信用購買別國資本家的商品，互相借貸等等。

結果，在各國間發生了許多支付的債務。假設某國底，例如德國底資本家應於特定時期內(例如一年)清償其對別國的，例如法國的債務，二萬萬金法郎。再設，在同時期內，法國底資本家應支付其對德國資本家一萬五千萬金法郎的債務。互相清算的結果，一部分債務——一萬五千萬法郎——因互相抵消，可以無須以現金由這國運入他國。既然德國底債務比法國底債務大五千萬法郎，那末，爲了國際差額的平衡，即這二國的支付對比，應由德國運五千萬法郎到法國去。在這種情形下，貨幣於世界舞台上形成了一般支付手段的作用。在各國間的交換愈發達，則當作一般支付手段看的貨幣底意義愈增高。世界貨幣底這種意義是很盛行的。

當某國出賣商品給別國，但又不購進商品(或者相反)時貨幣即以一般購買手段的資格出現了。當破壞了各國間的通常交換，例如，當某國因荒年不能不由別國購進許多生產品的时候，就發生這樣情形。當生產極多金銀的國家，以金銀與別國交換爲其所必需的生產品時，貨幣就充當一般購買的手段。這裏貨幣已不是流通手段了。

凡是「事情不在乎買或賣，而在乎財富之由這國輸入他國，且能以直接的商品形式而進行這種運轉的」(註)地方，貨幣即以「財富之絕對的社會的物質化」的資格而出現。當某國爲參加戰爭，賞付夙欠等等而由別國獲得貨幣借款時，就有這種地位的。

〔註〕資本論，第一卷，九十一頁。

爲國際的與國內的流通所必需的流通數量之不斷變動，發生了造成相當貨幣準備之必需性。「當然——馬克思說——儲存物的機能，一部分是由當作在由國內市場上的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看的貨幣機能發生出的，一部分是由當作世界貨幣看的貨幣機能發生出的」(全上)

第四十六節 匯兌 國際清算 總結

貨幣一變成世界貨幣就喪失其在國內的特性且表現作特定量的金屬塊。結果某國的鑄幣按照其重量與別國的同金屬的鑄幣相交換。各國金鑄幣價值的比兌——適應於包含於其中的黃金數量——叫做匯兌。例如，根據匯率，戰前的一金元等於五，一八二戰前的金法郎，四·一九七德國馬克，一·九四三金盧布等等。某國實價的（即標準的）鑄幣的行市，即這些鑄幣能與別國的鑄幣交換的比例，不能使匯率高於由這國到那國的鑄幣輸送費與改鑄費的總數。假使行市超過了這個界限，則需要外國鑄幣用以支付的某國資本家簡單地把本國鑄幣運到外國去且改鑄成外國鑄幣好了。

國與國間的商业交易，不僅是用現金，而且也可以用信用。這時在國際間的貿易中，信用證券也可以暫時代替現金。

假定法國一個資本家在英國購買煤炭。這一交易用信用進行，英國人要從法國人方面領取相當額面的期票。現在，再設另一個英國資本家打算在法國購買葡萄酒。那末，購買葡萄酒的英國人可以不用化匯款的匯水，也不用化輸送相當現金到法國去的費用，只要實行如下的手續就可以了。即，他購買英國煤炭商的法國滙票，而轉寄給法國的葡萄酒商，（只要這個期票是可靠的），葡萄酒商就很容易從購買英國煤炭的本國人（寄滙票人）手裏，領到現金。所以不僅購買葡萄酒的英國人，即購買煤炭的法國人，也都省下了一筆現金輸送費。

在國際清算上，能够代替貨幣的這種期票，叫做滙票。法國賣英國的商品越多，則英國對法國滙票的需要就越增加，即用這種滙票來償付法國商品價額的人就越多。

那末外國匯價，即可以購買滙票的貨幣量是用什麼東西決定的呢

如果寄滙票的國家是通用金幣(或是兌換銀行卷)的國家，那末這個滙價不會從金額市價低落到超過從這一國運到他國去的現金輸送費以上。因為如果滙價超過現金輸送點以上，那末輸送現金倒比購買滙票便宜了。外國滙價，是以現金輸送費為限度，按各個外國滙票的需求如何而變動。他國對某國的債務越多：則需要債權國的滙票也越多而其滙價也越高(雖然不能超過上面所說的限度)。所以某國的國際借貸，對該國的滙價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某國對他國的貸方(Credit)比借方(Debt)多，那末，我們就說及了某國底順態的支付差額；在相反情形下，就引起逆態的支付差額。

貿易差額，即輸出與輸入的差額，在支付差額的性質上有極大的意義。如果輸出超過輸入，即所謂順態貿易差額，使該國收入他國的黃金大於支付給他國的：這將促進順態的支付差額。反之，如果是逆態貿易，那末，該國便要支出比收入更多的黃金，這將促進逆態的支付差額。

除貿易差額外，還有從他國的一切外債，運輸外國貨物，和其他各種項目所獲得的收入，也同樣對於一國的支付差額之性質上有很大的意義。

以上我們所說的，主要的是關於金幣流通佔支配地位的國家與國家間的結算。假使在某國有不完全價值底鑄幣或紙幣時，那末，購買該國貨幣單位的滙價將依存於紙幣(或輔幣)的行市，即依存於為該國的紙幣或輔幣所代表的黃金幣值(註)。

「註」外國匯價，不僅受既存的事實影響而變動，且受恐慌，戰爭，荒年等等謠傳的影響而變動。

*

*

*

我們已考察過貨幣底各種機能。互相聯關着且這一機能由那一機能發展而來的這些機能已以萌芽的形態存在於商品生產之較低的階段上，但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這些矛盾遂也愈益發展了。

馬克斯說：「無論單純商品等價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與世界貨幣，總之這些特殊的貨幣形態，都按照彼此機能底範圍之差異與相對的優越性，而指示社會生產過程底不同階段」（資本論，第一卷，頁十二頁）。貨幣之變成流通手段而起顯著作用的，是在無數的商品交換行爲中，商品與貨幣交換，貨幣已經在相當期間，作了等價物以後的事。當作儲藏手段底貨幣機能之意義成長起來，是在商品生產的發展，加強了貨幣的權力，流通過程本身發展起來使貨幣之蓄積成爲必要以後的事。貨幣要稍爲明顯地發揮作支付手段的機能與世界貨幣，必需商品生產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機能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高階段上，才能負擔這一顯明的任務。

貨幣機能的發展表示出商品生產底矛盾之增長與發展。

這些矛盾之發展，會使在商品生產之特定階段上的貨幣轉化爲資本。如我們以後所看到似的，牠們將以資本的資格成爲剝削與獲得利潤和收入的手段。

然而在研究由貨幣而資本的轉化過程以前，我們應先來研究一下僅與我們在上面曾加以考察的貨幣機能密相聯繫的幾個問題。

第九章 紙幣 布爾喬亞的貨幣論與 曲解馬克思—伊里奇貨幣論的批判

第四十七節 紙幣的發生及其本質 紙幣與黃金

研究貨幣機能時，我們已闡明，貨幣怎樣於流通過程中成為價值標誌以及後來於流通過程中實價貨幣怎樣能暫時為虛價貨幣與紙幣所代替。

由國家發行且強定行市的紙幣早已出現於資本主義國家中了。牠們普通或者由國家以紙幣的形式發行，或者由信用貨幣改變過來的，以前這些信用貨幣是可以自由兌現的，以後則變成有強定行市的貨幣符號了。

例如，法國於一七一六年曾設立了發行銀行券的羅銀行，這種銀行券的兌現於一七二〇年停止了。在法國大革命時再次出現了紙幣——原以地產抵押的代換券。在法國於一八四八年又出現了紙幣；此後於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時，銀行皆停止了兌現。在美國，紙幣也出現過幾次，第一次於十八世紀中葉發行的，那時，因加拿大的遠征隊而急於需款。在英國於拿破侖戰爭時，銀行券曾變成紙幣。在俄國於愛克德里二世時曾發行轉化為紙幣的代換券。克里姆戰爭時紙幣再次

出現了。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時，差不多所有參戰國的銀行券皆轉化為紙幣了。

資本主義諸國只於恐慌與危機（革命，戰爭，經濟恐慌等等）時才行使完全紙幣的流通。

在『平常的』時候，在資本主義諸國——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般危機時期以前——紙幣的發行是極有限制且很少見的。在有幾國，例如在德國，於戰前，數量甚少的紙幣與金幣，銀行券平等地流通着。僅在各個的國家，例如在英國，才有完全的紙幣的流通。

於流通過程中代替實價貨幣的紙幣只代表了為牠所代替的金幣的價值。所以只有在紙幣的流通量不大於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這一場合之下，為每一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才與每一金幣的價值相吻合。

我們知道，某一特定時期，在國內流通上所必要的貨幣量，是有一定範圍的；那個範圍是由市場上流通着的全商品價格，以信用買去的商品價格，限期支付的貨幣，和鑄幣的流通速度等等去決定。如金幣數量超過為流通所必要的數額時，黃金的過剩部分就當作儲藏手段積蓄起來，否則就改鑄成各種金製品。

如果在流通界內，除金幣外，還有紙幣將如何呢？

假設國內有一億元底金幣和一億元底紙幣。如果流通必要的貨幣量在二億元以上時。那末，很明顯的，紙幣與金幣是平等地通用的。如果實際上，金幣不能滿足流通的全需要而只滿足其一部，又如果投到流通內的紙幣量並沒有超過流通上的不足金額，那末紙幣所代表的價值，當然是與金幣相等。但如果流通必要的貨幣量仍然是兩億元，而紙幣再加發一億元，共兩億元。那末，國內的金幣和紙幣總量是三

億元。這些貨幣的一部分，即3億元—2億元=1億元，很明顯地是流通上的多餘部分。我們上面說過，這一多餘部分是應該從流通手段轉化為儲藏手段的。那末究竟是那種貨幣轉化為儲藏手段呢？

想『儲藏』貨幣，大概誰都是選擇完全價值的金幣。一億元的金幣，逐漸退出流通界，而收藏在保險箱裏。在流通界內只剩下二億元底紙幣（註）。在流通上需要二億元貨幣時，紙幣仍然可以完整地代替金幣服務於流通上：即一元底紙幣可以買到的東西，恰如一元金幣所能買到的東西，

〔註〕在此，好像（劣幣）（紙幣）驅逐了（良幣）（金幣）。（劣幣）這樣驅逐

（良幣），叫做克賴霞木法則（Gresham's Law）

現在假定流通必要的貨幣量與上面相同，而紙幣量擴大到三億元，因為在流通中只需要金幣二億元，而現在有三億元紙幣，所以印着「一元」底各個紙幣，在流通上不能當作金幣一元通用，而只能代表其本身的 $\frac{2}{3}$ 價值，即只能代表66 $\frac{2}{3}$ 分。這個時候，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降低了三分之一，用紙幣三元所購買的商品，在價值上與金幣二元底價值相等，這是很明顯的。

總之，假使紙幣的票面總額——以紙幣表示出的——大於為流通所必需的貨幣總額——以金幣表示出的——；則為每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將低於為每單位金幣所含有的價值，且紙幣的票面值價大於為流通所必需的實價貨幣幾倍，就低落幾倍。

由上述可以明白，為每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並不依存於流通着的紙幣本身的額數，而是依存於適應於為牠所代表的金幣數量的額數。當作價值標誌看的紙幣只於流通中代表着金幣，其自身是沒有獨立價值的。因而牠不能執行貨幣的基本機能——價值尺度的機能。

即在紙幣流通之下，這種機能也為金幣所繼續執行的。甚至在流

通中完全沒有金幣的地方，黃金經過商品——於黃金流通停止以前且於紙幣流通發生以前，這以黃金體現出來——形成價值尺度的作用。此外，當作價值尺度看的黃金的作用，這裏，也於黃金直接或間接與別的商品交換的時候，表現出來。最後當作價值尺度看的黃金的作用，這裏，又於對外貿易——那裏黃金往往充當金鑄幣——中表現出來。

由上述的紙幣及其與金幣的關係，可以明白，認為，只有在紙幣完全兌現的時候為紙幣所代表的價值才等於金幣的價值，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紙幣固有時能由國家兌現，但不常見。紙幣不兌現且無担保品，這倒是常事。紙幣的數量不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這倒是可能的。

但在此要注意的是：我們研究紙幣時，為求簡單起見。是以流通必要的貨幣量之一定不變為前提的。即在現實上並不一定是這樣。因為各種商品的分量與價格，鑄幣之流轉速度等等是不斷地變化的。不過，雖是這樣，但最少，流通必要之貨幣量，有一比較長期而不再減少的最低限度。因此，嚴格說來，防止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下降，需要使貨幣量不超過這個限度。

如果國家發行紙幣至為流通所必需的限度以上時，那末，這時候，國家便要準備現金（或其他現實有價物）以防止紙幣價值的暴跌，使貨幣低落到最低限度時，可以和現金或其他有價物交換，把貨幣從流通界收回來。在此，現金或有價物的準備，並不是必需等於發行紙幣的總額，而是必須等於超過最低限度的分量。

當流通着的紙幣量並未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時，國家能（但並非時常如此做的）使紙幣兌現。在增發紙幣且紙幣行市低於金幣行市時，自然，國家時常皆禁止紙幣兌現的（註）。

「註」至於說到全權於流通中代替金幣的虛價的金屬輔幣，那末，只有在其數量不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的時候，為牠所代表的價值才等於金幣的價值。假使輔幣的數量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則為牠所代表的價值將低落，當尚未等於包含於輔幣中之金屬價值的時候。假使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早已減少了與減少以後，則虛價輔幣將與金幣在其數量超過流通需要所遭逢的同樣命運，初自較貴重的（白銀），繼及次貴重的輔幣均將轉化為儲存物，改製為金屬器具等等。

第四十八節 通貨膨脹及其意義

總額不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的紙幣發行，於戰前，在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曾有過。

例如，如上面所曾指出似的，在德國，紙幣與金幣，兌現的銀行券平等地流通着，在奧國——那裏是純紙幣流通的——發行數額極有限的紙幣，按其票面價值（說按照為單位紙幣所代替的價值較確切）等於黃金。

在這種情形下，紙幣的發行已是國家收入之根源了。發行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幣（而紙幣印刷費是極有限的），布爾喬亞國家即以這種紙幣去支付工資，購買商品，資助資本家等等。

既然紙幣的發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是有利的，那末這裏，資本主義的紙幣已暴露出其階級性了。

但當紙幣的發行量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其行市抵於金幣時，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紙幣的階級性表現的更為明顯了。

紙幣的這種過量發行叫做通貨膨脹（紙幣泛濫）。布爾喬亞國家（在牠以前，則為諸侯的國家）於經濟之深刻危機的時期中，於恐慌，

革命等等的時期均求助於通貨膨脹。例如，我們已知，紙幣，在法國於大革命時，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普法戰爭時與巴黎公社時，均曾出現過；在俄國於克里姆戰爭時出現過牠等等。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及轉於資本主義體系一般危機的戰後時期，通貨膨脹達到更大的程度。通貨膨脹的洪濤衝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幣制，這乃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最近階段之特徵。

在戰爭，恐慌，革命條件之下，在布爾喬亞國家，通貨膨脹，表示出對於工人階級與勞動大眾的剝削之加強，龐大資源均操在統治階級手中，與戰爭，恐慌相聯繫的，與布爾喬亞之撲滅革命運動與鞏固自己統治的鬥爭相聯繫的支出之劇增。

「紙幣的發行——伊里奇說——是強發公債的最壞的形態……牠惡劣了工人，貧民的地位」（全集，第二十一卷，一八八頁）。

紙幣的濫發與為每一紙幣單位所代表的價值之下降，必然引起以紙幣體現的商品價值之上漲。隨通貨膨脹的加深，價格也必更形提高了。價格高漲是盲目地極不平衡地進行的；某商品的價格漲得快，別商品則漲得慢。

紙幣落價與物價高漲的結果，凡有紙幣者皆力圖從速脫手，把因幣價低落而發生的損失推到別人身上去，凡有商品的人，則皆想把商品長時期地保存在自己手中以等待其價格的更形上升。

因幣價下降而發生的損失最後又轉嫁到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不同，工人雖握有商品，但這種商品不能延而不賣以待其漲價；工人不能不把其唯一的商品——勞動力——賣給資本家，而不遷延，以免死於饑餓。此外，工人階級不能不以信用出賣其勞動力，只有於勞動力被利用以後才能領得工資，因而受到在其工作時間內所發生的幣價低落的損失，就使名目工資（即支付工人的紙幣單位的數量）增加了，但

這種增加，比幣價低落與物價高漲的速度遲緩得多。結果，實質工資，即工人以領得的貨幣所購買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減少了。所以，通貨膨脹以潛伏的形態，轉嫁因幣價低落的損失於工人階級的方法而實現的，勞動者被剝削的加強。

通貨膨脹除掉加強剝削工人階級而外，還加強了剝削貧農，他們一部份依工資過活，此外，於收成後，他們不能不低價出賣其生產品，而高價購買商品。

通貨膨脹又使在鄉村與城市中之小有產者大眾破產，通貨膨脹落價了他們底辛勤而獲，積液而成的儲款；在存銀行，儲蓄機關等等中的存款之落價，表示出，這些存款之被布爾喬亞國家與大資本家——銀行主所收奪(佔有)。

利於通貨膨脹及因此而發生的財政破壞者，只有大布爾喬亞的幾個集團。

大布爾喬亞利用通貨膨脹以加強剝削工人，由工人身上榨取得追加的手段，收奪小有產者，破產其競爭者且把更多的財富集中在自己底手中，他們可因紙幣落價而提高商品價格，把自己底貨幣資本轉化為黃金，貴重物品，外國貨幣。

通貨膨脹給以商品運到外國去的資本家以更大的利益。這可以這樣說明之，他可以比外國的資本家較廉價地以黃金購買商品，因在本國的工資，以黃金計算起來，在此外國的低。因此，以商品運到外國去的資本家，與別個資本家競爭時，能操勝券，以其商品廉價賣給別個資本家，由此可以獲得一些(利益運貨利益)，比之不從事輸運的他底敵手。此外，經營出口，與外國貿易而護得黃金(或穩定的外國貨幣)的資本家，能避免因幣價低落而發生的損失。

前途暗淡，物價飛漲，想把跌價的貨幣轉給他人的企圖，在通貨

膨脹下，給犧牲他人而從中取利的投機者，形成有利的地盤。在此，特別活躍的是購買已破產的資本家底企業，施行種種奸計的大投機者。

大地主與富農由通貨膨脹而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們因實質工資低落而戰勝其他企業家，因在農產物的生產費中工資佔極大的地位。

通貨膨脹對於運糧食到外國去的地主更有利益，貨幣跌價對於以自己底土地抵押銀行而獲得借款（這種情形最常見）的地主也很有利：因紙幣購買力的低落遂減少了他們應還給銀行的實在數量。

不要以為糧食的小生產者也與大地主與富農有同樣利益的；剛相反，他們糧食出口的一切利益皆為大地主與糧食商人所佔有。在通貨膨脹下，中農，尤其小農的地位不見優於工人；農業勞動者與工人共同擔負着幣價低落的重負。

然而通貨膨脹給予大布爾喬亞（及其集團）的利益是有一定限度的。

貨幣跌價引起幣制的破壞，他大大地困難了生產之擴大（伊里奇，全集，第二十一卷，一八三頁）。

物價的飛漲，投機者的奸謀，商品的斂跡與貨幣的充斥，破壞了國內商品的流轉。通貨膨脹，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很大作用的信用成為不可能。加強了對於勞動大眾之剝削的通貨膨脹，又引起了相反的作用，增大了布爾喬亞政權之革命的傾覆底恫嚇。所以，在一定階段上，通貨膨脹對於大資本就成為不利的了。大資本開始以現金逃往外國，資本家遂以其資本變成貴重品或不動產為更有利了，不動產價格的上升，比生產商品及把他賣成貨幣更快（註）。

〔註〕，活動資本變成死價格性的過程，叫做資本的凝結。

所以，通貨膨脹的結果，在一定階段上，於布爾喬亞面前提出常

態的貨幣流通之恢復的任務。

常態的貨幣流通，要怎樣才能恢復呢？主要的預備的條件是這樣的國家預算，即這樣的國家收支關係；這時，收入的主要款額不是發行紙幣，而是別的來源。徵收人民的捐稅，內債與外債，國營企業的收入等，都是這種財源。戰時，因為國家的支出非常大，用上而所說的一切固定收入來填補還不够，所以安定貨幣底行市普通是不可能的。國內的經濟狀態不安定，經濟發生動搖時，都是這樣，因為在這種場合，從國內所得到的租稅和內債都不多，而外國資本家看見對方沒有多大的把握，也不肯放款。

所以幣制之確立，只有在一國經濟狀態良好時才有可能。如建立了穩定的幣制，那末，由於形成對於前途的信賴和信用的基礎，而可以日益得到良好的經濟狀況。

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徵是；最受通貨膨脹的痛苦的勞動者要負改革貨幣的責任；國家所課賦的租稅大部分都壓在勞動者身上，國債的利息也同樣要他們去支付。

安定通貨是用下面的方法：

一、廢棄舊紙幣 (nullification)。即取消舊紙幣的流通效力，而換以新的安定紙幣，信用貨幣，或金幣。

二、貶低平價 (Devaluation)。即已經發行的紙幣並不廢棄，而停止今後的發行。

這時，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雖仍然很低，但以後，價值不會再低落。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與金幣底價值間，建立了稍為安定的比率。

這一個比率由國家正式承認，以後國家就可以把舊紙幣和新紙幣甚或和金幣交換。

三、通貨緊縮 (Deflation——即肅清通貨膨脹)。國家雖然保留現

在流通着的紙幣的效力，但同時不獨停止今後發行新紙幣，且減低已經流通的紙幣量。這，可以由國家把租稅及其他收入所得到的一部分紙幣，不再投入流通界而完成。

殘留於流通內的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逐漸高漲，不久便達到金幣底價值。有些經濟學家，把紙幣這樣恢復原價底方法，叫作復舊 (Restavration)

廢棄舊紙幣，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曾用過這個辦法；貶低平價，在歐戰後之德國及其他各國改革幣制時都用過；通貨緊縮（第三個方法），世界大戰後由英國實行過。

第四十九節 戰時及戰後的貨幣流通。

各資本主義國底貨幣流通現狀

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大部分參戰國家的布爾喬亞都放棄那基於黃金的，戰前的穩定的幣制。且用濫發紙幣以徵集為戰爭所需要的龐大手段，

成爲例外的只是日本與美國，因爲兩國和各交戰國通商蓄積了巨額的準備金，而且只在戰場上露了一點面。帝俄時代的一九一七年三月。流通着的幣紙量比戰前的信用貨幣增加了七倍，存在了八個月的臨時政府，在這個期間內，發行了帝俄在戰爭中二年半內發行的紙幣額數之二倍半。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流通內的貨幣量，幾乎比戰前多四倍。法國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四年間，銀行券的發行額增大了五倍；英國在這個期間內，銀行券的發行增大了十三倍，等等。

這一切情形在大部分的交戰國中，都不能不引起物價之大大地高漲與一切有關於通貨膨脹的結果。隨着通貨膨脹的出現，當然紙幣和

銀行券的兌換便要停止。

戰爭雖是終結了，然而大部分的交戰國，在貨幣流通上並沒有好轉，反面更日益惡化，引起通貨膨脹的擴大。

這是因為自戰時即已處在一般危機的狀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在戰後最初的幾年間又蹈進無產者之直接革命的進攻時期。

在這時期，資本主義國的布爾喬亞，為要與革命相鬥爭，為了被破壞的戰區之復興，解散隊伍，償付賠款等等而需要龐大資金。

戰敗國的恐慌，尤其激化。為協約國所敗，負巨額賠款的德國，通貨膨脹達到沒人相信的鉅額。一九二三年十月，所發行的紙幣馬克總額為二，五亥(二五，〇四九，五五七，一八〇萬萬馬克)。國家經費百分之九十，是用紙幣開消。當時一美金值紙幣四十萬萬馬克以上。

。戰勝國的通貨膨脹，雖然沒有達到這樣天文學上的數字，但在戰後數年間也繼續了很厲害的通貨膨脹。即，一九二一年的英國，一磅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降至三分之一；一九二五年以前的法國，紙幣一佛郎所代表的價值，降到金佛郎底七分之一。

資本主義國稍微開始穩定貨幣流通的，是資本主義在戰後數年間的極度深刻動搖後踏進相對安定時期以後的事。

在大資本主義國中，首先完成通貨安定的是英國。一九二一年底英國政府，因為收回了流通上的多餘紙幣，所以已經完成了提高紙幣所代表的價值。在此，通貨安定招來了失業增大，勞動階級生活的惡化這些悲慘的結果。幣制的改革，於一九二五年，恢復銀行券兌現的時候，才完成。

上面說過在整個經濟都已崩潰，紙幣達到使人難以相信之巨額的德國，差不多無法着手收回流通界的多餘紙幣。在一九二三年，為了穩定貨幣流通，才創立了「德國貸款銀行」(Die Deutsche Renten

Bank)』，由銀行發行額面價格等於金馬克『貸款馬克』的特殊證券。舊紙幣十萬萬馬克，能夠與新紙幣一馬克相交換。

一九二四年，『貸款馬克』更能與等於金馬克的『帝國馬克 (Reichsmark)』相交換。先由『道威斯計畫 (Dawes Plan)』，次由『楊格計畫 (Young Plan)』，而實現了帝國主義者之『國際管理』德國幣制。因為帝國主義者，想向德國索取戰債，所以非常關心德國的通貨安定。

在大資本主義國中，最後肅清通貨膨脹的是法國。直到一九二六年通貨才開始穩定，到一九二八年才全部完成。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底法令，制定了值戰前五分之一的新金佛郎。把紙佛郎換算為這種新金佛郎，而紙佛郎乃能自由兌換。所以在此，提高紙幣所代表的價值，是用貶低幣價去完成的。

大部分的資本主義國家底貨幣流通，都是用這種方法使之安定的。

但在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底第二期，這個『安定』並不是完全永續的，同時也不能永續『安定』的，正如我們後面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安定只是相對的安定，並不是把資本主義從一般恐慌狀態援救出來。

在世界大戰與戰後時期內，在各國間，存金大大地再分配過了：大批現金均因購買軍用品，因支付戰債等等而由參戰國流出，結果，存金遂集中在幾個大國（尤其是美國）中，而耗費其大部份存金的資本主義國家遂無力恢復到自由的金幣流通了。

因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德國，意大利，奧國，保加利，波蘭，以及大部份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採用所謂金滙票本位制以穩定其通貨，在這種制度下，保證通貨之穩定者不是黃金，而是在外國能兌現的，外國通貨。在大體上，這種制度

皆以美國（美國仍保持着銀行券之兌現）與英國（英國的銀行券在一定限度內能兌換金銀）（註一）的通貨為準則，這使大多數資本主義國的幣制均依賴於少數大帝國主義的強國。在落後國家停留着許多外國的銀行券，外國期票與其他証券，在某時期，這些東西均會發生擠兌的，因而給大國的通貨造成危機，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幣制，就是在相對穩定的時期也表示出極不穩定：這複雜環鏈的一環出毛病就會影響到所有其他環圈。

世界經濟恐慌首先打擊着於經濟關係上較弱的國家，有大批債務（借款，戰債等等）的這些國家，在經濟恐慌以前，是以增加商品出口，以及運入新資本，舉新借款等等方法而還債的（註二），但在經濟恐慌時，由外國運入新資本，差不多停止了，而商品的運輸也發生極大困難。故債務國為履行債務而輸出大批現金與外國通貨。這大大地縮小了弱國的黃金與通貨的存款且動搖了其通貨。這種情形首先在許多農業國表現出來：阿根廷，布拉西（Brazil），秘魯，智利，澳洲及其他國家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已放棄穩定的通貨了。

【註一】銀行券與金塊交換而不與金鑄幣交換的制度，叫做金地金制，在法國也曾採用過。

【註二】由外國運入新資本，固能清償短期借款，但該國的債務却因而更增大了。

但通貨恐慌之採取更嚴重的形態者則自英國於一九三一年放棄金本位且實行通貨膨脹的時候起。一九三一年經濟恐慌的發展，尤其信用恐慌的加深（註），使德，奧（這二國的信用恐慌採取更深化的形態）由英國銀行收回許多存款。企圖以同樣的方法給英國以政治打擊的法國，也由英國銀行收回存金。最後英本國底政治地位之不安定又使大批資本外流。所有這些，均使英鎊破產，以前除美金外，英鎊要算

最安定的通貨了。繼英之後，又有許多國家放棄金本位，這些國家的通貨固以英鎊為準則的（英國的殖民地與保護國，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國）。

「詳註」詳述信用恐慌及一般的關於現代資本主義恐慌，參看「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篇。

恐慌的繼續發展又引起日本的通貨膨脹，在大戰時，日本的幣制也算穩固的。一九三三年，連最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底幣制均破產了。美國的停止紙圓之兌現，與轉變到通貨膨脹是由經濟恐慌的繼續發展，銀行券的破產，國民之儲匿現金，大布爾喬亞想藉通貨膨脹以逃避恐慌的企圖所引起的。

到一九三四年，在資本主義世界，只有四國（譯註）保存真正的金本位：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在德國，波蘭，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僅於形式上保存金本位；這幾國的金匯兌藉其對外關係（藉對外貿易等等）而勉強保存着，國內實際上已存在着潛伏的通貨膨脹，至於在所有其他各國中的通貨膨脹，則公開地存在着。

「譯註」比利時於今年也已放棄金本位了——譯者。

大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貨之破裂又使資本主義世界底幣制之統一破裂。

通貨膨脹又惡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之悲慘的地位，因牠減低了實質工資。通貨破裂更深化在帝國主義的強徒間之矛盾。既然通貨膨脹能使在世界市場上廉價出賣商品，故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在世界市場上與保持金本位的國家鬥爭時能增強自己底力量。同時又開始了在大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英國，日本——間利用通貨膨脹而爭奪市場的新「競賽」，美金以貶值而戰勝英鎊，日元戰勝鎊等等。所以由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刻矛盾所滋生出來的通貨紊亂，在現階段上，更加

深了這些矛盾。

第五十節 布爾喬亞的貨幣論

布爾喬亞的貨幣論之主要的派別就是數量論與名目論

依數量論——其最近的代表人物是費息耳，嘉塞耳與肯恩思(註)——貨幣沒有內在的固存其中的實在價值。依這派的理論，貨幣的購買力於流通中形成且依存於投入流通中與商品交換的貨幣量。依這派理論，投在流通界的貨幣愈多，則其購買力愈低；反之，如投在流通中的貨幣愈少，則其購買力愈高。這派理論的信徒，利用紙幣的發行量愈多，則紙幣愈跌價這一事實去証實其理論。

註：註在十八，十九世紀，其主張者有陸克，孟德斯鳩，李嘉圖，休謨，彌爾。

同時，我們知道，紙幣只是在流通中的金幣的代替者。為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不外由紙幣與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的比例去決定。而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則依存於流通着的商品之價值與黃金的價值。黃金能測度別的商品之價值者，僅因為黃金本身具有代表物化了的社會勞動之價值。

如我們所已知，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皆在商品與貨幣出現流通界以前，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交換只是表現了以前已造成的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如馬克思所指出，依數量論，「投在流通過程中的商品無價格，而貨幣無價值」。數量論把當作流通手段看的貨幣本質，與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本質，與需要具有實在價值的實在貨幣之其他機能分離開來。

否定貨幣之內在價值，由處在流通中的貨幣數量推論出其「購買

力」，數量論以及一切俗流的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均不於商品生產之內在矛盾，而於流通中推究出經濟法則。

蒙蔽了於貨幣中體現出來的商品生產之內在矛盾的數量論，同時企圖「證明」在資本主義下，貨幣流通有自覺制約的可能性。這派理論的信徒，擬出以處在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之制約以及藉貨幣發行以控制商品價格去「療治」現代資本主義恐慌的許多草案，不是偶然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類此自覺的制約是不可能的，因這種經濟按其特性是無政府狀態的：其自然的法則出乎且違反乎人們底意志而作用着。而且通貨恐慌不過是全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表現形態之一，其根源則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貨幣流通之「自覺」制約的企圖反而更加强了通貨紊亂——這乃現代恐慌的特徵。

現在轉而研究另一布爾喬亞的貨幣論——名目論

依名目論的學說，也如數量論一樣，貨幣並無內在的價值。依名目論，貨幣只是由人們底自覺意志，尤其由法律所規定的有條件的符號。依這派理論之最近一個代表人——克納撥(註)底意見，貨幣與戲票的號數相似。戲票的號數依人們的全意，給以座位的權利，同樣，貨幣也由法律規定，給以執行買賣之合法手段的有條件的證券。因而，依名目論者底意見，貨幣符號是黃金的或紙做的，對於貨幣單位沒有意義的。正如貨幣是純條件的，觀念的一樣，依名目論，貨幣單位(盧布，法郎，等等)也復如此。

[註]其理論普通叫做「國定的」，或「法制的」理論。

名目論帶有觀念論的特性，因由人們底意志，因由爲人們所形成的法律去推究出貨幣及其機能。事實上，貨幣的價值係離開人們底意志而被確定的。商品價格依存於生產商品與金幣之社會——必需的勞動，而此勞動則客觀地存在着。國家雖能任意改變價格本位，貨幣物材

之測定的單位，但牠不能改變用以體現商品價值的貨幣物材之數量。

在流通過程中當作價值符號看的貨幣機能是沒有意思的，如無當作價值尺度看的貨幣底基本機能；牠是由當作一般等價物看的貨幣本質，由貨幣體現社會勞動這一點發生出來的。故紙幣只是金幣的代替者，在流通中的金幣價值的代表者。

假使發行紙幣的布爾喬亞國家，強令公民與金幣平等地使用紙幣，那末，只有在流通中的紙幣量尚未超過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之相應的數量的時候，這一事情才能執行。

流通着的商品數量，其價值與價格，鑄幣流通的速度，定期的支付，在商品生產中皆盲目地，離開人們的意志地被確定着。假使在流通中發行過多的紙幣，則他們就會違反國家的強制而跌價。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之客觀的法則比各個人的意思與政府更為有力。

數量論與名目論均企圖造成這樣的幻覺——貨幣流通有自覺的與計劃的「制約」之可能性。名目論更重視了法律與政府在這種「制約」中之作用。

第五十一節 社會—民主派之曲解 馬克思的貨幣論

社會民主派對於貨幣問題也是與其他問題一樣尾隨着布爾喬亞底理論：他們或多或少的公開地把馬克斯底貨幣理論換為數量說和名目說，抽去馬克思理論底階級內容。

例如，達奈爾，說貨幣價值是具有法律性質的，這完全是擁護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國定貨幣說」。關於貨幣底這種見解，完全和他的一般理論吻合着：他企圖蒙蔽資本主義生產底各種矛盾，把一切問題

都歸結到法律上去。

另外一個社會民主派底台柱——費希丁不把從紙幣與金幣價值的關係，而直接由商品底價值得出紙幣的價值來。

依馬克思底學說，為紙幣符號所代表的價值，依存於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與代表這些金幣的紙幣之發行量。為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首先就決定於以金幣體現出的流通着的商品總價格。

費希丁解釋馬克思底學說是這樣的，為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並不依存於商品之金價格，並不依存於為紙幣所代替的金幣量，而是單純地依存於商品價值。依費希丁，為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依存於在商品價值與紙幣流通量間之關係；依他底意見，金幣價值，這裏，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沒有價值的紙幣是不能測度商品價值的；商品價值只有以一般的等價物——有價值的金幣去體現。否定了紙幣與金幣的聯繫，費希丁遂與數量論，名目論的代表者一樣，把紙幣轉化為有條件的符號(註)。與數量論，名目論的代表者相結合，費希丁企圖說明在資本主義下，貨幣流通有自覺制約的可能性。費希丁企圖藉助貨幣論以說明把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地轉化為有計劃的，沒有矛盾的經濟之「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

註：費希丁又把它當作不依存於金價值而依存於商品價值和貨幣流通量的有條件的符號看的貨幣之解釋推演到金幣上去。依費希丁底意見，為流通着的金幣所代表的價值，因流通自身的變化而動搖。

比費希丁更露骨的，是奧大利——馬克斯主義者布蘭達爾。他說：馬克斯底貨幣理論與數量說，只是外觀上不同的東西。

我們在社會民主派底「老前輩」考茨基之貨幣論中，可以看見擁護資本主義的實例。

當時考茨基反對費希丁底貨幣論，是打着擁護馬克斯底真見解的旗幟而出場的。但這種偽馬克斯底擁護者，實際只是欺騙勞動者，散佈布爾喬亞貨幣說，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

據考茨基說：「黃金之變成貨幣的理由，是因為人類對於牠比其他物品更為需要，且比領受其他物品更喜歡領受牠」。他說貨幣是人類為了便利而製造出來的純粹技術手段。因此，他否定貨幣是商品生產底各種矛盾，與這些矛盾的成長之表現。他說「社會主義者底任務，並不是在於廢止貨幣」。因為我們不能把當作「技術手段」底貨幣，「現為在某種經濟情勢下，與使用貨幣相聯結的害惡的責任者」。〈考茨基；唯物史觀。引文根據一九二九年出版在馬克斯主義的見解中之貨幣及貨幣流通那本文集〉。這樣擁護資本主義的考茨基，想蒙蔽貨幣是苦惱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的表示者。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底偉大解放戰爭」上，屠殺了一千萬人，三千萬人成了殘廢者，這都是為了黃金。因為黃金的關係，或許在新的戰爭上，要屠殺兩千萬人，使六千萬人變成殘廢者」。〈伊里奇；全集第二七卷，第82—88頁〉

黃金底自然屬性本身，當然不能成為戰爭的原因，但在資本主義經濟裏當作貨幣看的黃金，表現這個經濟底新的各種矛盾——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榨取與戰爭的各種矛盾。擁資本主義底考茨基，實在是蒙蔽了這一點。布爾喬亞底忠僕考茨基，是反對「取消」資本主義的貨幣，而想使貨幣永久化。

偽造馬克思貨幣論的魯平，把馬克思底貨幣機能之發展解釋作沒有實在內容的純邏輯過程。在魯平底解釋中，馬克思之貨幣某一機能到別一機能之轉變是某一概念到別一概念之純思維的轉變過程。其實，如我們所已知，於馬克思，貨幣機能之發展反映出商品生產及其

矛盾之實在的發展，恐慌的可能性之形成，在社會勞動與私的勞動間矛盾之深化。所以，潛伏於貨動中的矛盾之發展，又促使單純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貨幣轉化為資本)。

凡是魯平被猛烈批判而不得不說貨幣機能與物質生產「相聯繫」的地方，他都直接由「物質的生產過程」——他把這瞭解作純技術過程(註一)——推論出這些機能。所以於魯平，貨幣本質與其機能之發展有時是純邏輯過程，有時是技術過程。無論在這種和那種情形下，皆蒙蔽了由貨幣所表現出的商品生產之實在矛盾。蒙蔽和抹殺這些矛盾的企圖，使考茨基，魯平，費希丁，連納爾與擁護資本主義的其他布爾喬亞學者聯結起來(註二)。

〔註一〕魯平，「在馬克思底經濟體系中諸範疇之辯證的發展」，此文載在一九二九年第四期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上，引文則在八七頁。

〔註二〕在社會—民主派的交換見解之精神上，對於馬克思貨幣論觀之念論的曲解者還有特拉哈丁堡，其著作在不久以前曾被廣泛地採用過。把貨幣，貨幣流通與生產過程相分離，且把生產關係歸結到交換關係，法律關係，特拉哈丁堡同時又把貨幣底各種機能與貨幣本質分離，與為貨幣所表現的矛盾分離。在商品生產底矛盾發展之基礎上貨幣底機能之發展，於特拉哈丁堡是沒有的。為他所修正的馬克思—伊里奇的貨幣論與為他所修正的信用論密切地聯繫着。

第十章 在蘇聯經濟中的商品與貨幣

第五十二節 馬克思與伊里奇論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學說

資本主義體系已經不是世界的唯一體系。在地球的六分之一領土上，已存在着另外的經濟體系——社會主義體系。在這兩種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之間進行着鬥爭。

當然會有這樣的質問：在蘇維埃經濟發展的根抵上存在着怎樣的法則？牠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運動法則有何不同之處？如我們先由認識共產主義經濟（其初期階段是現在蘇聯建設着的社會主義經濟）之將來的發展開始，那就最能理解蘇維埃經濟的運動法則。

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主要的是，生產手段是社會的財產；在這種社會裏，如馬克思所說，人類「意識地把他們各個人的勞動力支出為社會的勞動力」（註）。即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裏，社會的勞動直接表現為私的勞動；反之，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的勞動直接表現為社會的勞動。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裏，要發現人類勞動之社會的性質，必要繞一個大灣——通過價值和價值形態。但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不必要任何轉灣：共產主義社會能直接計算在生產品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量，且直接以勞動時間（時，分等等）表示牠。

〔註〕資本論，第一卷，三六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生產出來的所有生產品皆為社會的生產品。在那裏將如何分配這些生產品呢？社會生產品的一部份用於繼續生產的手段上，他部份則用以滿足社會各成員的消費。第一部份仍為社會的，第二部份則分配於社會各成員間。又怎樣來分配這第二部份呢？

馬克思首先指出，這種分配的方法，將隨「社會，生產組織之性質以及生產者之史的發展階段」而變化。（資本論，第一卷，三六頁）。

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社會主義裏，消費品的分配根據支出的勞動而進行的，在共產主義底高度階段上消費品的分配，則依「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而進行。

這種生產與分配底組織沒有價值與商品拜物教的餘地。因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直接是社會的勞動，故人們底生產關係並不物化，並不採取在物物間關係的性質，物體關係的性質；「人們底社會關係，對於……他們底生產品，這裏，無論在生產上與在分配上皆非常明顯」（前書，三七頁）。

生產和分配之自覺性與有組織性消滅了盲目法則的統治，人們成為統治的社會關係。

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是盲目的法則，強制在生產上活動的人」，而共產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由人們底集體理性所達到且在共權力之下」表現與活動於生產與分配過程之自覺的有計劃的領導上之法則。

如已指出似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其發展中分為二個階段：第一——社會主義階段，第二——發達的共產主義階段。

牠們間的區別是：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上，在社會主義下，尚保有布爾喬亞社會的「劣根性」。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二階段中的生產力水準與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之發展允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

則之實現，而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分配將根據支出勞動的質和量而進行的。在社會主義之下，尚保有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在城市與鄉村間矛盾之殘餘等等。在社會主義下，階級已被消滅了，但尚保有階級區別的殘餘。在社會主義下仍保持着無產者專政。

「國家——伊里奇說——能完全取消者，只有當社會已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原則的時候，即當人們完全習慣於公共生活之主要原則的時候，而且當他們底勞動全是生產者底勞動，他們完全樂意按照能力而工作的時候。」（全集，第二十一卷，四三六頁）。

第五十三節 蘇維埃經濟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還有一過渡時期，由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革命轉化的時期。「適應於這時期的又是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時期的國家不外是革命的無產者專政」（新達綱領之批判，一九三二年版，四三頁）。

蘇維埃聯邦是無產者專政的國家。我們集中了一切最重要的經濟的基幹——無產者專政就藉此以實現其使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共產主義社會之革命轉化的任務——於無產者專政的手中。

無產者取得政權以後，蘇聯經濟是集合各種經濟角部而成的彩色畫。伊里奇於一九一八年曾列舉五個角部：1. 家長式的經濟（這裏還保持着農民底，牧畜者底自然經濟；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到原始共產主義的殘跡）；2. 小商品經濟，這裏包括着千百萬農民與手工業者底經濟；3. 私的資本主義經濟；4.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裏包括租讓的企業；5. 社會主義經濟，這裏首先就包含着為工人階級全體所有的國

家企業。同時，以小商品的關係最佔優勢。

就是在基於領導的經濟基幹（國有的工業，農業，土地國有，對外貿易之壟斷等等）的無產者專政的時期，即已運用政權的全部力量，以決定我們全部經濟發展之路線，其向社會主義的運動。

目下，在各角部間的關係已有利於社會主義地而根本改變了。例如，在一九三三年，社會化的工業，提供所有工業生產品的百分之九九·九三，而私有工業僅佔百分之〇·〇七。在農村經濟中我們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絕對優勢。

無比的強固力量是目下已聯合四分之三的農民經濟與百分之九十耕地的集體農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五——二八日中央擴大會議決議第一頁）。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為伊里奇於新經濟政策初年所指出的五個角部中之第一，第三與第四，即家長式的經濟，私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不復存在了。富農主要的已肅清了，所保持的只是資本主義份子的殘餘。第二角部——小商品經濟（個人的農民經濟）已成為「不能不從屬於且適應於集體農場制的次要力量」（伊里奇於蘇聯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的報告，二十一頁）。

第五個角部——社會主義經濟「已是在全國民經濟中之唯一統治的且唯一領導的力量」（前書，一六頁）。

目下在蘇維埃聯邦中已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而於第二次五年計劃內將完成了主要的過渡時期，且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當作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過渡經濟看的蘇聯經濟有其固有存於牠的矛盾。蘇聯經濟的主要矛盾是在日益擴大的共產主義與日益末落的資本主義間的矛盾。

過渡時期——伊里奇說——不能不是在末落的資本主義與滋長

的共產主義間的鬥爭時期」(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七頁)。

「我們底運動——俾殺黎奧諾維支說——在鬥爭的程序中，在矛盾發展的程序中，在這些矛盾之克服的程序中，在這些矛盾之出現與肅清的程序中流露出來。——新舊的鬥爭，生死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在十五次黨大會上的報告，七〇頁)。

由這主要的矛盾派生出在全過渡時期，以及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在社會主義，一直到完全的共產主義出現以前，無產者專政有存在的必需。無產者專政在「新舊鬥爭，生死鬥爭」(在末落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的共產主義間)的鬥爭有決定的作用。

無產者專政有三方面：

1. 爲了消滅剝削，爲了保衛國家，爲強國與他國的無產者之聯繫，爲了在全世界的革命之發展與勝利而利用無產者底政權。……
2. 爲使勞動者，被剝削大衆徹底地與布爾喬亞分離，爲鞏固無產者與這些大衆之聯盟而利用無產者底政權。……
3. 爲了社會主義之組織，爲了階級之消滅，爲了轉化到無階級的社會，轉化到無國家的社會而運用無產者底政權。……

只有這三方面聯貫起來才能給我們以無產者專政之明確完善的概念」(伊里奇主義問題二〇一頁)。

無產者專政不僅是政治的力量，而且是偉大經濟的力量。「假使政治的權力於經濟上沒有力量——昂格思說——那末我們爲政治的無產者專政而鬥爭時，將何所歸宿呢？力量(即國家底政權)——這當然又是經濟的優越」(馬克思與昂格思底書信集，一九三二年版，三八五頁)。

與資本主義之盲目的發展不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是無產者專政之自覺的領導過程。

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社會發展的法則統治着人有

如盲目的在人以外的力量。在無產者專政的條件下，事情就二樣了。

「以前對立着人的社會作用的法則——昂格思說——統治人們的自然法則，此時將完全爲人們所利用，當然又爲人們所統治。」（反杜林論，二〇四頁）。

「這好像在發電之破壞力與在電機或電燈中所發出的電光間之不同。」（前書，二〇一頁）。

「只有當人們已開始完全自覺地創造自己底歷史的時候，只有當人們在運動中採取社會之原因時，志願的作用才有很大的意義」（前書，二〇四頁）。

爲什麼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底社會活動的法則對立着他們有如 統治他們的外來的法則？因這種經濟以生產手段之私有權爲其基礎，這裡，社會勞動直接表現爲私的勞動且由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統治着。

在蘇聯，自其傾覆資本主義以後的第一天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基幹（大工業，交通，土地，銀行等等）皆已成爲無產者專政的所有物。在國內實施其政權的無產者專政同時又是偉大的經濟力。認識了社會發展的法則且把牠變成 從僕 有如 控制電機 一樣，以完善的智識去利用牠，根據我們自己底利益，即根據共產主義建設的利益引用牠於歷史因素的變動中。我們自覺地領導我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自覺地創造我們自己的歷史。

在與資本主義份子鬥爭中，無產者專政決定了我們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成長，小商品角部之社會主義改造與資本主義份子之肅清的路線。無產者專政爲了我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而與資本主義鬥爭是我們到共產主義之前進的基礎；但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僅包含與資本主義，富農之直接鬥爭，不僅包含與包圍我們的資本主義諸國之直接鬥

爭，而且包含着與衆民之商品——資本主義傾向鬥爭，爲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之保證與鞏固——藉以在無產者領導之下，把小農經濟轉化爲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而鬥爭，與在經濟中與人們意識上之資本主義殘餘鬥爭，爲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而鬥爭。

獲取政權與經濟基幹的無產者造成了新的經濟體系，這種體系於自身內潛存着社會主義建設之客觀的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是不能自然地轉化爲現實性的。爲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就必需在黨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之嚴肅的堅定的鬥爭。

社會主義建設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的決定條件是黨底正確政策與運用這政策之正確的領導。

由此推論出政策對於經濟之主位。政策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如無無產者專政之經濟政策，如無其自覺的有計劃的領導，就不能改造我們底經濟，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但政策對於經濟的主位不能在政策與經濟的對立的意思中去瞭解，不能在馬克思的主要理論——經濟是一切社會之基礎——的消除的意思中去瞭解。無產者專政的政策對於經濟之首位者只是當作這經濟之集中表現看。只有社會主義的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建設之基礎，由這一點出發，無產者專政自覺地以我們國家的工業化與農村經濟的集體化——這是社會主義經濟之二種決定的基礎——爲自己底任務，且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內已實現了社會主義基礎之建設的任務。

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在其定義新經濟政策時曾說明我們底經濟政策之階級的意義：

「新經濟政策是在經濟的基幹操在無產者國家手中的實現之下，預計到資本主義之拍頭的，預計到資本主義份子與社會主義份子之鬥爭的，預計到在資本主義份子的末落中社會主義份子的作用之增大的

，預計到社會主義份子之制勝資本主義份子的，預計到階級之消滅的無產者國家的政策。（論反對派，二一頁。）

在黨領導之下，無產者專政自覺地與資本主義份子鬥爭的，要肅清階級，且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我們的經濟政策之這種路線是我們底經濟發展之主要路線。

在實施經濟政策的事業中，無產者專政之最重要的工具是計劃。計劃的可能性與必需性直接由我們經濟的本質，由我們底實現無產者專政，由無產者專政把經濟的基幹操在手中而為最重要的生產手段之所有者，流露出來的。

由此又推論出在資本主義——在那裡為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所統治着——的條件下，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

這可以布爾喬亞方面根據蘇聯的成例而計劃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企圖之失敗去說明之。計劃的體系給我們底經濟以很大的優點，比之為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統治着的資本主義經濟。

什麼是我們底計劃的特徵呢？

布爾喬亞的光復者想把我們底計劃歸結到計劃的藥方，歸結到計劃的猜測。依他們底理論，計劃的任務應在乎，不積極地干涉現實性，不要更動牠，而是消極地觀察且說明猜度，且提議，現實性將盲目地，放任地發展着。企圖以計劃的這種瞭解來拘束我們，有害者想達到這一步，無產者及其專政應允許我們經濟以資本主義的放任性。

為無產者專政所實行的計劃是具體地指示現實性之改革的道路，具體地決定在某時期，全國規模的我們經濟之發展，給領導者與工作者指明處所的計劃的方針。

無論如何均不能把我們計劃的本質歸結到計劃的草擬。計劃的草擬——俾費黎奧諾維支同志說——只是計劃的開始。只有在計劃草

成以後，處所決定以後，日下計劃的領導才能擴大到計劃之實行，修正與確定的行程上去。」（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五三頁）。

由於社會主義經濟之成長又改變了計劃領導的形態，出現了計劃的新工具。

例如在復興時期的初年，農民經濟之計劃的領導是以把握與農民之市場的聯繫而實現的，現在我們於農村經濟上增添直接的計劃領導之新方法，因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工業已增高了，商品回轉已社會化了，農村經濟已有百分之七十五集體化了，而且「社會主義角部已把全國民經濟的所有經濟的柱石統操在手中了。」（前書，五七二頁）。

蘇維埃的經濟體系創造了視勞動為尊敬，豪俠，英雄之新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其組織之新的社會主義的形態，這於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中極明顯地表現出來。對於勞動的這種關係是由蘇聯的工人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且操着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這點發生出來的。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是在為我們計劃之完成與超過而鬥爭中之最重要的因素。

他方面，自主經營的訓練，「盧布管理」的保證，商業的開展——這促使在我們經濟中的商品形式之鞏固與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之自覺的有計的領導中之重要的作用。但這種商品形式與在資本主義下的商品形式原則上不同。下面我把再較詳細地來考察其特徵。

第五十四節 蘇聯的商品形式之特性

伊里奇曾相對地說起在我們條件下之商品形式：「國營的生產品——與農民底糧食交換的社會主義工場的生產品，並非在政治經濟學

的意義上的商品，無論如何，不僅是商品（全集，第二十六卷，三七〇頁。）

由此可以明白，蘇聯的商品，貨幣與自主經營的形式與在資本主義下的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問題不在乎——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說——商業與幣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在於：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為克服資本主義成份而取得布爾喬亞的方法與工具，牠們（即社會主義成份——陶達）成功地利用這些方法與工具以反對資本主義，成功地，利用牠們以建設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所以，問題在乎，應用我們發展的辯証法，原則上改變了布爾喬亞底這些利器之機能和使命，根本使之變成對於社會主義有利，對於資本主義有害。（第十四次黨大會記錄，四九六頁）。

所以，我們商業與我們蘇維埃貨幣之根本特徵在於：牠們並非體現出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運動之盲目的法則，價值法則，並非統治人們的力量，而是轉化為操在無產者專政手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

在無產者專政之領域內的商業是發展社會主義工業的工具，為社會主義積蓄而動員內在資源的手段，計算蘇聯的勞動大眾之消費和需求，刺激新商品之生產的手段。在工業商品生產之增加的基礎上的蘇聯商品之開展，以農業品供給城市之質的改良與量的增加——是改良勞動者底文化和物質水準之主要手段之一。蘇聯商業是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的工農團結的工具之一。

當作社會主義建設之工具看的蘇聯貨幣也形成不小的重要作用。

首先我們以貨幣形式計算社會勞動。然而這不是我們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所看到的那種盲目的值價的計算：主要的，牠是有計劃的計算，因而蘇維埃的貨幣不是盲目的價值法則之表現形態，而是計劃領導的工具。這裡首先就包含着蘇維埃貨幣與商品資本主

義經濟的貨幣之深切的區別。

關於貨幣的其他機能也復如此。姑以流通手段的機能為例。在我們，商品與貨幣的流通並非盲目地流動着——這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才有地位。我們以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為出發點而計劃了商品的分配。我們同樣計劃了在國民各階級間的收入之分配；最後我們在計劃的程序中指揮了貨幣的發行。當作儲存手段與支付手段看的貨幣機能也復如此。

當作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看的蘇聯貨幣之主要機能在乎，盧布管理。

我們藉貨幣以控制工業計劃之執行，供給企業以資源；我們藉蘇維埃貨幣以實現對商品流通之管理，以合理化供給的事業。我們把貨幣當作與小商品角部之聯繫且以計劃的領導使小商品角部服從的手段之一而利用之。我們經過信用組織把貨幣當作小商品角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手段之一，當作集體農場的發展與鞏固的手段之一，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之實現而重分資源於各部門的手段之一，而利用之。我們為的要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而利用這一切。

因而我們注意到，使我們底盧布穩固。這首先由在蘇維埃貨幣之發行的事業中，尤其銀行券發行事業中的有計劃的政策以達到之。

我們底銀行券以黃金，貴金屬，穩妥的外國通貨，與國家銀行的其他財產為担保品。這一保證對於我們與資本主義諸國的商業關係有很重要的意義。我們貨幣的最主要的保證就是絕對大多數的商品均集中在國家手中。

假使注意到在國內商品流通中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市場，而非僅有次要意義的無組織的市場——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說——那末，以什麼來保證蘇維埃通貨之穩固呢？當然，不僅是金準備。蘇維埃

通貨的穩固性首先由按照固定價格投進商品流通中的大批商品均操在國家手中，這一點保證之」（伊里奇主義問題，第九版，三三頁）。

所以，蘇維埃的商品——貨幣形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很重要的作用且按其本質，根本與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商品——貨幣形態不同。

在我們條件下的商品——貨幣形態不僅是純外表的形態。原則上與商品——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形態不同的，我們商品貨幣形態之存在是由我們底社會主義經濟之生產關係本質的自身中發生出來。只有在最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才能消除貨幣的必需性，才能直接以生產品交換，直接的共產主義分配，與直接以勞動時間計算。

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傅毅黎奧諾維支同志於其報告中說，直接生產品交換的實行比之蘇維埃商業之實行是更複雜而困難的事情，直接生產品交換「只有在思想上實行蘇維埃商業的結果中才能進行」，至於貨幣，他說，牠們「還繼續存在着，直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之完成」。（黨第十七次大會記錄，二六頁）。

直接的分配是以貨幣之取消與直接以勞動時間計算勞動之自然生產為先決條件的。在全國的大規模中，在千百萬人的大規模中，由勞動之不甚正確的，不甚完善的貨幣計算到直接以勞動時間之較正確的計算，需要勞動支出的質與量之更詳細的智識與研究，勞動支出計算的新而複雜的方法之發明，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公正的勞動指標等等。他方面，直接的分配需要生產力發展之更高的水準，生產社會化之更高的程度。而且不僅生產，消費也復如此，以及生產品的豐裕和人們底共產主義的再教育。

以怎樣的方法才能完成到直接生產品交換與直接以勞動時間計算去的轉變呢？

牠可以開展在現階級上的蘇維埃商業與穩固在現階段上的貨幣這種方法去完成之。商業的開展，蘇維埃貨幣的穩固，自主經營的訓練形成了更適宜為消費者而服務的計算與分配的機關。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才能造成為在最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上的商業與貨幣的取消所必需的組織，技術條件。那時！增進了……生產力，而且社會財富的一切根源完全被利用了，社會能高舉自己底旗幟：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郭遠綱領批判，二八頁）。

因此，第十七次中央擴大會議對於蘇聯國民經濟第二次五年計劃之草擬的指令曾這樣說：

「會議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上主張『生產物交換 廢除貨幣』的『左派』的辭句之反多數主義的性質。他方面，會議又指出，黨的政策與工人階級底利益完全和表現於浪費國家富源，以及破壞經濟計劃上的自主經營原則之布爾喬亞——納潑孟的曲解不同」（第十七次中央擴大會議記錄，二七九頁）。

第五十五節 在蘇聯經濟規律性問題上的布爾喬亞光復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與右派機會主義的曲解之批判

布爾喬亞的與少數派的經濟學家，反革命者與有害者們皆把蘇聯經濟當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變形看。

「現在的體系——為無產者法庭判決作反革命者，有害者的友洛夫斯基教授說——不能瞭解作過去與將來的混合體 *mixtum Compositum*，牠是商品經濟的體系，不過其形態不同而已。在有市場與商品的地方，價值(譯註)法則皆起作用着。經濟的情勢漸次接近於自由競爭

的條件。在經濟的情勢中，獨佔形式的組織能有很大的作用。國家可以「不干涉」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各種條件。國家可以實行保護一部份經濟形態或部門，排擠其他部門的政策，以制約對外貿易，信用與生產的諸條件。假使在這些條件之下，市場仍殘存着，則價值法則就起作用！（一九二六年第十二期，「財政學報」）。

「譯一」友洛夫斯基，原來是用價格性法則這個術語的，

由此出發，有害者把計劃工作的本質歸結到蘇聯經濟之盲目趨勢的預想，歸結到我們經濟的適應於這種盲目的趨勢。所以在理論界中的這種論調不外是他們底反革命的有害的實踐之基礎。

他的目的，是想把我們經濟變成市場的資本主義自然成長的領域，是想「證明」普羅勒達里亞和其國家不必指導經濟；不必和資本主義要素鬥爭。他的最後目的是想推翻普羅勒達里政權，光復資本主義。

右翼機會主義，在牠們全系列的綱領上，和這種理論相結合。我們已經認識均衡論與勞動支出法則的右翼機會主義的見解。現在，讓我們考察一下，他怎樣把這種理論適用於蘇聯經濟上，從這種理論引出怎樣的政治的結論吧。

例如，布哈林從均衡論出發去研究蘇聯經濟，且首先找到這經濟的「制約者」。他認為和其他一切經濟一樣，蘇聯經濟的制約者是勞動支出法則。依他看來，正是這個法則，用鐵一般的必然性，強制我們保持分業上的相當比例。因此，依布哈林看來，在我們經濟中的計畫工作是「在自然成長的統制之下，豫想地豫先處理要事後才能確定的東西。」（布哈林過渡經濟的規律性問題五二——五三頁）

總之，依布哈林看來，無論在資本主義諸條件裏，或是在蘇聯經濟諸條件裏，都同樣是勞動支出法則在起作用；不同的，祇是在蘇聯經濟裏，豫想地豫先處理這種作用且其作用也可事先預知，在商品一

資本主義經濟裏，那是用自然成長的價值形態起作用。

依布哈林看來，在蘇聯經濟裏除了勞動支出法則這種計劃表現而外，還有採取「價值法則」形態的自然成長的表現形態。那末，兩者的相互關係如何？對這質問，布哈林同志答道，「總括地說來，我們也可以使價值法則變成對我們有用。價值法則『幫助』我們，而且由此而掘牠自己的墳墓——這聽起來雖然也許有點奇怪。」（前書，五三——五四頁）。

布哈林對蘇聯經濟法則的這種解釋，實質上是叫我們把從資本主義繼承下來的各個經濟部分的比例保存在我們的經濟中的說教。我們所必要的並不是一切比例，而是能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能够在必要的速率上保障社會主義要素成長——這要顧慮到蘇聯經濟體系內藏着的一切龐大的可能性和優越性——的比例。這個比例不用說，和我們只是像先想到那要事後才能確定的自然發生的統制者的比例，有天壤之別；這是無論在量上和質上都完全不同的比例，這個比例，只有在自覺地處理我們經濟，按照社會主義的路綫自覺地指揮其發展的無產者專政之下才能達到。

我們知道，價值法則並不是蘇聯經濟的運動法則；然而布哈林把牠和計劃的指導並存，因之，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他的論敵布勒奧布拉繩斯基的俘虜。布哈林完全誤解了計劃和自然成長的相互關係。用他的見解說來，我們經濟政策的根本任務在乎，由計劃利用自然成長，即由計劃利用價值法則——這價值法則，在他看來，是「對我們有用」「幫助我們」的。這種接近，是從布哈林對農夫的二重性之錯誤的解釋發生的。照他看來，農民祇是可以不依賴無產者之領導而按照社會主義的路綫以自行發展的勞役者。他沒有看見農民之商品——資本主義的傾向。因此，他沒有看見，把農民引導到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的事

業中無產者積極領導農民之必需性，和他們的商品—資本主義傾向鬥爭的必需性。

伊里奇，俾殺象奧諾維支極力主張必須鞏固與中農的同盟，在普羅勒達里亞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地改造他們；同時，對布哈林同志指示出必須和農民之商品—資本主義的傾向鬥爭。

此外，「說價值法則轉化為勞動支出的法則」——布哈林把這勞動支出解釋為價值之物材的技術的內容——也完全錯誤。布哈林說起商品在共產主義社會裏轉化為生產物時，伊里奇會指示他道，「不是轉化為生產物，而是轉化為另一東西，例如：轉化為不經過市場而直接供社會消費的生產物。」（伊里奇遺集，第六卷，三八八頁）。

由此，伊里奇申說着下面這點：共產主義社會具有不能還元於人和物的關係之特有的生產關係體系，因之，同樣具有特有的分配體系。因此，用物的形態表示的生產關係——價值形態，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不能替換為物材的—技術的「勞動支出法則」。

我們曾說，布哈林的理論不外是右翼機會主義政策的理論基礎。

因為對計劃之右翼機會主義的解釋，布哈林同志，必然會否定當作階級鬥爭的手段看的計劃之作用。從均衡論出發，他必然會達到這樣的結論去：主張蘇聯經濟「諸成分的均衡」，說教蘇聯各階級之平和的生存，普羅勒達里亞和布爾喬亞之和睦。由此，他將跑到富農成分之成長轉化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上之自然流通；必需減低速度等等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去。

這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必然會跑到屈服於階級敵人的路上去，因為他們抹殺，掩蔽對方向我們挑起的鬥爭，用階級和平的說教援助他們，因為經濟的自然流動的說教，減低速率，適應市場法則的要求是表現布爾喬亞的希望。

現在讓我們來批判布勒奧布拉繩斯基的托洛斯基主義理論吧。

布勒奧佛拉繩斯基把蘇聯經濟的研究任務和方法規定為：

「我的任務是先把國家的現實經濟政策——這是兩種經濟體系和適應着這兩種經濟體系的各階級之合成力(Resultant)的鬥爭——捨象掉，……盡可能的用純粹的姿態解明相抗爭的各種傾向的作用；然後，說明現實生活的合成力為什麼不走另一條路，而走這一條路。」

新經濟學，一九二六年版，七十頁。

我們已經曉得，佛勒奧佛拉繩斯基是把轉形期的蘇聯經濟視為由處在我們底計劃基礎上的原始社會主義積蓄的法則和價值法則這兩個原則去支配，依他底意見在這二個法則間實行着難於和解的鬥爭，結果，形成鬥爭的合成力，這便是決定我們底政策。

他說，「在單一的經濟組織裏，如果有全體系的前進運動之敵對形態的兩種原則的鬥爭，那末，問題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可以有兩個制約者嗎？——不，能夠沒有兩個統制者嗎？所謂單一的力，無論在任何瞬間，都是相鬥爭的兩種力之合成力。——……（前書，七二頁）。

照布勒奧布拉繩斯基看來，普羅勒達里亞國家之計畫的指導是由「原始的社會主義積蓄的法則」來決定，而這個法則的本質「主要的，或同時，是從國家經濟外部的資源（即主要的由于犧牲農民——拉比什斯）把物質的富源，積蓄在國家手中。」在其著作的別個地方，他率直地說，「由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榨取小生產的增大，——這榨取的增大，據他看來，為原始的社會主義積蓄法則以鐵一般的必然性所指揮着。

現在，我們把布勒奧佛拉繩斯基這徹頭徹尾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批判一下吧。這裏，我們把牠和我們所提起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性的一般問題關聯起來說。我們先從布勒奧佛拉繩斯基研究蘇聯

經濟時所用的方法開始，即把我們黨的經濟政策捨象掉的方法開始。我們黨的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上有怎樣的作用，這是已經知道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既然是研究蘇聯經濟的，不用說，我們便不能把我們黨的經濟政策捨象掉。把政策從經濟拉開，這是根本敵視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的少數派的特徵，在蘇聯經濟問題上把政策與經濟分開，就表示出，當作我們經濟發展之基礎看的無產者專政底作用之否定，當作無產者專政之指揮力量看的黨底作用之否定。

布勒奧佛拉繩斯基所提起的其他方法論的指示——把蘇聯經濟的規律性就各個成分而研究，及其二個制約的理論——是表明他對蘇聯經濟完全無理解的證據。

蘇聯經濟雖然在其中有各種成分，然而形成着一個統一的經濟。在現階段上，潛伏着社會主義成分絕對優勢的作用。無產者專政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有計劃領導即根據於此的。立足在社會主義角部上的無產者專政，使千百萬的農民經濟轉化為大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我們已經曉得，包含由貧農中農經濟到大的集體生產去之社會主義再教育的法則——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法則，表現於無產者國家之計劃的指導中。反之，布勒奧佛拉繩斯基設定原始的社會主義積蓄——其本質是社會主義成分之「苛斂誅求」小商品成分——的法則。這種「理論」事實上是宣傳工人階級與農民同盟之瓦解，農民底革命可能性之否定。由此，可以曉得，他所提起的兩個統制者的理論，不獨和馬克思—伊里奇主義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而且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政策底理論根據。

第四篇 剩餘價值與資本

第十一章 貨幣之轉化爲資本

第五十六節 資本底一般公式及其矛盾

我們已知，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之發展，又促成商品底內在矛盾之發展，促成貨幣底發生與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隨着自己之往後發展，又達了使貨幣轉化爲資本的水準。

貨幣於歷史上是資本出現之最初形態。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胸懷中，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發生以前，奴主與領主底地域特徵已以貨幣形態對立着高利者與商人底特徵。

但貨幣不僅在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之史的過程上是資本出現之最初形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統治之下，每一新的資本最初皆以貨幣形態而表現：在市場上購買特定商品僱傭工人而出現於貨幣市場以前，資本家應先支配貨幣「這貨幣應經過特定過程而轉化爲資本」（資本論，第一卷，九三頁。）

貨幣本身尚不是資本。牠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轉化爲資本。我們應進而考察這些條件。

當作貨幣看的貨幣與當作資本看的貨幣——馬克思說——最初

僅藉流通之不同形態而互相區別（同上）

先來考察一下是為小商品生產者底單純商品經濟之特徵的，單純商品流通的形態。

試舉一個自己有生產手段，靠自己的勞動生產物生活的小商品生產者——農夫或手工業者來做例。各商品生產者皆企圖把自己底商品。到市場上去換對於他有使用價值的其他商品。每個小商品產生者，都想盡量高價出售他自己的商品，這是當然的。一切操作底根本意義，就是以取得新的使用價值為目的底商品與商品之交換。所以單純商品流通底公式，可以像下面那樣去表明，即商品——貨幣——商品： $W—G—W$ ，這裏商品流通始於商品且終於商品。在商品交換下，貨幣僅形成了中介的作用。

是為資本之特徵的流通公式就二樣了。其意義在乎為出賣而購買。資本家以特定量的貨幣投入流通中，在市場上購買商品，然後又出賣商品，再由流通中收回貨幣，所以資本流通的公式可以以 $G—W—G$ 形態體現出來。假使在單純的商品流通之下，流通的意義在乎，以具有某種使用價值的商品與具有別種使用價值的商品交換；那末，在資本流通之下，事情就二樣了。資本流通始自貨幣且終於貨幣，只有假設資本家由流通中收回的貨幣量大於他以前投入流通中的貨幣量，這種情形之下，資本流通才有意義。所以資本流通公式之最確當的形態是： $G—W—G+g$ ，這裡『 g 』是與最初投入的資本 G 相比較而發生的，資本的增額。

『超出最初價值的這些增額或餘額——馬克思說——我叫做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九六頁）。

所以，當作資本看的貨幣流通的目的是價值底增殖。為了能進行這增殖，資本家應不斷地把其貨幣投入流通中，然後再由此取得一切

新而又新的增額。『所以，價值轉化為自己運動的價值，自己運動的貨幣，這樣，牠就成為資本了。』（前書，頁頁）。

乍看去，似乎可以說， $G—W—G$ 這個流通公式，僅足為商業資本的特徵，此時，資本家出賣為他所購來的商品而獲得增額。但工業資本家，在經營工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以前，應在市場上購買生產工具與手段且僱用勞動力，即以貨幣投入流通中且以之購買商品；次則，他又出賣在生產結果中所獲得的商品。這樣他又由流通中收回貨幣。固然，由工業資本家看來，在以貨幣購買商品，和因貨幣出賣其商品間，生產過程在流動着。但這裏，結果，資本家還是把一定量的貨幣投入流通中，為的想以貨幣換商品且獲取更多的貨幣。

我們所引用的公式，僅指示出資本怎樣出現於流通中，但並未說明資本怎樣形成的，並未說明剩餘價值所由形成的根源。

什麼是剩餘價值的根源？

乍看起來，剩餘價值，好像是可以因提高商品價格而取得的。我們知道，價值法則是由其不斷的擾亂與背離價值而實現。在以價值為中心的價格之無限的動搖過程中，某一資本家可以由犧牲其他資本家而賺錢。可是，用這種方法，只能說明犧牲其他資本家而某資本發財的事實，不能說明在總體上的整個資本家階級所得到的剩餘價值。

實際上，如果某資本家在買賣自己的商品時，因供給需求之變動，由犧牲其他資本家而自己發財；那末，整個資本家所有的價值總額，並不會增大。很明顯的，非有將利潤不斷流入資本家腰包去的泉源不可。在這一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社會底存在才有可能。

那末，利潤不是因為出賣者具有用價值以上的價格出賣其商品的特權而獲得的嗎？

讓我們拿一位產業資本家來說明吧。他賣掉自己的製品後，非用

他得到的貨幣，去購置其個人底消費資料，和繼續其生產過程所必需的一切大量商品不可。因此昨天的賣者，今天變成買者，昨天的買者今天變成賣者。因此作賣者時所賺的部分，作買者時便要丟失。

總之，剩餘價值底泉源，最初價值的超額，不能以流通過程去說明。很明顯的，我們應在生產過程中去找利潤底泉源。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完全不管流通過程。我們由商品底價格嚴密地適應着牠的價值，不論任何商品所有者與任何資本家，在交換商品時都不欺騙對方這一前提出發，根據商品流通各種法則而尋求剩餘價值底泉源。

第五十七節 勞動力之商品化

創造價值的是勞動。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出現的一切商品中，只有一個——勞動力於消費過程中具有能創造比自己底價值更多的價值之能力，因而可以當作形成剩餘價值底泉源。

「我們把勞動力瞭解作在人身中，在活着的人格中存在着的肉體底和精神底能力之總和；當人在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發揮它。」（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一一〇頁）。

但並非在社會關係底任何制度下勞動力皆是商品。例如在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剛才我們研究過的單純商品經濟制度之下，皆不買賣勞動力。勞動力要變成商品需要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在人格上，必須是自由的。換言之，對於自己底勞動力，必須具有自由處理的權力（奴隸和農奴都沒有這種權力，他們在人格上隸屬於奴隸主和封建領主）；第二，勞動者必需從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解放出來，因此，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就是工人所以與擁有生產手段因而

不出賣其勞動力而出賣其勞動生產品的小商品生產者不同的地方)。

這些條件在原始資本積蓄時期已大規模地形成了。

在研究封建主義的崩潰過程時(參考第一篇第三章)，我們已知，在封建社會中，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怎樣使鄉村與城市的小生產瓦解了；為資本所榨取了且已破產的大批農民與手工業者怎樣轉化為喪失生產手段之私有權的「自由的」無產者；同時，少數富有者怎樣以加強剝削小有產者，殖民地的掠奪的方法把龐大財富集中在自己底手中。喪失生活資料的無產者為免死於饑餓不能不受僱於資本家，把其所有的唯一商品——勞動力賣給資本家。

因此，歷史底發展過程，準備了在市場上從未見過的新商品——勞動力之出現。他方面，這同一過程，準備了剝削小生產者而獨佔所有生產手段底大產業資本家之出現。

在此，便形成了為發生大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各種條件。

第五十八節 勞動力這一商品底價值與使用價值

勞動者不能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因為能夠供勞動力運用底生產手段，被剝奪去了。但他是「自由的」，所以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生產手段的獨佔者。

如果勞力在資本主義經濟裏變成商品，那末很明顯地也和其他一切商品同樣，必須具有兩種性質：使用價值與價值。

商品底使用價值，如我們所已知，在於這個商品滿足人們之某種慾望的能力。勞動力這個商品底使用價值在乎資本家強使勞動者支付他以其勞動，換言之，就是叫他勞動。總之，勞動力這一商品底使用

價值，就是勞動者替資本家勞動底意思。

那末，勞動力底價值倒底由什麼去決定的呢？

商品底價值，如我們所已知，是由生產該商品時所支出的社會必需勞動量去決定。然而怎樣對勞動力適用這個規律呢？當然勞動力並不是在工場中造出來的。勞動力雖然不是在生產過程上製造出來的，然而要維持勞動可能的狀態，再生產勞動可能的狀態，必需一定量的消費資料，而在這些消費資料的生產上必須支出一定量的社會勞動。

勞動者，因為勞動，因為對外界自然勞動，所以自己需要支出一定量的筋肉，神經，腦髓等。為了維持自己的勞動力在勞動可能的狀態上，勞動者必須首先恢復這一支出。因此，他必須消費一定量底生活資料；即，他必須有住處，衣服，食物等等。

勞動者終歸是會死的。所以為了不斷的再生產，必需保證勞動者底自然繁殖。所以勞動者應有扶養家族的生活資料。

除勞動階級消費之一定的生理最低限度——如不足這最低限度，就會使勞動者衰敗與早死——而外，還有一定的文化的最低限度，也應算入勞動階級生活慾望的水準上去。勞動階級的生活慾望水準，完全依存於勞動階級形成和孕育於什麼歷史條件上，且隨歷史發展的進程而改變。

所以勞動階級的生活慾望水準，隨國家之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國的水準，帝俄的水準，中國水準等等。

最後，勞動者的熟練，也必須加到影響勞動力底價值之各種因素裏去。

勞動者在成為熟練勞動者以前，必須經過某種教育期間。在這一教育期間，於其學習上消費了一定量的勞動，這當然會提高熟練勞動者底勞動力之價值。

總之，勞動者爲了維持勞動力於有工作能力的狀態，爲扶養平均的家族，爲了滿足最低限度的慾望(包含文化—歷史上的因素)，爲了學習一定的熟練程度，而需要生活資料——這一切生活資料本身都具有價值，而且這個價值與其他一切商品底價值相同，是由生產牠的社會必需勞動量去決定。——這一切生活資料底價值，正是決定勞動力底價值的。

資本家當然永不會以保障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之上述水準爲其任務。他反而想盡量降低工資。而他成功了。因爲在資本主義下，一般地說來，都是勞動力底供給超過牠的需要的。因此，資本家支付勞動者的金額，縱令說是接近了勞動力底價值，但實質上永沒有達到。

不過，在剩餘價值理論上馬克斯是從勞動力按其完全價值支付這一假定出發的。馬克斯科學地證實了剩餘價值是由勞動者底勞動所形成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過剩部分，就是在勞動力底價值被完全支付的時候，也是同樣。

因此，我們暫且先作這樣一個結論：勞動力與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價值，這一價值可以由再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去決定。

第十二章 剩餘價值的生產

第五十九節 勞動過程與剩餘價值之形成過程

資本的一般概念

價值與剩餘價值僅能形成於勞動過程中，生產過程中。

爲使勞動者工作，資本家於支付勞動力而外，還應耗費一定量貨幣以購置生產手段：勞動工具，原料，副料。生產過程一終結，資本家當然應首先收回其預支於生產手段與勞動力上的價值，再獲得了超過這些價值的剩餘價值。

假使我們曾以以前的假設——勞動力按其完全價值支付的——出發，那末這如何會可能呢。

直至此刻，我們是說勞動力這一商品之這樣的本質，牠是由許多別的商品培養成的。想答覆我們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應考察一下，由許多其他商品培養成的勞動力這一商品之特性。

資本家爲要有權利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以適應於勞動力價值的特定量貨幣購得勞動力，譬如每天五角——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乎勞動——這是價值的創造者。購得勞動力底使用價值之權利，資本家，就開始利用牠，使工人支出其勞動。假使他以五角一天購得勞動力，假使這五角是五小時勞動之貨幣體現，那末，工人於五小時勞動內已

把資本家購賣商品——勞動力所支出的總額歸還資本家了。但勞動力有這樣的特徵：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準上，牠能給予更多的勞動量，比之爲保持自己所必需的，換言之，牠創造出比勞動力價值更大的價值。知道勞動力這一商品之這種「新奇」特徵的資本家不以五小時勞動——在這時間內工人造成了等於其勞動力價值的價值——爲限，而要使工人多做一些時間，譬如十小時。

所以，勞動者以其下半天的勞動所形成的價值部分，是構成資本家底純利的。勞動者形成超過勞動力底價值以上的過剩價值部分，叫做剩餘價值。勞動者再生產其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部分，馬克斯稱之爲必要時間；勞動者爲資本家形成剩餘價值所需要的時間，馬克斯稱之爲剩餘時間。爲工人以剩餘時間造成的剩餘價值，就是資本主義利潤的源泉。

資本主義榨取底主要特徵，就是這剩餘價值的形成。在奴隸制，封建制等各時代，在前於資本主義的榨取之下，勞動力並沒有變成商品，因之剩餘生產物並沒有變成剩餘價值。

在統治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的外形之下，潛藏着極殘酷的資本主義榨取。這種榨取與前於資本主義（在奴隸制和封建制之下）的榨取不同，在那裡榨取帶有非經濟的強制性，而這裏榨取出現於平等底旗幟之下，出現於兩位形式上獨立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一方面現爲貨幣所有者，他方面現爲勞動力這一商品的所有者——所定的商品合同這一外觀之下。

雖然不像對奴隸和農奴那樣用鞭鞭打勞動者，但勞動者和資本家底合同，本質上並不是自由的。這比監視人鞭子更厲害地把勞動者趕入工場，變成資本家底負債奴隸。這個鞭笞——即是勞動者的貧窮，即是他們的缺乏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

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工人底勞動。但使工人能以自己底勞動創造剩餘價值，必需有生產手段。勞動力所以能成爲商品，能爲剩餘價值之榨取的源泉的，僅因爲工人喪失了能藉以行使其勞動力的生產工具與手段；資本家所以能利用勞動力以造成剩餘價值者也僅因爲他握有爲工人所沒有的生產手段。

爲資本家所購得的勞動力的價值，與屬於資本家的生產工具與手段的價值，換言之，即操在資本家手中成爲榨取和佔有剩餘價值之手段的所有價值的總和，叫做資本。

物之所以成爲資本者不是因爲其自然的屬性，而是因爲他們是特定的社會關係——資本家對於被僱的勞動力之剝削的關係之擔負者。所以，資本是在握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與喪失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因而不得不把自己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且替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之物化（即物的體現）。

就是說，資本祇是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歷史範疇。

第六十節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我們已說明，凡處在資本家底財產中且在資本家底掌握中被當作製造剩餘價值底手段的一切價值，統叫做資本。

但構成資本底一切要素，在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上並不起同樣的作用。我們先以一個工作臺爲例由生產手段說起吧。一架工作臺參加全系列的勞動過程。可以比較長期間地使用。雖然是逐漸消耗，但在其存在期間，與其最初的形態並沒有根本的變化。假定這個工作臺的平均生存年限是十年。這個工作臺每年要消耗其價值的十分

之一，其消耗的價值部分就轉入到藉助牠而生產成的商品上去，假定這個工作臺當生產牠時需要支出社會勞動底一萬勞動日，而牠一年生產五百個商品：那末這個工作臺轉入一個個商品底價值，很明顯的是： $10000 \div (500 \times 10) = 2$ 勞動日。工作臺雖然是慢慢地消失其價值，但如我們剛才所說，牠仍然可以參加勞動過程，一直維持到十年後，至牠不堪使用的時候為止。這不僅工作臺是如此，即動力機，配力機，建築物等，也可以說都是如此。

總之，由生產工具所形成的一部分資本，按其消耗率如何而將其價值逐漸轉入新生產物裏去。

原料及助成材料則與此不同。牠們只能參加生產一次，且因此就變更其物質形態。投到工作中的原料，完全被加工製造了；燃料完全轉化為動力了。所以，原料和助成材料，一下就把牠的價值轉入到新商品底價值上去。

不過無論機器，建築物等等，和原料與助成材料之間有怎樣的差別：但從價值轉入到製成的商品中去的觀點看來，牠們具有一個共同的而且本質的特徵：即牠們都不曾創造任何新價值，僅把為耗費在牠們上面的社會必需勞動所決定的價值轉移至新商品裏去。

那末，機器，原料，等等的價值，是怎樣轉入新商品底價值裏去的呢？是由勞動轉入的。讓我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吧。現在，有二個工場：一個正在活動中，一個是在歇業中，兩個工場中都有工作臺，機器，原料，建築物等等生產工具與手段。活動中的工場的生產工具與手段，是由工作或和工作無關的種種事情如風化作用底現象等等而消耗。歇業中的工場的生產工具與手段雖是極少的，但總是由風化作用或其他原因不斷消耗着。例如鐵生鏽，牆脫皮等等。要完全維持牠，必須加以保護。在前者，不管是由工作的消耗，或由與工作無關的

種種事情的消耗，都是轉入新生產的商品價值裏：資本家賣掉其所生產的商品時，再回到他的腰包來。在後者，消耗部分是不能轉入商品底價值裏去。因為沒有商品可轉。所以價值不能回到資本家的腰包來，而是資本家的直接損失。根據這個實例，很可以看出勞動不僅形成新的價值，而且具有將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所包含的價值，轉入到新生產的商品去的性質。

但我們決不能因此便以為勞動者為了使生產工具與手段的價值轉入到商品裏去，必需支出在形成新價值以上的追加勞動量。勞動者由於形成新的價值，由於在生產上消費生產手段，並不需要支付任何追加勞動，就可以使牠的價值轉入到新商品去。

這是由於當作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看的勞動二重性中發生的。我們已知，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因而同此工人的勞動以抽象勞動的資格創造新的價值，以具體勞動的資格使生產手段底價值轉入到新製成的商品上去。

「假使勞動者底特殊生產勞動不是紡織——馬克思說——那末他就不會使棉花轉化為棉紗，所以就不會使棉花和紡錘底價值轉入到棉紗去。反之，假使這同一勞動者改了職業而做木匠，那末，他仍然會因一天的勞動而把價值轉入到材料上去。換言之，他並不是把紡績勞動或木匠勞動這種具體勞動加到價值上去，而是把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加到價值上去……。」

因此，紡績的勞動，用一般的抽象的資格，即當作人類勞動之支出，而把新價值添加到棉花及紡錘底價值上去；以紡績過程這種具體的，特殊的，有用的資格，把這些生產手段底價值轉入生產物上，因此保存牠的價值於生產物中。」

（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

總之，生產手段底價值由勞動轉入到製成的商品上去，但這個被轉移到商品上去的價值仍和先前一樣，並未變化，當機器消耗終結時，轉入製成的商品之價值，恰與體現於機器中的價值相等，不會多也不會少。

但勞動力則與此不同。勞動力不僅常常促使生產手段底價值轉入商品，且更造成新的價值。這個價值還可以分成兩部分。即這個新價值底一部分是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之再生產，他一部分是作成資本家底純利益之剩餘價值。

在此兩個資本部分間——一方面是生產手段的價值，他方面是勞動力的價值——之差異是很明顯的。

〔轉化做生產手段，即轉化做原料，助成材料，勞動手段的資本部分，在生產過程上其價值並不變動。所以我稱之為不變的資本部分，或簡稱之為不變資本。〕

相反地，轉化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在生產過程上其價值變化的。牠不僅再生產自己的等價，同時更生產超過部分底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能夠自己變化，也能大也能小。這個資本部分是不斷地從不變量轉化到可變量去。所以我們稱之為可變的資本部分，或簡稱之為可變量本。〕（資本論，第一卷，一四五頁）。

第六十一節 榨取率

雖然，不變資本是形成剩餘價值的必要條件，但其自身並不能形

成剩餘價值。形成剩餘價值的只有勞動。所以不變資本總額無論怎樣大，都絲毫不能變更剩餘價值的總額。因此，在決定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程度時，我們可以不管資本家投下多少不變資本，但我們必需知道：第一，勞動者爲了補償其勞動力底價值，從其勞動所形成的生產物價值上，得到多少；第二，資本家以剩餘價值底形式而得到多少。

榨取勞動者的程度，可以用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底價值即可變資本這二個量的比率(換言之，即剩餘勞動時間與必要勞動時間之比率)表示出來。

用百分率表示的這個比率，稱爲剩餘價值率，或剝削率。剩餘價值率是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程度之嚴密指標。

試舉以明之。

某資本主義企業的機器和建築之價值是五千元，原料和助成材料是一千元，勞動力底價值(即工資)是二千元，而剩餘價值是一千元。按照這個例，我們用 C 代表不變資本，用 V 代表可變資本，用 m 代表剩餘價值，可以得到下面的公式：

$$C = 5000 \text{ 元} + 1000 \text{ 元} = 6000 \text{ 元}$$

$$V = 2000 \text{ 元}$$

$$m = 1000 \text{ 元}$$

用母字來表示這個榨取率是 $\frac{m}{V}$ 按照上面的數字來表示即 $\frac{1000}{2000}$

，用百分率來表示的話，就是 $\frac{m}{V} = \frac{1000 \times 100\%}{2000} = 50\%$ 。

這就是說，勞動者必須補償其勞動力底價值，而在工作中的每一小時上，要算上爲資本家製造剩餘價值的半小時。 m 與 V 不變的時候，無論資本家是用貴的或賤的生產手段，榨取率當然都照舊不變。

榨取率或剩餘價值率，可以按其生產物中的比例量表示出來。假

定九千圓底價值體現於九百公尺的布上，那末，不變資本可以體現六百公尺布，可變資本可以體現二百公尺布，剩餘價值可以體現一百公尺布。

生產物比例量所表示的剩餘價值率或榨取率，是等於 $\frac{m}{V} = \frac{100}{200} = 50\% = 5\%$ 。

在伊里奇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很容易懂的例解。根據一九〇八年俄國工場底調查所得的統計資料的分析，關於工資與利潤之互相關係的問題，伊里奇曾得到下面那樣的結論。

『每個勞動者一年平均得到二百四十六盧布底工資，而每年給資本家形成二百五十二盧布底利潤。

所以勞動者在一天之中，爲自己勞動是用半天以下的時間，爲資本家勞動是用半天以上的時間。假定平均勞動日爲十一小時，勞動者在全部中只能得到五小時半的部分，不，只能得到比五小時半更少的部分。剩餘的五小時半，勞動者無任何代價，沒有任何報酬而勞動着，勞動者在這半天所作的東西，完全形成資本家底利潤』，（伊里奇全集，第十六卷，九五頁）。

第六十二節 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資本論之批判

古典派的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之代表，亞當斯密士與大衛李嘉圖均達到了這一點：生產品價值的一部份由工人造成且毫無代價地爲資本家所得。

例如，斯密士說：『在所有手工業與生產中大部份工人皆仰給於經濟人，這種經濟人在工人完工以前預付工人以爲工人所加工的物材，工資與生活資料。這種經濟人取得工人勞動的生產品之一部份或由

勞動增添到爲工人所加工的物材上去的價值的一部份；這一部份組成了經濟人底利潤』斯密士，國民財富的特性與原因之研究，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俄譯本，七三頁）。

次之，斯密士說，由工人增添到原料物材上去的價值分爲二部份：其中一部份爲工人的工資；他部份則組成企業家底利潤。

然而古典派是不能解決剩餘價值問題的，因他們混同了勞動力與勞動。事實上，如承認，勞動創造價值，且以這種觀點看去，工人賣給資本家的是他底勞動而非勞動力，那就不能說明，爲資本家所支付過的活勞動的價值，爲什麼往往少於爲這些勞動所造成且提供資本家的生產品的價值。以較少勞動量而造成較大的價值，這就對立着勞動價值論。古典派由於其布爾喬亞的限制性，是不能解決這個矛盾的。能成功地解決這個矛盾者祇有馬克思，他嚴格的把勞動的範疇與勞動力的範疇區別開來，且指出，資本家購買且支付的不是工人底勞動，而祇是其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在勞動生產性之特定水準上能創造比其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

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終算近似——雖不徹底——關於資本主義剝削本質問題之正確的解決。而俗流派的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註）則不會提起類此的任務。剛相反，他的目的是蒙蔽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

註：馬克思稱這樣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爲流俗經濟學家，他們與古典派不同，甚至不想深研資本主義生產之內在規律性且限於經濟現象之外表的考察，且於資本主義生產之辯護人的精神上從事粉飾與歌頌資本主義制。

因有這一目的，「生產的功績」論——其發源者是當時的賽——直到現在尚極廣佈於資本主義的布爾喬亞辯護者間。

依這個理論，在價值與「新財富」的創造中有參加生產過程的三種因素——土地，資本與勞動——同等地參加着。所以工人——勞動的代表，資本家——資本的所有者與土地的所有者互相表示出「生產的功績」，因而應共同參加收入的分配：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資本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工資。

然而我們已知，土地與生產手段只是為造成價值所必需的條件。價值是由勞動造成的，而剩餘價值的源泉則是工人的剩餘時間。否定了這一點，生產的功績論企圖證明，無論資本家，無論土地所有者均不曾剝削工人，他們各自所獲得的部份皆適應於其參加生產中的部份。

企圖由流通過程出發去說明資本家之利潤的理論，更為布爾喬亞的理論家所利用所廣佈。類此的俗流——強辯的理論之不正確，我們從以前，在考察關於單純商品流通形態與資本主義的流通形態的問題時，曾証實過了。

社會—民生派的剩餘價值論是建立在交換的論調上的，他們把這論調引入政治經濟學中而與「土地，資本，勞動」的生產功績論相結合。對於馬克思，問題的中心在乎剩餘價值生產的說明，同時，對於社會—民主派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著者——奈爾丁兄弟，中心點在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生產物普通往往按照價格——結果大於包含其中的勞動——而實現，這是怎樣進行」的說明，實現中（奈爾丁兄弟，經濟理論引論（德文本），一〇九頁，參看克恩，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之破產，「布爾雪維克」雜誌二九；——年第三期，五二頁）。

他們於這種精神上，下剩餘價值的定義：

「當——他們說——以某種轉移機把工作者底勞動結果之全部或一部轉移到不工作者的手中時，我們就看到剩餘價值了」（註書，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之破產，五一頁）。

依他們底理論，一切問題全在乎轉移機——市場，交換。所以開展於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被社會——民主派歸結為分配的部份，而非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消滅而鬥爭。

『在現代社會中表現出的嚴肅的階級鬥爭——另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伯樂五泰說——第一是為社會生產品的分配而鬥爭，第二，與此相聯繫地在我們面前提出經濟組織的問題』。

把在布爾喬亞與無產者間的矛盾歸結到分配的範圍，社會——民主派遂宣傳着在生產範圍中的利益調和。

『不能分配得比已生產出的更多的東西——伯樂五泰說——生產出的愈多，才能分配得愈多。所以，毫無疑義地，工人的利益在乎盡量提高生產性』。

在其著作中肅清了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其資本的定義中遂完全處在布爾喬亞的立場上了。

『在國民經濟意義上的資本——奈爾丁兄弟說——……不外是現存於某經濟社會中的供給的或生產的財富……鐵匠底鎚，書記底筆，以及有幾十萬匹馬力的機器，都可以說是資本』（經濟理論的引論，德文本，四九頁）。

類此的定義，我們又可於有害者金茨堡處看到。『資本——他說——不外是為將來的生產所需要的積蓄勞動』。

企圖以交換的外表去解決剩餘價值問題，根本是不正確的，因為，如我們所知，交換為生產所決定，並非交換決定生產的。為社會——民主派所下的且歸結到「轉移機」，即歸結到交換的，剩餘價值的定義，忽視了剩餘價值被創造於生產過程中的這種事實。在交換過程中，僅能再分配剩餘價值，暫時使某資本家因取償別個資本家而有利，但任何階級均不能因這再分配的方法而存在。所以在布爾喬亞與無產者

間的鬥爭不能引申為在分配體系中的稍許改良而鬥爭，且當為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本身而鬥爭。況且為社會——民主派所說的為工人階級底地位稍許改良而鬥爭，他們口頭上盡管那麼說，事實上却不那樣做。他方面，把資本機械地引申到物的財富，勞動工具等等的社會——民主派把他轉化為蒙蔽資本主義剝削之特徵的超歷史的範疇。

所以，我們看到，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之最重要問題——在剩餘價值問題上，社會——民主派不但完全與馬克思相背離，且不如古典派，而陷在俗流——強辯論之深淵中了。

在我們底經濟學文獻中宣傳社會——民主派的理論者是有害者，少數派，魯平。

魯平戴上假面具表演着，他所使用的第一種方法——冒充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魯平以為在說明政治經濟學之基礎時，可以完全略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剩餘價值，而直接由價值推演到生產價格。

但事情還不限於冒充。魯平——孟雪維克直接曲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勞動力——他說——體現出在工人與資本家間的生產關係，經過『物』的交換（貨幣與勞動力交換）把他們聯繫起來。勞動力表現為商物，『物』，其支配權由這個私有者，工人，轉為別個私有者——資本家，由這一轉變造成了在他們間的生產關係。勞動力是在資本家與工人間——在二個獨立的商品所有者間的生產關係之『物的』或『物化的』體現（魯平——馬克思的價值論概要，一九二八年版，一一二頁）。

總之，依魯平，在工人與資本家間的生產關係，第一，由『經過物的交換』而形成，第二，是『在二個獨立的商品所有者間的』生產關係。

這裡，魯平以更巧妙的形式發揮了，把剩餘價值歸結到交換關係

的分配關係的，如我們所已知的社會—民主派的觀念。把工人與資本當作平等的商品所有者，魯平遂蒙蔽了且掩滿了這種剝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潛伏在形式上平等的外表之下的極深刻的的不平等。本質上，馬克思勞動力價值論之魯平的「解釋」不外是在馬克思「解釋」的旗幟之下開揚我們上面曾說起的俗流經濟學家賽的生產——續論。

最後，魯平又把剩餘價值的範疇瞭解作觀念的非物質的範疇。依他底意見，剩餘價值是「社會的關係」而非「物質的物」。在該種情形下，完全可以引用伊里奇反對布加考夫對於剩餘價值論之類此觀念論之修正時所說的話。「把物質的物」與「概念」相對立起來——伊里奇這是煩瑣哲學的顯明的榜樣。目下很有人歡喜在「批判」形態之下而宣揚牠。假使這個概念並不是適應於特定「物質的物」，那末，關於社會生產品分配的「概念」有什麼意義呢？剩餘價值是由特定部份的呢，棉花，五穀及所有其他商品所組成的剩餘生產品之貨幣的等價』（全集，第四卷，一九六頁）。

魯平所主張的經濟思想在乎：使勞資的關係成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間之和平友愛的關係，使資本主義沒有矛盾，因而把剩餘價值由生產轉移到交換中去——一言以蔽之，蒙蔽，掩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不可調和的抗衡，且以此給其有害的實踐造成理論的武器。

第六十三節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中 剝削之不存在

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之發展的形式，其特點為；第一，獨占生產手段底資本家階級之存在，第二，喪失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的勞動者之存在。資本主義的剝削於剩

餘價值中找到其特殊的體現者。

那末：在蘇聯國營企業裏以剩餘價值為特徵的這一切表徵，是否存在呢？

除外我們蘇聯經濟體系的一般特徵，是不能解決我們國營企業底社會—經濟特性的問題的。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有國營企業皆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因政權操在布爾喬亞的手中且國家就是『布爾喬亞分贓的委員會』，而在企業上的關係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在蘇聯，掌握政權的是勞動階級，我們的國家是勞動階級底國家。因此我們的國營企業，是屬於勞動階級全體的。

因此在我們的國營企業裏，完全沒有作剩餘價值之根本特徵的獨佔生產手段底資本家之存在。

而作第二個表徵的勞動階級怎樣呢？我們的國營企業底勞動者，並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勞動者。我們應明白，自勞動階級，把一切生產手段，大工業，土地，運輸等等皆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時候起，自這時候起普羅勒達里亞，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直接意義中的普羅勒達里亞。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普羅勒達里亞喪失一切生產工具因而套上了布爾喬亞的榨取鎖鏈。……自傾覆布爾喬亞的政權且奪得生產手段的時候起，勞動階級在國家裏乃變成統治的勢力。』（莫洛托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

蘇聯的勞動階級，並未與生產手段分開，因之，在我們國營企業裏工作的勞動者，並不是工資勞動者。他們並不是在資本家所有的企業裏勞動，而是在勞動階級所有的企業裏勞動，即在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裏勞動。所以在我們底社會主義經濟裏，（當作商品底勞動力）這一範疇並不存在。

假使在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成份上，沒有資本家，勞動力又不喪

現為商品，當然沒有討論剩餘價值，資本，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底各種範疇的餘地，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却把我們的勞動者不能完全得到自己勞動生產物這一事實，認為是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之榨取勞動者。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把認為社會主義之特徵在乎給勞動者以其勞動全部生產物這種見解評擊得粉碎了。

他說：『顧名思義就算「勞動的收入」是真正他所生產出的生產物，那末，集體勞動的收入乃是社會生產物的總和。

其中應當拿出去的部份是：

第一、被消費了的生產手段之補充部份：

第二、擴張生產所需要的添加部份：

第三、豫防各種災害，天災等之破壞生產的豫備金，或保險金。

總生產的餘下部份，便拿來做消費資料。

但是進行各人的分配以前，還有應該抽去的部份：

一、不屬於生產的一般行政費。

這一部份不用說也許比目前的社會所需要的少得多。而其減少隨着社會發達的程度而進展。

二、為滿足社會慾望，如學校，療養所，衛生設施等等的部份。

這一部份，不用說比目前的社會所需要的多得多。而其增加，隨着社會發展的程度而進展。

三、不能勞動者的扶養基金，即目前社會之所謂貧民救助費。

然後才開始分配。即此後才開始分配消費資料給組合社會內的各生產者』（馬克斯，哥達綱領批判，一九三三年俄譯本二三——二四頁）。

所以即在共產主義下，社會生產物也並不是完全分配社會成員以滿足各個人的慾望。還要拿相當部份去擴張生產和滿足社會的需要。

但不能因此便武斷地說這是榨取，因為，結局，『當作個人的生產者所失掉的，還會直接間接回到當作社會成員底他的手裏去。』（前書，二五頁）。

同時，資本主義的分割勞動日，如必要時間與剩餘時間，在蘇聯也已失掉其意義了。

馬克思說：『剷除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時，勞動日會縮短到必要勞動之水準去。或其他事情沒有變化時，必要勞動本身底範圍會擴大。因為一方面，勞動者底生活條件擴充而生活上之要求提高。他方面，今日的剩餘勞動的部分會變成作社會底準備金和蓄積基金的必要勞動，在這種意味上，可以視他為必要勞動。（這種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的準備，是擴大生產，尤其是補償因災害而受到的損失的生產手段，或生活資料之準備）』（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

在我們社會主義成份裏所能看到的，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分割勞動日為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並不是把社會生產物底價值分割為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而是擴大再生產的基金和消費基金，而且在這一消費基金中，一部分拿來滿足社會的需要，另一部分拿來滿足個人的慾望。

這種分割，是從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成份裏所能看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牠以共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的本質發生的。

昂格思說：『生產物最初征服生產者，其次便征服其自己的佔有者的這種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為根據現代生產手段本身性質的佔有方式所代替：即為一方面社會直接佔有維持及擴張生產的手段，他方面，個人直接佔有生存和繁殖的手段』（恩格斯：反社林論201頁）

分割為擴張再生產底基金和個人底消費基金，從再生產底見地上看來具有很大的意義。伊里奇給布哈林轉形期底經濟所下的評註裏，有如下的指示，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即，分割為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生產生產手段底部門，與社會生產第二部門的生產消費資料底部門間的比例這一問題，對共產主義社會也具有很大的意義。

蘇聯的勞動階級與勤勞者，都極關心擴大再生產基金和個人消費基金之迅速增大。爲了加速增大個人消費基金，必需更加速地增大擴大再生產基金，而其決定的條件，是勞動生產性的向上。由此可以明白俾殺象奧諾維支同志所說的在現階級上的提高勞動生產性之主要方法與社會主義建設之具體綱領的重要意義。後面，我們將詳細來研究這個問題。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我們集體農場內的生產關係。

我們的集體農場底性質，離開了普羅勒達里亞專政，離開了蘇維埃經濟之一般體系便不能理解。集體農場只有在普羅勒達里亞專政下，只有在蘇維埃經濟的條件下，才是社會主義底經濟形態，反之，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任何集體企業雖然牠不是資本家創立，而是小有產者創立的，也不可避免地會變成資本主義企業。

伊里奇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毫無疑義地，合作社是集體的資本主義機關……。在私人資本主義裏，合作社的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間的區別，等於集團企業與私人企業的區別。在國家資本主義裏，合作社的企業，第一，當作私有企業，第二，當作集團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有區別。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之下，合作社的企業當作集團企業和私有資本主義企業有區別，如果牠建築在隸屬於國家，即隸屬於勞動階級的基礎上的土地，生產手段，那末，便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全集，第二七卷，395—396頁）。

集體農場底生產手段，根本上是集體財產。這是在普羅勒達利亞國家，即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土地上組織起來的。在集體農場裏，基本的生產手段都被社會化了，並不是各個集體農場員底財產，而是集體農場底財產。在此完全沒有佔有生產手段底剝削者，和喪失生產手段的被剝削者之劃分。

以這一事實為根據，我們可以把集體農場認為社會主義底企業類型。

『經濟類型由什麼來決定的呢？當然由在生產過程上的人類底關係——俾殺與奧諾維支同志說——經濟類型能以別的東西來決定麼？難道在集體農場中有佔有生產手段的階級與喪失生產手段的階級麼？難道在集體農場中還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麼？集體農場，難道不是表現於屬於國家的土地上的主要生產手段之社會化麼？有什麼理由說為經濟類型之一的集體農場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之一？』（伊里奇主義問題，四五四頁）

不過，如果把集體農場，看成國營企業或國營農場那樣的徹底社會主義企業，那末，即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那末二者底差別是什麼呢？

在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裏，其生產手段是屬於國家所有，換言之是屬於勞動階級全體所有。但集體農場，其生產手段並不是屬於國家，而是屬於一定的集體農場或集體農場底整個成員。但這已不是私有權而是集體所有的形式。同時，這所有的形態想轉化為我們於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中所看到的那種社會的所有權，還應通過特定發展的過程。另一方面，在其發展之現階段上的集體農場，除掉基本的生產手段之為集團所有外，同時又保持着不重要的生產手段之私有權。總之，集體農場與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不同，生產手段尚未完全社

會化。

至於說到在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鬥爭，那末，毫無疑義地在集體農場內保持着階級鬥爭的因素，因尚保持着資本主義的殘習。為經濟組織之社會主義形態的集體農場，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之下，能表示出而且已表示着經濟建設之奇蹟。然而如無共產主義的領導，他們能一時成為反革命行動的掩護者，所以最主要的任務為黨藉助無產者而施行的集體農場之布爾雪維克化。因此在^集體農場內雖有階級鬥爭的因素，但無論如何不能與集體農場以外的階級鬥爭相混同。

集體農場的布爾雪維克化，牠們的組織，經濟之穩固，所有集體農場員皆變為富有者——這就是由目前為集體農場之主要形式的亞特耳轉化為公社——依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說，這是『在更發展的技術與更發達的亞特耳基礎上，在生產品富裕的基礎上發生出來的』（第十七次黨大會記錄，二九頁）——的道路

這是非常明白的，因在集體農場內我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當然談不到剩餘價值和資本等等。

至於說到個人農民的經濟，我們就可於其中找出單純商品經濟底主要關係，但在無產者專政領導之下，這會通過強大的集體化與肅清富農階級而發展到大的社會化的集體農場的經濟。因此，剩餘價值這種資本主義的範疇，在此不能適用。

最後因為我國有些地方還存在資本主義份子的殘餘，所以在那裏還有資本主義剝削殘餘之存在。但蘇聯經濟的特徵在乎，資本主義因素不但不是我國之統治的因素，剛相反，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法則之一，是驅逐資本主義成份，和肅清富農階級。所以資本主義底各種關係及因資本主義而發生的各種範疇，不獨以後得不到任何發展，且將很快地趨於滅亡。

社會—民主派企圖證明：蘇維埃的經濟體系是國家資本主義底體系，蘇聯國營企業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

例如巴威爾稱蘇維埃經濟體系爲『國家資本主義的獨裁』。惡意地咀咒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公開地主張干涉的考茨基說，在我們國內進行着的『所有權改變了』——這『無論怎樣叫都可以，然而偏不是社會主義』。

在關於我們國營企業之特性的問題上，社會—民主派找到其忠實的承繼者——托洛茨基—氏諾維夫的反對派，他們把我們底企業瞭解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而非如伊里奇那樣把牠瞭解作徹底社會主義的企業。例如，加孟熱夫說，在我們國家幣制中所有權的關係是社會主義的，而生產關係則是資本主義的，梭可耳尼可夫說，我們底對外貿易，國家銀行，貨幣制度均採取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則。加孟熱夫與梭可耳尼可夫均不瞭解生產者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這是決定生產關係之特徵的決定的符號。

『試以國營生產爲例——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說——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麼？不，不是的。爲什麼？因爲在這裏並無二個階級，只有一個階級，工人階級，他們握有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且不被剝削，而由企業中取得最高限度的工資。產業愈發達，則全體工人階級的地位愈改良』（第十七次黨大會記錄，三十一頁）。

托洛茨基主義在其目下的形態上完全處在社會——民主派的立場上了。其評價我們經濟的特性也如此。

第十三章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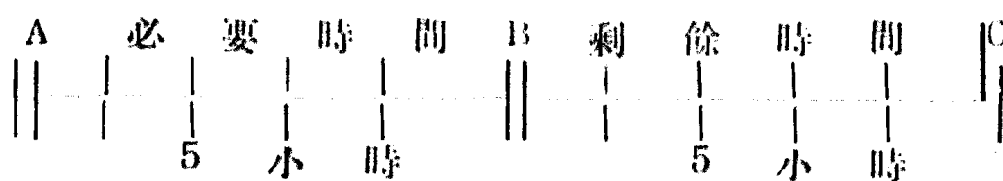
第六十四節 絕對剩餘價值 動勞日與其界限

剩餘價值的生產與佔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運動與發展的刺激物

無厭地追求利潤的資本家爲盡量強制剝削勞動者而加強由勞動者榨取得剩餘價值而尋求一切手段。

在資本支配生產的初期，並未改變生產技術。所以資本用以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延長勞動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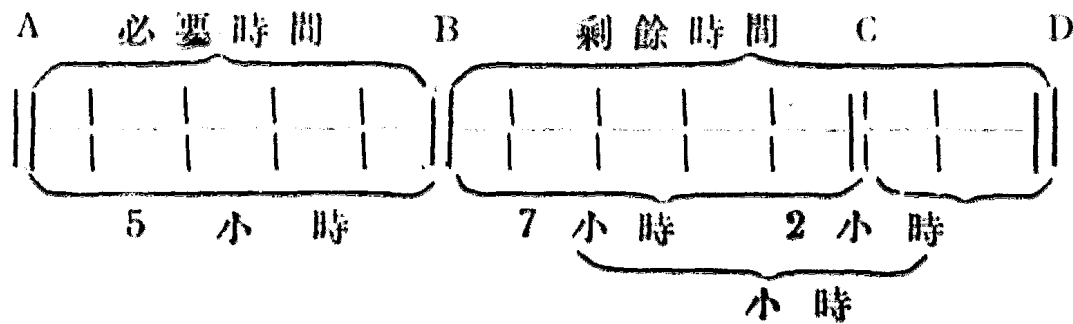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勞動日可以分爲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必要時間，勞動者在這時間內再生產其勞動力的價值，第二部分是剩餘時間，在這時間內，勞動者爲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茲圖示如次：



這裏，剩餘價值率等於 $5/5$ ，或百分之百。

那末，剩餘價值率要怎樣才能增大呢？首先，牠可以延長動勞日的方法以增加之。拿上面的例說來，即十小時以後，譬如再增加二小時，以增大之。

資本家可以延長勞動日的方法——例如，在上例中勞動日由十小時延長到十二小時——而增大為他所得的剩餘價值。



這時候。剩餘時間延長至七小時，剩餘價值率等於 $7/5$ 或百分之一百四十。

延長勞動日，資本家以勞動者在全日中所支出的勞動之絕對增加的方法——不管勞動力的價值大小如何——而增加為他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例如，在上圖中，剩餘價值因全日延長而增大；必需的勞動時間 (AB) 仍和原先一樣。

由勞動日之絕對的延長而得到的剩餘價值，馬克思稱之為絕對剩餘價值。

勞動者應提供其動勞給資本家使用的勞動日之界限是如何？

勞動日底最低限度，是不能確定的。可以把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所必需的時間認作最低限度。但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勞動日決不會低於這限度，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目的是由剩餘時間所造成的剩餘價值。

最高限度，首先由勞動者底體力去決定。勞動者支出其勞動力大概有一定的限度，整天工作二十四小時，肉體上實在不可能，休息，睡眠，進食，總得費相當時間。此外，「勞動日的延長還有某種道德的限制：勞動者為滿足各種智識的與社會的慾望——其範圍與量，由一般文化狀態去決定——需要一定的時間，」（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不過，這些界限，伸縮性極大。資本家努力把勞動日的這種界限延長到勞動力之物理的界限去。

太長的勞動日，榨盡了勞動者的一切精力，奪去了勞動者能藉以提高其文化水準，自行向上發展，參加社會工作和政治運動的一切時間。過長的勞動日又促使工人階級之生理上的衰敗，衰老，死亡，專門職業病態之發展。此外，又阻礙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底技術發展，因為，資本家只能夠從勞動者方面榨取很高的剩餘價值，對技術的改良便不很注意。所以很長的勞動日，通常，幾乎毫無例外地支配着資本主義的曙光期，此時勞動生產性還處在非常低的階段上；直到現在，牠還支配着最落後的國家！長勞動日之不可避免的友伴，各處都是極端殘酷的榨取方法：低的工貨，可悲慘的生存條件，破爛的衣着，污濁的食物，結果為勞動階級之低下的政治與文化的水準，死亡的源泉

資本論第一卷裏，馬克思曾很明顯地說明着勞動日之過度延長所引起的種種結果。（參照第一卷第八章）。他引証的事實，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曙光期的事。

不過，就是現在，我們也還看見，資本家有用增加絕對剩餘價值的方法，即用過度延長勞動日的方法，以提高榨取率的傾向。

例如，在像美國，法國，這種國家中，在許多企業上，勞動日皆延長到十一—十二小時，甚至有長至十五小時的。勞動日之極端的延長我們可於公開的法西斯者專政的國家（德國，意大利，波蘭）中看到。不消說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了，在那裏勞動日真長到極大的限度；例如，在中國，勞動日長到『自日出至日末』；在許多其他的國家中，平均勞動日等於十四小時，而在有些國家的紗織工業中，則長到十八小時。

只有政權操在工人階級手中的蘇聯，才徹底地且不偏不倚地縮減

勞動日。目前在大多數企業中皆實行七小時勞動日。蘇聯的勞動日將隨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勞動生產性之提高而更縮短。

第六十五節 爲勞動日而鬥爭

在資本家與工人間爲勞動日而進行的嚴肅的階級鬥爭充滿了全部資本主義史，由其發生的第一天起至其生存的最末一日，至其滅亡時止。

在初期，資本主義曙光期裏法律以種種方法延長勞動日，強使工人多做工。

這是因爲；第一，剛從生產手段分開的手工業者和剛從土地被強制解放出來，且爲封建家臣解雇放逐的農奴們，不容易馬上習慣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第二，新發生的勞動階級當時還和土地緊密地結合着。而且，在資本主義初期，生產過程，形式上雖然歸屬於資本，然而技術依然在很低的水準上，一切積蓄，一切擴張生產雖然使勞動的需要激增，然而，供給並沒有適應着需要那樣增大。因此，強制新變成的勞動者熟習警察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強制延長勞動日，減低工銀，在資本家看來是必要的。

因此，勞動日最初之標準化，是根據資本的利益的。

這個時期是從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

自大工業發生以來，即十七世紀末葉以來，情形乃根本變更了。資本主義開始飛快的發展了。且資本已經得到用純經濟的方法大大地加強榨取勞動者的可能性。先前在要藉法律之助以延長勞動日的時代，資本家，很明顯的是贊成勞動日之法律的規定的。現在，資本家已

贊成勞動者完全「自由地」出賣其勞動力而資本家便可以不用任何限制而榨取勞動者的完全「自由」了。

但勞動日的延長與無厭的剝削會引起工人階級之有組織的反抗。布爾喬亞政府，隨工人運動之成長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以法律規定勞動日了。

在比其他國家先發展大工業的英國，勞動者最初爭得的是童工八小時，青年工人十二小時，成年工人十五小時半（一八三二年的法律）制的法律制限。其次是一八四四年女工的法律規定，女工勞動日規定為十二小時，禁止夜間勞動等等。

因為女工青年工人和成年男工緊密的結合着，所以，在許多生產部門上，成年男工的勞動日也開始規定為十二小時。馬克思說，「因此，在一八四四——一八四七年的時期內，十二小時勞動日。將其一般的平等的作用普及於根據工場立法的一切產業部門。

一八四八年，青年工人和女工的勞動力規定為十小時。

當然，這些規定，都是經過激烈地反對資本家鬥爭以後才頒布的。布爾喬亞國家，為勞動階級所威脅，採取這些法律以後，資本家在他們的企業上，或是減低工銀，或是用交替制，或是用法律解釋上的一切詭計，或是直截的不管；以破壞蹂躪這些規定。而且，他們具備着一切可能性。因為政府的官吏，法官律師等都是他們的忠僕，準備着誠心誠意為他們效勞。

不獨這樣，如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的，勞動日之縮短還伴隨着勞動強度之可怕的增進。資本家用盡一切方法，一切完全的體系，想在比從前短少的勞動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

為了立法上規定勞動日的鬥爭，從英國漸次擴張至其他各國。各處的這種鬭爭都是進行於勞動階級方面之偉大的犧牲和資本家方面之

狂熱反抗中。

一八七七年，在巴爾汀摩 (Baltimore) 舉行的全國勞動者大會，曾宣言為「承認美國全土之八小時標準勞動日制」而鬥爭。其後，國際勞動者同盟總會更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鬭爭為世界普羅勒達里亞底任務，為「解放勞動階級之預備條件。」此後，為獲得八小時勞動日的鬥爭日益增大，擴張至一切資本主義國家。

在世界帝國主義者大戰後的初年，那時強化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最重要的資本主義諸國的布爾喬亞，被迫而同意八小時工作制，這是在華盛頓舉行的特別國際會議所承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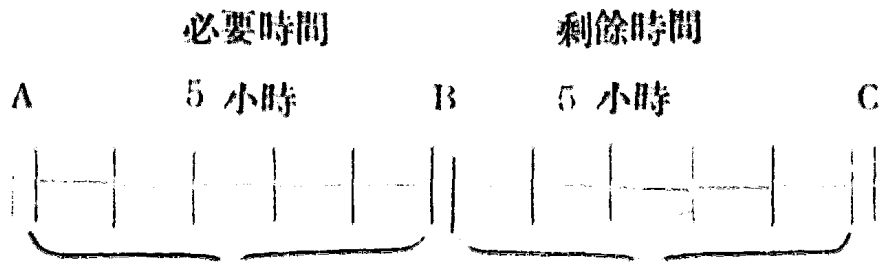
但隨着資本主義之部局鞏固(穩定)之實現，布爾喬亞又對勞動日進攻了，華盛頓條約遂變成廢紙；許多國家(意大利，法國，波蘭，)且以法律規定勞動日之延長。

如我們在後面將看到的似的，近幾年來，布爾喬亞對於勞動日進攻更加強了。此時，布爾喬亞利用一切力量以加強剝削工人階級而避免世界經濟的恐慌。

第六十六節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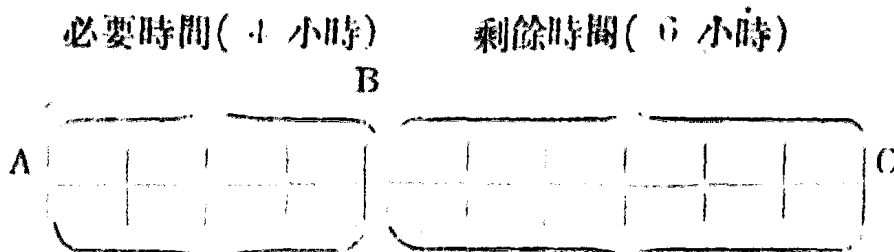
我們已知道，勞動日的延長，同時要遇到一定的界限，即物理的、道德的界限，尤其是勞動者的反抗。

這一切，以及競爭，迫使資本家不得不找尋可藉以增大榨取勞動者剩餘價值量的其他方策。然則，除延長勞動日外，還能有別的什麼方法呢？再來看看表示勞動日的上面的圖式吧！



剩餘價值率是 m/v 或 $5/5$ ，即百分之百。

要增大這剩餘價值率，把剩餘時間向C方面延長固然可以，而把必要時間(A1)縮短也可以。譬如資本家把AE縮短至四小時。



很明顯地，AC(勞動日一般的長度)雖依然沒有改變，而剩餘時間則已增至六小時了。因為縮短了必要時間遂增大剩餘時間與剩餘價值率：牠增至 $6/4$ ，即增至百分之一百五十。

『由於延長勞動日而生產成的剩餘價值——馬克思說——我叫牠做絕對剩餘價值。反之由必要勞動時間之縮短和因之而發生的勞動的兩部分間相對的量的比率之相應地變化而發生的剩餘價值，我稱之為相對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十章)

那末，資本家怎樣可以增大相對剩餘價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呢？

要記住的是：暫時，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從資本家把勞動力按照其完全價值支付即按照為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消費資料的價值——雖說實際上其支付是低於這價值的——這一前提出發的。因此，由在價值以下支付勞動力而縮短必要時間的可能性，我們暫時把牠完全置之度外，在這種條件之下，必要勞動時間之縮短，只要減低勞動

力底價值本身才可能。而這是由減低勞動者底生活資料——食物，衣服，鞋襪等等底價值構成的。可是，消費資料底價值，只有在生產牠們時支出比以前更少勞動量的時候，才能減低；而這，只有在勞動生產性之增進這一條件之下才可能。

勞動生產性之增進，和勞動強底之增大不同，並不是由增大勞動者底勞動支出去達到，而是由勞動條件之變化去達到，即由新機械之採用，機械配置之改善，多餘的不合目的底運動之排除，光線通風之改良等等去達到。因為這一切進步和改良，勞動者可以支出少量的勞動而生產更多的商品。

但相對剩餘價值首先須在生產勞動者底消費資料的部門，或生產這些部門底生產手段的部門裏，勞動生產性已增進了的條件下，才能增大。

結果，生活資料的價值乃低落了，勞動力底價值也低落，由此，而剩餘價值乃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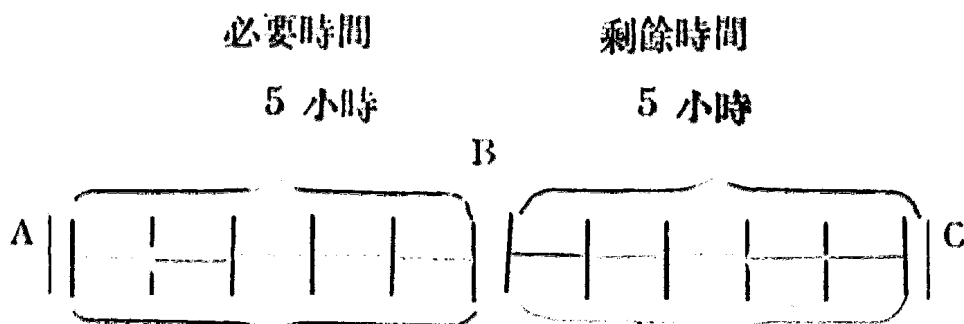
顯然，相對剩餘價值之這種增大，只有在勞動條件底變化（新機械的採用等）不是別的現象，而是普及於一般，反映於該產業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上的時候，才可能。

但是，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大並不是只有在技術的改良（一般地勞動條件的變化）普及於全般的時候才可能。在改良還沒有普及於全般，某企業的勞動之個別生產性超過為那一產業部門所擁有的生產之社會必要水準以上的時候，勞動生產性之增進更為有利。因為個別企業之勞動生產性增進了，那一企業的生產物之個別價值便比社會的價值低。而在市場上，資本家並不是按照其個別價值賣，而是按照其社會的價值賣的。（這在前面個別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問題上，已經說過了。）商品底社會的價值和個別的價值之差額為這企業所有者，資本

家形成所謂額外的剩餘價值。

不過，這裏會發生出疑問來，現實上，能夠可以把這種情形加進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去嗎？

更深進一層考察起來，我們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剩餘價值生產的增大，也是從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和隨之而增大剩餘勞動時間而發生的。現在，拿一個企業來做例，假定這個企業裏的勞動日，像下面那樣分爲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



更假定，這一企業底勞動生產性和生產之平均社會條件相適應。又假定在某種商品單位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平均的社會必需時間，例如一公尺麻布所需要的平均社會必要時間是三十分鐘。在這種條件之下，十勞動小時應該可以生產二十公尺麻布，現在假定一小時勞動的貨幣表現是一元，那末，一公尺麻布是五角。二十公尺麻布是十元。這十元中，五元用以支付勞動力底價值，五元形成資本家的剩餘價值。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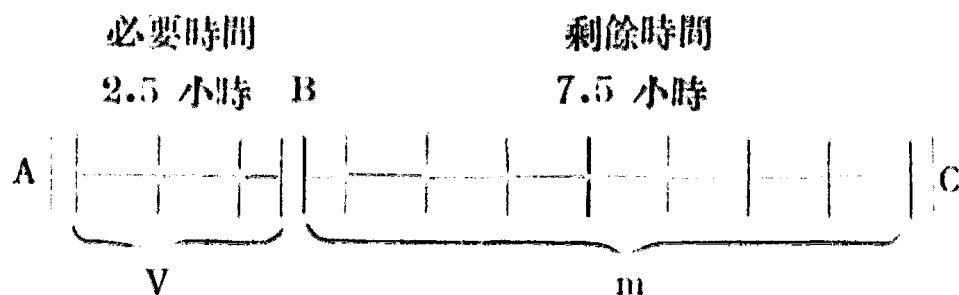
(註)這裏，以及後面，爲求簡單計，我們暫不計及由勞動者的具體勞動

移轉至生產物中去的勞動手段，原料，幫助材料等等的價值。

現在假定，這個企業的勞動生產性，因爲某種技術的改良，提高到二倍，因之，勞動者在十勞動小時內，支出和以前同量的勞動，造出二倍的麻布即不是造出二十公尺，而是造出四十公尺麻布。因此，在這一企業裏所生產的一公尺麻布，不是費三十分鐘的勞動時間而只

費十五分鐘的勞動時間，因此，牠的價格也要從五角降至二角五分。可是，勞動生產性的增進，只限於一個企業時，社會的必要時間依然沒有變更。當然，私有這個企業的資本家，並不是把他的麻布按照每公尺二角五分賣——自其個別價值說來，雖然是二角五分——而是按照每公尺五角賣，四十公尺麻布，要賣二十元。因此，十勞動小時內勞動剝削的結果，在沒有改良技術以前，資本家祇得十元，現在，可得二十元。雖如此，但他給勞動者的還是和從前一樣，只給五元，因為勞動力底價值依然沒有變更。

這即是說，現在，勞動者要生產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已經不用勞動日的一半，而祇用四分之一勞動日，即祇要十勞動小時中之二小時半。茲圖示如次：



榨取率將等於 $\frac{7.5}{2.5}$ 或百分之三百。

這樣，剩餘價值，可以在勞動日不變，勞動強度不變的場合，由變更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之比率而增大。這個事實，便說明着我們這相對剩餘價值的問題。

很明顯地，資本家之所以能夠獲得這種莫大的額外剩餘價值量者，正是因為這種勞動生產性還沒有普及於大部分的工廠。一旦社會一勞動時間減少了，生產品價值減少了，因而額外的剩餘價值也消逝了。

第六十七節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般的基礎。

我們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初期，資本並沒有變更生產的技術，而掌握着生產。可是，從這時候起，勞動日便分爲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勞動者把這剩餘時間替資本家造成剩餘價值而支出。所以這裏，我們以超過必要時間界限的勞動日之延長爲問題，我們在這裏看到了絕對剩餘價值的形態。

然而，在那一技術基礎上掌握生產的資本，不久便開始改革這技術基礎。同時，資本主義便從絕對剩餘價值生產推移至相對剩餘價值生產。

所以絕對剩餘價值是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的出發點。

同時，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又引起絕對剩餘價值之發展。例如，我們看見的，機械之發達，大工業之發展引起勞動時間之過度的延長。

在這種意味上，我們知道剩餘價值兩種形態之某種同一性，而這同一性，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階段上，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時候不平衡地完成於各個生產部門上的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是伴隨着勞動日之延長的。

馬克思說，『以某種觀點看去，在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差別會成爲一般的幻想。相對剩餘價值是絕對地的，因爲牠決定了超過爲勞動者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界限以上的勞動日之絕對的延長。而絕對剩餘價值又是相對地的，因爲牠決定了能限制勞動之必需勞動時間那部份的，勞動生產性之發展』（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

如果由此，作成這樣的結論：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這兩

種形態既然是同一的，故可以忽視存在於這兩者間的極本質的差別，那就錯誤了。馬克思說，「假使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剩餘價值的運動上，則這種同一性的外觀便要消滅了。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日確立且成爲普遍的生產方法，則在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間的差別便可以感覺到，雖所說的是關於剩餘價值率一般之提高。」(上引書)

*

*

*

如我們後面所見似的，資本主義因使技術發達，不僅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性，而且大大地提高勞動強度，即提高其緊張性。假使勞動生產性的提高表示出工人因技術改良而增加生產量，則在勞動強度提高之下，生產量所以增加者，因工人更緊張地工作，在單位時間內，工人支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動。

由此發生問題：在勞動強度提高之下，剩餘價值應歸何種形態？

答覆這個問題：應分二方面來說，有時勞動強度的提高僅在各個企業內，有時則已普遍地一般地提高了。

假設在某企業內，因勞動強度的提高，工人生產出一倍半的生產品，比之在該社會的平均的勞動強度之下的。因社會一必需時間，是由社會一正常的生產條件去決定，而這裡勞動強度與敏捷性的平均水準又和先前一樣，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底勞動強度提高一倍半將等於工人多工作一倍半，比之平均的勞動強度。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強度提高應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但一旦勞動強度的提高普遍了以後，絕對剩餘價值就轉化爲相對剩餘價值，因在此，提高了社會上平均的勞動強度且縮短了社會一必需時間。「假使勞動強度——關於這點，馬克思說——在所有產業部門皆同時且相等地提高了，則強度新提高的程度已是普遍於社會一正

常的水準，因而不能算做增添的量（資本論，第一卷，四〇八頁）

資本家用盡一切方法增大勞動程度：或是用監督者監工，或是處罰一切些小的過失。威迫不行時，便用後面說的一切奸詐詭計和各種各樣的發薪方法以籠絡勞動者。最後，爲使勞動者不能不以最大的緊張去進行工作計而努力組織生產。急速地不斷地運轉着的現代機械，使勞動者一刻也不能休息，因爲不一留意，工作便會發生糾紛，有時連生命也會發生危險！

勞動強度一增加，那末，不管勞動力的價值如何，剩餘價值都要增大。但應指出，勞動強度增大，同時，勞動力的價值也很增大。實際上，一切勞動都是勞動者的筋肉經神之一定量的支出。勞動強度越加強，勞動者便要支出更大的能力（Energy）。筋肉神經等等支出越多，爲勞動力之再生產所需要的生活資料便要越增加。

不過，如我們後面所看到的，通常，勞動力並非按其價值支付，而是低於其價值支付的，工資之落在勞動力價值之後，乃資本主義發展之主要傾向。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發展底三階段 和相對剩餘價值

第六十八節 單純協業

我們已認識剩餘價值的二種形態：絕對剩餘價值的形態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形態。

如我們所知道者然，相對剩餘價值是以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又義勞動生產性提高的結果）的方法，而得到的。研究相對剩餘價值之發展，即是研究在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生產性之發展。

伊里奇說，『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時，馬克思研究了在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生產性提高之三個基本的歷史階段。即：一，單純協業；二，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三，機械和大工業。』（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一八頁）

我們現在應轉而考察上述的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三個階段，同時又研究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之發展。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發生於單純商品經濟——這必然會在大規模上產生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基礎上，發生於封建制度之崩潰的基礎上。最初資本並未變更生產技術而掌握生產過程。這時，資本主義企業和小手工業企業不同的祇是同時隸屬於同一資本下的勞動者數較

多且有計劃地工作着。多數勞動者結合着有計劃地工作着，其中每個工人皆執行同一工作，這叫做單純協業。

光是許多勞動者單純地結合在一塊有計劃地工作這點——雖說生產工具並未改變——便已經形成新的社會生產力；光是單純地集合手工業的原始生產手段這點便已得到莫大的優越，這就會引起「在勞動過程之器材的諸條件上的革新。」

馬克思說，「一中隊騎兵的攻擊力或一聯隊步兵的抵抗力，本質上，和各個騎兵和步兵個別地展開攻擊力與抵抗力之總和不同；同樣，各個勞動者個別地發揮的機械力的總和，和有許多勞動者在同一不可分割的作業上同時共同勞動所展開的社會的力不同。例如舉一重物，旋一重機，或除去途中之大障礙物等……要之，問題是……協業不獨是增進個別的生產品。而且，在其本身上，形成一種新集合力 (Mass enkräft) 的生產品。『(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爲什麼能增進勞動生產性呢？

首先可以這樣來說明之，同時有計劃地共同工作的許多勞動力一結合起來，結果，勞動的機械力乃增大，各人單獨地完全不能執行的工作變成能夠實現的工作。

此外，更有所謂生產之緊急的時候，如處理穀物和棉花等等的工作，要許多人在短期間內共同把那工作幹完，不然，不是生產完全失敗，便最少也要減低工作的成績。

又大批工人共同工作時，因各個勞動者間的競賽而引起的勞動能力奮勉也有很大的意義。

如果許多人在各種生產階段上同時工作，那末，因爲許多人們之單純協業，產生也許要敏速得多。例如建築磚房，如果各個泥水匠各

作一定的工作，全個集團同時包括勞動過程之全階段而分任工作，那末，生產速度必大大的加快。

因協業而得節約生產手段，也有重大的意義。

『二十個職工操縱二十架織機的作業室比一位機械業者用二位職工作業室更大，雖是事實；然而，在二十個職工作業的作業室中所需要的設備，比十個二位職工作業的作業室所需要的設備更少。』（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此外，單純協業還有許多優越性。

伊里奇說，『在手工的原始技術之下，各勞動者間的差異（如力量，機巧，技術等）常常很大：先是因為這樣，小工業家的地位，便變成極不安定；他對於市場變動之依存性採取極困難的形態。假使許多勞動者在一塊工作，則在他們間個人的差異，在作業場中，已被調和了，「同時工作的許多勞動者的總勞動日，其本身便已經是社會的平均勞動日。」因此。資本主義工廠的生產物之生產與銷售，獲得無比得整齊和安定。』（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三〇五一—三〇六頁）

在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裏亦有單純協業。在原始社會，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的社會裡也採用過單純協業。

可是，資本主義的單純協業，按照生產關係的體系，和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協業形態根本不同。

資本主義的協業，按其本質，以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與資本家的工錢勞動者為其主要的先決條件。既然，這裏，許多工人底勞動之結合是由資本家所處理的，所以協業的規模，共同工作的人數，均依存於某資本家的資本之大小，依存於在該資本家所支配之下生產工具與手段之多少，支付工人的手段之多少的。

許多人勞動的集合形成領導的必需，這均化了各個人的動作且執

行了由全體生產之特徵中發生出來的機能。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這領導就成爲資本的機能。但指導許多人共同勞動的資本家，如要盡量由工人榨取得剩餘價值，就以組織他們底勞動爲自己底任務。『資本家的指導——馬克思——不僅是由勞動之社會過程的特性中發生出來且參加後者之組成的機能，牠同時又是剝削這社會勞動過程的機能，而且這是決定於在剝削者與共用以剝削的原料物材間之不可排除的抗衡的。』（資本論，第一卷 第二四八頁）。

要使資本家自身能够在人格上從肉體勞動解放出來且集中其注意力於管理生產，必要某種最少限度的資本量和適應着這資本量的被榨取的勞動力的數量。

生產的更爲社會化，又使，資本家先擺脫指揮生產的事情，把這些事情委託給專門的雇員，後來，如我們所知的，在股份公司的企業形態上，資本家完全切斷了和生產過程的關係，變成純然吃金利的有閒者了。

許多布爾喬亞學者們都想把剩餘價值視爲資本家管理生產這種高級勞動的報酬。

事實上。甚至自行管理企業的資本家，也和代行這種服務的雇員根本不同。馬克思說，『資本家並不是因爲是產業上的指導者所以是資本家；而是因爲是資本家，所以才是產業上的指導者。』（資本論第一卷 第十一章）

他方面，資本家所得到的剩餘價值，決不是和雇員的最高工資額一樣。資本家所得到的剩餘價值，並不是適應着他管理生產的個人勞動，而是適應着他所使用的資本之多寡。

由此可以明白，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理論之『煙幕彈』，他們以蒙蔽，資本主義剝削爲目的，把資本家的收入當作資本家——生產者的勞動

報酬。

資本家之管理生產同時又是榨取勞動者的機能。資本主義生產之主要特徵是勞資間不能排除的抗爭。

同時，因為被僱用的勞動者的人數，是依存於在勞動過程上結合勞動者的資本之大小的，所以，由單純協業所造成的新社會生產力，縱令在現實上這是勞動之協業形態的結果，使資本家不需要什麼代價而可以獲得莫大利益，然而，表面上看來還好像是資本的生產力。

第六十九節 工場手工業

在資本主義下協業發展的結果發生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

〔大家曉得，這工場手工業是基於分工的協業，』(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第二九八頁)

在單純協業之下，我們是以執行相同工作的許多人共同勞動為問題的，而在工場手工業之下，共同工作的工人則執行不同的工作。

工場手工業，歷史上，曾以兩種方法而發生。第一種方法是；資本家把各種專門勞動者，把各種械業的勞動者——這個勞動者祇生產生產物品的一部份——結集於一個大工作場，結合於一個大屋子中。勞動之這種結合的結果，表現為全體完成了的生產物。

為說明工場手工業之這種發生過程，馬克思曾舉出製造四輪馬車的例。(參照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製造一輛四輪馬車，需要車匠，馬具師，裁縫師，鎖鑰工等等。資本家可以把一切專門家統合起來，在一個工作場裏完成一輛四輪車。在這以前，這一切手工業，祇是在各人自己家裏製造四輪馬車的各個部分。要之，在社會分工的一定階段上所

發生的這種工場手工業形態，因其更形發展，遂把牠推移至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去。

第二種方法是資本家把從前的手工業者——這些手工業者並不是生產生產物之一部分，而是生產完成的製品的——統合在他的工作場去。統合起來的勞動之分配，已經必然地要使之推移至發揮極大優越性的勞動者間的分工去。結果，分工過程變成有系統的，而且急速地發展。

工場手工業是從手工業和小商品生產到機械的大工業去的過度形態。

牠和手工業不同，牠是以工銀勞動之榨取，與普遍地採用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大機械工業不同，牠是用手的技術。

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性，且發展了縮短必要時間與延長剩餘時間的新方法。這，因勞動者畢生致力於某部分工作而達到，因勞動者堆積了他獨自的經驗。工場手工業生產全體的生產物，是這各部分作業的成果，工場手工業之全「生產機構」是以部分勞動者為其各器官的一種機構。

把勞動過程分割為細密的部分作業的工場手工業，因而把勞動者所用的各種工具簡單化，把牠們增加和改良；這又異常提高了勞動生產性，使相對剩餘價值增加。

工場手工業，把勞動者一生束縛在某一部分的作業上去，使他變成不完全的畸形者。

「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把精密工和「家內工業者」也包含在內的勞動者變成畸形者。現出專家和畸形者。前者表現為研究者都要驚奇的寶貝；後者現為——手藝非常發達，「和貓脊一樣」胸臆

很狹的大量的「家內工業者」。』（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三三四頁）

伊里奇說，『工場手工業不獨創出專門的地方，而且創出這些地方內部的專門化（商品的分工）』（前書，三三五頁）。

在這點上，工場手工業具有和手工業與大機械工業不同的特徵。

『地域的分業……是工場手工業之特徵的樣相……即小規模的職業沒有作出這種廣大的生產地區。工場打破了那些小規模職業的封鎖性，使建築物 and 勞動者大眾容易移至其他地方。』（同前）

此外，工場手工業又造出加強農業與工業分離之特殊的因素。

伊里奇說，『在這裏，農業和工業之分離，無論在工場手工業的技術上，在其經濟上，在其生活的（或文化的）特性上都有很深的根據。技術把勞動者束縛在一種專門工作上。因此，一方面，使他變成不適用於農業的人（體力衰弱等等），他方面要求他進行無間斷的連續的工作。』（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三三六頁）

工場手工業又大大地深化了且發展了在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矛盾。

在自己的很小的工作場裏用原始的工具工作的手工業者，包辦了某一生產物的全生產過程，雖說是在很狹的範圍內，然而，他總是在各方面發展自己，因而，需要多方面的知識。他是生產過程的指揮者，與其執行者。他沒有把勞動之智的方面和筋肉的方面分開。在工場手工業中就不同了。這裡勞動之智的方面與力的方面分開。即在單純協業裏，管理生產的機能已經是在資本家和領高薪的資本家的助手裏，勞動者方面只剩下筋肉勞動。這種傾向，在工場手工業裏，異常加強了。

馬克思說，「正和野蠻人要把一切兵術當作他的技巧而行使一樣，各自獨立的農民手工業者小規模地展開的知識，判斷，意志，在工

場手工業裏，除對作業場全體以外，已無必要。生產之靈性的動力正因為消失了許多方面，所以能擴大於一個方面。部分勞動者們所失去的東西成爲和他們對立的力，集中於資本之中。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使物質生產過程之靈性的動力對立着工人——他人所有者且成爲支配他們的力量。』（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第七十節 社會的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 分工。各個企業內的生產組織化和全 社會內的生產無政府狀態間之矛盾

社會的分工爲商品經濟的基礎。社會分工的本質，照伊里奇說來，含在這裏：「改製的工業和採取的工業不同，其中任何一種又分爲更小的部門與分門，後者以各種商品的形態生產特殊的生產物，且將這生產物和其他一切生產物相交換。商品經濟之發展，使各個獨立的工業部門的數目增加；這種發展傾向不獨使各個生產物的生產轉化到特殊的工業部門去，連生產品各部分的生產也轉化到特殊的工業部門去；不獨使生產物的生產，連生產物的精製和消費上的各種工作都轉化到特殊的工業部門去。』（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一五頁）

社會分工應和企業內部的分工區別開來。

我們曉得，爲資本主義技術之發展始點的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在置其基礎于企業內部之極複雜的分工這點上，和一切過去的生产型式不同。

發生於工場手工業中的企業的內部分工，其後日益成長與發展。

近代資本主義企業是在各個作業場與工場間具有極複雜的分工體系的複雜組織，在企業內各個勞動者，職員，技術家間具有極複雜的

分工體系的複雜組織。

馬克思像下面那樣的規定社會內部的分工和企業內部分工之差異。

『使飼畜業者，皮革業者和製鞋業者各人的獨立勞動關聯起來的是什麼？那是他們各人的生產物都是商品這一事實。反之，在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特徵是什麼？那是部分勞動者不能生產一般的獨立的商品這一事實。只有各部分勞動者的生產物綜合起來變成一體的時候，才轉化為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為不同的勞動部門的生產物之買賣所限制；在工場手工業內部的部分勞動間的關聯，藉各種勞動力全賣給同一資本家之助而確定。……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以生產手段集積於一個資本家手中這一事實為前提；社會的分業以生產手段分散於許多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間這一事實為前提。在工場手工業內以嚴格的一定比例與關係的鐵則決定了在各種工作間的勞動人數；反之，在商品生產者和其生產手段分配於各種社會勞動部門的場合，則偶然和任意有種種作用……工場內部的分工是一開始便有計劃地遵守着的有規律的分工；社會內部的分工，是要通過市場價格之晴雨計的變動才能夠知道，事後才發生作用，統制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律的意志的是內在盲目的必然性。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是以資本家對其總機構之組成部分的勞動者，有無條件的權力為前提；社會的分工使各個獨立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這些商品生產者除競爭的權力以外，除他們互相間的利害壓迫所生的強制以外，不知道其他任何權力。』（資本論第二卷第十三章）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徵是：「社會分業之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分工之專制。」

本質上不同而直接相對立的這兩者，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互相補充

互相限制而一塊地存在着。

企業內分工之專制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而越成長，則全社會上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也越成長。

關於這，恩格斯說（反杜林論，一九五——一九六頁）：「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現出外面，且採取了更大的規模。同時，資本主義加強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的最重要手段表現為對無政府狀態之直接的對立，這個手段乃是各工業企業內生產之社會的組織之強化。」

至最近止，曾廣行着這種理論，即以爲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是永久的，非歷史的，一切社會機構都共有的範疇。

這種理論，機械論者與觀念論者都贊成。發揮這種觀點的，少數派魯平以爲：經濟學應專研究社會分工，照他的理論看來，這種社會分工被歸結到發生於市場上的諸企業間之關係的，企業內部的分工，即他所謂的技術的分工，不能不是其他科學的對象。由這種理論出發，他下着另外一個結論說，「技術的分工」，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也將存在；而社會分工，在共產主義下，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根本是錯誤的。馬克思說「社會全體的分工，無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爲媒介，在各種社會經濟機構裏都是有的；然而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却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殊產物。」（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和魯平的解釋相反，馬克思認爲社會分工是被任何社會一經濟結構所採取的，而工場手工業內的分工祇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裏特有的東西。在此，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是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的歷史範疇。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的社會分工，無論形態上或在內容上都和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分工根本不同。

尤其曲解馬克思主義者是混同社會分工與在企業間之市場關係；以及把企業內部分工歸結到技術關係。在這種解釋中，忠實於社會

民主派之交換的論調的魯平，否定了社會分工是發生於生產中的；把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關係解釋作技術關係，他又否定其階級性了；他否定馬克思的這一點：企業內部分工基於『資本家對於工人之無條件地的專制』。

工場手工業時期是相對剩餘價值更發展的階段，是在更精練中的榨取之更可怕的強化。在總括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之研究時，馬克思曾像下面那樣與以一般的計價。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一方面為社會經濟發展之歷史的進步與必要的契機；他方面為文明的與精練的榨取工具。』（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 * *

工場手工業根據由分工所得到的生產方法上的變革，把生產力的發展往前推進。可是，基於手工勞動的工場手工業不能變換生產之技術的基礎。因此，在其後來的發展上，牠碰到手工技術和手工勞動形態上的種種障阻。

馬克思說：『工場手工業本身的狹隘的技術基礎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時，變成和工場手工業本身造出的生產上的欲求相矛盾。』（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同時，工場手工業準備了變革生產之技術基礎的一切必要條件。因為，由於把勞動過程分割為一聯串的部分的作業，使勞動工具單純化，多樣化，易於改良，使之適應各部分的作業。因之，製出各種單純器具之結合而發生的機械之先決條件。

第七十一節 機械與大工業

我們知道，工場手工業怎樣準備了機械之出現，即準備了縮短必要時間增大剩餘價值的新手段。

機械之發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上劃一新紀元。

假使『在工場手工業裏，勞動力是生產方法之變革的出發點』那末『在大工業裏，勞動手段是生產方法之變革的出發點。』（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二八〇頁）。

一切機械都由發動機，轉運機和作業機三部分構成。

發動機供給全體機械以動力。轉運機以中間的器具——調帶（Belt）齒輪等等——調整動力，變化動力，將動力傳達於作業機。經運轉機接受必要的動力的作業機，用各種工具進行從前手工勞動者用同樣的工具或器具操作的一切工作。

『假使我們在配置於機械裝置的機器上看到了特殊工作的機器——馬克思說——那末，他們仍看到手工工具，不過規模不同而已。例如鑿孔機的作業機是巨大的錐。這是用蒸汽機關運轉的。如果沒有牠（鑿孔機——拉比杜斯）就不能生產這種大蒸汽機關和水的汽筒。機械旋盤是以前腳踏旋盤的再生；機械鉋是用木匠鉋木時所用同樣的工具以鉋鐵製造的鉋匠；在倫敦製船廠切木的工具是巨大的剃刀；好像用剪刀剪布一樣，剪鐵的剪裁機是巨大的剪刀；汽鎚是以通常的鎚頭來作業的東西。可是這鎚頭非常重……用他來粉碎一塊花崗岩，簡直有點像兒戲，且輕輕地打幾下，就把鐵釘釘入柔軟的木材裏去是一樣的容易。』（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無論轉運機的意義如何大，但在工業革命中有決定意義的是工作機。

機械把生產從人類有機體之精神肉體的特性與限制性中解放出來

馬克思說『勞動者同時所能使用的勞動工具的數目是受其自然的生產工具數目，其身體器管的數目所限制……。同時能紡二根紗的紡紗工人就和有二個頭的人那樣少有……。然而，紡織機械自其出現以來，即能帶12—13紡錠，織襪機則能轉動幾千織襪針等等』（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現代的紡織機則已由幾十幾百而帶幾千紡錠了。爲弱女工所操縱的巨大的起重機，能很容易地提起或移動巨大的鐵塊和其他材料；工場內敷設的鐵道和其他機械的改良能够以比最能幹最精確的勞動者還要更精確更細緻地工作。

機械不獨使人類的筋力變成不必要，而且使手工業者的技術，手藝，精銳的眼力，經過長年月日得來的工作上的熟練變成不必要。許多秤量器獲得了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方式中夢想不到的精確性。

機械的生產，和工場手工業一樣，也是採取協業形態。和工場手工業不同的是，——在工場手工業中，協業是部分勞動者的協業——在機械的生產中，有部分機械的協業。

馬克思把機械的協業分爲二類：即分爲同一種類的許多機械的協業和機械的體系。

『在以機械的生產爲基礎的作業場，即工場裏，常常再現單純的協業。這種協業，第一——關於勞動者方面的事，這裏暫時撇開不談——採取同時共同工作的同種類的各作業機之空間的集合這種形態……。例如，由於在同一建築內設置許多織機而成立機織工場。』（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可是在本意味上的機械體系，是各種不同而互相補充的一聯的業作機所執行的各階段過程上互相關聯的一系列，爲勞動對象所通過

，才代替各個獨立機械位置的體系。這裏，也還是實行基於工場手工業獨特的分工的協業，然而，這協業已呈現為部分工作機械的結合。（上引書）

機械的發達，更使之變成獨立的自動機械，即使之變成不用勞動者之助，而能做一切工作，只要求勞動者管理的自動機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見到自動的機械體系了。

機械的生產，開始發展於工場手工業的基礎上。最初，機械是由在工場手工業的工場裏的勞動者和巧妙的手工業者所生產出來的。

可是，後來，隨着工業的生產方式之日益發展，械機的生產品日益變成與工場手工業的技術衝突，結果，乃開始用械機生產械機。只有自這時候起，大工業，才形成。依馬克思的話說，『大工業才形成完備的技術基礎，才能站得穩。』（前書，二九，頁）。

械機一方面掃蕩了一切橫硬在前面的前於資本主義的技術形態，他方面又逐步佔領資本主義的各生產部門。好象神話似的，以非常的速度日益擴大工場建築和機械的機構，這又引起基於各機械間之（同時表現技術之統一的）細密分工的複雜協業。

機械的技術以各生產過程之科學的研究與調查去代替手工業者當作「家傳秘訣」代代相傳的個人經驗。實驗室成為一切技術的發明和改良的中心。

資本主義的技術發展之最新傾向是以大量生產為特徵，即以各種企業大量製造同樣生產品為特徵。

和這相關聯地就發生了生產標準化問題，尤其最近在美國產業上，更為發展。生產標準化的本質，是在減少所生產的商品之類型。因此，生產不是從滿足消費者個人的趣味這個要求出發，而是以消費大眾為目標，從盡量製造實用的廉價的一種生產物的類型這種要求出發

生產物類型數目的限制，引起了生產的規律化之必需性，即限制製品各部分的類型的數目，不管其種類之異同，例如一個螺旋釘，要使之在各種機械上都可以用。

這一切，引起機械，工作台，器具等必需能夠適應對於生產之狹隘的工作，其專門化的所必要。

『作業器具之發展的重要傾向——魯賓斯坦說——是其專門化。從適合於多種工作的一般的器具，轉化為完全適合於某種一定的任務的工具。勞動過程上之極微妙的陰影引起了與牠相適應的工具……』

與勞動工具專門化同時，又發生牠們的聯絡，……在現代技術的界限內嚴格地聯絡了各種各樣的勞動工具之轉動，同時地或連貫地進行着複雜的生產動作。例如在冶金業中……這是以所謂轉動機很快地去代替勞動工具的方法而達到的』（魯賓斯坦，現代資本主義與勞動組織，二九頁，一九二三年）（版）

這一切，皆引導到：「工人差不多由生產過程排擠出來且僅糾正這些差不多獨立的機械底進程，往往同時。……」

人類勞動之由勞動工具的領域中排擠出來這一點聯絡了現代機械與生產過程之飛快的速率，尤其是與機器和勞動工具之極快轉動的平行的調和與適應」（前書，三十頁）

生產過程本身日益合理化：機器的配置，器具和材料的供給，合理的光線等等，這一切，盡可能的使勞動者不浪費一分一秒的不生產，使勞動者不必因為拿器具拿材料而走動以致浪費時間。

在這種關係上，有特別大作用的是所謂傳送體系，(Conveyer System) 即從這一作業場至另一作業場裝有着許多傳送帶，把工作材料(例如鐵料)運到勞動者面前去的工場內的傳送體系。做好了的物品(

例如車輛)再放在傳送帶上,運到其他工作場,更行加工。(例如把車軸裝在車輪上)等等。不絕地轉動着分配材料,精密地停留一定的時間,要求加工於材料的傳送帶,使勞動者的機能變成不需要什麼熟練的極簡單的工作。這一切,使生產費異常減少,使勞動生產性異常向上。

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上有很大意義的是化學。

馬克思說『化學上的一切進步,不光是增加有用原素的數目,增多已知原素的利用方面,增大資本,擴大資本的投下範圍:化學進步且能够使生產過程上和消費過程上之排泄物循環於再生產過程,使之不用先行投資而造出新資本物質。』(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

自此時起,化學的發達,異常躍進。最近數年間,化學工業較其他一切部門進步得特別快。造成了有系統地提供極重要生產物的許多新生產。化學工業領域上的新發明,引起許多工業部門之滅亡與新部門之勃興,這在各資本家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那是不待說的。

在資本主義諸條件下,助長化學工業發展之最重要的因素是戰爭的準備。

電氣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上,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電氣化使下面這些事情成爲可能:(一)送達動力於極遠的距離;(二)使用極低廉的燃料,即使用泥炭下等煤炭等。(三)因在極遠距離上送電之容易,牠能不依據動力的存在地,而更合理地配置工業;(四)因在燃料豐富之地設發電所,可以不用輸送燃料而送電至遠處,所以非常節省;(五)給勞動造成更衛生的環境;(六)因電力易於傳送與細分,故給極大規模之生產企業,或與給極小規模之生產企業裏,甚至給家庭日常用的電斗,電爐等均能利用牠。然而,電氣技術的意義,還不止於此。牠還異常助長生產的集中,即助長生產集中於少數巨大

的企業。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飛快地發展的電汽技術，目下已形成傳送電力於幾百哩羅米特遠的地方，有可能性。現代的技術已給建築供給法國與德國那麼大的面積的電站造成可能性。

由於中央發電所比較小發電所的優點，遂發現了由幾個中央發電所充分供給電力於任何國家的可能性。這種情勢開闢了空前的生產集中的遠景。

因此，發生了以一個巨大的發電所作有力的中心地，在無限的空間蛛網似地佈滿着無限的電線網，以作偉大的『神經系統』，而造成一國或幾國的單一技術組織的前提條件。

然而，推動技術的發展向前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因為其本身具有的固有矛盾，不能利用現代資本主義的技術所給予的，尤其是電氣化所給予的一切莫大的優越。例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電氣化發展，因為土地和生產手段之私有而被大大地阻碍着。基於私有制原則的許多障壁，使合理地大規模地建設電氣網沒有可能，等等。

只有在蘇聯在土地國有，主要的生產手段已社會化的計劃經濟的條件之下，技術，特別是電氣化才能得到在人類史上空前的更為增長與發展之可能性。

資本主義之利用機械，一點也不是爲了輕易勞動者的勞動。

資本主義技術的進步，不但沒有改善勞動者底地位，而且，剛相反，促進資本家榨取勞動者之空前的強化，人類勞動力之空前的浪費，用機械以勞動的勞動者之空前的奴隸化。

資本家盡可能地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以及在資本家間相互的競爭，是使本資本家改良其企業技術的原因。

不是爲了減輕人類勞動，而是爲了個人利益，——這是資本家探

用新機械與改良技術時所追求的目標。

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進步，往往甚至在其非常興旺時，皆有一定限度的原因，這就是，資本家所以不想把所有的技術改良統統使之實現的原因。如果資本家用在某種新機械的價格超過其所替換的勞動者的勞動力之價值以上時，那末，無論那機械如何精巧，如何可以減輕勞動，資本家也不採用。

試舉例以說明之：假設某種新發明的機械值一千小時的勞動時，為牠所能代用的勞動量是一千二百小時，因此，可以節省二百小時。但，這並不是說對於資本家，機械是有利的；也並不是說資本家便要用那機械。不是資本家支付給勞動者的，並不是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給資本家的勞動；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嗎？所以，他並不注意機器節省下多少勞動，他所注意的問題，只是機械與為機械所代替的勞動力價值對於他孰更經濟這個問題。如果勞動力的價值，換句話說，如果資本家支付工人的能為機械所代替的勞動是六百小時，那末，使用值一千小時的機械，在資本家看來是不會有利的，他將拒而不用，雖然這機械能輕易人類勞動。

『在英國——馬克思說——運河中拉船的工作，有時不用馬去拉而是由女子去拉。因為生產馬或機械所必要的勞動，在數學上是有一定分量的，反之，為過剩人口之一部份的女子維持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是無論怎樣計算都可以的。所以，再沒有別的國家，會比機械之國，會比英國更無耻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濫費人力了。』（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這些話，是馬克思在世時對英國說的。但現在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

因為中國的苦動勞力特別便宜，所以把起重機和其他西式碼頭應

該有的大汽輪的起落貨設備認為無利益。然而，不獨在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就是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我們後面可以看見的，也有許多極貴重的發明，因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之貪婪而被埋沒了！

如後面我們將看到的似的，阻止技術進步的傾向在帝國主義時代表現得更明顯。對於這一點之最顯著的說明是現代世界經濟危機的時期，此時在資本主義諸國出現捨棄資本主義的技術效率，回轉到『刀和鋤』的觀念。當然這種觀念不能阻止在各工業部門，尤其是在與備戰有關聯的工業部門中技術的進步。

由資本主義剝削本質中所發生出來的，阻止技術進步的傾向，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速度，把最繁榮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和蘇聯——在這裏，沒有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發展所設的限制和界限——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對比起來，特別明瞭。在蘇聯，只要能夠保障勞動，能夠減輕人類工作，能夠把勞動從人類的雙肩移到機械的鐵肩，移到銅鐵的筋肉去的，那末，無論任何機械都要採用。

第七十二節 資本主義之發展與榨取之增大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之可驚的進步並沒有把人類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也不能使他們不為『每天的麵包』而憂慮，更不能造成使大部分人類從非人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條件。

此外，技術的進步反使勞動者更受痛苦，加強他們的剝削。

機械技術發展說第一個結果是廣汎的童工和女工之採用。這是因為機械減少人類筋力的作用。

把女工和童工拉進生產去的結果是勞動的價值降低，而榨取率抬

高。事實上，姑以有一妻三兒的某一勞動者來做例吧。從勞動力的價值法則說來，他的工錢應足能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現在，假使他的妻和他的一位兒子也拉進去參加生產，開始獨自找到其生活費。結果，這勞動者從前要養活他的妻和這個兒子的生產費的一部分，現在就截去了。因而，勞動者本身的工錢將比以前低得多。而他的妻兒所得的工錢，不用說，比他所得的更要少。

不獨這樣，因為女工和童工的競爭，使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鬥爭越發困難，且更惡劣了他們的景況。

資本主義技術發的第二個結果，是勞動強度之異常提高

機械之採用，第一先使勞動日延長。我們已經說過，機械，不獨在使用時要損耗，就是在不使用時也要損耗。但只有在使用時牠才能把其自己的價值轉入到生產物去。此外，還要顧慮到所謂機械之『道德的』消耗，即當牠為別的更完善的機械所代替時，牠的壽命雖未告終，就要變成無用的了。

這一切，驅使勞動日無限地延長，採用採班制，夜以繼日，整日二十四小時均在繼續生產着。可是，這種對於榨取勞動的性急的要求，我們曉得，要遇到了勞動者之絕望的反抗的，因此，資本家在勞動者驅迫之下不得不在某個時期內限制且縮短勞動日。但資本家遂傾注其全力於增加勞動強度，以代替延長勞動日的辦法。

強度的提高，是由現代機械的迅速的發展而完成。隨着技術之發展，日益變成機械之附屬物的勞動者不能不把他的勞動的速度與緊張度，合着機械的速度與緊張度；勞動者的注意力達到最高的限度。

現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極快地普及的傳送帶組織，把勞動者變成『連氣也喘不過來地』在整勞動日中不斷的返覆着幾種單調的機械的動作的，一種自動機。他已經不能由自己決定勞動的速度，他應在極

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定的工作。對他最悲慘的是：他一旦疲乏過度手足不能如意工作時，便會妨害了全勞動過程，此後，工場便把他辭退了。

特別引起勞動強度之增大的，是不僅在其發源地美國，而且在歐洲也非常流行的所謂『勞動之科學的組織化』，『產業合理化』。其本質包含在把勞動日之一分一秒都要用在創造剩餘價值的，生產之組織化上。

應指出：這種制度包含着不獨能增大勞動強度，而且能增進勞動生產性的許多方法。除去機械和工具的許多缺陷，適切地配置牠們，使勞動者不必費時間去找工具或材料，使光線和通風的設備都很妥當，——在這種制度下就是不增加勞動強度也可以增加製造額。

但資本家往往企圖以最少的支出而增大其產額。光提高勞動生產性不能使他滿足，因而他以種種方法去策勵勞動者而提高其勞動強度（註一）。

（註一）在這種關係上，有最大作用的是我們在後面工銀篇中所說的支付工錢的種種形式、

例如根據在國際聯盟之下的國際勞動局的統計（註一），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工業部門內，世界經濟恐慌以前的最後幾年間，工人產額的增加，是因下列因素而達到的（數字為百分數）

獎勵的工資制	15	300
不斷連續的工作	40	260
工人動作的合理化	20	700
拋歇(pause)的利用	2.8	33
職業的選擇	10	40
設備的改良	56	159

工人位置安排的改良.....	30	14
企業組織的改良.....		60

所以甚至，像國聯勞動局這種機關的統計，都明確地說明了，每個工人產量的增加主要的是因為勞動強度之提高。根據這些數字，極充分地證明勞動強度已怎樣被提高了：1. 獎勵制由百分之十五增到百分之三百，2. 不斷工作，由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二百六十；3. 工人動作之合理化由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七百。

在此應注意到這些統計對於資本主義相對安定已終止了的目下的關係，最近幾年來，對於工人階級的壓迫大大地加強了。

在日本最近五年來，紡織工人負擔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其中由恐慌的最後三年來增加百分之二十八（註二）

在德國，根據柏林的市況學院的統計，勞動強度的增高，可以下列數字表現出（一九二八年為百）：一九二九年——一百零六點六；一九三〇年——一百十五點六；一九三一年——一百二十四點四。

普魯士石煤的開採，鑛工平均的產量，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八；而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則增加百分之七二·六（註三）。

註一：世界經濟情報，一九三二年第三——四期。

註二：恐慌與工人階級的貧困，一九三四年，第二三一頁

實際上，資本主義技術的長成，怎樣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

註三：前書，一六八——一六九頁。

怎樣增劇其勞動緊張性，這可以工人底壽命與工作能力的統計中看到。這些統計說明了現代工人底肌體遭受異常的損失。勞動者，尤其是先進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爲了維持其體力，盡可能去找尋刺激物。爲了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斬傷自己的身心。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

勞動者，大部分至三十五——四十歲便已失掉其勞動能力。

在美國，白了頭髮的勞動者，無論誰也不會雇他，因為這種勞動者，普通，已經不適用於工作。可是，在有產階級的人們，三十五至四十歲正是立足的時候。大多數布爾喬亞的布爾喬亞政治家從這個時候起才開始其事業。

在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勞動階級力戰得來的「勝利品」正如德國某作家(何里切爾)所描寫的下面那樣悲慘生活。

「美國的勞動者以死於青年為幸福——這是幸福的，因為乞食，自殺，發狂，或迫不得已的犯罪等命運在伸開魔手等候着他們。誰想看着人群悲慘死滅的情境，到甘薩斯市的「平民旅店」或芝加哥南的克拉街去看看便可以，或是看看施送麵包殘羹的「救世軍」傳道館施放所面前的人羣也可以。二三千個男子魚貫着排成一個長列，默默地忍耐地等着輪到自己。」這是在戰前的一九一三年寫的。

最近數年來，在資本主義諸國，勞動強度提得更高了。同時如上面所說，又進行着對勞動日制的進攻。在戰後初年工人階級力戰的勝利品，八小時工作制已被取消了，而且事實上已達到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有十五小時的勞動日！所有這些伴同着工資之大大的減低。

我們不難想像；由於勞動日之延長，和勞動強度之異常提高的這種極婉曲的榨取方法相結合，使勞動力怎樣很快地被耗費了情形。

在資本主義國家因此而發生的不幸事件之劇增，並非偶然的。

例如，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據德國的所有工業，不幸事件之發生由全部已保險的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而在英國煤礦中，死傷人數則由每千人中之五人增到八人。在美國的煤礦中死亡人數於一九二八年已增至每千人中之五十三人了。最近幾年來這種數目更有增加。

馬克思說，『機械本身原來是縮短勞動時間的，但當牠為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延長了勞動時間；機械本身，本來是減輕勞動的，但當牠為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使人類隸屬於自然力；機械本身，本來是增殖生產者的財富的，但當牠為資本主義所使用時，反使生產者變成窮困者。』（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與在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矛盾之發展

與剝削之增大同時，資本主義發展又加深了，且尖銳化了在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矛盾。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離的過程『始自單純協業，那時，資本家按其對於各個工人的關係，表現為社會勞動體之統一與意志。牠發展於工場手工業中，在那裡，工人下降為不完全的工人。牠完成於大工業中，這與當作生產底獨立效能看的勞動科學分離開來且使後者替資本服役』（資本論第一卷，二七三頁）

如果工場手工業已把手工業者變成不完全的工人，終生束縛於某項瑣碎的工作；那末，機械的生產則把工人變成機械附屬物。機械更使勞動之智的方面與力的方面分開。智力勞動成為專門人才，企業指揮者，工程師技術家之特權，轉屬於專門科學的實驗者，成為對抗體力勞動的力量，牠利用資本的力量以大大的加強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

反之，體力勞動則喪失了其內在的含義與興趣。工人變成在機械之下的自動機。

機械的生產，一方面，再生產了且加深了在精神勞動和筋肉勞動間的矛盾；他方面，造成勞動之不斷地代替的反傾向。

生產技術之不斷革新的結果，喪失了某生產部分的意義，且肅清牠而發生別的生產部門；同時又進行着資本與勞動之不斷地由這部門而到那部門的流動。周期地動搖資本主義的恐慌，把勞動者大批趕上街頭。所有這些，使勞動者應不斷更換工作，不斷地由這一企業到那一企業，從這工業部門到那工業部門去找工作。

勞動的這種更動又形成了這樣趨勢：局部的工人，某部分社會機能之單純的擔負者，變成了多方面發達的個人，因各種社會機能的執行乃互相替換的生活活動的方法。

這勞動代替的傾向，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中，發生了工場勞動和初步訓練結合的要素。

然而，這些要素完全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全體系相矛盾。

『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和適應於此形態的勞動者的經濟關係，毫無疑義地，完全與此種變革之酵母，舊分工之廢止，與其目標完全矛盾。不過，一種歷史的生產形態中所含的矛盾之發展是達到其生產形態之分解與新成就的唯一歷史過程。』（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所以，精神勞動與筋肉體勞動之矛盾，不但不能在資本主義界限內予以廢除，而且日益加深與增大。

只有當政權移到勞動階級手裏的時候，才能够推動生產力之發展急速前進，且造成爲廢除在共產主義最高階級上的精神勞動與筋肉勞動間之對立性所必要的先決條件。

現在在蘇聯，科學和學業日益與生產相結合，大眾日益參加生產管理，習得科學和技術，創設工場—高等工業學校等等。不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級裏，我們還不能完全廢除在精神勞動和筋肉勞動

間之對立。在現階段上我們底任務是專門化之加強，我們由此造成在共產主義社會最高階段上完全廢除在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之對立的前提。

第七十四節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及其發展

我們已知，單純商品經濟的特徵是在社會勞動與私的勞動間之矛盾。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在生產社會性與佔有之私的資本主義性間之矛盾——這是在資本主義領域內之根本的不能排除的矛盾。

這矛盾的本質在什麼地方呢？

單純商品經濟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底經濟。小商品生產者握有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故小生產者底勞動生產品是其私產；他把自己底生產品拿到市場去與爲他所必需的商品交換。所以，私的佔有是適應於在單純商品經濟條件之下的小商品生產的。在單純商品經濟條件之下的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因各個私的小生產者在分工的基礎上互相聯繫且互相工作着，然而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勞動，直接表現爲以其勞動生產品——商品互相交換的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私的勞動。已固存於生產階段中的在各商品生產者間底社會聯繫僅出現於暴露於交換中。

單純商品經濟，雖已有在社會勞動與私的勞動間之矛盾，但尚無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資本主義的佔有形態間之矛盾。

資本主義壓迫獨立小商品生產者——手工業者和農民，奪去他們的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把他們趕到資本主義大企業裏去勞動，而這些剝奪來的生產手段則集中在資本家手中。機械的工業，更加促進了

且加強了資本主義巨大企業中的生產手段與大量勞動力之這種集積過程。因此，資本主義的大企業，篡代基於個人勞動的私有小企業而成長起來。在這些企業中，生產手段首先為勞動工具由各個小商品生產者底生產手段變成屬於大資本家底勞動工具，而勞動也成為僱傭勞動了。

同時，資本主義生產也採取與手工業者和農民底小商品生產相對立的，社會生產的性質。

那末，這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表現於什麼地方呢？首先表現於生產工具上。小經營所使用的生產工具（手紡車，手鎚等等）是爲了各個手工業者而製造的。反之，資本主義大企業的生產工具（紡織機械，蒸汽鎚等）是以大量的勞動力爲目標的。和以一位東主二，三位職工爲目標的各個小手工作業場相反，資本主義造成幾百幾千勞動者爲目標的巨大工場。因而，生產的性質也根本變更了。在手工生產裏，由作業場生產出來的生產物是各個小生產者的勞動生產物，反之，在資本主義的工場裏造成的生產物是社會勞動的結果，參加其生產的總勞動力的生產物。

所以，生產本身，本質上是社會的，其生產物，本質上也是社會的。可是，佔有形態依然還是私的。生產工具與手段，這裏，爲資本家所獨佔，而由藉助支配許多勞動力的生產手段的多數勞動者底勞動所造成的社會生產物也轉化爲資本家的私產，爲他所佔有。

在生產之社會性與佔有之私有性間的這種矛盾正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這種矛盾，隨着資本主義之日益獲得新的生產部門，日益浸潤新的國家，而日益成長與深刻化！

手工業的生產方法根本以生產手段所有者之個人勞動爲基礎。工銀勞動幾乎是例外。「基爾特」的組織和牠（工銀勞動）抗爭。

然而，只要生產手段一採取社會性，且集中在資本家手裏時，工銀勞動制便變成生產方法的基礎。

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過程越進行，工銀勞動制便越發展，在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韻抗便越成長，資本主義世界裏階級的鬥爭便越發尖銳化。

在這資本主義社會的韻抗與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中橫陳着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在生產社會性與佔有之私的資本主義性間之矛盾。

恩格斯說，『在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表現在普羅勒達里亞和布爾喬亞間之韻抗的形態中』（反杜林論一九四—一九五頁）。

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增大了生產的社會化。在資本的權力之下，組織許多工人一塊工作的大企業更發達了。在每一企業中的社會組織更加強了。但因仍保持着私的佔有，所以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大社會化的生產之增長，同時，又加深了在各個資本家間之鬥爭，且加強了資本主義生產全體之無政府狀態。

總之，隨資本主義的發展，除各企業的生產之組織化增高而外，又加強了全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所以是為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特徵的，在生產社會性與佔有之私的形態間的矛盾，『外表上表現為在各企業內部生產之組織性與全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間的矛盾（前，一九六頁）』。

政治經濟學的繼續研究，我們將更切近地且完滿地證明，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怎樣尖銳化了且加深了我們已舉出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

這些以在生產社會性與佔有之私的資本主義形態間的主要矛盾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矛盾之長成與深化，體現於階級鬥爭的深化中，這又必然會引導到資本主義的崩潰，普羅勒達里亞掌握政權與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建設。

第七十五節 社會主義協業與生產力之發展

在蘇聯經濟中，因為無產者專政所統治，故無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在生產社會性與佔有之私的資本主義形態間的矛盾。由這專政方面對於製成的生產品之有計劃的分配，在我們，是適應於操在無產者專政手中的社會生產的。

由此發生出在社會主義協業與資本主義協業間之許多極重要的原則上的質的不同。例如假使，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手段對立着工人，好像對立着他人的且征服工人的力量一樣，假使『僱傭工人的協業只是同時剝削這些工人的資本活動的結果』，那末，在我們底社會主義工業中，勞動協業以工人階級全體——在無產者國家內被組織成當作統治階級看的工人階級全體對於生產手段之社會的所有權為其基礎的；在我們，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結合的方法，工人對於勞動的關係均與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完全不同。

『目下給他人的勞動，替剝削者的受制的工作，百年後，將是為自己的勞動，且使用最新技術與文化之成效的工作』（伊里奇全集，第二二卷，一六一頁）。

假使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我們可於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看到生產過程之指揮，某種有計劃的生產，那末，牠對立着工人，『觀念上好像計劃，實踐上則為資本家的特權，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強制他們活動的別人意志底權力』（資本論，第一卷，二四八頁）。指揮機能的本身，同時，又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機能。

在社會主義工業中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沒有剝削關係，而且企

業的計劃並不當作別人意志的權力而對立着工人，而是工人自己的集體意志之表現。

所以我們底計劃領導之決定的要素是計劃之徹底地實行，動員大衆爲完成且超過計劃而鬥爭，直接由企業內工人大衆發動反計劃運動之組織。

社會主義協業發生出視勞動爲『名譽事業，尊貴事業，英勇事業與毫爽事業』完全二樣的關係，這極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運動表現出來。

我們曾指出，資本主義協業也曾『引起競賽與生活力之異常提高』（資本論，第一卷，三四三頁）。然而這是工人爲別人的而且妨害他的資本力量所克服的結果，所以有極狹隘的限界。

在我們底社會主義協業中，競賽形成了原則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假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競賽採取殘酷競爭與鬥爭的形態，且促進野蠻的剝削；那末，在我們，競賽則基於勞動者之互助與團結，企圖藉助競賽，以最好的方法而達到共同的目的——社會主義生產之發展與鞏固。這足以說明，勞動狂熱化，勞動組織之社會主義的形態，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之特殊作用。

大大地發展了分工的資本主義協業，完成了智力與喪盡一切興趣的體力勞動之分離。

更發展了分工與生產專門化的社會主義協業，又使工人經過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去參加爲勞動生產品一般總額之增加而鬥爭，參加有計劃的領導過程，提高其熟練程度與文化水準，以種種方法激勵與發揮大衆創造性，促進自覺的與多方面發展的個性，且給在共產主義社會之最高階段上肅清在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形成先決條件。

社會主義協業與資本主義協業不同，沒有在企業內部的組織性與全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間之矛盾。在我們底社會主義工業中，勞動，依伊里奇底話說，是有計劃地被組織在全國的大規模中。

在蘇聯經濟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協業的各種形態，始自最單純的原始的協業——農民的生產手段之單純的集合，終於使用機械的最複雜的協業。

勞動之社會主義的協業創造出新的社會生產力，由質的關係看來，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而且提供出偉大的生產效率。許多事實證明着，無論在我們工業的實踐上，在集體農場連的實踐上，我們皆已步步前進了。例如，社會主義協業偉大優點之最明顯的指標為勞動生產性之向上，與集體農場的收成比之個人農民經濟——就是在集體農場在「農民用具之單純集合」的基礎上而耕種的情形下——更為豐收。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預料着」集體化難免失敗，而且發出這樣的見解，農民用具之單純的集合是不能建設大的集體化的經濟的，這正如漁舟不能造成汽輪一樣。

反之，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則以全力指出，光是「在集體農場底胸膛中的農民工具之單純的集合已能提供，實際上，為我們所夢想不到的效果」（伊里奇主義問題，四五頁）。

集體農場建設的實踐光榮地證實了俾殺黎奧諾維支同志的話。處在社會—民主派立場上的托洛茨基是不懂得蘊藏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體系之本身中，蘊藏在社會主義協業體系本身中的那些偉大優點的。

說到在資本主義下的技術發展，我們已知，資本家祇有當機械的勞動量比勞動力再生產的勞動量對於他們更能節省勞動時，他們才使用機械。蘇聯是不知道在機械發展上之資本主義的限界的，因剩餘價

值的榨取並不是蘇聯社會主義企業的目的。在蘇聯，只要機械能輕易勞動，沒有不使用機械的。這大大地擴大了機械使用的範圍。

假使在資本主義之條件下，技術發展是以盲目的方法而發生的矛盾過程，則在蘇聯，技術發展是在工人階級底自覺領導之下而實現的有計劃的過程。

假使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機械形成了延長勞動日與增加勞動強度的傾向，那末，在蘇聯的條件下，機械的引用已使勞動日縮至七小時，將來還要更縮短。此外蘇聯又實行六日與五日工作週。

假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機械的引用以及與此相聯繫的童工與女工之僱用加強了在工人間的端爭，惡劣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引用對於工人階級許多有害的結果，那末，在蘇聯的條件下，機械的引值反提高了工人階級底生活水準。女工的普及不但不減少男工的作用，且使女工地位空前地提高，且改良了工人階級之一般的生活水準。在蘇聯，童工是不准引用的。青年勞動者則合理地引同着，同時又使之在工業學校中學習。

假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機械大大地提高了勞動強度且榨取出工人底一切生命腺，那末在蘇聯的條件下，機械的利用輕易了勞動，且把勞動的重負大大地轉嫁到機器機械力上去。

第五篇 工資

第十五章 關於工資的一般概念。 工資的形式

第七十六節 工資——勞動力價值的轉形

初看去工資就是勞動的報酬。其實，假使工人因十小時工作日而獲得二元五角，則此二元五角不是別的，只是他在全工作日內支出勞動的報酬。

但可否認為這個表像是正確的？爲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就得首先嚴格地區別清楚勞動的概念與勞動力的概念。

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勞動力是人們的體力與精力之總和，而勞動則爲勞動力作用的過程，爲使自然適應於人們欲望之滿足的，人們的有目的的活動。

雖說勞動造成價值，但勞動本身則沒有價值。假設勞動有價值，那就無法說明商品的價值。事實上，由什麼去決定商品價值？由支出在商品上的勞動去決定之。但由什麼決定勞動的價值？假使我們答道，勞動的價值仍由勞動去決定之，那就陷入了並無出路的圈子中了。然而事實上，這種圈子是不存在的。我們知道，資本家在市場上購進

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且其給予工人的也不是工人的勞動價值而是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如我們所已知，勞動力底價值決定於為工人的工作能力之恢復及其家人生活所必需的社會——必需勞動。

固然，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並非看中勞動力本身，而是看中勞動力能給予他的那種剩餘勞動，但他所買的是勞動力而非勞動。假使資本家報酬工人在工作日內給他的全部勞動，則一點剩餘價值，當然連一點資本主義，都不能存在了。

所以，假使在前例中工人因其十小時工作日獲得二元五角，則此二元五角在任何情形下均不能當作工人於十小時工作日內給予資本家的全部勞動的報酬。牠們僅應看作勞動力價值的報酬。假使，如我們以前所假設的，工人為其勞動力價值之恢復，支出了五小時即全工作日之半，則工人於工作日的第二個半數中即於第二個五小時內創造出來的價值，給資本家組成了剩餘價值。

所以，資本家以工資的形式支付工人者不是其勞動的價值，而是其勞動力的價值。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存在着掩蔽這種情況之瞭解的許多原因。

試以奴隸制與農奴制為例。那裏，剝削在非常明顯的形式中進行，凡是沒有成見的人均能一目瞭然。

『在賦役勞動下——馬克思說——農奴為自己而化費的勞動與為地主而化費的強制勞動間之區別是基於空間與時間的(註)。在奴隸勞動下，甚至事實上奴隸為自己而工作的勞動日的這部份，皆為給主人的勞動了。所有其勞動皆為無報酬的勞動。反之，在僱傭勞動的體系下，連剩餘的或無報酬的勞動皆像有報酬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編第十七章，四二一頁)。

『註』顯然，農奴以一部份時間在賦役下工作，一部份時間則為自

己而工作。在賦役下時，他在地主的土地上或在地主的五穀下而工作，爲自己時則在賞與的土地上工作。馬克思是在這種意思上說，空間與時間上的勞動區別。

事實上，如說到資本家，則『他首先希望以盡量少的貨幣獲得盡量大的勞動。因爲實際上他僅注意到勞動力價格與由牠的機能所造成的那些價值間之差異。但他企圖盡便宜地購買一切商品，且於低於價值購買與高於價值出賣的簡單的欺詐中看出其利潤的根源。所以，他遠未瞭解這種情景，假使真正存在着如勞動價值那樣的物品，且他真已償還了這價值，則任何資本主義都不能存在，其貨幣也不能變成資本』（前書，四二二頁）

但不僅資本家，爲了自己的利益計，固執着，所謂工資是勞動的報酬，這種關於工資本質之錯誤表象：甚至工人也陷入這種曲解中。以工人的立場看去，在上例中他給予資本家的十小時勞動是什麼？不是別的，只是獲得爲他自己及其家人一天內的生活所必需的二元五角之手段。假使由於某種原因，工資的大小發生變化了，假使他所獲得的不是二元五角，而是三元或一元五角，則他將立刻解釋作其十小時勞動的價值或價格之變化，而非其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之變化。

關於工資本質之這種錯誤的表象，所以深入於工人的意識中者，因他並非於出賣其勞動力給資本家之後，而是在他於特定時間內把自己的勞動給資本家以後，才領到工資。所以工資形態遂產生出錯覺，牠是勞動的報酬而非勞動力的報酬。力圖辯護資本主義且掩蔽資本主義之剝削根源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力圖以種種方法保持這種錯覺。

事實上，工資不外是勞動價值或價格之轉形。

因工資於外表上採取勞動報酬的形態，所以馬克思叫工資謂勞動力價值，價格之變換的（歪曲的）形態。

第七十七節 工資的形式 計時的工資

在資本主義的實踐上採取各種工資形態。所有這些形態，本質上，是資本家根據生產的具體條件而採取的，以加強勞動剝削為目的的資本家報酬工人的各種方法。

工資的主要形式有二：計時的與計件的。

計時的工資是按照特定的時間如一天，一星期，一月而給予；計件的工資或者根據每件或者一般地根據製成的商品之特定量而給予。

先由計時工資研究起吧。

『勞動力——馬克思說——時常在特定的時間內出賣。所以『計時的工資』，例如一天的，一星期的等等是轉形，在這裡直接體現出勞動力之一天的價值，一星期的價值等等』（資本論，第一卷，四二三頁）。

『然而題然地——馬克思在那裏繼續着說——由於勞動日的長短，即由於勞動者每日所供給的勞動量之大小，同樣的按日工資，按星期工資與其他的工資等等可以為極不同的勞動價格，即因同一勞動量而支付極不同的貨幣量。所以在計時工資的部門內，必應辨明在工資的總量，例如一天的，一星期的等等，與勞動價格間之區別。但怎樣求得該勞動量的貨幣價值或價格呢？我們就可獲得平均的勞動價格，假使以平均勞動日之時數去除勞動力之平均的按日的價值。……所以，以這樣求得的勞動時的價格為勞動價格之尺量的單位』（「資本論」（第一卷，四三四頁）（註）。

「註」必應指出，這裏，馬克思所用的「勞動價格」「勞動底貨幣價值」

應有條件地瞭解做勞動力價值與價格意思上，時解作為前段所解釋的那樣，

想求得關於『勞動價格』的正確概念必需注意到勞動力之平均的每日的價值與勞動日的時數，然後以前者的總量，即每日的勞動力價值，除後者，即除勞動日的時數，以這種方法去計算出所謂勞動時的價格。在上例中，勞動時的價格，或如馬克思所說『勞動價格之尺度的單位』等於每日的勞動力價值(即二元五角)除十小時勞動日：

$$\frac{2\text{元}5\text{角}}{10} = 2\text{角}5\text{分}。$$

我們所以認為這很重要者，因『存在着並不依存於名義上按日的或按週的工資之減少，而減低勞動價格的方法』(註)例如每日的工資不變，仍為二元五角，但勞動日則由十小時增到十二小時半，這時每小時的價格或『勞動價格』將不是二角五分，而等於 $\frac{2\text{元}5\text{角}}{12.5} = 2\text{角}$ 了。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二五頁。

直到此刻，我們都是說，假設每日的工資不變，勞動日延長怎樣反射到勞動力價格上去，反射到工人生活上去，但工人不僅因勞動日延長且因工作時間不夠而受苦。這往往因按小時的工資而發生，重述上例以明之，在上例十小時的工作日由五小時的必需勞動時間與五小時的剩餘勞動時間組成的。假使把這應用到按小時工資上面去，則每小時均應分為二部份；在前半小時工人再生產其勞動力的價值，在後半小時內給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在這些條件下，工人，只有當其勞動日不短於十小時時，才能得到適應其每日勞動力價值的報酬。假使資本家縮短勞動日，按勞動的時數支付工人，那末他就知道『向工人榨取特定數量的剩餘勞動，不把勞動日延長到為工人生活必需的水準。』(前書，四二六頁)。

在目下經濟恐慌的條件下，我們看到了大批工作不完全的工人。

爲他們因不完全勞動日而獲得的報酬，甚至不能擔保其半饑半飽的生活。例如，在完全工作週時每週獲得二十美金的福特工廠的工人，自一九三三年來，在不完全的工作週下平均每週獲得五——十美金，而且有一部份失業了（參看『危機與勞動階級的貧困』，一九三四年版，八八頁）。

所以『……假設勞動價格不變，則按日的或按週的工資是依存於供給勞動量。由此規律首先推論得，勞動價格愈低，則爲保證工人之可憐的平均工資所必需的勞動量愈大，或勞動日愈長。勞動價格水準的下降致令勞動時間的延長。

但反之：勞動時間的延長又引起勞動價格的減低，以及按日或按週工資之減低。』（資本論，第一卷，四二八頁）。

在計時工資之下，工人因特定的工作時間而獲得的工資總額，並不依存其勞動之強度的。假使工人因十小時勞動日獲得了二元五角，則這總額既不至因強度之增大與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生產品而加多，反之，也不至因強度之降低與生產較少的生產品而減少。所以，從企圖無限制地增加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的立場上看來，計時工資的這種性質是很大的缺點。

爲了盡可能地去消滅上述的缺點，資本家組織着鞭笞工人工作的專門管理。他引用嚴厲的專門監督，工頭等等——這些資本家的忠僕監視着工人的一舉一動，不給他有『喘息的餘暇』。最近且創設了專門統制的機關，非常正確地記錄着機器運轉的一切動止。

第七十八節 計件工資

我們已經說過，計件工資並非按照特定時間而是按照製成生產品

的單位計算的。工人生產出來的商品單位愈多，他所得到的工資也愈多；他生產出來的商品愈少，則工資也愈少。

所以，在計件工資中，工資額決定於工人的能力或努力，與我們剛才考察過的按時計算法沒有任何關係。工人所已支出的時間量，這裏，似乎完全未計及。

事實上，『計件工資只是計時工資的轉形，正如計時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之轉形一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四三〇頁）。

實際上，工人因其製成每件商品而獲得的工資，由什麼去決定的呢？假使把供求的不均衡置諸度外，認為工資應給工人以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的社會—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則計件工資就應以普通工人於一天內能獲得恢復其明天的勞動力所必需的基準去計算。

『在計時工資中，勞動直接由其時間之長短去衡量，在計件工資中，由一定時間的勞動所凝結成的生產品數量去衡量。勞動時間本身的價格結局又決定於等式：每日勞動的價值等於勞動力的每日價值。所以，計件工資只是計時工資的轉形』（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篇第十九章）。

例如，假設在縫衣作坊中的每個女裁縫平均每日做成五件襯衣；再設其勞動力的每日價值，等於二元五角。顯然，在這些條件下，每個女工應因做成一件襯衣而獲得五角。假設資本家也定下這樣的工資。每個女工，每天限於做五件麼？不，在計件工資下，不限於此數；剛相反，為了改良自己的生活且多得一點錢，她每天做六件而得到三元。其他的女工也仿效着這個勤苦的女工：競賽開始了，結果，恐怕大多數女工不僅做六件，而要稍微多做一點，她們的工資也因而增加了。所有這些好像是說，計件工資，只要工人努力，就能提高其工資，改良其物質生活。最初，牠固然是如此。在計件制下的工人，都努力多多製造，在一般的勞動強度尚未提高到，即以前面的例子來說，

當大多數工人尚未開始每天做六件時，資本家給以這種抬高的可能性。但只要達到了這個程度，只要大多數工人的勞動強度已提高，資本家立刻提高生產額的標準而減低商品的每一單位的估價，即報酬，限制每日工資與勞動力價值相適應中。

據我們的假設，勞動力的每日價值等於二元五角，現在襯衣的平均產量不是五件而是六件，那末，資本家給一件的報酬不是五角，而是二元五角除六，等於四角二分了（註）

〔註〕我們捨棄了因勞動強度提高而增加勞動力價值，必需的生活資料之數量。然而，如我們所已知，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資本家也不致因他於計件下所達到的勞動之緊張化而受損失，反更有利？

與包工制（即計件工資制）相聯結的不易使人相信的勞動之緊張化，悲慘地影響到工人階級，且如我們所已見過似的，促成工人的慢性疲勞，神經病，身體的早老。除掉工資減低外，包工制還能引起工人間的競爭，嫉妬與不和，在這種制度下，工人努力工作所獲得的報酬為失業，因每個工人努力勞動能使這種工作由少數工人去完成。最後無須監督的包工制給家內勞動的發展以絕好的機會。

馬克思說，『計件工資，造成介乎資本家和工人間的寄生者，使勞動的轉嫁容易實行……歸於這個中介者的利潤，是完全由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價格和中介者自己現實地支付手工人的價格部分之差額則出來的……計件工資又使資本家僅和工頭（手工工場中的組長）；在手工工場裏和班長，在鑛山裏和煤炭及其他物品的採掘工，在工場中產和嚴密意義的機械工，訂立契約。這種契約載明生產一定件數給予一定價格，根據這個價格，使工頭能包任募集工徒和支付工資。資本的榨取勞動，這裏，經過這個工人榨取那個工人的形式而實現出來』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十九章）。

這種榨取形態特別普及的是落後的國家，例如中國。

阿吉亞洛夫說：「工場主的殘酷的榨取和失業，姑且不說：中國的工人呻吟於特殊的壓迫，就是在所謂工頭的半工人的壓迫之下。中國的包工是供給人力於企業的包工頭使工人工作。這種包工頭自己做工又在監督別人。他是介紹人兼監工，又往往當一個工頭去指導工人。愈用有利的條件包住工人，這些包工頭愈賺得多。他關心使工人容易勞動，使工場主感到滿足，使工人充分屈服，成為蠶物，以便永遠隸屬於他。這是糾纏在人身上不可分離的小寄生蟲」（現代中國的階級與黨——三——四頁）。

但計件工資制，不僅工人間發生競爭，嫉忌，同時，牠會引導到工人間的個人主義，獨立性，不團結，『自己監督的能力』之發展（資本論，第一卷，四三四頁）。

計件工資對於工人的義意是如此。資本家方面對於計件工資的估價，和這個不同。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計件工資的優點，在乎牠盡量提高勞動強度且不需要專門的監督和統率。

但是同時，計件工資制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也包含着某種不利之點。主要的一點，是工人祇注意於商品的量而不顧到商品的質。為使勞動強度化不予惡影響于商品的質，資本家關於生產出來的商品的採用與否特別設立了嚴密的條件。剛看出一點兒缺點時，那商品就被落選了。

在比較了計算工資的兩個方法，按時間計算的和按件額計算的方法，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計件工資制或包工制是最適於資本主義的榨取精神的支付方法，且可以這點去說明工人所以常常爆發了反對這個支付方法的鬥爭的原因。

但是若因而作成，無論何時且在任何條件下工人都以計時工資制

是有利的，資本家以產額工資制是有利的這個結論，那便錯誤了。在很多的情形下，資本家也可以促進機械的步驟，使在時間工資制度下也能和在計件工資制度下去提高勞動強度。而且在這種場合裏，計件工資甚至還給資本家以某種不便。這種不利主要的是在下述這點？

假使在計時工資制度下，工場主可以用機械加速運轉的方法提高勞動強度，且於形式上可不變工人的工資而加強工人的剝削，那末在計件工資制度下，只有採取降低估價以加強剝削；在第二種情形下，向工人階級的進攻是更公開地進行的，牠馬上使工人感覺出來，且立刻引起工人的叫囂與抗議。

第七十九節 工資的賞與形態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資形態，除了上述的兩種基本形態以外，還有在資本主義的實踐中表現着很大作用的許多滋生出來的形態。這些形態，雖然樣式複雜，但牠們的特徵，都是以蒙蔽榨取的事實，和用欺騙誘惑的手段使勞動者不受外部強制而提高勞動強度為目的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資的賞與形態。

這個制度總括說來是這樣的，規定工人每日應該生產的一定標準（就前面的女裁縫的例子說，假定每天做五件襯衣）。工人每天得到一定的工資（假定是兩元五角）；如果他一天的生產超過了這個規定的標準，那末他便於基本工資以外還可領得追加的「賞錢」。

這樣的制度，本質上是包工制度最壞的一種：事實是這樣的，資本家把標準以上的生產額的報酬看做『賞錢』看做不是給勞動力的普通報酬，不過對他所認為的額外生產額給以微細的報酬罷了：假使一

個女裁縫匠額外多做了兩件襯衣，資本家爲了獎賞她的「辛苦」，給她五角錢——所以實際上是對她在額外生產出來的每件襯衣，祇給二角五分錢；同時若在標準額內每件應給五角錢。

除我們剛才所說的通常的賞金制度以外，還有差額賞與制度。這兩種制度的差異是這樣的：在單純的賞金制度下，工人在標準以上生產了某種商品時，得到賞與金；但是在這個標準內，每一個生產品都支給一樣的報酬；在差額賞金制度下，工人生產越接近標準，對於每個生產品的估價也越增大（例如，第二個生產品比最初的生產品報酬較多，第三個比第二個更多等等）。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廣泛地被適用着的是得拉式的差額工資制。得拉制度中的根本要素，是規定日課和賞金。得拉的日課，是以最優秀的工人在最大限度的強度下的生產額爲基準來決定。資本家以一般追加的工資，使這個最優秀的工人極度緊張地勞動。把他的一舉一動所費的時間記入時間測定簿。所以規定了對這個工人要求的特別高度的緊張標準的資本家，把這個當做全體工人的責任標準。

在得拉制度下，只有工人完全執行了對於他所規定了的增大的日課時，他才能領到賞金。若是稍微不曾一氣呵成地做完他的責任額，那末，他不但不能得到全部賞金，而且他的全部賞金，還要被全部取消。此外，連他的基本的產額工資都要減少，以示懲罰。不難明白這種制度是強制工人把自己的全力緊張起來去勞動的。

關於得拉式的制度，伊里奇曾說：

『勞動生產性怎樣提高了！……但工資並未增加四倍，僅增加一倍半，開初或須會更大一點。一旦工人習慣於新制度，工資遂又低到原先的水準了。資本家獲得更大的利潤，而工人則支出了四倍緊張的腦汁與體力，加速了四倍』（全集第十七卷，二四七；二四八頁）

所以得拉制雖組織了勞動且合理化了，經濟了工人的動作，但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有這些偉大的改良均對抗着工人，更大地壓迫他，剝削他』（前書，三四八頁）

這種制度，依伊里奇底話說『聯合了極慘無人道的布爾喬亞之收奪與在機械運動分析事業——呆版與愚蠢的運動之工作，勞動之正確方法，計算與管理等等的最好制度之引用——中的最豐富的科學成效。蘇維埃共和國——伊里奇繼續說——無論如何皆不應把這些有價值的科學與技術的成效用於這方面』（全集，第三十二卷，四五四、四五五頁）。

只有在蘇聯『凡是得拉制的科學與進步的許多方面之採用』在消除『慘無人道的布爾喬亞收奪』之下的『以生產品生產之一般總結為基準的工作』皆有益於整個勞動階級，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工人用於文化方面的時間。

第八十節 額外勞動（工資的其他形態）

資本家使用額外勞動以達到和資金制度同樣的結果。

額外勞動的本質，是這樣的，以一定時限，例如十小時，為正當的勞動日，對於這個時限的勞動時間支付一定的工資。但事實上，勞動日可能延續着且超過了這個限度。工人以自己的標準而勞動的時間，即在上例中十小時以上的時間，當做額外時間，對於這額外時間，用標準以上的比率，支給工錢。資本家用這個較高的工資，力使完全筋疲力竭的工人在勞動日的終了的那個時刻用出最後的馬力。

乍看起來可以說，工人在額外勞動上所得到的工資，似乎是勞動力的價值以上的超過價格。然而實際並不是這樣。資本家對於標準以

上的額外勞動按時支付的事實，絲毫也不能彌補工人在那時所支出的增大了的力量；那不過是祇有這種補償的假象罷了。並且，資本家通常祇是對額外時間規定着較高的支付，但是他却以減低對於標準勞動的各時間的報酬，作為補償。這時，工人在總額上雖然得到和在通常的時間工資上完全相等的工資，但勞動時間很多，因而是支出多量的勞動。

額外勞動，在工人地位上給以很壞的影響。額外勞動，不外是掩蔽了的勞動日的延長。額外勞動的適用致使勞動人數的減少，因而至於使失業者增加；這種失業者，像以後所能看到的，不僅對失業工人的地位，就是對於幸而就業的工人的地位，也給與不利的影響。所以各地工人階級都對額外勞動作堅決的鬥爭。

當結束各種工資形態的問題時，還有攷察分紅制度和物價工資制度的必要。

很明顯的，這種分紅制度祇是一種欺騙，是對於工人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資本家所特別留給工人的部分不過是微乎其微的小錢，而且這又是事前從基本工資中所剋扣下來的呢。還有，因為資本家不在一定期間比如在一年後發給「紅利」，所以工人往往長期的被羈繫。在罷工很明顯地不利於資本家時，這種制度往往表示出資本家反對罷工的重要工具。因工人多能覺悟這種制度的害處，所以牠終於不見有普遍的流行。

在物價工資制度下，工資是隨着商品的出賣價格而變動的。這種制度的害處，在把工人的工資委諸市場的變動：當資本家為和競爭者鬥爭而減低自己的商品價格時；由這價格降低而來的大部分危險，是要使工人負擔的。在這種制度中所包含着的蒙蔽和騙局，我們毋須更贅述了。

第八十一節 現物工資和貨幣工資

工資可以用現物形態和貨幣形態支付。工資用生產物支付時，是現物工資；用貨幣支付時，是貨幣工資。

工資的現物形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曙光期中，曾極流行過。當時的資本家，或用自己企業的生產品，或用他爲自己工場的勞動者從市場買來的消費資料支付工資。這種工資形式對工人是極不利的。資本家努力用種種方法榨取工人而要減少他的工資。例加，在用自己工場的生產品支給工人時，他把在市場上賣不出去的山貨強給工人；在從工場附屬商店裏供給消費資料時，他把粗雜的物品用高價出售，要從消費者的工人身上剝奪利益，等等

「就是俄國在前世紀的八十年代裏，不是從產業經營而是從對自己的工人的買賣上得到的利益，構成很多工場主的利益的大部分。工人單靠自己購買食品，固是事實，但是一到了要用其他的一切必需品時，他們便不得不向工場主講求了。工人的一切的必要品都是工場主的收入項目，燈油費，浴費，醫藥費等（這些就是在工人完全不用的場合），都不斷的從工資中剝扣下來。連麵粉，碾割麥，油這一類東西，他們都得在工場主的商店購買；而且這商店，還把所有的一切粗雜物品——洋布以及紗綿布等強制地賣給工人。工場主公開主張，若是工場主知道了他的工人在別的商店買了東西，他有馬上把已支付的工資索回的權利。或者更赤裸裸地，還有用祇通用於自己的工場商店的商品券支付工資的」。（波洛唐諾夫，斯采巴諾夫共著，經濟學教程第二卷一五一頁，一九一九年版）。

在革命前的俄國，現物的工資如何發達，可以下表判別之「參看

蘇聯經濟政策的階段，二六四頁：

以工業品與糧食支付的

年度	百分比
1901.....	11.3
1902.....	11.5
1903.....	10.4
1904.....	10.3
1905.....	10.7
1906.....	9.1
1907.....	10.9
1908.....	11.8
1909.....	10.7

在各個工業部門中現物工資佔百分之二十以上。

現物工資不僅加強了勞動剝削，且困難了其反對資本家的鬥爭，在反對物重不足要求物品的質改良的鬥爭時，工人往往被愚弄與欺騙，此外現物工資，使工人的消費品僅限於資本家所指定的，工人不能以自己的眼光來支配工資，因而極沮害了工人之文化和政治的發展。

這一切事實，都必然使工人不得不對工資的現物形態作堅決的鬥爭。現在除了最落後的國家或資本主義經濟的最落後的部門，幾乎無處不用貨幣形態支付工資了。

第八十二節 名目工資和實質工資

貨幣工資並非常常反映出工人工資的實質水準。

實際上，譬如我們已知一個工人每月拿到二十五元，那末我們不能夠僅僅憑這個數字而立刻說他賺錢多。我們還更有知道工人的消費資料的市價是多少，這二十五元錢能買多少生產品的必要。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我們才能確定工資的實質的水準。但是消費資料的價格是因地而異的。例如，拿在資本主義內的一個農產物豐富的區域的企業來觀察，在那兒，估工人的豫算的最大部分的伙食費，比在其他大商工業中心地的更便宜的很多。所以雖是同樣是領二十五元的工人，但是前者這二十五元內用以充當飯費的部分，可以比在後者在這方面所用的少。因此，雖然兩人所領到的金額，從貨幣的名目上說，正是相等，然而在實質上，在農業區域作工的工人，因為在那裏飯費便宜將是得到較高的工資。

在工人領得的貨幣額和用這金額在市場上購得的生產品的數量間的更顯明的隔離，我們可以在因濫發紙幣產生出來價格奔騰的時候看出來。

所以，我們要把實質工資和名目工資嚴加區別。我們把名目工資瞭解做工人領到的貨幣總額，把實質工資瞭解做用這貨幣在市場上買得的消費資料的分量。

把名目工資與實質工資拿來和貨幣工資與現物工資混同起來的人非常之多，並且把名目工資比擬為貨幣工資，把實質工資比擬為現物工資。這樣的混同完全是錯誤的。當我們說貨幣工資和現物工資時，我們是注意到勞動力之不同的支付方法（用貨幣或用現物）的。當我們說到名目工資和實質工資時，我們是從貨幣工資的形態之存在出發，並且由比較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時代中的工人的貨幣工資，按照消費資料的價格高低決定這個工資的實質額數的。總之名目工資和實質工資的概念；不是表示着勞動力支付的不同形態，而是代表一種決

定工資的實質水準的方法。

第八十三節 工資之國民的差異

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間，存在着工資水平之很顯著的差異。

「當比較國民的工資時——馬克思說——必應主意決定勞動力價值的大小上的變化的一切要件：——自然的歷史發達起來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及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的生產性，勞動的外延(時間)的及內包(能率)的大小等等」。(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篇二十章)。

當比較資本主義諸國的國民的工資時，我們應首先注意到工人的「自然的和歷史的發達起來的生活必需品底價格及範圍」，換句話說，就是工人階級的文化的水平。上面我們已經指出過，這些差異有很大的意義。要瞭解這些差異的重要性，比較一下美國和革命前的俄國就已經够了。這時有極重要的作用的是歷史條件而且首先是階級鬥爭的條件，這兩國的資本主義就在這下面發展了的，因而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也在這下面形成了和發展了的。

革命前俄國的工人階級，是在封建—農奴的諸關係的條件——這些條件困難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下形成的。從這些情形出發，在俄國便長期流行着落後的工人的榨取方法——過度的長勞動日，低廉的工資。所有這些條件的結果：一方面是俄國技術的落後，機械生產的不發達，他方面是俄國工人文化水準的比較低落。

在美國我們看到另一種光景：那裏工人在封建—農奴關係完全沒有，在初期中，並且連獨佔的土地所有者都沒有的條件下孕育成的，

其中主要的是在工人時感不足與有移民必要的條件下從西歐移殖到美洲的人們所形成的。這些條件，一方面，適於高度技術生產的發達，他方面，又適於美國工人文化水準的提高。

勞動強度，在國民之工資差異的問題上，也是一個重要的要素。

馬克思說：『在各國有一定的平均勞動強度，勞動者如不曾達到這個平均強度，則耗費在這個商品上的時間，就大於社會的必要時間，所以不能當作標準的品質的勞動』。（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篇第二十章）。

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等等）中，勞動強度遠比在落後國家中的高。落後國家主要的是延長勞動日，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則特別提高勞動強度。如我們所看到似的，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強度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致使工人器管早衰致使工人早死。

在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國家，工資的水平遠比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高。試以戰前的英國工人的工資德國工人的工資與革命前的俄國工人的工資中國工人的工資為例以比較之。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英國與德國的工資高於革命前俄國與中國的工資，關於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了。這裏主要的說明，應在歷史的條件下在階級鬥爭的條件下的在這國或那國工人階級已怎樣發展之下，去尋求之。

然而應注意：在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較高的工資之後，有着勞動強度之過份的提高，而且勞動強度的提高遠超過了工資的提高。

此外在技術發達的國家，名目工資的增加，幾乎不能促進實質工資的增加，即幾乎不能促進在工人所管理之下的生活資料的增加。工人底生活資料的價格，在發達的國家較高，這是正規。

假使「日工工資或週期工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達了的國民一方面，比較不發達的國民的方面要多些」；那末，『在相對的勞動價格，即剩餘價值與生產品的價值相比較的勞動價格上，後者的國民的

方面比較前者的國民的方面要多些」。(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篇第二十章)。

所以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較高的工資之後，隱含着較高的剝削率，空前地提高的勞動強度，生活資料價值的成長。下面我們將看到，隨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相對的工資，即連絕對的工資，也經常地表示降低的傾向。

第十六章 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理論之批判 蘇聯的工資問題

第八十四節 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工資論

馬克思的工資論完全由其剩餘價值論中推演出來且與之組成不可分離的整體。自然，在工資論中我們還得特別注意在剩餘價值論裏曾加以考察過的布爾喬亞的理論與社會—民主派的理論。

我們已知，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與工資論的基礎上，處着馬克思第一個人所區別出來的勞動與勞動力的分野。資本家支付工人的一一如馬克思所說——不是其勞動的價值，而是其勞動力的價值——這一點乃正確地說明剩餘價值的關鍵。顯然，因反對馬克思理論的這中心點，而興起了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及追隨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剩餘價值那篇中我們曾加以考察過的狹的理論，生產性以及許多其他的理論，按其本質皆係反對馬克思的這上述主要點。

近幾年來，曾為傑尼金底白色自衛政府之部長的，俄國底布爾喬亞之有名經濟學家徒幹把拉諾夫斯基的社會分配論底通俗性，為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接受，其方向也是如此的。

徒幹首先反對勞動力是商品，馬克思的這個定義。他以為勞動力不是商品且沒有價值，因其並非在生產過程中由勞動所造成，而是生

長於生活過程中的。結果，徒幹做出這樣的結論：「並非勞動力的價格為其生產費所決定，剛相反，而是勞動力的生產費為其價格所決定。」（徒幹：政治經濟學基礎，一九二二年版，三六二頁）

徒幹自己認為工資是分配的範疇，而非生產的範疇。根據這種理論，工人與資本家是社會勞動造成的生產品分配之二個參加者，他們各取其自己的部份。社會生產品之工人的部份，其工資之高度，依徒幹「被決定於二種因素：能決定分屬於社會各階級間的社會生產品之大小的，社會勞動的生產性；與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為工人所能支配的社會生產品部分即依存於此的。」（前書，三七二頁）

社會——民主主義者重複了我們上述的徒幹底社會工資論之主要的見解且公開地走上否定馬克思的工資論之道路。

例如，奈爾丁兄弟間直了當地寫着：「關於勞動力——商品交換的價值問題是沒意思的。存在着的只是關於工作（即勞動）價值的問題，

所以本質上，奈爾丁兄弟，在這理堅認：資本家支付工人的不是其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勞動的價值。站在這種行程上，他們自然會否定馬克思關於勞動力的學說且完全轉變到徒幹的立場上去。

「馬克思——奈爾丁兄弟說——根據為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工人的費用去計算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現在工資的問題——只是有機體的力的問題，且沒有任何鐵的法則，去計算每年生產出的商品價值；應有多少歸於資本的部份，又有多少歸於勞動的部份，我們全不知道；但至少我們承認這樣的法則，即任何時候，皆限制勞動於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任何獨立的寶貴的機構均不能解決，除非階級鬥爭；」引文根據克里維支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資論，第十七頁。」

總之，奈爾丁兄弟，與馬克思的勞動力的價值論相反，因與徒幹

一樣他們推演出其他的理論，根據那理論，工資一方面決定於勞動生產性，他方面又決定於『勞動階級的社會力量』。

初看去，徒幹與奈爾丁兄弟的關於『勞動階級的社會力量』的論證，好像能給這種理論以革命色彩。但按其本質，這實是反革命的替布爾喬亞辯護的理論。

第一，『勞動生產性』與『社會的力量』——一點也不包含着特殊的資本主義的因素。這種概念能適用到任何生產方法。而剩餘價值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只有從此出發，我們才能正確地瞭解發生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第二，徒幹把工資問題引申到分配問題，同時，牠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懷中有其基礎。由工資問題而分配問題的引申有什麼意義呢？依馬克思，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給勞動階級在由牠所生產出來的生產品中應得的部份造成一定限度。勞動階級在資本主義下所能得到的工資之最大極限是勞動力的價值。實際上，工資任何時候不能達到勞動力價值的水準。徒幹及與他同道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企圖說服工人，他們即在資本主義下，也能無限地改良其地位的。依他們的意見，無須為消滅資本主義而鬥爭，只要充分的保證在布爾喬亞的國會中獲得一定的席數且相信改良主義的職工會就得了。誰都知道，為爭取議員席數的鬥爭，以及改良主義職工會的鬥爭是不能急速的改良工人地位的。國會與職工會一到改良主義者的手中就成了掩蔽的作用，他們藉此使勞動階級從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實際的鬥爭中退出來。以為工資依存於勞動生產性的，徒幹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其理論提出供布爾喬亞的強辯的思想。他們想這樣說，工人的利益在乎勞動生產性的發展，因為可以此而提高其在社會生產品中的部分。

如以為曾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地位有改善之可能性的社會——民

主派極能爲工人之局部的利益而領導鬥爭，那就錯誤了。不僅在企圖傾覆資本之權力的革命政治鬥爭中，就是在企圖反抗資本之進攻其生活水準的狹隘的經濟鬥爭中，社會—民主主義者皆形成勞動階級之反叛的作用，分化了勞動者的隊伍。在一九二六年英國鑛工大罷工時，這一點由改良主義的職工會明顯地暴露出來，近幾年來，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國等等的許多經濟鬥爭中，這一點皆充分地暴露出來了。

第八十五節 蘇聯工資的特性

由於在蘇聯經濟中剩餘價值問題之考察，我們已証實了，在蘇聯的社會主義企業中，勞動力已不是商品了。

這根本改變了在蘇聯的條件下，關於工資問題的提法。既然在蘇聯，勞動力已不是商品，那末，就是說我們底工資本質上根本與資本主義的不同——而工資水準也非由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去決定，而是由別的因素去決定的。

馬克思—伊里里說，在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上，在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勞動尚不能成爲生活的慾望，勞動生產品的分配按勞動的質與量而進行。

我們的工資以適應於勞動之質和量的分配之社會主義的原則爲基礎，

蘇聯的工資，首先體現出在個人消費的基金與社會主義積蓄的基金間之關係。她不外是工人階級因滿足其個人消費而領得的社會——勞動證券。

因分爲必需時間與剩餘時間的，勞動時間之資本主義分類在蘇聯已不存在了，所以生產物，總而言之，還是生產物，牠用以滿足全體勞動階級的需要，不管其如何使用法：用在個人消費上或用在社會主義的積蓄上。這裏包含着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之根本區別。那裏必需時間與剩餘時間之分類陰含着二個階級之存在與鬥爭，這裏勞動階級自覺地把其生產品分爲二部分：個人消費的資金與社會主義積蓄的資金。

工人爲滿足其個人消費而領得的個人消費的基金由工人階級依據計劃的程序而確定，同時，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工資盲目地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被規定的。

組織於國家中且受共產主義黨之領導，勞動階級根據什麼去領導社會生產品之分配呢？根據二種原素：一方面，必需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之應有的速度，於極短時期內，在經濟——技術的關係上『趕上且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他方面，必需有系統地提高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這又依存於勞動生產性之增長。

這二種因素的結合決定了工資之主要的水準。

勞動之社會主義的形式——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是生產力發展之最重要的因素，其本身又成爲工人物質生活改良的因素。

按勞動支付之社會主義的原則，爲勞動生產性提高的刺激，生產品之質的改良，佔領導地位的經濟部門之發展的保證，突擊隊之物質的刺激等等的前提。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生產性之高度水準適應着工資之可憐的水準。勞動生產性的增長，在資本主義下，使資本家更爲富有，而勞動階級更爲貧困。但在資本家與地主的政權已被消滅，且工人階級已成爲生產手段之主人的蘇聯，工資的增大是適應着勞動生產性之提高

的：爲我們所達到的勞動生產性的水準愈高，則我們愈有可能去改良勞動階級的物質條件。一九三二年，蘇聯工人的工資水準爲戰前俄國工人的工資水準之 170 %，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工資水準很難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近來且更形減低。僅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這幾年中間，蘇聯工人與職員的每年工資基金，由一三五七九百萬盧布增至三四二八〇百萬盧布，而產業工人的每年平均的工資，在這時期內，由九九一盧布增至一五一九盧布（參看俾殺黎奧諾維支，在十七次黨大會上的報告，二五頁）。

除掉爲每個工人所親手直接領得的個人的工資外，對於工人階級生活水準有極大意義的，還須計及社會化的工資基金（如社會保險金等等）。比如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只是社會保險的基金，在蘇聯，已由一八一〇百萬盧布增至四六一〇百萬盧布了（註）假使計及社會化的工資，則蘇聯工人的物質狀況之改良，比之上引數字所指出的大得多了。

〔註〕前書二五頁

但在蘇聯社會主義企業上的勞動生產性，尙未極充分地提高。我們不僅要趕上且應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使勞動生產性達到最高的水準。

對立着這成長者尙有平等的與普及的份子。

馬克思，昂格思，伊里奇，俾殺黎奧諾維支不止一次反對過平等化，小布爾喬亞的平等無論何時皆不是馬克思——伊里奇主義者底觀念。

『馬克思主義——俾殺黎奧諾維支說——並不把平等瞭解作私人消費的平等，而是瞭解作階級的消滅，即：a 於資本家傾覆且收奪以後，所有勞動者平等地由被剝削下解放出來； b，在他們把其私產全

部給予社會以後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私有權皆平等地取消；c. 全體按其能力而工作的平等義務與所有勞動者按其勞動而獲得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的社會）；d. 全體按其能力而勞動的不平等義務與所有勞動者按其需要而獲得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是由此出發的，即人們底能力需要，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無論在共產主義時期，按照質或量，不是且不能是一樣的且相等的……這就是平等之馬克思主義的瞭解」『參看，俾殺黎奧諾維支，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的報告，三十頁』

所以，我們底當然的任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之實現。然而想實現這個原則，必需使生產力的發展達到最高水準，勞動由爲生活的手段轉化做生活的慾望，消滅在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矛盾，這只有在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上才能達到；在社會主義下，如我們已曾指出過，統治着按勞動分配的原則。因而勞動者由於其勞動之質和量不同，而獲得了相應地不同的生產品數量。

所以在我國，必應有等差：熟練工人應比不熟練工人多得到一些；工人的先進份子比之其他工人大眾應於較優的條件下選擇出來；領導的工業部門的工人，比之落後工業部門的工人應多獲得一些。這應按照工資與供給的路綫而進行的。

平等化會阻止生產力之發展，因不能激動工人提高熟練程度，促進勞動力的流通性，妨害工人的基本幹部結集於領導的職業與對於最重要且領導的工業部門之最有利條件的保證。

與平等化鬥爭是我們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勝利之最重要條件。

俾殺黎奧諾維支同樣以下列的話去形容平等派：

『馬克思與伊里奇說，在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區別，就是在社會主義下，在階級消滅了以後，還存在着，只有在共產主義下，這種區別才會消逝，所以在社會主義下的『工資』不應按需要，而應

按勞動給予。但由經濟事務員與職工組織者形成的我們底平等派不同意這點且以爲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種區別已沒有了。誰不錯？馬克思與伊里奇不錯，還是平等派不錯？應承認馬克思與伊里奇是對的。但由此可以明白，誰於平等「原則」上建立稅則體系（System of Tariff），而不計及在熟練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區別，誰就撕破馬克思主義，損壞了伊里奇主義』（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八九—五九〇頁）。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敵人企圖使平等成爲於工人階級之最落後份子之風度上遊戲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本質。例如布爾喬亞的書手評擊了仲殺黎奧諾維支同志底關於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六條件問題之解釋。曲解馬克思，伊里奇主義底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正確的學說，他們於工人階級之最不自覺的落後份子之風度上作成了那種玩耍。

以一部份落後工人底小布爾喬亞的風度而擁護平等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例如，在爭論職工會問題時與伊里奇辯論的托洛茨基提出『努力工作——消費平等』的原則，伊里奇於答覆他時，指出這是『虛妄的』。

『努力——他說——是願望，而沒有需求的願望是沒有的……努力的願望又是需求的願望，不是如此的努力——做夢，幻想』（全集

第二卷，七十頁

全蘇聯職工會中央蘇維埃之右派機會主義的領導——牠事實上引申了平等派的路綫，反對維護生產之任務的職工會的機能——與馬克思—伊里奇主義，實際上並無任何共同點。

在現階段上，蘇聯工資之主要的形式是計件制。牠是適應於勞動之質和量的社會主義的工資形式。牠與資本主義的計件制不同，我們已知，資本主義的計件制是更適於資本之利益的，勞動力榨取的形式

這種原則上的區別是由蘇聯的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在那裏勞動階級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的生產關係體系的本身內推究出來的。蘇聯的計件制能刺激勞動底生產性與強度之提高，同時，又無資本主義計件制所發生出來的那種否定的結果。這是因為為國家之主人和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的勞動階級，要求工人提高勞動生產性與強度，同時又以種種方法去改良工人，尤其是突擊隊隊員的地位。工作日的縮短，工資的增加，動勞保護的各種方法等等——所有這一切皆使計件制能提高勞動生產性與強度，同時又改良了工人的地位。

蘇聯工人對於動勞之原則上不同的關係在這裏有極重大的意義。對於勞動之自覺的，社會主義的關係，提高了動勞者之生活力且使勞動更容易了且愉快了。

孟什維克愚笨地企圖以種種方法去譴責蘇聯建設之成功且聲說蘇聯的體系並非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系，混同了蘇聯的計件制與資本主義的計件制。

這種見解可以在撥拉奧佛樂繩斯基的著作中見到。

他以爲在蘇聯的條件下，計件制是工資之布爾喬亞的形式，這對立着對於勞動的新刺激的教育且『大體上說，在生產手段社會化之下，還表示出，在全時代上的私有權的新形態之殘存』。

他完全沒有明白，當作適應於勞動之質和量的分配之社會主義原則之實現着的蘇聯的計件制與資本主義的計件制所有深切的原則上的區別。

我們應堅決地駁斥這樣的見解，在蘇聯的條件下「工資」還保有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資所固有的拜物教的不合理的特點。

此外，在蘇聯不僅有如有些偏見的人們所想像的工資之外表的形

式。蘇聯的工資是按勞動分配之社會主義原則的實現方法，但非直接按勞動時間的分配。原則上與資本主義工資不同的蘇聯工資之存在是由蘇聯經濟的生產關係的本質上推演出來的。

在說到蘇聯的商品形態與貨幣形態時，我們曾闡明，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最高階級以前，不能有直接的生產品交換且不能直接以勞動時間，時，分，秒等去計算勞動的。

蘇聯的工資形態是為提高勞動生產性與強度，為勞動紀律，反對小有產者的靡費，為對於勞動之自覺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反對有害的傾向之鬥爭的形式與武器。牠是適應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之開展的，勞動與資料之計算的工具。最後，因在蘇聯工資之主要形式還是貨幣形式，因工資還分為名目的與實質的，所以為於其實在體現上而提高工資的鬥爭有限大的意義。在蘇聯的條件下，這種鬥爭本質上是為提高蘇聯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之勞動生產性的鬥爭。

我們說明了在我們底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中之工資的本質以後，我們還應簡述幾句在我們底集體農場中的勞動日之特徵。應堅決地捨棄關於勞動日的二種錯誤觀點：1.企圖混同勞動日與工資；2.企圖把勞動日演化為直接以勞動時的社會主義分配的形式。說到第一種觀點，那末，牠忽視了存在於表現為社會主義企業之低下形態的集體農場與表現為徹底地社會主義企業形態的國營農場間之原則上的區別，這種區別，我們已於『剩餘價值』篇中闡明過了現在不再重述，混同勞動日與直接以勞動時的分配——這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之最高階段才有地位——是完全不正確的，這種分配的必要前提是貨幣，貿易等等之消滅。在我們底經濟中目下尚無這些前提。勞動日是有條件的計算單位。這是為決定集體農場員於勞動上，當然以及於當作集體農場經濟之成員看的生產品分配上之參加部份而被採用的。勞動日並不取消

了在集體農場中的貨幣之必需性。

第六篇 資本的再生產與積蓄

第十七章 再生產及積蓄之一般概念

第八十六節 再生產之概念

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斷地更新着。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只能在某一期間滿足人類的需要，以及生產的需要。消費資料的生產須藉助消耗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手段去完成的。與消費資料的生產並行的勞動工具以及一般的生產手段的生產若不更新，那末，生產過程之不斷地反復，不用說是不可能的。

這種在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中或在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中，生產過程之更新與反復叫做再生產。

馬克思說：『不問生產的社會形態如何，在任何情形下皆須連續的，即必須週期地更新地通過同一的階段。社會不能停止生產，正如牠不能停止消費一樣。』

所以，社會生產的一切過程，從其不斷的關聯與其更新之不斷的流動的方面觀察起來，同時，也就是『再生產』的過程。（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一章）

再生產過程，不僅是物的再生產過程，並且又是完成於此中的社

會關係的再生產過程。

例如封建經濟，不但每年再生產一定量的消費對象及生產手段，同時又再生出如下的情形：生產者的農奴，在其勞動生產物中不過獲得僅够維繫其生命的分量；而給與領主的分量，不但够他維持豪華的生活，並且還够養家臣，軍隊，以鞏固將來自己對於農奴的權力。所以再三地再生產着封建主的統治地位與農奴的被統治的不獨立的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往往是，喪失生產工具的勞動力的出賣者；因其工資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過剛够維持自己的勞動力，即維持一種勞動可能狀態，及扶養一個普通的家庭。

至於說到資本家，則在生產過程中的他底支配地位之再生產，因下述的事實而成爲可能。就是：他在生產過程之後收到製造品，而其價值，除掉補償消耗了的資本部分的價值外，還給他以剩餘價值。資本家賣出這商品收到貨幣，從這裏而扣除他個人的費用之外，其餘都用以買進新生產手段與新勞動力。這樣，他不斷地從新成爲生產手段的佔有者，以後再繼續收買勞動力這種商品，由這種商品再得到榨取剩餘價值的可能性。

馬克思說：「要之，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本身，由其本身進行，再生產出勞動力與勞動條件的分離。牠再生產了而且擴大了榨取勞動者的條件。牠迫使勞動者爲了生活不得不繼續出賣其勞動力，又給資本家以爲要富有而有不斷地購買勞動力的可能性。資本家與勞動者之以買者與賣者的資格而在市場上對立，現在已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依照生產過程自身的進行，勞動者以勞動力的出賣者的資格而不斷的出現於市場，並且他的生產物不斷的被轉化爲資本家的購買要具……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本身，在一般的關聯上，或把牠作爲再生產

的過程來考察時，不僅是生產商品，不僅是生產剩餘價值，而且再生產在一方面的資本家和他方面的工資勞動者間的資本主義關係」。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一章）。

第八十七節 資本主義的單純再生產

我們知道，當資本家在出賣已生產出的商品時，除收回他自己底全部資本的價值之外，還實現了超乎此的剩餘價值。

資本家可以任意把出賣其商品所得的剩餘價值，供給自己個人的消費，或是投到生產中去，使之擴大。

假使資本家把全部剩餘價值皆用於滿足自己的消費，那末他僅能於原有規模上更新生產過程。在原有規模上再生產之簡單的反復叫做單純再生產。

資本的單純再生產已表現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之許多特徵，當分離地不由其反復與更新去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個個行為時，這些特徵尚潛伏着。

若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完全當做一次的東西去觀察，那就會得到這樣的印象，即資本家在出賣勞動者所生產的商品於市場之前而支付工資，就好像是豫先把自己財產的一部分借給勞動者似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真實性外表上所發生出來的幻像，為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所利用，他們處在這理由上，時常說，資本家養育着工人因而沒有剝削。

可是若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當作再生產過程來研究時，這種錯覺馬上便消逝了。顯然，資本家所付給勞動者的工資，絕不是從其他的源泉來的，而是由貨幣中來的。這貨幣正是資本家因實現勞動者在過去

生產過程中所生產了的價值而得到的。

馬克思說：「由于貨幣形態而發生的錯覺如不考察各個資本家或各個勞動者，而考察資本家階級或勞動者階級時，便立刻消滅了。當付出為勞動者階級所生產，為資本家階級所佔有的一部分生產物之時，後者是不斷地以貨幣形態將支票交給前者。而且勞動者也不斷地將這個支票還給資本家階級，從資本家階級得到可以養活他自己的生產物部分。生產物的商品形態與商品的貨幣形態，隱蔽了這個過程的真性質。（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三十一章）。

但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並非任何時候皆存在的，因而發生問題：第一個資本家由那裏取得貨幣去購買勞動力與生產手段？

很多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人——說，投於生產中的最初的資本是現在的資本家或其先人的「血汗」積蓄成功的。從這裏出發，便產生了這樣的結論，這個資本部分是永遠保持其清潔並和榨取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已知，在現實上，怎樣發生資本主義的生長過程。這個過程是在極殘酷的榨取形態，小生產者的破產與直接的被剝奪以及對殖民地民族的掠奪形式中進行的。

但是我們暫時許可這個為資本家投入生產中的最初的資本真正是他們的血汗和脂膏的結晶的假定。假定資本家投入不變資本八千元，可變資本二千元，共計把一萬元的最初的資本投入生產中。再假定這二千元的可變資本是在一年內的勞動力價值而剩餘價值率（剝削率）為一〇〇%，麼末，這二千元的可變資本將同樣可以產生二千元的剩餘價值。我們知道，在單純的再生產的條件之下，資本家為了充當自己的需要，把這二千元完全用盡了。遂造成了這種的錯覺，資本家實際把其企業看作任何時候皆為他最初投入生產中的一萬元。

這種錯覺的發生是由於，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不僅轉移了最初資本的價值且在再生產的每次工作中生產了超於預支資本的二千元的餘額。假使工人不生產剩餘價值而資本家仍和先前一樣，每年純費二千元，則他的最初一萬元，只須五年，就用完了。就是說，只要我們以單純再生產為問題，則資本家最初預投在生產上的一萬元資本，在每一年的內（註）都有二千元，換成被他所榨取的工人勞動，經過五年該資本中已一文也沒有為資本家所最初投下的手段了。縱令最初的一萬元是資本家的「辛苦」的成果，但是現在這投下的資本已經沒有剩下的一文了，現在的資本完全是榨取勞動者的成果。

〔註〕當然我們假設着已生產成的生產品完全實現了。

因此，我們看到，縱然資本家用他「真正賺得」的資本開始經營事業（然而，我們知道，這種假設是不合事實的），而在這種場合，認為他的資本能够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全時期中，保持其「真實」和「清白」，是再愚蠢不過的。這個事實是很明顯的；只要我們不把個個生產期間一個一個的分開，而在連續和反復的關聯上，就是從再生產的觀點上去考察。

關於這層，馬克思說道：「總之，積蓄一層暫時不論，單就生產過程的單純反復說，換言之，單就單純再生產的進行說，也可斷定在長的或短的期間之後，任何資本也會轉化為蓄積了的資本，或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章）。

最後，由於單純再生產的考察，我們應作關於勞動力的再生產的結論。

生產過程同時又完成了所謂生產的消費。這種消費的進行有兩種形式。第一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消費了機器，原料，補助材料等生產手段，但在勞動過程中又進行着屬於資本家的勞動力的消費。生產

消費是在工場內舉行的，不屬於工人而屬於資本家的，顯然，在生產消費的過程中，工人替資本家服務。但如說到勞動者自己私人的消費，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勞動者自己私人的消費是這樣的：勞動者滿足自己的需要，即如飲食，穿衣，休息，閱讀報紙，撫養家族等等。這是其個人的消費，且這種消費的大部分是離開生產過程而舉行的，一看好像只是勞動者自己的私事。但是，實際上却大不然。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也是替資本家再生產勞動力，休息，睡眠，穿衣，教養兒女，工人為供資本家的剝削而生產勞動力。

第八十八節 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的單純再生產的特徵，但是在實在的資本主義的現實性中，單純再生產之存在，並不是經常的現象，而只是偶然的現象。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特點是擴大再生產。

如我們以後所將看到似的，資本家的競爭迫使每個資本家均不自主地去不斷地擴大生產甚至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級，在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末落期，仍以一般的擴大再生產為資本主義之特徵（與托洛茨基所說的在這階級上生產力發展之停止的理論剛相反），

假使資本主義的特點是擴大再生產，那末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積蓄過程時，為什麼由單純再生產開始？他所以要如此做者，因1.單純再生產是擴大再生產的階段，在這裡包含着資本主義的生產的主要特點，一方面資本家再生產，他方面，勞動階級的再生產；2.資本再生產過程的本質，由單純生產的分析，開始揭示出來，但我們所以始於單純再生產的研究者不僅因為這是容易完成再生產之主要問題，而

且因爲，於歷史上，牠是發展的出發點。

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之下，擴大再生產，只有依靠以下的場合，才能實現，即，資本家並不把爲他所獲得的剩餘價值的全部，都用在自己個人的必要上，(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就是這種情形)而把牠的一部分，用以擴大將來的生產。就是用來購買追加的機器，原料，補助材料，及勞動力；把牠轉化爲用以生產新的剩餘價值的追加資本。

這樣剩餘價值之轉化於資本，就是所謂資本的積蓄。

然則這種資本的積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能完成呢？

生產過程終了以後，不論是從不變資本移轉來的最初價值，或新產生的價值，都同樣採取商品的形態而存在，這商品應實現於市場上且從商品形態轉化爲貨幣形態。

資本家爲要能在擴大的規模中開始生產過程，他就應到市場上去尋找爲將來生產上所必要的一切商品。

但，既然所說的是擴大再生產，顯然，這些商品應有更多量現存於市場。

這裏必須特別申明，擴大生產的可能性，不但與資本家手中所現存的貨幣形態上一定量的資本有關係，還要看他是否能够在市場上找着爲擴大生產所必要的物質，以及是否能够找到這些物質之必要的分量。

「一年的生產物，首先必須供給一切的對象(使用價值)去恢復一年中所消費的資本之物的部分。除掉這部分的東西以外，剩下的就是成爲剩餘價值之存在形式的純生產物，或剩餘生產物。但這剩餘生產物是由什麼去形成的呢？能由可以滿足資本家階級的欲望或願望的各種東西，屬於資本家階級的消費基金的各種東西去形成嗎？果如此，則剩餘生產物將要消費淨盡。結果，不過是形成了單純再生產」。〔

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一章)。

總之，爲要進行積蓄的過程，就不得不把全年的剩餘勞動的一部分，拿來生產追加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馬克思說：「剩餘價值所以轉化爲資本者，僅因剩餘生產品(其價值就是剩餘價值)已豫先包含新資本之物的要素」，(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一章)

可是，除了追加的生產手段及追加的生存資料以外，爲生產擴大所必要的，還有追加的勞動力。

「這件事，也由資本主義的生產自身的機構所處理；牠再生產了當作依存於工資的階級看的勞動階級，他們底通常的工資，不但够維持他們的生活，還够蕃殖他們的子孫。勞動階級每年供給大小年齡的追加勞動力給資本，資本只要使一年生產中所包含的追加的生產手段與這些勞動力結合起來就行了，這樣，剩餘價值的轉化就告完成。」

(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一章)。

資本主義的積蓄，就在這樣的諸條件下，實現的，

在這個場合，生產的擴大由剩餘價值而完成。所以在擴大生產中所包含的追加資本之「榨取的」起源就可以完全明白。

「其發生的過程，我們已經完全正確地知道了。這就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除了他人的未受報酬的勞動以外而從別處得來的價值，從最初起就是一個微分子也不被包含着。與追加的勞動力相結合的生產手段，以及這些勞動力賴以維持的生活資料，兩者都只是剩餘生產物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勞動階級強奪來的賈物的組成部分。雖說資本家階級以這賈物的一部分，用充分的價值，從勞動者階級購買得被追加的勞動力，即以等價上相交換；而這種事情，也與征服者用那從被征服者得來的貨幣，再向同一被征服者購買商品的那種舊方法無別」，(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

勞動力的出賣及其為資本家所買，皆按着商品流通的諸法則進行的，這個法則在互相交換自己的商品時，是以商品所有者間的平等為基礎的。然而在這二個人——資本家與工人——間交換的平等只是表面：工人獲得了的勞動力的價值，而支付這價值，使用為他有所購進的商品——勞動力的資本家，不僅獲得他所預付的可變資本，且獲得了剩餘價值。

「當做根本的原來交換而顯現的等價物互相的交換，現在一變而成為僅僅表面上的假象；在實際上，與勞動力交換了的資本部分：第一，牠自身不過顯現為未支付等價而佔有了的他人的勞動生產物之一部份；第二，牠不但由生產了牠的勞動者去補充，還要由某種新剩餘生產物去補充……」

最初我們以為所有權是以自己底勞動為基礎。現在，財產，在資本家方面，就是佔有他人未受報酬的勞動及其生產物的權力；在勞動者方面，就是自己佔有自己的生產物之不可能性。這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

然而在商品生產的根本法則與資本家的佔有方法間之矛盾，無論是怎樣大，而後者的產生，絕不能違反前者的諸法則。反之，却是正規的前者的執行者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

單純商品經濟隨着牠的發達，必然要變為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可以說，自從勞動力本身成為商品的瞬間起，商品經濟就變成了全般的支配的經濟形態，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是在商品生產的主要法則——價值法則的基礎上進行的。但在我們此刻所研究的交換行為上二個參加者是工人與資本家，商品所有者二種類型，這是為單純商品經濟所沒有的，這種現象宣告了新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之出現。因而這種交換的結果是資本主義之佔有，不支付的勞動之佔有，即發生這樣

的結果，這雖因商品生產法則之採用而發生的，但同時又對立着我們在單純商品經濟中，在商品生產最初階級上所見到的那種關係。

馬克思說：『因為商品生產按照牠的內在的法則發展。同時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所以固存於商品生產中的私有權的法則，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佔有的法則』。（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

馬克思底這些話，很明顯地暴露出社會民主派底理論——尤其是把在工人與資本家間的關係之本質歸結到二個平等商品所有者之關係的魯平底理論之詭辯的本質。

我們所指摘的資本積蓄之本質的特徵，就是表示着，牠與在沒有資本主義諸關係的其他經濟的構造中所看的擴大再生產，是一點不能混同的。

同時，還要特別指出，資本的積蓄，無論如何，不要與那種僅簡單地保存自然形態或貨幣形態上的價值的貯蓄，相混同。這種積蓄形態，只有在商品關係的初期發展期，才能看見，因為在這個時代，經濟在根本上還只是以私的消費為目的，轉化於貨幣的不過是過剩的使用價值。從資本主義的見地看來，使貨幣離開流通界，或將商品在現物形態上蓄藏起來，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資本家以這樣的方法去增殖貨幣：把貨幣從新投入于商品流通，從新投入于生產，為使貨幣增殖新貨幣。使資本家活動的根本動機，並不是使用價值，也不是將交換價值形態仍舊不變地蓄藏起來，而是價值之不斷地增大。

資產階級的辯護者以種種方法去證明，資本積蓄是資本家方面的犧牲：為了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他不能不『節省下』為他所榨取得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之消費，應限制其消費，因此，他們又把利潤當作資本家因節儉而得的工資。

依馬克思底話說，『節儉』論力使資本家……無饜的剝削者，價值自

已增殖的渴望者——成爲印度的迷信者，他「割破了自己的軀體」，且因這種「自己虐待」才活在世上。這種理論的粗略強辯性是很顯然的。

剩餘價值的增大，不與資本家之個人的節儉成正比例，而是與他所榨取的勞動力價值及勞動強度成正比例的。一年甚於一年地對於勞動階級榨取愈益強化的結果，剩餘價值量增到這樣的程度：就假定資本家過非常奢侈的生活，而其私人耗消的增加，遠落在其收入的增大之後，所以他自己的利潤中充當私人消費的部分，愈加減少。因而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本身，使資本家可以從對於財富的消費的誘惑及對於保存與繁殖財富的欲望兩者之精神的鬥爭中解放出來。

* * *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當資本家不私自消費爲他所佔有的剩餘價值的全部，而以其一部投入於生產而作爲追加資本的場合，是可能的事情。

資本積蓄的結果，資本就被擴大，剩餘價值的生產也被擴大。

資本家並不關心一切生產的擴大，而只是關心給他保障增大剩餘價值的那種生產之擴大。這種事情，就是資本主義的積蓄之根本的特徵。

從這個見地上看來，使用價值的擴大再生產，若不伴隨着剩餘價值量的增大，那就不是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的擴大再生產。

第十八章 資本積蓄與大生產底長成

第八十九節 資本的集積與集中

「無論如何，儘管積蓄吧！」——這是資本家的標語，凡能保障這積蓄的手段對於他皆是好的。剩餘價值量的增大，不但是獨立的目的，也是將來積蓄為手段。

甚至資本家主觀上以為他所已得到的財富水準為滿足，但為要保持這個水準他就應擴大生產——積蓄。資本主義的競爭不使積蓄停止，不使資本成長停止。如不擴大生產，那就要落後，在競爭中就會失敗。

但是為什麼，積蓄把競爭上的優勝的可能能性給與資本家呢？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積蓄能使資本家擴大企業的規模；而企業越大越堅實，便越有利，這是通例。

大企業對於小企業的優越點，是在什麼地方呢？

商品的低廉，在資本家彼此間的激烈的競爭戰中，是主要的武器之一。以降低價格為目的而講究一切技術的進步，大生產比較小生產更有可能：牠能够利用科學及技術的最新的發明，建設附屬的研究所，招聘最好的有能力的技術師或發明家。假設某企業特有比較其他企業更高度的技術，那末，牠就能够拿社會的必要以下的勞動時間，生

產商品；結果，雖然這商品是以市場價格以下的價格出賣，還是保證牠得到差額(超過)的利潤。

此外。大生產因為能够支配龐大的勞動力，所以能使勞動更加專門化，種類更分得詳細，因此又可以減低原價。

還有許多的經費，即維持建築、保持溫度，透光，保管，管理等等所須要的費用，並不是與生產的增大或企業運轉的增大，成比例地增加的，而是在比較更低的程度上增加的。所以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企業運轉的加速，則對於所產生的每一單位的商品所分擔的費用就減少了。

同時，大生產在市場的行動上即無論出賣他的生產物，或收買原料，輔助材料等等的場合，牠所佔的地位，比較小生產所佔的要優越得多。大企業能大批的購買——這樣一定要便宜些——，可以不用中間人，又可以壓迫出賣者等等。此外，大生產在商業界享受着極大的信用，牠能以很快很有力的條件，得到長期的信用交易。

大生產因為所得的利潤大，所以牠擴張起來比較小生產要快得多，且一旦遇到因沈滯，災害，恐慌等等而發生的打擊時，大生產也比小生產容易避免些，

所以大生產能製造低廉的商品，且在競爭中佔着極有利的地位，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大企業當然生長起來，並且必定發生生產的集積與集中，以及資本的集積與集中。

什麼是資本主義生產之集積與集中，資本的集積與集中呢？

馬克思說：「一切單個的資本，都是生產手段之或大或小的集積，並且適應這集積的大小，支配相當勞動軍。任何積蓄都是新的積蓄手段。在何積蓄，都使當作資本而作用的財富的總量擴大，同時還加強在個個資本家手中的財富的積蓄，因此，又擴大了大規模的生產基

礎，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資本的增大，是由許多個別資本的增大而完成的……同時，由最初資本的各部份分離出來，當作新的獨立資本開始其機能。這時特別演着重要作用的事情，就是資本家家屬內部之財產的分割。所以隨着資本的積蓄，而資本家的數目也或多或少地增加起來……」。（資本論第一卷七篇第二十三章）。

「全社會總資本的這樣分裂為許多單個資本，或社會的資本這些斷片，互相排斥着，互相吸引着。所謂資本互相吸引這件事，已不是與資本的積蓄含有同樣意義的生產手段及勞動支配之簡單的集合，牠底意義是；已成的資本再集合起來，揚棄其個別的獨立性；並且資本家對於資本家的收奪實行起來，多數的小資本，轉化為少數的大資本。這種過程，與前一過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牠只是以已存的機能資本的分配的變化為前提，所以牠的作用範圍，並不限於社會財富之絕對的增加，或積蓄之絕對的界限。一方面多數人喪失了資本，另一方面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的資本，却龐大起來。這是與積蓄及集積不同的嚴密意義上的集中」。（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

從上面馬克思的話看來，集積與集中的差別，可以很明顯的歸納如下：所謂集積，就是企業的增大，是由于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即由于剩餘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而來的企業的擴大。在這種意味上，集積的概念，與我們在前面所規定的，歸結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追加資本而充用于將來的生產擴大一點的資本蓄積的概念，是一致的。

如馬克思所說，這個過程的特徵是：在這個場合，「社會資本的增大，是經過許多單個資本增大的中介而完成的。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與這並行的是，集積過程到了某種程度，既成資本的分立過程也就進到相當的程度。這個分立過程，如馬克思所說，是由「資本家家屬之財產」的分割而發生的。

一方面有分立的傾向，另一方面又有馬克思所謂與集積不同的資本集中的傾向，對牠起反作用。

所謂資本集中，並不是由于剩餘價值資本化而來的個別的企業擴大；牠是由于大企業合併小企業，大資本掠奪小資本的方法，或由于相互間競爭戰的結果而在大企業間締成的協調而顯現的現有資本的結合。資本的集中，是以減少個別資本的數目，來增大大資本的。

資本的集積與集中，都是資本主義積蓄的結果，同時，牠們又非常助長了積蓄的發展。

新企業的創立與已有企業的擴大，都要求巨大資本家所有的大資本的投資；可是資本主義愈加發展，創立新企業所須要的限度的資本，也愈加增大。

若沒有資本的積集與集中，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技術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資本的集中，把分散的資本，統合在一個強大的力量之下，因此才給資本主義實現了為個別資本家所不能實現的巨大企業；同時牠非常地增大了資本的威力，進而又能助長積蓄的強化。然而，不管資本集中在繼續的積蓄上與在資本主義發展之一般行程上表示出如何重大的意義，牠無論如何不能有領導的意義。應指出，能集中者僅係已積蓄了的資本，所以為集中所必需的先決條件，任何時候皆為剩餘價值資本化的一定程度，即資本與生產的集積過程。所以在其經過其二種形態——集積與集中——而實現的統一的資本積蓄中，領導作用屬於資本與生產的集積，而不屬於其集中。

在歷史發展的行程上，小商品生產，如我們所已知，因其內在的矛盾，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與生產之集積過程在這種轉化中有決定的意義。這種過程使小商品生產者分化為資本家與工人。集中

大大地加強了這種過程，因大資本家壓迫小資本家，使之與生產手段分離開來。所有這些又增大了勞動的社會化，使小的個人的生產轉化為社會的生產。此外，如我們所已知，又改變私有制的內容。基於自己勞動的私有權被基於佔有別人勞動的私有權，即資本主義的私有權所代替。所以在社會勞動與其私有形態間的矛盾基礎上所發生出來的，生產集積過程發展到了在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小商品為生產技術更改良，勞動更社會化，當然在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的佔有間的矛盾更尖銳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所代替。

第九十節 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隨 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高度化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資本的集積與集中，使個資本家的企業擴大起來。同時企業的擴大與確立，是與其技術的發達相伴隨的。

但技術的發達，必須要反映於企業的全資本構成。在任何資本主義的生產中，我們必須分別清楚，活的勞動力與為過去勞動的結果之生產手段。資本主義企業的技术到了某種程度，每單位的活動力就能夠承受並且加工在與這種程度相當的某種分量的生產手段。

『在所使用的生產手段的分量，與對於使用牠的時候所須要的勞動量間的比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四章）就表現着所謂企業資本之技術的構成。

可是，一切資本，都表示着某種價值量。誰都知道，從價值及剩餘價值之造成的見地看來，為過去的（「死了的」）勞動之結果的生產手段，是不變資本；而活的勞動力是可變資本。因此資本之技術的

構成，若要用這各部分的價值來表示，就必須拿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率來看看。

這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因牠體現出發生於技術的構成中的變化，故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

馬克思說：『資本的構成由兩重見地去考察。從價值方面來講，這是由資本所分成的不變資本，或生產手段的價值，與可變資本，或勞動力的價值(工資的總額)兩者的比率來決定的。從作用於生產過程中的材料方面來講，一切資本都被分為生產手段與活的勞動力，在這種意味上，資本構成，就是由被使用的生產手段與使用這手段時所須要的勞動量的比率，來決定的。我叫前者為資本之價值的構成，叫後者為資本之技術的構成。在這兩種構成之間，含有密切的交互關係。我因為要用一種名詞來表示牠。所以把由資本的技術構成所決定的，而且這個技術構成的變化將要反映在牠上面的這種交互關係，叫做資本之有機的構成』。(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

所以馬克思在其資本有機構成的定義中，概括着價值的資本構成與技術的資本構成之統一。然如由此作出在其間之完全同一的結論，而忽視將馬克思所曾指出的存在其間的區別，那就錯誤了。

這些區別可以這樣去說明之：在價值的資本構成中所發生的變化並非任何時候皆吻合着，當然也非任何時候皆體現出在技術的資本構成中之變化。

例如在某企業中，在同一技術的裝置之下假如現在使用比以前價高的原料，那末，可變資本的價值雖然沒有變動而不變資本(其中包括原料)的價值却增大了。所以這企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提高了，雖說技術構成並未變動。但如在資本之技術構成中發生一般的全部的變化，就又體現於價值的構成中。

技術提高對於資本構成有什麼作用呢？

今有一個企業，能夠採用複雜的高價的機械，勞動生產性因而提高了，並且牠的各勞動者能夠承受大量的原料，能夠轉動多量的生產手段：這樣的企業，在技術上是比較完備的；又如另外一個企業，牠的各勞動者只能承受較少的機械，建築物，與原料，就是不變資本比較少，在技術的時代上比較落後。這兩者比較起來，前者之有機的資本構成當然要比較後者高些。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技術的進步必然要提高企業之有機的資本構成，而可變資本的價值愈加追不上不變資本的價值。

這樣，在社會的總資本中，可變資本的部分，愈加縮小了。

馬克思說：「在積蓄的累進中，不變資本部分對於可變資本部分的比率，不斷的變更着。假設這個比率在最初是 1: 1，漸漸的就改爲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等等；所以資本增大了，轉化爲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就漸漸由資本總價值的半數減低爲牠底上， $\frac{1}{4}$ ， $\frac{1}{5}$ ， $\frac{1}{6}$ ， $\frac{1}{7}$ ， $\frac{1}{8}$ ，反過來，轉化爲生產手段的資本部分，却累進爲 $\frac{2}{3}$ ， $\frac{3}{4}$ ， $\frac{4}{5}$ ， $\frac{5}{6}$ ， $\frac{6}{7}$ ， $\frac{7}{8}$ 等等。勞動的需要，並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是由總資本中可變資本部份的大小決定的，所以這種需要，並不和從前所假定的一樣，因總資本的增殖，按比例地增大起來却因總資本的增殖而累進地減少」（資本論第一卷501頁）

但是，這絕不是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者的絕對數是時常減少。在絕對數上，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都是增大的，不過前者增大迅速，是後者所不能與牠比較的。例如，生產擴張爲兩倍，而勞動者的數目，因技術進步僅增了一倍半。

總之，資本主義發展了，技術進步了，同時，就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但是這有機構成愈加提高，愈加能夠以相對的漸漸減少的可

變資本部分，來推動漸漸增加的生產手段。技術前進一步，就解放出來一部分的勞動力。

固然如我們所知，一切技術的改良，都使商品的價值及價格低落，所以事實上就擴大了牠的銷路，另一方面，在某種產業部門或企業中，因為技術的向上與銷路的擴大，結果，就擴大了供給牠們以原料，補助資料等等的其他部門的生產。而且若是這種擴大，是以本來的技術為基礎而完成的，那末，使用勞動力的分量，也必然要增大起來。然而，從事於生產的勞動力的總量，對於不變資本的增加，是愈加相對的減少了。

在戰後的近代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技術與資本的有機構成的成長，不但使勞動者受到相對的驅逐，還受到絕對的驅逐；資本家一方面使自己的企業「合理化」，提高牠的技術，並且擴大生產，可是，隨時不斷的減少勞動者的人數。

第十九章 資本的積蓄與勞動階級的地位

第九十一節 在以不變的技術爲基礎的積蓄下之勞動者底工資

資本積蓄，在勞動階級的地位上，尤其在他們的工資上，有怎樣的反映，我們現在來考察一下。

以前討論工資時，我們是從勞動力由資本家照其完全價值支付的假定出發的。我們所以設立這個假定，其必要的理由，是爲要詳細闡明資本家的榨取的本質；爲要證明一切資本家雖然照價支付勞動力，也還是榨取了勞動者，還是從勞動者得到剩餘價值。

然而這個假定，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之真實的現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勞動力的價值以貨幣爲媒介，才被表現出來而採取價格的形態，換言之，就是採取工資的形態。可是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因受了需要與供給的影響，而與其價值相背離。所以爲要具體答覆在資本積蓄的條件下的工資在現實上是怎樣變動的問題，就必須闡明這時勞動市場上勞動力的需要與供給的關係如何。

首先要檢察一下：當資本積蓄的進行，是在資本之不變的有機構

成下，以不變的技術與不變的勞動生產性為基礎的時候，工資情形怎樣。

在這些條件下，資本家為要從勞動者榨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牠最希望能夠以最大限度使用已有的基本的裝置，即機械與建築物。

因此，他最初是想用延長勞動日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我們知道，這種方法是與一定的生理的限界及勞動者之有組織的抵抗相抵觸。所以資本家就用產業「合理化」的方法，來提高勞動的能率。資本家，努力使他所有的時間與裝置，就是一分鐘也不要浪費，勞動者的一舉一動都要很有利地去利用。

把這種制度表現到最高度的，是福特主義（取自美國有名的汽車大王福特的名字）。根據福特自己的話，在他的諸企業中的機械，都配置着一定的，僅僅是每個勞動者及每架機械所必要的時間。「在這個標準以外，不用說一尺，就是一寸的時間也是沒有的」。福特又拿和上面所說的同樣的精確程度，來規定勞動者製作的速度。「所給勞動者的時間：除掉絕對需要的以外，一秒鐘也沒有多餘的」。勞動者的動作精確到以秒為界限，像這樣的制度，怎樣消費勞動者整個的能力，怎樣使勞動者的神經緊張得可怕，就可想而知了。

榨取愈強化，剩餘價值的數量就愈大，轉化為資本的部分也愈多；擴大了的生產，又給與更多的剩餘價值量。像這麼和雪一樣的，沒有止境的增加剩餘價值，擴大積蓄。

這個擴大，若是在不變的技術之下進行，資本家就要不斷的要求新的勞動力。在勞動市場上，需要與供給的關係，就能暫時呈現一種對於勞動者有利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下，工資能夠騰貴起來。

勞動力的價格騰貴與無償勞動的減少，不能達到威脅資本主義制度的程度。資本主義經濟的機構本身，就注意到如何去抑止工資的騰

貴。

資本主義的積蓄之唯一的刺激，就是剩餘價值的增大。勞動力的價格騰貴，同時剩餘價值量就要遞減。使資本家對於積蓄的刺激及速度因此衰微。結果，勞動力的價格又低落，再恢復到對於資本主義積蓄有利的狀態。

我們剛才所說的，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之下的積蓄條件，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註）我們已指出過，競爭使各個資本家擴大企業的規模，提高生產的技術。資本主義的法則當然是在資本有機構成增高的基礎上的積蓄。

【註】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積蓄之一般法則時，由在有機構成不變的基礎上之積蓄開始研究這種事實可由二方面去說明之；第一，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基礎上的積蓄，於大機械生產發展（十七——十八世紀）以前，在資本主義的兒童時期有地位，第二，在資本的技術構成不變上的資本之擴大再生產組成了在積蓄過成中的在產業週期內的階段。

第九十二節 技術的成長與勞動階級的地位

然則技術的發達，對於勞動階級的地位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知道，技術的發達，與資本的有機構成的高度化，是相伴隨的。這時候，可變資本的增大比不變資本的增大，要遲緩得多，所以很顯明的對於勞動力的需要，相對地減少了；在不變技術的基礎上的再生產中所感到的勞動力之暫時相對不足的情形，現在更加稀少了。生產技術不斷進步的結果，為要給與現在生產中所有的勞動者以工作，就須要更多的資本，更多的生產手段。因此，工人想尋找新的工作就更加困難了。

但是，還不止是這樣。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勞動者被機械驅逐於工廠以外，還產生了許多形成失業豫備軍的原因。這種豫備軍是等待資本家去使用的。

首先資本主義技術的發達，不但使勞動力的需要相對的減少，還更加把婦女及兒童都大批引入於生產裡面。而這些婦女及兒童又與成年男子勞動者相競爭，使勞動力的一部分又相對的變成過剩的東西。

其次，因為資本家間的競爭及生產的集積與集中的結果，使中小資本家破產而落入失業者之隊伍。在農業經濟中，資本之集積與集中，破產了基本的農民大眾，使之成為零落的被壓迫的階級——貧農及佃農——而形成了莫大的沒有工作的過剩勞動力。

這就是使失業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斷的友伴之主要原因。

馬克思把失業豫備軍的存在形式，分為流動的，停滯的，及潛伏的過剩人口的三種。

過剩人口之流動形態，是在一部分勞動者暫時失業的時候出現的。這是因為個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部門不能平均發展的結果。在這個和那個生產部門中技術的進步，使這羣或那羣勞動者暫時成為過剩的人口。

假若這些勞動者的減少，是使商品價值低落之技術向上的結果，則這部門的銷路就擴大，生產一擴大，就需要追加的勞動力，所以大部分失業勞動者，在暫時失業以後，又可以仍舊回到從前因為技術發達被驅逐出來的部門裏去。

雖然這樣，可是失業的勞動者們，很難回到他所習慣的原來的生產部門裏去。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間有不同的技術的進步之結果，勞動必須重新被分配於個個生產部門，在這種情形下，大部分

勞動者就不能不到新的部門中找工作；這新的部門，比他原來工作的部門，其運轉的速度更快。

過剩人口，除了流動的形態以外，還有所謂停滯的形態。這種失業形態的主要成份，是失掉了工作以後，既不能回到自己原來的專門的工作去，又不能加入新的生產部門的勞動者。這些失業者集團，漸漸失掉了自己的熟練。一部分從事於不規則的暫時工作，例如掃除道路，劈柴苦力，及碼頭苦力等等，以維持生活，一部分則求乞，偷竊，劫掠過活；失掉了自己的勞動力的勞動廢兵，就多半變成這種樣子。資本抓他們好像抓檸檬那麼容易，吸完了就丟到街上去。

這部分的豫備軍，不是到了勞動力非常缺乏，與產業的成長異常強化的時候是沒有加入生產的可能的。總稱這個集團為流氓普羅列塔里亞，或浮浪普羅列塔里亞。在這些隊伍裏面，蓄藏着資本主義榨取的犧牲品，醉漢，強盜，賣淫等等。

相對的過剩人口，除了這兩種顯明的形態以外，還有潛伏的形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就是農業比較工業落後。這種落後的結果，使農業不能容納由農村人口之自然的增殖所形成的追加勞動力的某種分量。在農村中，這些過剩勞動力，使農業勞動者的勞動非常低廉。

這些過剩的農業人口，一部分到工場上去找職業，一部分仍舊留在農村裏，沒有相當的工作去救濟其貧苦的生活，苦苦的等待着任何賤價工作的機會。

他方面，包含着人口增殖使資本的可變部份比不變部份相對地減少的資本主義法則，更適用於農業經濟。在農業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使可變資本不僅相對的減少，而且絕對的減少，絕對地縮減了資本主義農業中用以僱傭勞動力的數量。過剩的勞動力不但不為農業經濟所收用，同時因有豫備軍，且不能為工業所收用。

這些過剩人口的形態統屬於潛伏的形態。他們並不是由生產中解雇出的失業者。他們是半就業，半失業的農民，這個集團的構成分子，都是自己多少還有一點極微小底財產的。但是在他希求工作的方面，與從生產中被驅逐出來的勞動者沒有什麼分別的——這是半無產者。因此，資本仍舊是想趁着機會，去吸收這些勞動力的新販賣，新無產階級的隊伍。

預備軍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是有很大大意義的。有了他們以後，在產業興旺期所看到的迅速的擴大生產，才有可能。假使沒有期待着資本家雇用的預備軍，那末，要擴張生產，除了等待着勞動人口之自然的增殖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為榨取所必要的追加勞動力，若要等待因自然的增殖而產生，那就必須經過一個世代的(三十年)期間。然而在產業的興旺期，一舉就必要莫大的追加勞動力——這是非目前就有不可的。資本家對於新的追加的勞動力，是不能够很耐心地等待着牠成長起來。因為在這個期間，資本主義恐怕要反復着好幾次的好市面，好景氣，恐慌，及不景氣了。

因此，資本主義造成了並不依存於自然增殖的獨特的人口法則。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積蓄，寧肯不斷的生產着無用的過剩的勞動者的人口，這種過剩人口，與資本主義積蓄的力量及範圍比較起來，是相對的，與資本之平均的利用要求比較起來，是過多的』。

「所以，勞動者人口自身，一方面產生資本的積蓄，同時，他方面在增殖的範圍中又不斷的生產使他自己相對過剩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特有的人口法則。實際上，任何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法，都有牠自己特殊的，含有歷史意義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只有在歷史上不受人類干涉的動植物之中，才能存在。

但如勞動者的過剩人口，是積蓄之必然的產物，或在資本主義基

礎上的財富的發展之必然產物；那末，這過剩人口，又是資本主義積蓄的槓桿。並且，又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生存的條件之一。這種勞動者的過剩人口，形成着資本可以自由利用失業預備軍，牠絕對隸屬於資本之下，好像是資本以牠自己的費用養成了的一樣」。（資本論第七篇第二十三章）。

預備軍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在資本主義下，一部分工人的過量勞動適應於別部份之被強制地失去工作。除其他因素而外，預備軍的存在証明了，資本主義的體系不能為替勞動者保障工作與飯盃而組織生產。

所以布爾喬亞與社會—民主派的經濟學家，力圖或者証明，為馬克思所發現的預備軍法則不反映於現實性，或者說，預備軍法則——完全不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關聯的自然法則而且將永久存在。這後一種理論並不是新創的。牠早已為英國的經濟學家兼牧師的馬爾薩斯所宣導。依馬爾薩斯的理論，人口的繁殖遠比為保障增殖的人口底生活所必需的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的增加為快。

這就是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對於預備軍存在之說明。他們以為救濟資本主義的這種病証之唯一的辦法就是節制生育。

我們已知，預備軍存在的原因不應於自然中，而應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中去尋求。預備軍為資本主義積蓄行程本身所形成，牠完全為不平衡地進行的資本主義再生產所必需。

把失業問題歸結於自然底一般法則之領域，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完成了其特定階級的使命，馬克思曾以下列的話明確地解剖了這一點：

「上述的理論……對於布爾喬亞是極有利的，牠安着他們底良心，以人道的責任去責備他們底殘忍，捨棄了由社會制度所發生出的結果，注意着由自然所流露出的結果，最後且給他們以袖手旁觀無產者

之死於饑餓——好像旁觀自然現象——的可能性，他方面，則不注意無產者貧困的責任，且不因此而責備他們』

第九十三節 預備軍及其對於工資的影響

預備軍的存在，怎樣影響于工資與勞動階級的一般地位，是不難明白的。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積蓄的過程中，也有勞動力的供求關係對於勞動者方面有利的瞬間。這就是在積蓄以不變的技術為基礎而進行的時候。

那時期，正是使工資增高勞動力價值的絕好機會。然而預備軍的存在妨害了這種增高。

到了沈滯期及恐慌期，幾十萬挨餓的人們，都在敲打工場門扇的時候，這些預備軍的存在，可以使享受着就業的幸福的勞動者之地位惡化起來。雖然勞動者因為工資的低落，不能再生產他的勞動力，而對於資本是不成什麼問題的。他可以隨便辭掉勞動者——因為在他們的後面，還有失業的大預備軍在等待着。這些預備軍，都伸着頭期待着資本家賜給自己以勞動的可能性，即供給資本家榨取的可能性。

不但如此，資本主義之飛躍的發展，不斷地使對於勞動力的需要變動起來，因此，使得勞動者的地位非常浮動。誰也不能保障，今天為工資而工作着的勞動者，明天是否還能為工資而工作。

從破產的手工業者之中，尤其是從沒有教育的，生活程度低的，與資本家鬥爭時沒有一定目標的貧農之中，不斷地流出新的勞動力。這事情對於勞動者的工資給以不斷的威脅。

龐大的失業者大眾，不單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供給其勞動。在交

通發達的現在，他們若是找着工作，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敢跑去。在各國，我們可以看見勞動者不斷地從農業地，農村向着工業地移動。誰都知道，在革命前的我國，農民不斷地從農村向莫斯科（及一般工業中心地）或彼得勒移動過，當巴古石油工業發達的時候農民大眾從中部及伏爾加諸縣向巴古殖民的事情，也是很有名的。

勞動力的移動，並不限於一國以內。從經濟落後的，具有貧困的農民及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大眾的國家，失業者大眾，和雪崩一般流入到勞動力不足的，一般的工資較高的工業國家裏去。例如，在帝制時代的俄國，波蘭，和意大利，都供給本來工業就很發達的美國以勞動力。最近幾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從新發見了勞動力之豐富的貯水池。這就是東方諸國，尤其是中國及日本之汪洋的人類的滄海。

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中所形成的預備軍的洪流，超越國境而流到產業高度發展的國家裏，同時到處對於勞動階級的地位給與了惡影響。

『大體上——馬克思說——工資之廣泛地增減是由適應於工業週期之變化的產業預備軍之擴大與縮小去制約的。故工資并非決定於工人人口之絕對數的變動，而是隨工人階級所由分化為在業軍與失業軍的關係，移民的相對範圍之增大與縮小，找到工作的與復又失業的程度而變化的』（前書，五〇七——五〇八頁）。

第二十章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資本主義積蓄與社會主義積蓄

第九十四節 勞動階級的貧窮

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且加強了資本的集積與集中。資本主義社會的財貨，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都大大地集中在極少數大資本家的手中。在殘酷的競爭過程中，破產了小生產者——農民，小手工業者，小有產者，且提供出許多無產者。隨無產者人數之增加，隨無產者勞動生產性之提高，又增多了預備軍，社會收入的工人部份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準下降了，他們相對地，絕對地貧窮了，工人的榨取加強了，階級的矛盾尖銳化了，在勞動與資本間的鴻溝加深了。

『社會的財貨，——馬克思說——資本的機能，資本增殖的能力與範圍，愈大，因而，無產者的絕對量愈大且其勞動生產性愈高，則相對的人口過剩也愈大或產業預備軍也愈多。自由的勞動力，與資本擴大力因同一原因而發展。故，產業預備軍之相對的大小與財貨力之增加相並行地增多。但預備軍比之在業勞動軍愈大，則固定的人口過剩也愈多，……最後，勞動階級貧困的階層與產業預備軍愈大，則在業的貧窮也愈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蓄之絕對的，一般的法則。』

（資本論第一卷五一四頁）

所以，資本主義之發展的法則就是勞動階級之絕對的與相對的貧窮化。

相對的貧窮在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收入之工人部份的降低。

絕對的貧窮在乎降低工人生活水準，減少工資，提高消費資料的價格，增大勞動強度，延長工作日等等。

『工人絕對地貧困了——伊里奇說——即比以前更窮了，不能不過着惡劣的生活，可憐的飲食，襤褸的衣服，棲息於屋簷之下，坑溝之所。

但，還須看看工人之相對的貧窮，即在社會收入中，工人部份之減少。工人部份比起資本主義社會之極快的富裕來，是極其微小的，因後者是千百萬地增加的。』（全集十六卷，二一二頁）

因資本主義積蓄之進展而發生的工人階級之貧窮，極明顯地爆露出資本主義矛盾的一切內容。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愚笨地反對馬克思的關於絕對貧窮的學說，他們企圖以種種方法去證明，與馬克思相反的，勞動階級地位改良的趨勢之實現。

在反對馬克思的絕對貧窮論的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間最早出現的修正主義者是伯倫什坦與斯特魯佛及其他人。伯倫什坦以為馬克思的生產集積論是不曾証實的，馬克思所發揮出的關於絕對貧困的法則，僅根據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偏面的事實，但這時候以及此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按別的途程而進行的。自此時起，勞動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界限的影響加強了，職工會的影響提高了，因而豫備軍的作用消逝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伯倫什坦說——職工會能使勞動的供給適應於需求』，換言之，就是，否認豫備軍的作用。

斯特魯佛堅認，『烏托邦的特徵必需存在於馬克思主義中，當作社會主義之理論的根據，這時他由且應由四十年代之事實的前提出發

，即由貧窮論出發。』

在當時，反對伯倫什坦與斯特魯佛以及馬克思的貧困論之其他批判者的，有考茨基與蒲列哈諾夫。但他們仍在修正主義的立場上去批判伯倫什坦與斯特魯佛的。馬克思的關於勞動階級之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學說被考茨基與蒲列哈諾夫代以這樣的見解，他們以為勞動階級只是相對地貧困，只是與資本家的財貨之增長比較起來，才更形貧困了；據他們的意見，勞動階級生活水準之絕對的體現，則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提高了。

修正主義者的關於勞動階級地位因資本主義發展而改良的一切膚淺的見解是基於片斷之事實的，基於不足為資本主義主要趨勢之特徵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個別事實與因素混合的，基於不容置辯地表示出的勞動階級絕對與相對貧困的增大之實現的，主要實際材料之被忽視的。

在總結四十年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論中，昂格思說：

『當時，甚至對於大部人都改良了，但一切改良任何時候均不是因為失業豫備軍的勞動者大眾之洪流，工人不斷地被新機器所排擠，鄉村工人之流入城市，甚而現在皆大大地為機器所排擠，而發生的』
(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德文版第二版序言六〇頁)

所以昂格思指出，有時能使勞動大眾的地位之暫時的改良，不是因為失業豫備軍而發生的。

只有貴族工人的地位，即在特殊的條件下和資本家給以較優待遇的少數工人，多少真正有所改良，而勞動大眾的『貧困與窮相的水準』則增大了。

伊里奇曾根據戰前的最近時期，無可置辯地指出，『工人比先前簡直更貧困了』，生活惡劣，飲食惡劣，以極大的緊張去工作等等，

由於資本主義積蓄的累進，由於財貨之增加，勞動階級的地位，絕對地惡劣了。

工人地位絕對的惡劣，其生活水準之絕對的減低，並不依存於其名目工資的水準，並不依存於其名目工資的增減。

在決定工人生活水準時，我們不僅應注意名目工資，更應注意到工人消費品之實在價格。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諸階級上，名目工資，固然增加了，而消費品的價格則漲的更快，因而工人生活水準實在減低了。

分析了三十年來德國工人的工資之後，伊里奇曾作成這樣的結論：在這時期內，名目工資平均增加百分之二五，同時「生活品的價值最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前的最後十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均有同樣的情形。

『在英國，根據四七種職業，實在工資，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減低了百分之十。在德國(普魯士)，實在工資，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減百分之二十。研究美國工人工資的布爾喬亞學者，徒葛拉，以為美國的一九〇〇——一九一五年間的實在工資比一八九〇——一八九九年間的水準減低百分之三一四』(『在爾雪維克』雜誌，第一九三二年，三期，六九頁)

只是這一點已完全無可爭辯地說明了勞動階級生活水準之降低了。

然而我們尚未計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勞動強度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大大地提高了，向工人榨取出其生活汁，且如我們所見者然，把他變成了苟延於半生半死上的殘廢者，假使計及這種能決定工人生活水準的更重要的因素，則工人絕對的貧困，更為明顯了。

在決定工人的生活水準時，不僅應注意到在業的工人，不僅應注

意到「先進」國家的工人(考茨基就是如此做的)，還應注意到世界市場與落後的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

總之，在決定工人的生活水準時，不管布爾喬亞的與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如何，皆應注意到所有這些因素：工資的高度，生活品的價格，連勞動強度也算在內的勞動條件，勞動日的長度，失業人數，與連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也在內的各國之工人地位。

假使僅注意到西歐與美國工人的狀況，就不足置信絕對貧困的法則了——如誰這樣想，那就大大地錯誤了。布哈林批判考茨基時就作過這樣的錯誤。

他說：『馬克思在其理論中分析了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且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之內在法則致使勞動階級地位之惡化。

考茨基怎樣瞭解呢？他把勞動階級只瞭解作大陸的勞動者，這些無產者層的地位日益改良了，但考茨基不明白這一點，大陸勞動階級地位的改良是殖民地民衆被壓迫與虐待之寶貴的代價』。

這樣去瞭解貧困化是完全不正確的。本質上布哈林處在他想給以批判的考茨基的立場上了。只有貴族的，上等的勞動階級的地位，因資本主義發展而多少所有改良。至於說到大陸的動勞大衆，則根據對於他們的關係，為馬克思所確定的絕對貧困的法則，完全保有其一切力量與意義。

盧林堡對於絕對貧困這個問題的見解也不正確，雖說她的立場與考茨基的不同，她與考茨基相反，承認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存在着相對貧窮與絕對貧窮的傾向。但與考茨基相同，她以為絕對貧窮的傾向為勞動者職工會之有組織的鬥爭所克服。

如後面我們所知者然，勞動階級之有組織的鬥爭，不管牠如何重要，終難克服且不能克服勞動階級之絕對貧窮的。如馬克思於理論上

證明出以及勞動運動經驗於實際上顯示出似的，勞動階級之有組織的鬥爭充其量也不過稍許提高了有組織工人的工資，且非常不確定，勞動者地位且因改良主義職工會之機會主義的政策而大大地惡劣。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更深化且尖銳化了無產者的貧窮。在資本主義體系一般危險尚殘存着的時期中，貧窮更形強化。

在這時期中所可看到的第一個特點是，失業者大大增加且成爲固定的，即甚至在好轉時也不能復業。

甚至在戰後美國資本主義向上的時期，都有百分之九——九五工人沒有工作；在英國，於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間失業者不下百分之六一七；一九二六年資本主義諸國失業者一般的數量不下千三百萬——千四百萬人。

在自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危機時期中，失業者的指數更形增高。一九三二年，資本主義諸國的失業人數在四千萬人以上。一九三四年，稍形減少，在美國，失業者人數達到千萬人，德國——六百萬人，英國——三百萬人。同時，工作時間不完全的勞動者數量則大大地增加了。現在美國，工作時間不完全的工人爲全產業工人全數的四分之三。

一般危機時期的第二個特徵，是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不僅使可變資本相對地減少，在有些部門且使僱用的勞動力絕對縮少。

結果，遂大大地加強了工資減低的傾向，不僅實質工資減少連名目工資也減少。在最近經濟危機的時期中，這種減少達到可驚的度程。

在經濟危機前，一九二七年，德國工人的工資比較戰前低百分之五，英國——百分之十，法國——百分之二十。美國，這時候的工資比較戰前高百分之二四，而勞動強度，比之工資提高得更大。自經濟危機開始時起，德國工人與僱員的一般工資總量，自一九二九年的四

四五萬萬馬克，減少到一九三三年六個月的一二五萬萬馬克。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美國工資的指數減低百分之六二，同時在這時期內，資本家的收入指數增高百分六十。

在同時期內，我們可於資本主義諸國中看見勞動日之延長。在美國存在着六十一—八四小時勞動週（註）。法國，在許多部門中，勞動日達到了————一二小時（引用自動機的工業），甚至有達到一二——一五小時者（糧食工業）。在殖民地國家勞動日更延得長。

〔註〕這許多數字皆根據『世界經濟情報』，一九三四年第四期的。

最近幾年來，不僅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甚至『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皆廣泛地採用強制勞動。例如，光在德國一國，已有百萬工人在所謂勞動營內工作，那裡，勞動條件與奴隸，罪犯的勞動並無任何不同。

亨利曾這樣敘述德國的這種工人底生活：

『他們毫無意味地工作着；在監督工頭，甚或在鞭笞的恫懾之下，大群人皆無權支配其自己工作的地位，甚至往往在軍事的形態下，經常地無條件地服從其工頭。他們如奴隸一樣生活着；與其家人分離，大多數成爲變相的移民甚至穿着囚衣而工作（例如在紐倫堡附近的勞動營），在廣場上，在樹林下或平地上一塊睡眠，而獲得吃不飽餓不死的準貼，他們底業務是工作與教育，教育與工作』（消息報，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

這些工人的貨幣工資差不多每小時二戈比（三，七五分尼）。不僅在法西斯的德國，就是在英美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類似的組織。

假使再注意到失業救濟金之非常減少，或完全廢除以及文化事業等等資金之減少，那末在我們面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出工人階級之空前

貧困化的畫景，其生活水準之空前的低落，且完全証實了馬克思與昂格思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說起的偉大預言。

「工人——他們說——貧窮了，而貧窮的成長比國民和財富的成長更快得多。這明顯地証明，布爾喬亞無力再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且以制約法則的資格把其階級存在的條件強納於社會中去，牠無力統治，因牠無法保障其奴隸的生存，即使在共奴隸的界限內……社會不能在其權力之下存在」(『共產主義宣言』，二八頁，一九三二年俄譯本)

第九十五節 職工組合及其在爲工資而 鬥爭中的作用——伊里奇論階級鬥爭之工 團主義的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瞭解

『資本主義生產之一般的傾向——馬克思說——並非提高，而是減低平均的工資。』(馬克思：工資，價格與利潤六三頁)

職組於職工組合中的工人，在與資本家作堅決的鬥爭中，有時固能稍形提高工資的水準，但這絕對不能消滅勞動階級的貧困。

『工人的工資——伊里奇說——甚至在罷工鬥爭中，工人方面獲得很大的勝利時，其增高，也遠比勞動力支出加多更爲遲緩。』(全集，第十六卷，第212頁)

假使在生產發達時期，資本家在工人階級的要挾之下，肯稍許增加工資，則在生產衰落時期，他們不僅從工人處奪回其勝利品，且往往減低工資到半饑不飽的生活水準。

這表示出，直接的經濟鬥爭充其量也僅能暫時地，局部地改良工人的狀況。

工人的經濟鬥爭不能僅限於爲工資的鬥爭。牠不可避免地會高漲

到爲工人階級地位之一般的改良而鬥爭，爲國內最低生活之確定，爲在所有工廠的同樣的工作日之規定，爲工作日的縮短而鬥爭。但階級鬥爭的經驗必然使工人相信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的領域內爲工人階級地位之改良而進行的經濟鬥爭是不能成功的，牠不能真正改良工人的地位。所以工人的經濟鬥爭必然會轉變到政治鬥爭，轉變到爲工人階級底根本利益，爲布爾喬亞的政權之撲滅與無產者專政之建立而鬥爭。但在這種鬥爭中領導作用則屬於工人階級的先鋒——他們底共產黨。

共產黨從未否定在資本主義領域中的工人階級之經濟鬥爭，但牠從不把工人階級的一切鬥爭皆引導到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內的爲改良而鬥爭——如改良派與社會民主派所做的那樣。而且伊里奇在反對經濟派（註）的鬥爭中，還指出，經濟鬥爭應從屬於政治鬥爭，只有政治鬥爭才能使經濟鬥爭達到最後的目的。

（註）在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間的，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派，主張使階級鬥爭引導到爲經濟要求而鬥爭。

革命黨『制服』——伊里奇說——當作爲自由與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全體革命鬥爭之一部份看的改良鬥爭』（全集第四卷，四〇九頁）。

這就是說，職工組合的鬥爭不能且不應限在經濟要求的鬥爭，牠應提高組織於職工組合中工人的階級意識，於此教育以政治鬥爭之必需性的意識，牠所以要經濟鬥爭者，首先就因爲要消滅資本主義的體系。

所以，伊里奇時常反對把職工組合轉變爲在資本主義領域中之純經濟鬥爭之武器的機會主義者底企圖；所以，他反對把職工組合成爲與政治鬥爭『無關係的』，『中立的』機會主義者底企圖；所以，他指出，共產黨必需去領導工人的職工組合。

同時，奇伊里又反對『左派的』政策，後者完全輕視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忽視職工組合，且認爲職工組合只是機會主義底巢穴，他

們，職工組合者使工人離開了主要任務——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任務。伊里奇指出，這種「左的」觀點是極有害的，因牠忽視了，工人通過在組合中之正確的經濟鬥爭而啓發出且學習得為共產主義而鬥爭，共產主義者之參加職工組合是廣大工人大眾勝利，反對改良主義者底對於工人之影響的重要手段。伊里奇說，「左派幼稚病」，初看去，似乎很「革命的」，事實上，使工人大眾處在改良主義者的影響之下且幫助後者，牠使黨與工人大眾分離且使黨成為狹隘的教門(註一)。

這就是在職工運動中之二條戰綫的鬥爭。一方面反對工人階段的一切鬥爭皆引申到在資本主義領域中之經濟利益鬥爭去的經濟派，工團主義者(註二)，他方面，又反對否定經濟鬥爭的作用且一定會使各國的共產黨忽視去領導革命的職工組合的「左派」。

在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時期中，法西斯者想把職工組合變成法西斯獨裁之工具的時候；在共產主義者參加職工組合的鬥爭是為統一自下而上的戰綫而鬥爭，為奪取廣大工人階級而鬥爭之有力工具的時候，上述鬥爭有極大的意義。

(註一) 在職工運動中最有害的「左」派之別表現就是無政府的辛地嘉主義，牠否定了無產者底政黨之必要性且以為為資本之消滅而鬥爭應由職工組合担任。

(註二) 這一派所以叫做工團主義者，因牠是英國改良主義的職工組合——之特徵。

第九十六節 資本主義積蓄之史的趨勢

資本主義是發生在封建制與小生產之崩潰的基礎上的。

『個別的與散漫的生產手段變成社會——集積的手段——馬克思

說：「因而，許多小的私有權變成榨取國民大眾的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的，少數龐大的私有權，國民大眾之這種殘酷而艱辛的被榨取形成了資本主義之史的序幕」（資本論·第一卷，612頁）。

資本主義繼續的發展是在資本之集積與集中的基礎上完成的，結果，中小資本家被大資本家所吞滅了，破產了且消滅了小手工業的與家庭工業的生產，破產了千百萬的農民且提供了許多無產者。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的財貨則大大地操縱在極少數的大資本家底手中。

「因許多資本家爲少數資本家所集中與吞併遂大大地發展了勞動過程之協業的形式，自覺的技術的科學之應用，土地之有計劃的開闢，這些勞動手段的製造，這一切只有以把其當作集合的社會勞動之生產手段看的而引用牠的方法才允許所有生產手段同時採用，經濟化，把全國民皆投入世界市場的密網中，因而資本主義的舞台遂帶有國際性」（同上）。

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遂大大地社會化了，但同時，又尖銳化了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資本主義的佔有間之矛盾。一切龐大的財貨都集中在握有千百萬的少數人手中，在各人手中操縱着龐大的經濟勢力，偉大的社會的生產力成爲資本的貴人——寄生者堆積的財貨，同時以極快的速度增加無產者的貧困，且增高其團結性與組織性。

「除掉篡奪且壟斷這改革過程之一切利益的資本貴人人數經常地減少而外，又增加大眾貧困，壓迫，奴役，衰微與榨取，但同時又加強了勞動階級的力量，爲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本身所不斷地增加的，教育的，聯結的且組織的勞動階級的力量」（前書六一三頁）。

生產的集積與集中，一方面因小生產的破產而大大地增加無產者層，他方面，又把大批羣衆蒐集在大企業中，造成大大地適應其聯合與明白其階級利益的條件。

由布爾喬亞所發動的生產技術之經常的革新，使這群和那群勞動者對於生產成爲不必要，除掉爲資本主義危機所引起的流入與退出外，又給勞動者造成動搖性與其地位之無保障性，連明天有工作與否皆無把握的特性。

資本主義以其經常的變動，旺盛與恐慌，造成了人口之龐大的遷移，往往使工人爲找尋工作由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去，這使他明白全體工人階級的利益是結着的，並不依存於國土，民族，宗教與其他差別的。

『產業的進步——馬克思說——其不自覺的担当者布爾喬亞——使工人因競爭而分散的地位，爲工人因團結而革命聯合所代替。隨大產業的發展，在布爾喬亞的立足點上表現出其生產且佔有其生產品的基礎。牠首先生產出其自己底掘墓人。牠底滅亡與無產者之勝利皆是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宣言，二八頁）。

所以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本身已造成了，成長了，且大大組織和覺悟其自己利益與其歷史使命的那種力量，這種力量應撲滅資本主義的剝削體系，這種力量就是無產者。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已替無產者統治，替社會主義造成了物質基礎。

『馬克思去世以後，半世紀來，勞動的社會化更快了，資本家底大生產，嘉特爾，辛地加，托拉斯愈益成長了，就是說，財政資本的範圍與力量更大了。——這些皆是社會主義之不可避免地進攻的物質基礎……這一轉變之物理的執行者與道德的動力，就是爲資本主義本身所孕育成的無產者，其與布爾喬亞的鬥爭，以各種不同而內容則甚豐富的形式而出現，且必然會成爲政治鬥爭，而使無產者獲得政權（無產者專政）。』（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二五頁）。

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資本主義佔有形態間的矛盾深化，由在布爾

喬亞與無產者間的，在資本與勞動間的階級鬥爭之深化體現出來。

『資本的獨佔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鎖鏈，這種方法固曾使牠達到繁榮。生產手段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牠不能與資本主義的局限相和協。後者瓦解了。資本主義的私有權撤廢了。剝削者被剝削了』(資本論，第一卷，493頁)

資本主義的滅亡不能由自己自動地，沒有工人階級之鬥爭地，沒有由共產黨方面之有組織地領導這鬥爭而完成。爲社會—民主派與機會主義者所宣導的「資本主義自動滅亡」論，事實上是使工人階級不動，且資助布爾喬亞統治之延長(下面，我們再來批判這種理論)。

無產者底準備與組織，資本統治的消滅，無產者專政之獲得與共產主義社會建設，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之長期的，尖銳的鬥爭過程中才能實現。

第九十七節 在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關係的 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的積蓄)

在蘇聯經濟中的再生產過程根本與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不同。

如我們所已知，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逐次更新地再生產了使僱傭工人或爲奴隸且保證資本家之榨取作用的條件。由於擴大再生產，使資本統治勞動的權力更增大了，勞動階段更貧窮了，小生產者破產了。

在蘇聯，則要保證社會主義的積蓄，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足以滋生人榨取人的一切原因之消滅，且爲便於勞動者而提高生產力，且不偏不倚地提高勞動之物質的和文化的的生活水準。

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首先就表現出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部

份之絕對的與相對的增加和鞏固。

比如，在社會主義的工業部門中，一九二六——二七年提供出一九九九百萬盧布批發生產品，一九二七——二八年提供一五三八九百萬盧布生產品，一九二八——二九年為一八九〇三百萬盧布，一九三〇年為二七四〇二百萬盧布，一九三一年為四九四〇百萬盧布。這部份在全工業中之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為百分之九七·七，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九九·九三（註）。由這些數字可以看出，因第一屆五年經濟計劃實行的成功使『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在蘇聯工業中，現已成為唯一的且獨佔的體系了』（碎殺黎奧諾維支十七次黨大會紀錄一一七頁）。

「註」一九二六——二七，一九二七——二八，一九二八——二九年的數

字，參考伊里奇主義問題，五〇六——五〇七頁。一九三〇年，一

九三三年的數字參考黨十七次大會紀錄一一七頁。

蘇聯社會主義部份之發展不僅因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以及一部份合作社工業）之發展，不僅因農業經濟之現存的社會主義的企業之增長和鞏固，且因小商品的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而實現。

最近幾年來還殘存着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隨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其中大部份已在無產者的領導之下而走上廣大的集體化之道路了。小農經濟本來是不適於擴大再生產的，且非任何時候，皆適於單純再生產的。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小農經濟以及小手工業經濟既不適於擴大再生產也不適於單純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他殘存於農民之分化過程上，一方面成為富農，他方面成為貧農與僱農的分化過程上。在蘇聯經濟中，在復興時期的條件下，那時小商品經濟還佔很大的比重，農民分化的過程有其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民經濟發展極不相同的特點。由於無產者獨裁的統治，由於土地國有與在無產者

手中的經濟之高度領導的實現，由於無產者與貧中農大眾團結以反對富農，分化是不能採取原來的範圍的。在這時期，一部份貧農成爲中農了，富農經濟的增漲被沮止了，中農的比重增大了，中農乃農業之中心的樣相。但這種小農經濟是不能由自己去擴大再生產的。蘇聯的實際領導者曾以下列的話去說明農民經濟之再生產的特徵：

『我們的小農經濟不僅不能由自己每年去實現擴大再生產，剛相反，牠甚至不是任何時候皆能實現單純再生產的』（伊里奇主義問題，四四四頁）。

在發展的現階段上，農村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只有在集體化的基礎上，即只有當作大的社會化的生產，才有可能。這過程是在無產者和共黨方面的積極的計劃的領導之下進行的，後者發動了社會主義角部的一切力量，於農村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利用小生產者的營利性且與其商品——資本主義的傾向作鬥爭。

因小農經濟之大批集體化與國營農場的增大，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角部，到一九三四年初，已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八四·五，而農村中之個人的農民經濟已『降爲次要的地位了』

在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並非自天下降的而是在與資本主義份子作嚴肅的鬥爭過程中達到的，社會主義關係的增長伴隨着資本主義成份之限制，然後肅清。

故社會主義關係擴大再生產使在蘇聯經濟中的程序變化了，現在，如俾殺黎奧諾誰支同志在十七次黨大會上所指出似的，自然的角部，國家資本主義的角部與私人資本主義的角部已不存在了，小商品的角部已降爲次要的地位了，而「社會主義的程序，在蘇聯全部國民經濟中，是不可分地佔統治的與唯一領導的力量」（十七次黨大會記錄一六頁）。

在第一次的五年計劃中完成了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蘇聯政府又提出以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資本家階級的殘餘之肅清，在人民意識上與經濟上資本主義殘餘因子之克服為任務的第二次五年計劃。

蘇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擴大與鞏固上所達到的成功以及為實現這方面的以後任務而鬥爭的勝利，只有在其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上才可能，只有加強工業，尤其是生產手段的工業之增長，才能保證蘇聯全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然後成為社會主義關係之擴大再生產。

蘇聯在這方面的成功，可以下列數字表明之。如果在一九一三年，世界大戰的前夜，在帝俄，工業的比重為百分之四二·一，而農業經濟的比重為百分之五七·九，則到一九三三年，在蘇社會主義工業的比重已增到百分之七〇·四，同時農村經濟的比重則降到百分之二九·六，已由農業國成為工業國了。（參考十七次黨大會紀錄一六頁）。

假使注意到在重工業與輕工業間的關係，那末我們就可以見到，一九二九年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生產之比重為百分之四八·五，輕工業的比重為百分之五一·五，到一九三三年，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之比重已增至百分之五八，而輕工業的比重則降到百分之四二了。（參考前引書，一六頁）。

顯然，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不僅根本改變了蘇聯的各個程序的關係，且根本改變了其各部門的關係。許多新的工業部門之創設，那是為舊的資本主義的俄國所不知道的：紡織機廠，汽車工廠，耕種機工業，化學工業，製造飛機廠等等。

在其生產力提高的基礎上完成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所有偉大的增長，以為資本主義世界甚至在其最景氣的年頭都不能企及的那種速

度，實現於蘇聯。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內當時，國內外的一切設施的要求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品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二。在黨的領導下，在與階級敵人及其忠僕——機會主義者作殘酷的鬥爭中，由勞動者之英雄的偉力，使第一次五年計劃於四年內完成了。

在建立了全國民經濟之新技術基礎的且鞏固國家防衛力的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以後，即在建立了許多引用新技術的新企業且以新企業之建設為任務的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以後，黨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規定增長的速度稍緩慢於第一次五年計劃，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規定了最低限度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一六·五。但這種速度已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率所不能及。在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在景氣時，戰前，其發展的速度平均不會超過百分之六。這裏應注意，因蘇聯工業偉大地發展的結果，在絕對的體現中所表示出來的增長的每百分之一，則比前幾年大得多了，例如在一九二八年生產品的增長百分之一為一二六百萬盧布，而一九三三年為三二〇——三四〇百萬盧布，一九二八年生產品一般的增長為三二八〇百萬盧布，而一九三三年則為五十萬萬盧布。

蘇聯工業發展的速度所以能快於資本主義發展速度者，可以社會主義經濟比資本主義經濟的優點，社會主義的積蓄與資本主義的積蓄之原則上的不同去說明之。

如我們所知，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中，生產手段與勞動工具並非在資本的形態上與勞動者相對立，而是組織於無產者國家中的全勞動階級的公有物，這說明了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原則上不同的勞動者對於勞動之關係。大眾的勞動之旺盛，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給社會主義積蓄造成新的資源，這是為勞動受嚴重壓迫的資本主義的生產

方法所不能知道的。

與爲競爭所主宰且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無政府狀態相反，蘇聯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政府自覺地使牠走上社會主義關係擴大再生產的路綫。當作其指揮之力量着的政府與黨造成國民經濟領導與組織的條件——這在資本主義下是絕對不可能的。按照蘇聯經濟鞏固的路綫，按照社會主義積蓄的路綫，這給牠以偉大的優點。

次則，比之資本主義經濟，蘇聯還有優點——爲社會主義的積蓄，生產的擴大與勞動者的物質，文化的生活水準，能利用，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與地主所保存的，偉大的手段。

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資本主義的佔有間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且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加深的。蘇聯經濟在其增長與發展上沒有生產過剩之經濟危機，這種危機往往纏繞着資本主義的生產且使之趨於解體。

所有這些優點給蘇聯有甚至在資本主義之最好的年頭都遠比不上的飛快速度發展的可能。

假使把蘇聯經濟與戰後——這時資本主義經濟處在一般的危機中——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態相比較，則蘇聯經濟體系之優點，就表現得更爲明顯了。在一九三四年初蘇聯的工業生產品比之戰前水準差不多增加四倍（實爲百分之三九一·九），這時候，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或者低於戰前的水準，在有幾國，則比戰前稍許高一點：英國爲戰前的百分之八五·二；德國爲百分之七五·四；美國爲百分之一一〇·二；法國爲百分之一〇七·六（參考黨十七次大會記錄九頁）

資本主義積蓄是伴隨着在少數資本家手中的財貨之增加與勞動大眾之貧窮的，而蘇聯的社會主義積蓄則鞏固了且發展了社會主義關係，又造成了完全消滅階級化分與榨取的原因，同時又保證了勞動大眾

的物質與文化的生活水準之偉大的增高。

資本主義積蓄的法則是失業豫備軍的實現，而在蘇聯，則因社會主義工業之瘋狂地增長，完全肅清了失業且大大地增加了勞動者與僱員的人數。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初，在蘇聯尚有百五十萬失業者，至一九三〇年，失業已被完全肅清了，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內工人與僱員的人數由一千一百五十九萬人增至二千二百九十萬人。

資本主義積蓄的法則是無產者之相對的與絕對的貧窮，而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則是勞動者的物質與文化的水準之不斷地提高。

「社會主義僅能在社會的生產力之瘋狂地發展的基礎上，在生產品與商品之充足的基礎上，在勞動者之豐裕生活的基礎上，在文化之瘋狂地增長的基礎上才能建立成功。」（前書，三一頁）

蘇聯勞動者的物質與文化的增長之最重的因素是貧富農的分化之消滅，且消滅在鄉村中與這些貧窮的聯繫。

國民收入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萬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工人與僱員的工資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一三五九七百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三四二八〇百萬盧布；產業工人的每年平均工資，由一九三〇年的九九一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一五一九盧布；社會保險費在同時內由一八一〇百萬盧布增至四六一〇百萬盧布。

基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已獲得的成功，基於其繼續發展，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勞動者的消費水準應提高二，三倍，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國民收入應增大二·二倍；在國民收入中的國民消費的資金應增大二·四倍，工人與僱員的人數增加百分之二六；實在工資增大二倍；按照勞動者物質的與文化的生活水準之繼續提高的許多其他的條件之實現，保證了其優裕的生活。

第七篇 資本的循環與回轉

第二十一章 資本的循環

第九十八節 資本循環的一般概念 循環的三個階段與三種形態

在研究貨幣資本化的過程的時候，我們會說明剩餘價值並非造成於商品與貨幣的流通過程中，而是造成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的。

但爲了生產過程之不斷的更新，資本的運行，應不僅經過生產的範圍，且應經過流通的範圍。不賣已製成的商品，即不經過流通而實現含在其中的價值與剩餘價值，不經過流通而購買補充已耗損的新的生產手段，不僱用勞動力，則資本家是不能繼續生產的。

聯成一體的，即當作不斷地更新過程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的統一。

資本的流通過程爲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所決定。但在生產基礎上滋生出來的流通，在生產上顯示出次要的作用；複雜了牠，且深化了其矛盾。

所以在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以後，我們現在應研究在其基礎上滋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的流通，然後再來研究當作生產與流通之統一體看的，整個的資本主義生產。



在其再生產過程中，資本通過了生產範圍，又通過了流通範圍，所以，牠時常變換其形態，繼續其變形。

在開始生產以前，資本家應支用貨幣形態的資本。他以貨幣在市場上購買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結果，具有貨幣形態的資本，採取新形態——生產資本的形態了。

當工人與生產手段聯結，使後者運動的時候，就開始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且造成剩餘價值。生產過程的結果，發生了新的商品，同時又使生產資本變成商品資本。

但資本的這些變形尚未完結。既然，商品並非為資本家的私人消費而生產，而是以實現剩餘價值為目的，在市場上出賣而生產的，故資本家應以製成商品的出賣者的資格再次到市場上去。開始了商品實現（出賣）的時期；因而，具有商品形態的資本，又獲得貨幣形態了。更新了生產過程，資本家又把其貨幣資本變成生產資本，再把生產資本變成貨幣資本等等。

因此，可以把這些過程，作成下列的公式：

$$G \rightarrow W \leftarrow \begin{matrix} PM \\ A \end{matrix} \dots P \dots W_1 = G_1 \quad (\text{這裡 } G_1 = G + g)$$

G 表示貨幣形態的資本，由此開始了循環的過程；G 變成 W 即變成資本家為生產組織而購入的特定商品；W 由 P M，即生產手段，與 A 即勞動力構成的，然後再進行生產過程，這由 $\dots P \dots$ 表示出來，生產過程的結果，為製成的商品 W，W 第一按其價值，大於原來的 W 因在這裏包含着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剩餘價值，第二，有與原來的 W 不同的使用價值。由於商品的實現，就使 W 變成 G 即變成特定量的貨幣，這幣貨除掉原來的價值 G 外，還包含一着些餘額 g，因而實現了

剩餘價值。

因資本變形的第一次循環以後，就開始第二次的，第三次的，故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全過程可以採取下面的形式：

$$G—W < \frac{PM}{A} \dots P \dots W_1 — G_1 \quad G—W < \frac{PM}{A} \dots P \dots W_1 — G \quad \text{等等。}$$

總之，在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循序地採取三種形態：1. 貨幣資本；2. 生產資本；3. 商品資本。同時，牠又徹底的經過三階段而進行：1. 貨幣資本變成生產資本；2. 生產資本變成商品資本；3. 商品資本變成貨幣資本。這裏。第一與第三階段是在流通範圍中進行的，而第二階段則在生產範圍中進行。

資本之由這種形態而那種形態之徹底的變形，與經過三階段的資本的進行叫做資本的循環。

直到現在，關於資本的循環，關於資本之由這種形態而那種形態的變形，我們皆以貨幣資本循環為始點的。

然而，資本的進行，不僅可始自貨幣，也可始自生產過程或商品的。隨着循環的出發點(開始點)不同，存在着資本循環的三種情形(三種形式)，第一種情形，循環自貨幣資本開始，第二種情形自生產資本開始，第三種情形則始自商品資本。

其中任何一種皆有特點。貨幣資本循環($G—W < \frac{PM}{A} \dots P \dots W_1 — G_1$)的特點是這樣的，這裏循環始於貨幣且終於貨幣。循環的目的——價值的增大，比原來的數量更大的貨幣之獲得。這裏循環始於流通過程($G—W$)且終於流通過程($W_1—G_1$)，這種循環的生產過程只是在二個流通過程間之中介的層階，這蒙蔽了資本主義關係的本質，因循環始於流通且終於流通，頗似流通過程為資本家之主要目的，生產過程似乎被置在腦後了。

生產資本的循環，可以作成這樣的公式：

$P \dots W_1 - G_1 - W < \frac{PM}{A} \dots P_1$ 。假使資本家在第一次生產(P)以後，實現了剩餘價值把其一部分投入生產中，則再次的生產過程(P₁)將在擴大的規模中進行。

因在這種情形下，循環始於生產過程，且終於生產過程，故這裡特殊出現了生產之更新（再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與上面我們剛考察過的貨幣資本的循環不同，只是在二個生產過程間的中介循環。因這裏生產是出發點，又是終結點，故資本的全部運行，皆表現出為生產而生產。在這裏生產的更新與其擴大為資本運行之當然目的，這隱蔽着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再生產的目的，是剩餘價值的創造與佔有。同時循環的這種形態明顯地表現出，商品——貨幣的流通不能為資本主義收入的根源，因在商品——貨幣的流通過程（ $W_1 - G - W$ ）一點也見不到價值的增額。

商品資本的循環可以作成這樣的公式： $W_1 - G_1 - W < \frac{PM}{A} \dots P \dots W_2$ 。這裏，循環一下由互相對立的二個商品——貨幣流通的階段（始於 $W - G$ 而終於 $G - W$ ）開始，在這二個流通階段之後，才進行生產過程。因這裏，資本運行的過程始於其中已含着已製成的剩餘價值的 W_1 （ $W_1 = W + w$ ），則很明顯地，這種循環不斷地以前於牠的其他循環為前提。這循環的終點為新商品 W_2 在這裏面加入新造成的剩餘價值。所以，這裏，剩餘價值生產已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

這種循環特殊地顯示出，某資本家在其資本的循環過程中是依存於別個資本家的資本之循環的。這裏，顯然地，這個資本家，在進行生產之前，應先把其商品賣給別個資本家，再向別的資本家購買其他商品，由此，很明白地表現出，分離的（個別的）資本在其運行的過程中成就了且共同組成了統一的社會的資本之運行。

這就是資本循環的三種形態的特徵。關於資本循環的三個階段與

循環的三種形態，我們應注意，這裏並非說有不同形態的三種不同的資本，而是說，經過牠能在其循環過程中徹底地進行的同種類的資本。這種會變化其形態的一致的資本就是工業資本（註）。

「註」這裏把工業資本瞭解作包括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一切生產的工業部門的與農業部門的資本。

往後，我們將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爲資本所執行的各種機能互相分離且由不同的形態，如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之獨立的種類』所執行。這種『資本之獨立的種類』是，例如，以商業資本家爲代表的商品——貿易資本，其商品企業是與工業企業相分離而存在的，當然他也與工業資本家分離，以銀行爲代表的放款資本也如此。

此刻我們尚未考察資本之這種不同的『種類』。此刻，我們假設着，工業資本家，購買生產手段與僱用工人，出賣其生產的生產品，皆不藉助商人與銀行而進行的，因後者的參加，以馬克思的話說，會「淆亂了資本運行的各種契機」，且使之更形複雜。只有在我們說明了同此工業資本變化的各種形態與各種機能之後，我們才能明白，同此一致的工業資本的各種機能能相互分離。

第九十九節 當作運行着的資本

我們已知，剩餘價值創造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創造於資本榨取僱傭勞動的過程中。假使資本不循環，不由這種形態變成那種形態，則剩餘價值生產之不斷的更新，以及當作能增殖剩餘價值着的資本的機能，就成爲不可能。事實上，假設，工業資本家有貨幣資本，但此資本家因某種原因，不能把此資本變成生產的資本：當其貨幣資

本不能給資本家增加收入時，牠就失掉資本的作用且變成單純的儲藏（註）。次則，假設，這資本家購置生產手段與勞動力；顯然，只有當屬於資本家的生產手段與爲他所榨取的勞動力相結合時且開始生產，及同時進行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時，牠們才執行着資本的機能。最後，假設爲資本家以榨取工人的方法而獲得的商品，賣不出去，即商品資本不能變成貨幣資本，則剩餘價值的生產也不能更新，資本不能再次增殖收入，即停止貨幣資本的作用了。

〔註〕我們再次申明，此刻我們暫時不是工業資本以外的資本之其他形態。

總之，只有在當作增殖剩餘價值的價值中，只有處在運行中，處在循環的過程中，資本才能執行其機能。

在運行與循環中，在由其這種形態變成那種形態的轉化中去考察資本，我們應注意，並非所有資本，把其全部今日爲這種形態，明天都變成那種形態。

〔事實上，每一個別的產業資本在全階段上皆處在所有三種循環中的。三種循環，資本三形態的再生產形式，皆經常地，互相平行地通過着〕（資本論，第二卷，57頁）。

該資本家的資本之一部份，今日可以是貨幣的形態，明天就以之購買機器，原料，支付工人了。同時，別部份資本，可以投在機器與原料上，今天就把其價值的全部或一部轉化於製成的商品上。同時，第三部份資本，可以是製成商品形態，其實現與由生產的變成商品的別部份資本之轉化，以及由貨幣的變成生產的資本之轉化同時進行的。

同時處在各階段上的資本之各部份互相密切地聯繫着依存着，因牠們同是統一資本的一部份。〔既然個別的產業資本是依存於資本家的手段且爲每一產業部門的一定限度所決定的特定的大小，故其分類

應保持着特定的數的比例。」（前書，59頁）

所以，某部份的資本，例如商品資本之變成貨幣資本之無阻害的轉變，是依存於別部份資本，例如生產資本之變成商品資本的循環之無阻害而完成的。

「某部份資本到某種形態的轉變——關於這點，馬克思說——是以別部份資本到別的形態之轉變為條件的」（前書，61頁）。所以如果資本家不能掉賣已製成的商品，那末，就會停滯其資本的別部份之循環，例如在機械形態中的生產資本之轉化為商品資本。不賣掉過去製成的商品，資本家就沒有為購買原料與僱傭工人所必需的貨幣，此時，已投在機器上的資本也不能運行了。

總之「只有在三種循環之統一中，才能實現全過程的不斷性」（同上）。在資本循環中的每一停滯，均能使通過榨取勞動者而增殖剩餘價值的，有作用的資本，變成無作用的資本。自然想盡可能地增大利潤的，資本家的一切企圖，皆傾向在：不給其資本，即使其一部份資本，停滯在無作用的資本的形態中，保證其資本之不斷地運行。

然而，事實上，各個資本及其組成部份的運行之連續性並非任何時候均能保證的。

有許多部門，生產帶有季節性，生產資本只能在一定的季節內才能起作用，才能變成商品資本（例如，農業，漁業），在這季節以外，生產資本就不運行了。同時，在有些部門內，商品的銷售帶有季節的，例如，綿布，普通整年均在製造着。但僅在一年的特定時期才能出售；在其他的時期，存貨均成爲死資本了。這種死資本處在往往是長時期內購進且逐漸耗費的原料。

此外，某種形態的，個別資本之停滯，這資本的循環之間斷或其各部份的循環之間斷，皆會派生出資本循環的各階段之特性，以及各

部份資本循環的特性，藉這資本之助由勞動者榨取出的剩餘價值量與剩餘價值率依存於這些特性的。我們應更進一步來考察這些特性。

第二十二章 資本的回轉

第百節 資本回轉的一般概念

生產時期與流通時期 生產時期

在循環過程中變換其形態的資本，在其運行的過程中，重新又變成其原來的形態，回復着轉化的許多圈子。

「並非由分離的行爲去決定，而是由週期的過程去決定的資本之循環——馬克思說——叫做資本的回轉」（資本論，第三卷，39頁）。

這裏每一回轉的時間，由資本的某種形態仍轉化到這種形態的期間去決定。在每一回轉期內，資本通過了生產範圍與流通範圍。資本處在流通範圍中的時期，叫做資本之流通時期；同樣，資本處在生產範圍中的時期，叫做其生產時期。

爲了要說明在資本的一般循環中，資本及其各部分的回轉之各階段的作用與意義，闡明牠怎樣影響到藉助這些資本而榨取出的剩餘價值量上去，我們應更進一步去考察，資本的生產時期及其流通時期有怎樣的意義且依存於什麼的。

生產時期包含着爲資本家所有的生產資本變成商品資本的全時期，在這時期中參入勞動過程的時期，卽在這時期中，生產工具與手段結合着勞動力與勞動者加以改造的勞動對象。但生產時期不僅限於勞動過程的時期。

首先回憶到，某部分不變資本——機器與設備——並非一下地，而是逐漸地把其價值轉移至製成的商品上去，這些部分資本不僅參加一週期勞動過程，而是參加好幾週期，就是說某生產時期包含着好幾次重復的勞動過程。

再則，生產資本變成商品資本的時期，不僅包含着勞動對象為勞動者方面所加工的時期，在夜裏，在吃飯的時候，在休息的時間，勞動過程皆為間斷。這些間斷的時間皆為生產時期的組織部分，但牠並不加在勞動時間內。他方面，資本家準備原料與副料的一定的存貨『使在多少長時期內生產過程能不受在市場上商品逐日供給的偶然性之影響而在預定的規模內完成之』。(資本論，第二卷 73頁)。

這些存貨在堆積着的時期內，確未加工，同樣算入生產時期的一部分。

此外，生產過程本身所包含的時間，比勞動者自身所加工於勞動對象的時間長得多。在許多生產部門中，尤其在化學工業與農村經濟中，生產品的全部製成，不僅需要人們加工的時間，且需要自然力作用的時間，例如，在農村經濟中的麥子，應在一定時間內才能生長；製酒的麵，應有一定的時期發酵；在其改製中的皮革應有屬於製革過程的一定時間。

總之，我們知道，生產時期所包含的時間，比勞動支出所由完成的時期長得多。

這對於資本回轉的全過程與對於剩餘價值的生產有很大的意義。

在勞動過程的間斷時期內，新價值並未被生產。剛相反，建築，機器及其他生產手段反要耗損了(機器的生鏽，房屋的傾倒等等)。堆積着的或為自然力所作用着的物質，在這時間內，並未參加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過程，且成為「死的」資本了。

當然，在生產時期中所佔據的非勞動的時間愈長，則商品愈貴，且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則此資本所增殖的剩餘價值也愈小。

所以資本家盡可能地力使工作間斷的時間縮短，所以，資本家企圖縮短且消滅飯後的休息，採用夜班制，縮短不與直接的勞動過程相關聯的過程。

第二百零一節 流通時期 流通費

現在考察一下，流通時期對於資本的回轉有什麼意義。

在流通過程中，製成的商品應實現於且轉化成貨幣。同時，又應實現投入其中的剩餘價值。在同樣的流通過程中，應購買為生產繼續所必需的生產手段。

所以已製成的商品應在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中出賣且變成貨幣，然後，資本家又把貨幣變成為其生產的繼續所必需的商品。

因我們是以商品按其價值買賣為前提的，故在資本主義的流通中，所謂商品買賣，所謂 $W-G$ (商品—貨幣)與 $G-W$ 的轉化，皆是說『同此價值之由這種形態而那種情態，由商品形態，而貨幣形態，由貨幣形態而商品形態——僅說情況不同』的轉化。(資本論，第二卷，71頁)。

因在資本流通過程中，僅進行着由這種形態的而那種形態的價值之轉化，所以這裏既未造成價值，也未造成剩餘價值。

與資本流通過程商品買賣同時，資本家有時需要一定的中間時候，勞動與資本的支出。所以需要一定時間者，因想盡可能在有利的條件下，購買原料，燃料，機器等，因想盡廉價僱用勞動力。因此資本家不僅支出其自己的時間，且為購買，尤其當這些購買需要長時間且須展延到許多地方，例如在各地購買生產手段與工具，向農民購買零

碎的物品，要僱用其代理人。這些代理人往往報告廉價的勞動力等等。

在資本主義的流通中，出賣商品時，需要更大的時間與勞動。爲出賣其商品，資本家往往僱用大批工作人員。資本家以大批資金化在廣告等等上面。大資本家分派其代理人於各地，籍以廣告且推銷其商品。資本家的許多僱員皆從事於登記購買的主顧，記錄賬項，在其商店中普通有許多買貨者，會計，簿記員，配貨者工作着。

使商品流通的，僱員所耗費的時間，其買賣，應加入資本流通的時間。

因僱員把其勞動化費在商品與資本之由這個人而那個人的轉遞上面，所以，依馬克思的說法，他們只執行了由這個人而那個人的「私有名號」之轉移，所以，他們不曾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僅執行了價值之由這人而那人的轉屬，所以，他們的勞動雖爲資本流通所必需的，但不是生產的勞動。（註）

（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的勞動。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中，只是生產的勞動才是必需的，這也不是說從事非生產勞動的人們，就不爲資本家所榨取，往後我們將看到，例如，商業的僱員，其勞動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並非生產的勞動；但殘酷地爲資本家所剝削。

但在資本流通過程上，有些時間與勞動是支出在許多機能上的，這些機能按其本質是在流通時期中的生產過程之繼續。

這首先就是化費在商品運輸上的時間與勞動。

商品的轉運，按其本質，是生產的行爲，因只有商品達到消費的地位時，才完成其剩餘價值的創造。雖說商品的轉運不會使商品變化，但事情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商品的轉運——假使，牠不在投機的目的上去完成的——與價值之由這種形態而那種形態的變化過程不

同，例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那裏已無由這入而那人的「私有名號」的轉屬，但消費品仍須由共生產的地方移至共消費的地方。

但因商品的轉運是生產過程的繼續，所以，很顯然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從事運輸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與剩餘價值。故運輸工人的勞動是生產的勞動，且加入轉運商品的價值上去。

增加包含在商品上的價值與剩餘價值的這種生產勞動，是裝置商品，保存商品的勞動——只要這種種裝置與保存為使商品便於消費且保存其使用價值的必需性所引起，而不依存於「私有名號」之轉移過程，不依存於投機的資本家。

這種勞動的形態與執行在狹義上的商品——貨幣的流通的勞動不同，比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後，我們更可確信這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某些勞動生產品將於一定時間內保存在堆棧中，在這種保存上必需支出一定的勞動（為建築棧房等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勞動將支出於生產品之裝置上面。

耗費在以廣告為目的的商品裝置上，或以投機為目的的商品保存上的勞動，就不同了。顯然這種「勞動」與「私有名號」的轉移相聯結，牠加在耗費於狹義的直接流通上的勞動，既不造成價值也不造成剩餘價值。

總之，我們把從事流通過程的勞動分為：1從事於狹義流通的勞動，即從事於由商品而貨幣，與由貨幣而商品之轉化的勞動；牠是非生產的勞動，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餘價值；2從事於生產過程的勞動，牠僅在流通中繼續着，所以其生產性為流通的形式所蒙蔽着。

雖說在實在的資本主義的現實性上，關於勞動的形態，往往改頭換面，且同一種職務往往採取生產的勞動與不生產的勞動，我們應嚴加區別牠們。勞動的各種形態在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中起着不同的作

用。對於流通有這種特性者為勞動的第一種形態；第二種形態則劃入生產過程。

為在狹義上的資本流通過程所引起的資本支出，叫做純流通費。純流通費愈大，在流通中資本停留的時間愈長，則資本家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下，藉其資本榨取得的剩餘價值愈小。

『流通時期——馬克思說——與生產時期互相排擠着』（資本論，第二卷，75頁）。

所以，資本家的利益在乎；盡可能地大大縮小流通時間，及為流通所引起的支出。

印刷，郵電，運輸之發展以及其他交通的方法與能緊縮各種轉運，易於計算，廣告之新方法等的許多技術的效果達到了這個目的。但同時，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與增長又滋生出相反的趨勢，延長了流通時間且增加了在這上面的支出。這樣，隨着資本主義的生產，交通與一般的流通手段之發展，又增長了且發展了世界貿易，因而在生產地方與銷售地方的距離大大地增加了。由於資本主義的增長，嚴肅地深化了市場問題，困難了商品銷路。這又引起在廣告上，在僱用代理人上等等的費用之增加。

下面的數字足可證明，在資本主義諸國家流通費達到如何可驚的程度，據美國經濟學家李夫 (Rif) 的統計，美國在1850年流通費差不多為商品價格的百分之二十，1870年為百分之三十，1900年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到1920年竟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德國僅零售回轉一項的流通費，在1925年，即為六十二萬萬馬克，1929年達到八十三萬萬馬克；1920年以後，流通部分由零售回轉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三·七，增到百分之三十。據德國經濟學家葛霞 (Hensche) 的統計，1929年德國流通費的總額(運輸費除外)為百三十萬萬馬克，差不多等於德國全部

農業經濟批發生產品的總價值！在美國，光廣告費一項的支出，1926年即超過十二萬八千萬美金，到1933年增加至十五萬萬美金。

除掉流通費增加以外，又增多在流通上從事不生產勞動的人數。英國在1900年—1920年間，從事貿易的人數增加四倍。美國在1915年—1925年這十年間，從事貿易的人數比從事生產的人數大八倍！

在帝國主義時代生產費之龐大的增長乃為資本主義寄生病的象徵之一。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在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般恐慌之日益尖銳化的時期中，這種病態表現得更為尖刻。生產費所以大大地增長者尤其可以市場問題之日益深化去說明之。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流通費的寄生性就能極尖刻地表現出來，假使把牠與在蘇聯的流通費相比較。無產者執政與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原則上改變了蘇聯的流通費，同時又保證了於數量上減少這種費用的條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蘇聯沒有能引起廣告等等之耗費的資本家之無情競爭的地位。由於蘇聯經濟及其發展的刺激根本原則上與資本主義經濟不同，由於勞動者的物質與文化的生活水準之不斷地增長與其消費和需求之增長，在蘇聯沒有殘酷的『為買主的金元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鬥爭會滋生出龐大的流通費。蘇聯的流通費比之德國差不多小三倍（在資本主義國家須支出大部份廣告費的糧食工業中，蘇聯的流通費比美國差不多小四倍），流通費的縮小給蘇聯擴大且增長社會主義經濟以新資源，在蘇聯經濟發展的速率上給以新優點。在1928—29年蘇聯流通費的縮小給生產的，差不多有二十一—三十萬萬盧布（註）但蘇聯，在生產費範圍內尚未完全被使用，蘇聯的流通費比之其經濟體系所給予的可能性來還嫌太大。為減低流通費的鬥爭，毫無疑義地能給社會主義生產以新的追加的資源。

（註）參看『蘇聯貿易』1933年第二期，75頁。

第二百零二節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

資本回轉的繼續不僅依存於回轉各時期的特性，且依存於資本各部份回轉的特性。

考察一下，可變資本在其一般循環中的作用如何。

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以供一定時期的使用。〔牠每天在一定時間內工作着，在這時間內，牠不僅把其一天的價值結合到生產品上去，且把某種餘額的，剩餘的價值結合上去，關於這點現在我們暫時不提。在勞動力被購買以後，且工作以後，例如在一星期以後，其賣買應經過一定時間而不斷地重複〕（資本論，第二卷，106頁）。

在一定時間內所耗費掉的勞動力價值，全部轉入在這時期內製成的商品裏去，這種商品除掉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外，還包含着剩餘價值。轉化在這商品上的可變資本的價值，因商品出賣而全部實現了，且轉成貨幣的形態，可以再支付勞動力。在再次時期內所製成的商品之實現，又收回全部已耗費掉的可變資本，由於這生產品之實現，資本家又於貨幣的形態上，獲得了為下一期間的勞動力支付所必需的價值，等等。

『所以，預付在勞動力上的生產資本價值的這一部份，全部轉化於生產品上……與此同時進行的，還有關於流通範圍的轉形（即貨幣化成商品與商品仍化成貨幣）由於這種不斷的重複，故經常地與生產過程結合着（同上）。

可變資本回轉的這種方法，使牠與不變資本某些部份的回轉相近似，雖說在剩餘價值的創造中牠們的作用是不同的。

不變資本的某部分也有同樣的性質，這些部份在生產過程中，也把它價值完全轉移於已製成的商品上去，其價值，也如勞動力的價值一樣，因在生產之這一時期內所造成的商品之出賣而全部收回。

不變資本之這些部份為原料與副料，例如燃料，油，電力等等。以一定數量參加生產過程的原料，與燃料，完全耗費掉了，「爲了每一新的勞動過程而完全改變其樣相」（前書，101頁）。在其價值已全部轉化上的商品出賣掉以後，牠們就以貨幣的形態完全收回了，這貨幣又可全部用以購買新原料，新燃料等等。

總之，勞動力，原料在生產的一時期中即把其價值全部轉化於製成的商品上去（註一），由於資本家出賣這些製成的商品，這些部份資本的價值每次皆全部回復到資本家，他又可再次去支付勞動力，購買新原料與副料（註二），這些部份的資本叫做流動資本。

〔註一〕此外，勞動力還造成剩餘價值，我們這裏暫時不計。（如馬克思所做者然）。

〔註二〕固然資本家在出賣商品以後，並非時時，皆一下就這樣做。有時，他以不與出賣商品同時，即購買原料與副料爲於利。但這於事實上無所改變，因他於出賣商品以後，已把參加生產的勞動力價值與原料，副料的價值全部收回了。

僅把其價值的一部份轉化於製成商品上去的機器與房屋就不同了。在一次生產時期中，牠們並非全部消費完，在其價值的一部份已轉化於製成的商品上且已因出賣這商品而實現了以後，牠們仍在許多次的生產時期內繼續存在着且作用着。在許多次生產過程內，牠們皆固存於生產中，進行許多次生產時期以後，機器與房子的價值，才以貨幣的形態完全回復到資本家，那時這些價值才完全變成新機器，即投在這些機器上的資本才完成了全部的回轉。

因了這種特點，所以把不變資本的這部份，即機器與房子，叫做

固定資本，以示與組成流動資本的可變資本，原料與副料有別。

總之，現在我們知道，資本有二種分類：一種是由在剩餘價值創造過程中各部份資本之不同的作用出發的，這就分爲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還有一種分爲，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是適應於在勞動手段的價值之轉化於製成生產品上的，在生產過程時期之價值組成上的，各部份資本之不同的作用的。這是根據其流通方法的，固定資本與流轉資本之不同的作用的。

我們應特別指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不同的流通方法是由其在生產過程的時期內，價值轉移過程及其形成之不同的作用，推究出來的；同時，連同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在內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則在流通過程中看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分類的根基。他們根據在市場上的商品流通過程，不能且不願指示在生產過程中的，且僅在流通過程中才表現出的人們關係。

對於這，我們應有下列的解釋。

第一，反對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分類，尤其反對把原料與副料包括在流動資本中，可以做成一個初看去頗可置信的答辯。我們說，固定資本在好幾次生產過程中皆固存於生產上，因而只有其價值的一部份才轉化於製成的商品上去。同時爲資本家所購入的原料與副料，普通也不僅用於一次生產時期，而是在好幾次生產時期上才用完。在所有原料與副料的存貨中，在每次生產時期上，僅把其價值的一部份轉化於製成的商品上去。這不是說，原料與副料的回轉與機器和房子的回轉沒有任何區別麼？事實上並不如此。不是爲資本家購進的存着的原料與副料並非全部參加生產麼？在全部存貨中，例如煤，今天只把一部份參加生產，餘下的煤是不動的，今天參加生產的煤，燒完了，且其價值也完全轉化於製成的商品；餘下的煤並未參加這個生產過

程。原料也有同樣的關係。機器與房子就不同了。牠們把其全部價值在許多生產過程的時期內皆固存於生產過程中，固存於生產上，且在許多次生產時期內皆全部參加生產，在每次生產過程上，牠們僅把其價值的一部份轉化於商品。

第二，我們應指出，固定的與流動的資本之分類，並非關於資本之所有形態，僅關於生產資本的。所以，如果我們在經濟學上有時看到，把「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術語引用到商品資本，尤其引用到貨幣資本上去的話，則這種分類與我們所闡明的，固定的與流動的生產資本之分類沒有任何共同點，不過形式上與後者相似吧了。

固定的與流動的資本分類，蒙蔽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

因為在流動資本上，除可變資本之外，還加入原料與副料，所以在牠們間的區別被蒙蔽了；因此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力的特殊作用遂被忽視了。

第二百零三節 固定資本流通的特性

固定資本的還原

我們已知，在一次生產時期結束以後，在一批商品已製成以後，把其價值的一部份參加在這裏面的固定資本仍在許多次生產時期中繼續作用着。同時第一批商品將拿到市場上去且實現了，所以在舊機器與房子未完全耗費掉的很早以前，資本家即因出賣商品，而以一定貨幣總量的形態，收回了轉化於製成商品上的這些機器與房子的價值之一部份。這種手段將以一定的貨幣儲存的形式而積蓄起來，這種貨幣將因固定資本之再三把其價值的一部份轉化於商品上而逐漸增加，當固定資本已完全耗損完了其價值也完全轉化於商品上了的時候，資本

家就可以積蓄着的貨幣手段去購買新機器且建設新房子。此時固定資本才完結了其回轉的一個時期且進行第二次回轉。

按照固定資本價值之局部收回的且保證其恢復的，貨幣儲存之不斷的積蓄叫做固定資本的(Amortization) 還原。

固定資本的恢復與貨幣積存的利用怎樣進行的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就應首先考察一下，固定資本的耗損與其更新的必需性是依存於什麼的。

固定資本的耗損首先在生產過程本身中進行的。某種機器在其工作時耗損了一部份，轉動機體，就發生這種或那種損壞，除掉由機器工作本身所引起的原因之外，其耗損還為許多自然的原因所決定：機器生銹了，牆脫皮了，機器與房子之木製部份朽爛了，因這二種因素的作用，機器與房子，不管如何修理，經過相當時間 耗損到相當程度，就成為對於生產無用了，且必需更換。

但在機器於物質上尚未完全耗損以前，固定資本的更新也會成為必需的。在企圖盡可能地獲得大利潤的資本家間的競爭，競用新的較優良的機器，因舊機器的生產成為不利了。假使固定資本因技術上更優良的機械之普遍使用而成為不利，那我們可以說，牠之耗損並非物質上的，而是『道德上』的。

假使機器之『道德上』的耗損，前於其物質上的全部耗損，則這就使資本家受損失，事實上，機器因物質的耗損，把其價值轉化於商品上且會重歸到資本家；假使機器陳舊了並非由於物質的耗損，則其價值的一部份就不能收回了。所以資本家皆以機器，尚未成為陳舊時，盡速地把其價值完全轉化於商品為有利，但那種以新機器去代替的，舊的，且於物質上尚未耗損完的機器，對於資本家無論所值幾何，他不能不那樣做，假使他於這方面不能不競爭的話。

各部份資本之物質的耗損是在各種時期內完成的。各種機器也是在不同的時期內耗損完的。各種機器物質上所由耗損的時間與房子所由耗損的時間不同，這裏應注意，並非所有的機器與建築物皆同時加入生產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固定資本尚未全部耗損完以前，積蓄的還原的總量並不是不動的。爲了各部份固定資本之恢復，牠們允許各部份在生產上時時更新。但這些總量不能於每次資本家出賣其一批商品且收回轉化於這批商品上的固定資本的價值一部份以後，就參加該資本家的生產的。這些總量將暫時以開放的貨幣準備的形式積蓄起來，直至可以動用牠的時候。

所以，因固定資本流通的這種特點，每個資本家皆暫時積蓄着開放的貨幣手段，這種手段在其企業中尚未能轉化爲生產資本，牠就以貨幣的形式停滯在資本家的手中。

貨幣形式的資本之停滯，雖係一時的，但已表示出，這時候，牠並未參加剩餘價值的生產。在某時期內尚無須爲剩餘價值的生產而動用其這部份手段的資本家，在這時期內可以把牠供給——普通皆經過銀行的中介——別個資本家的支配，一時地由某個資本家解放出來的總量，收集起來，於這時期，供別個資本家用於剩餘價值的生產。這就是資本主義信用的根源之一。

我們曾說，積蓄還原總量的各個資本家，要動用其一部份，因他們於各時期中須更新同此部份的固定資本。這些時期，因各個資本家而不同。但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上難免有這樣的時期，這時固定資本的更新——以及準備的復舊的貨幣總量轉化爲生產的固定資本——採取龐大性。

這爲『生產手段之不斷的改革，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其

意義更形增大的改革』所引起（資本論：第二卷，132頁）。

隨『生產手段的改革』，舊的固定資本，於『道德上』耗損了，資本家就不能不馬上大大地更新牠們。這普通是在恐慌後進行的，這時候，商品銷路的停滯，迫使資本家廣泛地競用能使他生產廉價商品且利於競爭的新的改良。

在某時期內固定資本的龐大更新以後，又積蓄着還原的總量，在尚未為固定資本之更新而使用或比之資本之龐大的『道德的』耗損時期，規模較小上的使用時，這種積蓄一直繼續着。只有隨普通在恐慌以後所發生的新的改革，才開始再次的龐大的改革。在這些改革中，依馬克思的說法，給資本主義生產週期地，時復一時地『徹底地呻吟於衰落的時期，普遍的掙扎，猛烈的危機』以『物質的基礎』（同上）

第二百零四節 在再生產中回轉資本的間斷 與補充資本的必需性 剩餘價值的資 本化與開放的貨幣手段之一時的積蓄

我們已知，固定資本回轉的特徵如何影響到一般回轉與資本再生產上去，但固定資本回轉的特徵尚把其痕跡印在資本之一般的循環上，尤其印在為資本再生產之不間斷地繼續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量上，且印在這種貨幣資本之運行上。

假設，資本家在其企業裏製造了一批商品，因為機器與房子（即固定資本）在這一生產時期內，不能耗損完，故再次的生產，可以無須新支出固定資本（註）。原料，燃料，副料，勞動力，簡言之，流通資本的諸因素就不同了：在每次生產時期一結束，牠們就需要其更新了。

「註」我們暫不計及修理費。

在進行下次的生產時期以前，資本家應再次恢復其流通資本，如此，他就必需有相當的貨幣「註」。

「註」爲便於說明計，暫不計及存貨。

他僅能因出賣商品而得到這些貨幣，因此，就需有相當的時間。但如因此而暫時停止生產是不利的。此外，機器往往會受耗損，在生產停止的時間內難免化費看守費與保護機器與房子的費用，資本家是不能允許投在固定資本上的大量手段在某些時期內不運用，不給以收入的。

不允許因流動資本恢復發生阻害而停止其企業，資本家在生產時期開始時，爲了這個時期，僅把其貨幣手段的一部份用於原料與勞動力上，在這時期結束以前，把其他部份以貨幣形式，以補充資本的形態積蓄起來。

在第一次生產時期內，補充資本是不動用的，當作準備的。在第一次生產時期終結以後，第一批商品尚未售脫的時候，資本家爲了購買新原料與勞動力而繼續生產計，就動用那積存的補充的手段了。但當第一批商品出售以後，轉化於這商品裏的資本又解放出來且又不動用了，直至藉助補充資本生產出來的第二批商品開始出賣爲止；出賣了第二批商品以後，這些補充的資本又解放出來，在這種情形下，遂又成爲不動用的了，等等。「最初的生產資本與追加資本之資本的分業一般地達到了勞動時期之不斷的繼續，達到了，任何時候，預支資本的大部份好像生產資本那樣地作用着，」（資本論 第二卷，一八二頁）。

總之，在資本循環過程中，時復一時地該企業的資本之一部份停滯在貨幣的形態上，暫時在這企業上不使用牠，並不參加剩餘價值的生產。顯然，資本家以縮小積存的不動用的資本量爲有利，雖說沒有

牠，全部進行是不可能的。

假使不注意各個資本，而注意到全資本主義社會，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時時皆有大量的這種暫時開放的積存的資本——暫時開放的還原的總量。這種積蓄起來的積存的資本是資本主義信用的根源之一。

這暫時開放的總量是無關於資本化的剩餘價值那部份的，因出賣商品而實現的這部份剩餘價值，並非一下轉化為資本的因素；在未積蓄到於生產上可以使用牠的時候，牠一直開放着。

第二百零五節 資本回轉的一般速率

資本回轉的速率及其對於藉這資本而榨取得的剩餘價值量之影響

在一定時間單位（普通為一年）內可以由這部份或那部份資本的回轉次數，表現出其回轉的速率。比如，可變資本普通於一年內完成好幾次回轉；原料與副料也復如此。固定資本，固然，於幾年內，才完成其回轉，而在一年內其回轉的速率則表現一單位的幾分之幾。

由各部份資本的回轉速率能計算出全部資本回轉的平均速率。

假設，某企業家投在固定資本上為100000元，其中40000元為房子，而60000元為機器。再設機器完成其全部回轉，即以還原的方法，收回其全部價值須五年，而房子則為十年。顯然，投在機器中的全部總量每年收回了的數量等於 $60000 \div 5$ 即12000元；投在房子中的總量每年收回了的數量等於 $40000 \div 10 = 4000$ 元；這一年末，固定資本共收回了 $12000 + 4000 = 16000$ 元。因全部固定資本為100000元，故其回轉的平均時間為 $100000 \div 16000 = 6\frac{1}{4}$ 年，一年內，其回轉的平均速率為 $1:6\frac{1}{4} = \frac{4}{13}$ 或回轉0.16次。我們僅計算固定資本回轉的平均速率與時間，可

以同樣的方法計算全部資本回轉的平均速率。

假設某企業有固定資本 80000 元，流動本資 20000 元，再設固定資本回轉的時間為八年，而連同可變資本也在內的流動資本，每月回轉一次，故一年內資本收回的總數將等於：

固定資本	80000元 ÷ 8 =	10000元
流動資本	20000元 × 12 =	240000元
一年內全部資本收回的總數		250000元

因在這企業上共投入 80000 元 + 20000 元 = 100000 元，故等於 250000 元的一年內資本收回的總額，大於投入資本二倍半，換言之，預付於這企業上的全部資本，一年內收回二倍半。

全部資本回轉的速率愈快，則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可以藉這些資本而生產出來的價值與剩餘價值也愈大，且為在製成商品的形式上獲得同數量價值與剩餘價值，為在企業上必需投入的資本也愈少。

假設，100000 元資本每年回轉二次（這裏，我們是說由各部份資本不同回轉的簡化而求得的一般回轉），這就是說，在藉這些資本一年內所製成的商品中，轉化了固定資本的價值與收回了可變資本的價值共為 200000 元，此外，還獲得了一定量的剩餘價值（假設 25000 元）。

現在，假設，資本於一年內並非回轉了二次，而只回轉了一次。則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資本家於一年內所生產出來的商品總量減少；且只有他一下投在企業上的（或說預付的）不是如先前的 100000 元而是大二倍，即 200000 元，在這種情形下，才能由工人榨取出同樣的剩餘價值。

事實上，假設，由其 100000 元資本中，以 12500 元組成可變資本，因我們為簡明計，假設可變資本與資本的其他部分，統於一年內回

轉二次的，所以，這就是說，資本家支付工人的 12500 元於這一年內因出賣其商品仍回到資本家，且於同是這年內再次支付給工人。所以，預付 12500 元可變資本的資本家，於支付 25000 元工資外，還能由此獲得 25000 元剩餘價值。

假使一年內資本並非回轉二次而是回轉一次，則事情怎樣呢？顯然，爲了能藉同樣的榨取率獲得與先前一樣的剩餘價值量計，資本家應一下預付二倍於先前的，即 25000 元工資。同時如果在行程上遲緩了固定資本的回轉（如我們爲簡明計所假設似的），則應加倍投入固定資本。

由此，我們再次提出這樣的概念，所以，資本家以加速其資本回轉爲有利：這滋助他藉同樣的資本由工人榨取得更大的剩餘價值。

然而，隨資本主義與技術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回轉之一般的速率，則表示着遲緩的趨勢。

這可以這樣去說明之，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與資本有機構成之增高，比起流動資本來，大大增加了固定資本，且大大遲緩了固定資本的回轉。事實上，隨技術的發展，引用了存在時間更久的，新而煩重且昂貴的機器；同時又遲緩了資本回轉之一般的速率。

關於資本回轉隨技術增高而遲緩化的理論表象可以下列統計證實之。

如果，我們引證斯特魯彌林(Strumilin)關於俄國在1911—1912年間各股份公司企業內資本回轉的時間，就可得到下列的統計（註），

根據回轉的企業規模 〔單位爲千元〕	回轉次數 〔單位一年〕
5000	1.51
3000	1.55

1000	1.90
500	2.30
100	3.18
10	3.55

（註：蘇聯工業資本問題，1925年，7頁。）

雖說在這表上，並未指出企業之技術的水準，但可以差不多無錯誤地說，企業的規模愈大（雖是根據回轉的），則技術愈高。

然而，應指出，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回轉遲緩化的傾向，為因技術增高而發生的反傾向所阻止。這是關於流通手段的發展與資本之『道德耗損』。是為資本主義發展之特徵的，勞動強度之提高，工人榨取的加強，同樣對立着資本回轉遲緩化，這些相反趨勢的影響——只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矛盾性表現之一。

第二十三章 關於馬克思底資本流通 學說之觀念論與機械論的曲解

第二百零六節 關於馬克思—伊里奇的與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學中的流通問題解釋之一 般的評註 社會民主派的流通論之批判

「由全部考察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生產與流通過程之統一」（資本論·第三卷，三頁）如無流通則生產是無意義的，且除開生產，則流通也屬不可能的，但如我們所已知，在這統一中有決定之作用的是生產。

馬克思—伊里奇政治經濟學的這種見解有偉大的革命的實際意義：牠告訴無產者，假使仍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不可侵犯性中，即生產手段與工具由工人分離開來，資本家獨佔這些生產工具與手段，勞動者必需出賣其勞動力且在生產上為資本家所榨取，則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無論如何改變，均不能排除資本主義的矛盾。馬克思—伊里奇政治經濟學指示無產者去掌握政權，雖不拒絕在流通過程中的革命行動，但應以傾覆資本主義的生產且代以社會主義的生產為其最重要的任務。

由此可以明白布爾喬亞對於馬克思—伊里奇的流通論之有害的關係，而社會民主派則企圖以種種方法去修改牠，換以反無產者的一

布爾喬亞的理論，「忠告」無產者勿「妨害」生產過程。

如我們所已不僅一次指示過的一樣，力避資本主義生產之內部關係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分開了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以流通為經濟的基礎，為的想蒙蔽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為的想說明二個對立階級的代表——資本家與工人是二個平等的私有者——購買者與出賣者，他們這樣着重於流通過程。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行程」又為社會主義派的特徵，他們為了欺騙工人且使之退出革命的鬥爭而造成了「經過流通之社會主義化」的特殊理論。

這種理論的著名代表人之一，就是曾任奧地利共和國的司法部長且於革命危急的時期拯救這共和國與布爾喬亞然後以「經過流通的社會主義化」的理論與工人之革命的傾向作鬥爭的，奧大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卡爾拉熱(Karl Renner)。

「流通過程——拉熱在其所著『資本主義政濟論』中這樣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之最高的立法者與裁判者，要而言之，在這裏包含着社會主義化問題的本質。牠(即流通過程)實現了價值與剩餘價值；牠把這些分配給各經濟的代表；牠是決定各經濟主人的命運之最後的裁判者」(資本主義經濟論，1926年，290頁)。

對於拉熱，流通是資本主義之「主要的基礎」，這樣，拉熱遂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參加者化為「經濟的代表」「經濟的主人」；當作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關係之基礎看的階級的關係被蒙蔽着了。解釋流通為資本主義之最高的裁判者以後，他作成結論：社會主義不能以消滅資本主義生產的方法達到的。熱心防衛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防備革命的無產者之「襲擊」，拉熱「堅信」社會主義是不能由生產開始的「佔領工廠，沒收企業……不是達到目的的方法」——拉熱這樣說(註

一) 他宣稱「由流通始一步一步地使資本主義走上『新的道路』」(註一) 依拉熱，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需要社會主義化，因「牠已經社會主義化了。」[生產已經社會化]，他說，所以「不以流通過程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化是無目的的且完全錯誤的」(註三)，

(註一) 資本主義經濟論，1926年，319頁

(註二) 前書，322頁

(註三) 前書，290頁

所以，拉熱企圖把無產者的注意力由排在其面前的消滅資本主義的革命主要任務方面轉移過來。他向無產者，陰瞞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內在矛盾且說這種生產已社會主義化了，為的想克服無產者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襲擊，革命的無產者經過社會革命與無產者專政而「佔領工廠且收滅企業」。拉熱的理論是在「經過流通的社會主義化」假面之下的反革命的觀念。

拉熱企圖說服革命的無產者，在經濟過程上的一切干涉，皆恫嚇着工人階級之非常的不幸，他歌頌着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說牠是「靈巧的機體」人類智慧之可賀的產物，(前書，819頁)，擁護資本主義的他，注意革命的無產者之旋「一鉗子的用作」，他說不要虛擲「一秒鐘」『一分鐘，這是這種職業的藝術家在長久時間內學習得的。』

「毀滅資本主義經濟非常容易——拉熱說——但以別的制度去代替牠就很困難了」(前書319頁)。

拉熱的關於「經過流通的社會主義化」的「理論」描準着無產者專政的一般，尤其反對現存的蘇聯之無產者專政。他說，普遍地壓迫資本家是「野蠻的手段」非常愚笨的。他說，蘇聯壓迫資本家的結果，「淆亂而外，一無所得」，(前書，321頁)，問題在乎，「爲了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無產者應否獲得政權」(前書，327頁)，他給以否定的答覆。

混在馬克思信徒中的拉赫，完全公開地反對馬克思了，後者的功績在乎把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推論到無產者的專政，這是馬克思所以與布爾喬亞理論家不同的地方。

分離生產與流通且以流通為基礎的，類此的見解之擁護者是費爾希丁。

『找尋交換的法則』——依費爾希丁，這是政治經濟學之主要的任務。依他的意見，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只有當某經濟在市場上，在交換過程中與別的經濟對抗的時候，才表現出來。因此以為在交換以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與在其他形態中的生產一點也沒有什麼區別。費爾希丁說，資本主義『只在交換行為中才體現出其社會關係』（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1922年，114頁）。所以，由此就發生了在不依存於社會形式的生產，與，依他的意見，為社會形式所決定的流通間之裂痕了。

1910年，費爾希丁在其所著『財政資本論』中以流通問題為中心點，企圖以同樣的方法，在資本主義完全走上其滅亡的道路時，去蔽蔽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我們的進程——他說——在資本主義的工廠裏，看不見其技術的新奇；我們的注意力應集中在顯現在市場上的各種過程之單調的形成』（前，51頁）。

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之否定開導費爾希丁與其信徒到『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經過流通的社會主義化之奧大利馬克主義者的『理論』變成了公開反對馬克思及無產者專政的工具。

這種流通論為馬克思主義的老叛徒——考茨基所熱烈擁護。於1926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中，考茨基叫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的現在的名義中』在由足以恫嚇資本主義的危險性，……由無意義的大資本家(獨占者)方面去拯救資本主義的目的中，去研究流通過程

。『在商品流通範圍中——考茨基說——資本家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往往相吻合的，因資本家與工人皆以流通過程之不斷地進行為有利。』故考茨基忠告工人在「流通不斷性的」與擁護資本主義的目的中與資本家相和諧。此外，考茨基還公開地以其理論去反對蘇聯的無產者專政，同樣，反對意大利的革命工人於1920年把生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英雄企圖。

在蘇聯，這種流通論的宣導者是魯平。

我們已知，據魯平，資本主義經濟之主要的生產關係是「交換的形態」，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依魯平，在其交換的基礎上是平等的商品出賣者之市場的關係。依魯平的「理論」，在二個於市場上交換已製成的商品的資本家間的關係，與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並無不同，因魯平於這裏和那裏所看到的只是交換。所以魯平「抽取了」為資本主義生產之基礎的階級關係，所以，魯平這裏與考茨基等相同道，企圖警告無產者，無產者的干涉生產是不需要的且有害的。與其他布爾喬亞的危害者相結合，他企圖說服蘇聯的無產者，在蘇聯的無產者的國家內，生產應自然的發展，應不由無產者的「干涉」，即當作純「技術過程」而發展。在流通的解釋及其他問題上，魯平以這樣的見解去反對無產者的革命與無產者的專政。

第二百零七節 關於馬克思底流通學說之機械論的曲解

生產與流通的關係的不正確的瞭解，把流通解釋作特定的契機，也為機械派的曲解之特徵。

機械派的一般見解尤其是布哈林的見解之特徵之一，為內在矛盾

之否定，及引導牠到外在的矛盾。

所以，布哈林說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時，其注意力就集中在這經濟與另一經濟間之外在的矛盾。依他的意見，資本主義的法則，由『生產的機體』各不同的部份之互相適應，即在市場上在交換過程中之這些部份的對抗而確定的。他雖也說及政治經濟學之『生產觀』，但他以為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根本的矛盾是市場的流通（右開者底政治經濟學，49頁）

布哈林在其研究的進程上是追隨費爾希丁的。在其『右開者的經濟學』中，他引費爾希丁底見解說，經濟學的任務是交換法則的闡明。在這問題上布哈林的見解與魯平的見解頗相近似，一樣以為，在資本主義企業的內部是沒有矛盾的，牠們僅發生於各企業間的關係中（註一）。

由其流通論出發，機械派在蘇聯在其基礎上，發展了其機會主義的理論，以為，農業經濟到社會主義的『方便的道路』，在蘇聯，只是流通的合作社，即按照銷售的，生產品出賣，信用的路綫之農民的團結。黨把廣泛地存在於新經濟政策之最初階段的流通合作社當作，使勞動農民參加集體農場的生產組合的方法，而右的機會主義者則否定當作小農之社會主義改造之主要方法的，生產合作社的作用。『我們問——布哈林說——有些同志以為……到社會主義的主要方法——這是集體農場，我以為這種見解是錯的。方便的道路經過普通的協業——銷售，購賣，信用——而進行』（註二）。因而，布哈林以為，經過流通的合作社，在社會主義體系內，不僅和平地發展了勞動的農民，『富農的協業的巢穴，也經過銀行，等等，而在同此體系中增長了』（註三）。由此推究出右派反對貧，中農業經濟之集體化的鬥爭，反對進攻富農且在繼續集體化的基礎上好像肅清階級一樣肅清牠的鬥爭。

所以在實際上，關於流通問題之觀念派的與機械派的修正是互相結合着的。

〔註一〕固然，除掉在經濟間的矛盾而外，布哈林不能不承認在階級間的矛盾。

但他把這二種矛盾分離了，同時對馬克思——伊里奇主義，這些矛盾形態是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佔有形態間的矛盾之體現者。把外部矛盾與內在矛盾分離了的布哈林遂進展到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這裏，機械論的修正與觀念論的修正，再次表現出同道，因費爾希丁也曾進展到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

〔註二〕我們政策的流動契機與基礎，1925年版，28頁

〔註三〕到社會主義的道路與工農的團結，1925年版，49頁

第八篇 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

第二十四章 關於社會資本的再生產 與流通的馬克思—伊里奇學說

第二百零八節 社會資本的運行與各別資本 的運行之區別 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在 社會資本運行中的表現

直到現在，我們皆由各個個別資本之運行着手去研究資本循環的過程的。但由於這種研究，我們已很明白，各個個別資本之運行是不能離開別的資本之運行而完成的；例如，我們已知，某個資本家的商品資本之轉化為貨幣資本，難免以別個資本家的貨幣資本同時轉化為商品資本為前提的（參考二十一章九十八節。）

『個別資本的循環——馬克思說——互相補充，互為前提且互相決定，又因這種交互的結合，組成了全社會資本的運行』（資本論，第二卷，251頁）。

但由於個別資本運行的研究，我們已很明白，牠們是社會資本一般運行之環圈，然而，這時我們尚未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些環圈怎樣組成一般的鎖鏈，全社會資本整個的運行是怎樣進行的。

現在，我們轉而考察這個問題。

社會資本整個的運行暴露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許多特點，這些特點尚未因個別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之考察而顯示出來。

在考察個別資本之運行時，我們並未研究這樣的問題，這個或那個資本家的生產品之命運如何，這些生產品怎樣被實現且實現後如何被使用。我們只是說明，在生產結果採取商品形式的資本，應於流通過程中轉化為貨幣資本，然後，又於流通過程中，把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因素，這樣的繼續進行其循環的過程。這裏，我們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某資本家的生產品有與別個資本家的貨幣相交換且以此貨幣購買生產手段的可能性為前提的。資本家以其資本的界限而獲得生產手段，然後把牠經過 $(G - W < \frac{A}{PM})$ 的過程) 投入其循環中；資本家與工人由此獲取消費手段；在什麼條件下實現商品，商品運到那裏去且運去以後，如何出賣，且該資本怎樣退出循環——這些在考察個別資本之運行時是沒有意義的。因而由這個或那個資本家所造成的生產品之自然形態也是沒有意義的。對於他認為重要的，只是其商品有某種使用價值，對於他更為重要的是其商品的價值以及包含其中的剩餘價值。

社會資本整個的循環就二樣了。因各個資本的運行是社會資本一般運行的環圈，因這裏各個資本之運行是互相決定的，所以各生產部門的生產品之關係，這些生產品的實現，其使用性，這裡就有很大的意義了。事實上，生產過程的更新，需要一定量的生產手段；這是為已耗費的生產手段之恢復以及往後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這些手段應由某生產部門的資本家生產出來；此外，為了工人勞動力之恢復以及資本家的慾望之滿足，必需特定量的消費手段，這些消費手段，又應在相當的部門內造成的。

顯然對於社會資本運行有意義的不僅是生產生產品的價值而且是

其自然形態，其使用價值，這使用性的特性是能使牠們滿足。不是對於再生產就需要某種生產手段之自然形態的生產品與某種消費手段之自然形態的生產品麼？

因而，由於全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應分為二主要的生產部門：1. 生產生產手段的部門；2. 生產消費手段的部門。第一部門給所有資本家提供生產手段，第二部門則給全社會的工人，資本家提供消費手段。

如不把全部資本分為這二大類，就不能明白，在社會再生產中，已耗費的生產手段之補償與個人消費的滿足是怎樣進行的；也不能明白，各部門的生產品之實現是如何進行的。

上述二大類中每一種資本按其價值形態都是由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所組成的，而藉這些資本所造成的全部生產品，按其價值形態又可以分為三部份：一部份是不變資本之回復，經過流通過程，牠與生產手段相交換，以代替已耗損掉的生產手段，第二部份回復了可變資本，在流通過程中，牠給在生產過程耗費其勞動力的工人交換消費手段，第三部份增值出剩餘價值，牠給資本家交換消費手段，在擴大再生產時，則除此以外，還與追加的生產手段與給追加工人的追加的消費手段相交換。

總之，我們已知，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中，按其價值形態，與按其自然形態，皆表現出各資本主義的生產部門(及其生產品)之關係。社會資本再生產特殊地表現出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的自然形態與價值形態之統一和對立。牠顯露出，固結於各商品中的且為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之體現者的，在價值與使用價值間之矛盾的發展。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部門皆生產出按其使用價值能保證生產手段之更新與消費手段的慾望之滿足的，生產品；生產生產手

段的工業，能生產出，為其自己部門和為別部門所需要的各種機器之充足的數量；生產消費手段的工業，按其能力，設備等等，給工人，能充分地生產出消費手段。但假定，在這裏並不存在着各部門生產品價值的關係：假設，由機器建設工業生產出的且為農業經濟所需要的耕種機，按其價值，轉化於農業經濟生產品的價值，但農業經濟只能在交換中以其生產品去購買耕種機。顯然，由於資本主義關係的統治，耕種機只有堆在棧房裏了，雖說為農業經濟所需要，而農業經濟的生產品又堆積着了，雖說工人有時無麵包吃，社會生產之不斷的行程將被破壞。

這種情形不是純屬意測的抽象。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簡單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轉化為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佔有形式間之矛盾，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與消費間之更深化的矛盾中。這難免時復一時地引導到社會生產過程之崩潰與瓦解。

這些矛盾之增長與發展又因社會資本再生產的考察而特殊地表現出來：由於社會資本運行的分析，提出了關於在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手段的生產間之關係的問題，即關於生產與消費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牠們的統一與矛盾的問題。

顯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特徵，是企圖無限制地擴大再生產。生產的擴大難免首先引導到，生產手段的生產之擴大，引導到『生產的消費』（即生產手段之消費）之增加。但生產手段的消費，如表示出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似的，時時與個人的消費（即消費手段的消費）相聯結；生產手段的生產之成長又引起消費手段的生產之發達。同時，很明顯地，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是大眾的貧困化，非常有限的消費。這在生產增長與消費有限性間的矛盾（其本身又是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佔有間的矛盾之體現者且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

矛盾)實現於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的過程中且在這過程中升至第一地位。

「消費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伊里奇說——這是事實。在這些事實與那些事實間的矛盾是由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與消費相關聯而又依存於消費，這矛盾並非教條，而是真實的生活。馬克思的實現論（註）——所以有偉大的科學價值者，因牠指示出這矛盾怎樣實現的；因牠把這矛盾升在第一位」（全集第二卷413頁）。

（註）伊里奇，所謂的馬克思的實現論是指馬克思的關於社會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的學說，因這學說，指示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生產品之實現的條件。

包含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矛盾之增長與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必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其週期的爆裂，社會再生產過程之可怕的破壞，引起恐慌。

在後面考察問題時，我們將看到這些矛盾如何發展，其爆裂是怎樣進行的。

第二百零九節 馬克思先輩的社會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的問題

由於在社會資本運行與個別資本運行間的區別的問題之考察，社會資本的運行就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深刻的矛盾。只有毫無憐憫地揭穿資本主義之真實的矛盾，且指示出其增長與發展的，馬克思——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才能說明社會資本之整個的再生產與流通的問題。

固然，遠在馬克思以前，初期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之一——開納在其「經濟學表」中曾偉大地企圖說明社會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的問題

，但開納的經濟學表，仍不能說明這個問題的，因開納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真實的矛盾。

開納怎樣處理問題的呢？他由重農學說出發，這是初期的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學派之一，認為只有在農業經濟中的勞動才是生產的勞動。依重農學派的意見，除掉業農者外，其他任何人民皆不能生產出新的價值，他們只是使用在農業經濟中創造出來的東西。由此出發，開納把全社會分成三種階級；1 生產階級（農業的主人——莊家）；2 不生產的階級（工業家，商人，工人）；3，土地所有者的階級。依開納的假設，農業經濟是資本主義地的：莊家由土地所有者租得了土地。在這種情形下，依開納的意見，社會生產品的各部份，按其價值與自然形態，有怎樣的關係呢？因唯一的生產階級是農業主人的階級，所以總額五十萬萬元的國民生產品，在生產的農業經濟年結束時，是握在這生產階級的手中且組成了消費手段與原料。據這國民生產品的價值，分為；1. 二十萬萬元的農業經濟之流動的資本（莊家的生活費，種子等等）2. 為在一年內固定資本（工具，牲畜，等等）耗費部份之補償所必需的手段——十萬萬元；3. 為土地所有者所獲得的純收入——二十萬萬元。

這價值五十萬萬元的國民生產品的實現，是依下列方法而進行的：

由土地私有者租得土地的莊家，給前者二十萬萬元租金。

土地私有者以這些貨幣的十萬萬元向莊家購買生活資料，以十萬萬元向工業家購得工業品。因出賣生活資料由土地私有者處得十萬萬元的莊家，即以此數購買工業品。握有二十萬萬元（其中十萬萬元是由土地私有者處得來，另外十萬萬元則由莊家處獲得）的工業家又這樣去支配其貨幣：他們為了已耗損的資本之回復，以十萬萬元向莊家

購買原料等等，再以十萬萬元購買消費手段。故貨幣又重新回到莊家，而生產過程又可再次開始了。

開納不曾解決爲他所提出的社會生產品之實現的問題，因他是由不正確的前提出發的。

爲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的他，不明白且不能明白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性和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他在其認爲只有農業經濟的勞動才是生產的勞動之出發點上已不正確了。再則，開納在其「經濟學表」中完全不曾注意到工業的固定資本，而這種固定資本在其實在的現實性上是存在着的。依「經濟學表」可以看出，工業家把其所有生產品全賣給土地私有者與莊家了，一點也沒有餘下以供其自己的使用，且他們連一點利潤也不會得到。所以「經濟學表」不曾反射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實在關係，雖說馬克思稱譽這「經濟學表」謂「偉大的思索之成果」，其偉大性在於企圖把全社會資本及其再生產統包括於整體中，同時，依馬克思的說法「政治經濟學尙披上外衣」。

亞丹斯密士以及後於開納的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之其他代表，按照生產勞動的問題以及一般的政治經濟學之基本問題，皆比我們可於開納及其他重農主義者處所見到的表象，更前進一步了。但在我們剛才所研究的關於社會資本整個再生產的問題上，則這些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比之開納反倒退了。亞丹斯密士所以不但不能解決，且不能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者，因牠僅把製成商品的價值推演到工資，利潤與地租，而忽視不變資本。

由此作成結論，斯密士不曾看到具有價值的生產手段之存在的，這一明顯的事實，當然是不正確的。然而，由勞動創造價值這一前提出發，斯密士以爲，不變資本的價值，生產手段的價值又可分爲 $v+m$ (借用馬克思的術語)，「這三部份(工資，利潤與地租)——斯密

士說——表示出麵包的總價格之直接地的或間接地的組成。爲了勞動的牲口與工具之耗損的恢復，可以承認必需追加的第四部份，但應特別注意，無論那種屬於農業的物品價格仍由這三部份組成的；例如耕馬的價格由第一，馬吃草的那方地的租金，第二，喂馬的勞動，第三，預付這租金與勞動工資的承租者的利潤，這三部份組成的』（引文根據盧森堡的財政資本，第20——21頁，1931年版）。

依斯密士，全社會生產統可劃分爲這三部份——地租，工資與利潤——或更正確些說，分爲二部份： $v + m$ （勞動力價值加上剩餘價值）。斯密士已拋棄了社會資本整個再生產問題之解決的方法了。事實上，假使社會生產品僅分爲 v ——勞動力價值與 m ——剩餘價值，那末，很明顯地不變資本已不曾組成已製成的商品價值之相當部份，因而牠一點也不能實現了。斯密士的根本錯誤在乎，他不瞭解在商品經濟中勞動的二重性，因而不能找尋到這種真理，在製成商品的價值上，不僅投入在生產上轉化爲勞動力價值且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除此外，且投入包含於生產手段上的死勞動的一部份。使包含於生產手段上的過去勞動轉移於新商品上去是無須一點追加的勞動力的。以其勞動創造新價值——成爲再生產的勞動力價值與剩餘價值之創造——的工人，同時又把包含於生產手段之耗費部份的價值轉化爲商品的價值，以勞動之抽象勞動的性質創造新價值，以同此勞動的具體勞動性把包含於生產手段上的舊價值轉化到新商品上去。

不瞭解不變資本在社會資本之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作用，把全部社會生產的生產品推演到收入的斯密士，是不能看見二大類——生產生產手段的部門與生產消費手段的部門之關係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有的意義的。不瞭解勞動的二重性，往往混同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其價值的，斯密士，是不能明白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過程中的生產

品的自然形態與價值形態之矛盾與統一的，不能明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與消費間之矛盾的。這當然可以如此說明之，甚至是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最好代表，因其階級的特性，不能明白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特殊的矛盾。

總之，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即在最好的情形下(例如開納)只能提出問題，正確地提出且解決這個問題者只有馬克思。

第一百十節 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社會資本全部的運行

來考察一下，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即當生產在原樣的規模中重複的時候，當資本家把他所榨取得的剩餘價值完全耗費在其慾望之上的時候，社會資本的運行，其價值與剩餘價值之收回與實現是怎樣進行的。

如我們所已知者然，資本主義地生產出來的商品之全部總額可以總數 $(c+v+m)$ 表現出來，在這裏包含着在這些商品生產上所耗費掉的不變資本的轉化的價值 (c) 與與此相結合的且由工人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新價值 $(v+m)$ 。所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出來，形形色色的物品，馬克思把牠分爲二大類；I——生產手段與II——消費手段。在這二大類中，我們又可按照價值把生產出的生產品分爲 $c+v+m$ 。

假設，在生產生產手段的第一類中，投入五十萬萬元，其中四十萬萬元爲不變資本—— c ，十萬萬元爲可變資本—— v ；而在生產消費對象的第二類中，共投入二十五萬萬元，爲簡明計，這二類的資本有機構成相同，即皆爲 $4:1$ ，故在第二類的二十五萬萬元中，不變資本爲

二十萬萬元，而可變資本為五萬萬元，

為使這個例子不致煩複計，再設這二類的剩餘價值率皆為100%，且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在一生產週期內把其價值完全轉化於製成的生產品上去。

這時，就可獲得下表：

第一類——生產手段的生產：

$$40c + 10v + 10m = 60$$

第二類——消費手段的生產：

$$20c + 5v + 5m = 30$$

第一類的社會生產品按其價值等於60萬萬元，且全由生產手段組成的：機器，工具，輔助材料。

第二類的全部生產品等於30萬萬元且全由消費手段組成的。

先來考察一下，在簡單再生產之下，第一類的生產品是怎樣實現的。

生產手段的第一部份將因在第一類內部各企業間之交換的方法而實現。在生產過程結束以後，這一類內部的機器，房產及不變資本的其他因素，全耗損完了且需要其恢復。既然在第一類中，不變資本共為40萬萬元，那當然在60萬萬元價值的一般生產品中，在第一類的內部實現了40萬萬元的生產手段。

因而餘下20萬萬元未實現的生產手段，其中的一半——10萬萬元——表現為在生產時消費掉的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其他一半則表現為剩餘價值。這餘下生產手段能否在第一類的內部被使用呢？以工資的形式獲得10萬萬元的第一類的工人，並不購買生產手段，而是購買消費手段，獲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也是如此：因在簡單的再生產之下，我們所說的是資本家把其全部剩餘價值皆用在個人消費之滿足上

再生產下，這二大類的生產品之實現，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才可能：假使第一類對於消費手段的需求額，按其價值，却好等於第二類的不變資本的價值，而第二類在交換中所提供出的其消費手段的數量，按其價值也剛等於第一類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顯然，爲此，就必須使第一類的 $v + m$ 等於第二類的 c ，即 $(v + m)I = cII$ 。

在我們由馬克思那兒引來的例證中，實現所以可能者，因這個等式却好被保持着： $cII = 20$ 萬萬元，而 $(v + m)I = 10$ 萬萬元 + 10萬萬元，也等於20萬萬元。

總之馬克思的圖表，是根據社會生產品實現的觀念的比例性之假設，而說明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社會資本各部份之回復過程的。但，這裏馬上發生出社會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的矛盾，必不免地會引導到非比例性，引導到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停頓與間斷。

在這表中，我們可顯然地看出，如馬克思所說，在簡單的再生產之下，完成了『在不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間之不斷的流通』。事實上，在第一類中， cI 這部份生產品，是以在這一類的資本家間生產手段交換的方法，而實現於這一類的內部。這『在不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間的交換』並未加進私人的消費。由此可以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在起始的時候，可不依存私人消費，因生產手段而完成。但這只有在開始時才能進行，生產一般如不依存於消費是不能存在的；生產手段的生產非爲其本身而完成，終歸會引導到消費手段之生產的。

『在不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間之不斷的流通——馬克思說——只有在開始時，才不依存於消費，牠任何時候皆不加進消費，但，……終究爲私人消費所限制，因不變資本之生產，任何時候皆非爲自己而完成，所以完成者，僅因其爲那種生產品參加私人消費的部門所使用』

，資本論，第三卷，212頁）。

所以，這裏，我們已揭示出足爲資本主義再生產之特徵且爲生產社會性與佔有之私的形態間之矛盾的體現者的，在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這矛盾深化的結果，又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包含在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中的矛盾，甚至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都在這再生產過程中固定資本之作用的問題上極尖銳地爆露出來。

此刻，我們假設，在簡單再生產之下，固定資本每年皆耗損了同樣的部份，然而只要一注意到在固定資本之替換部份間的關係，則其需要回復的部份與工作的部份，就起變化了，即某年替換部份較大，而他年則較小，這就難免破壞了上面的觀念上比例性的假設，雖說生產仍在原來的規模上繼續着，且保存着其他相等的條件。

這可因二種情形而發生。第一，在固定資本需要收復，而替換的部份增加的時候。這時候，表示在第一類中生產出的生產手段之不充分，這不免會引起勞動與資本之由這類退出而轉投入那類，當然會使簡單再生產的行程一時被破壞。

反之假使在某年中，固定資本需要替換的部份減少了，那末，會使生產手段過多，而發生生產過剩，『這過多決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但在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之下，牠就變成有害的了』（資本論，第二卷，131—142頁）。

所有這些，皆是說，馬克思的圖表，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資本的各部份之實現與回復是怎樣進行的，同時又揭穿了，甚至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危機的，社會再生產運行的一切矛盾性。

『在再生產的規模不變之下，固定資本的例子，已足使我們相信

了，——馬克思說——在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再生產中之非比例性，這就是足以說明危機現象的經濟原因之一。這種非比例性，能够且應該在固定資本的單純保存之下發生的；牠可能且應該在觀念的常態再生產之假設中，社會資本的簡單再生產中發生，對於牠這是新穎的』（前書，342頁）。

我們已知，資本主義的特徵不是簡單再生產，而是擴大再生產的傾向。然而簡單再生產不是單純的抽象。『假使已完成了積蓄——馬克思說——簡單再生產，任何時候皆為前者的一部份，當然，應個別地去考察牠，牠是積蓄的實在因素（前書，281頁）。簡單再生產為擴大再生產的一部份，同時又暴露出，是為資本主義之特徵的，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的矛盾，在擴大再生產中，這些矛盾表現的更為明顯。

第一百一節 擴大再生產

現在來考察一下，在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社會資本的實現與回復怎樣才能存在。

擴大再生產，是以剩餘價值的一部份之資本化；即剩餘價值的一部份並不用在資本家的消費之滿足上，而是用在生產擴大上，轉化為資本為前提的。想使剩餘價值的一部份轉化為資本，就應在市場上購買追加的機器，工具，原料，副料與勞動力。但如此，就必須在現實上，已生產出的生產手段，是供再次的生產與超過彌補已耗費掉的生產手段的數量才能够。

除追加的生產手段外，還必需有追加的勞動力之實現。『關於這——馬克思說——同樣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機構所注意：牠生產出依靠工資為生的，且其水準不僅為其保持且為其繁殖而達到的階級看的

勞動階級。勞動階級本身每年皆以這些年齡不同的追加勞動力供給資本，所以僅有餘下的部份才與已包含在準備生產之生產物中的追加的生產手段相結合——而且剩餘價值轉化為準備資本了！（資本論，第一卷，457頁）

總之，只有在假定必需的追加的生產工具與手段，和追加的勞動力已實現的條件下，生產的擴大才有可能。

同時，在我們上述的簡單再生產的圖表中，在第二類中所生產出來的消費手段，僅足供給那二類的工人與資本家的消費資料，在這種情形下，任何生產擴大都不能進行的。假使第一類的資本家，把為他所獲得的剩餘價值之一部份用在再次的生產之擴大上，那末，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是不能實現其志願的，因在市場上，找不到為其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追加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在先前的圖表中，擴大再生產之不可能性，為追加的生產手段之闕如所決定，因第一類所造成的生產手段的數量，僅足供給那二類在原有規模中的生產之更新。

顯然，如過渡到擴大再生產，就應發生一些變化，且以第一類為出發點而加以考察吧。

假設，於某一生產週期結束了以後，資本家在擴大的規模中，進行第二次的生產。

在第一次生產結果中所獲得的，第一類的全部生產品等於代表特定數量的生產手段的總額 $(cI + vI + mI)$ （註），在這些生產品中的，等於 cI 的特定數量，將用在本類於原有規模上的不變資本之恢復。但這類的資本家為了生產之擴大，就應有不變資本之特定的數量。顯然，他們僅能由其生產品，即由其餘下的尚未被使用的那部份 $(v + m)I$ 中取得之，但第二類（為了其 cII 之恢復以及為了其擴大）也應由這些基金 $(v + m)I$ 中獲得生產手段與工具。就是說，假使以前，在簡

單再生產之下，生產品這些總額 $(v+m)I$ 完全成爲 cII 生產品總額之恢復，而現在，在擴大再生產之下，這總額應增多一些，俾能滿足這二類在追加的不變資本之上之使用。

(註)這裏與先前一樣，我們仍假設，在一次生產週期中，所有資本全耗損完，且把其價值轉移於製成的商品上去。

由此已可明白，對於擴大生產，在 cII 與 $(v+m)I$ 間的等式必需爲 $(v+m)I$ 大於 cII ，或可以簡式體現的： $(v+m)I > cII$ ，所代替。

但仍得往下研究。

我們已經說過，第一類的資本家，不僅爲其自己，且爲第二類而製造生產工具與手段。

但第二類爲了能獲得爲其不變資本之擴大與恢復所必需的生產手段牠就應支付相應的總額。這只有當他給予第一類的消費手段的總額適應於牠想由第一類購得的生產手段的總額時，才有可能。他方面，第一類應有容受爲牠所預期的消費手段的可能；換言之，第一類的資本家與工人對於消費手段的消費應等於第二類對於這些手段之供給。在這二類間互相交換的商品價值間之相等是在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情形下，社會資本運行之必需的條件。

且代數地來說明這種施行於擴大再生產的等式。

假設第一類爲資本家在其於第一次生產結果中，爲他所獲得的剩餘價值量中，用在其私人消費上的部份等於 Ia ；假設第一類爲其擴大再生產週期所必需的可變資本等於 Iv' ，顯然，第一類爲了進行新的生產週，而發生的工人消費與資本家消費之滿足，就得向第二類要求總額 $Iv' + Ia$ 的消費手段。

同樣，假設，第二類爲了生產的擴大，也得向第一類要求總額 Ic' 的不變資本，這二方面如想實現，就得保持下列等式：

IIC' (第二類爲了新的生產週而對於不變資本的需求) = Iv' (第一類爲了新的生產週的可變資本，或以生產品體現出的第一類的新生產週的工人的消費) + Ia (第一類的剩餘價值之用於資本家之私的消費的部份)，這等式，簡寫如下：

$$IIC' = Iv' + Ia。$$

爲給予關於在擴大再生產之下社會資本運行的條件之更明確的表象且由此作必需的結論計，應再注意到馬克思的圖表。

對於第一類的數字與在簡單再生產的圖表中一樣，且假設，第一類的資本家把爲他所實現的剩餘價值之半數用在生產之擴大上，馬克思作成下列『出發點』的圖表，即擴大再生產的開始：

第一類 —— 生產手段的生產：

$$4000\text{百萬元}c + 1000\text{百萬元}v + 1000\text{百萬元}m = 6000\text{百萬元}$$

第二類 —— 消費手段的生產：

$$1500\text{百萬元}c + 750\text{百萬元}v + 750\text{百萬元}m = 3000\text{百萬元}$$

在第一次生產週期結束了以後，第一類的資本家把爲他們所實現出來的剩餘價值之半數，即500百萬元用在其下次生產之擴大上，他們以這500百萬元獲得了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因素。

這500百萬元究以怎樣的分配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則以第一類的資本有機構成之高度爲轉移。

第一類的資本有機構成等於4000：1000或4：1。假設在生產擴大之下，這種比例仍被保持，則第一類的資本家在其擴大上，將由這500百萬元中，以400百萬元購買生產手段，以100百萬元購買勞動力。在市場上有否400百萬元的生產手段呢？按照我們前述的條件，這是有的。生產手段共計造成6000百萬元，其中4000百萬元用在第一類的

不變資本之恢復上，1500百萬元將為第二類的不變資本之恢復。尚餘500百萬元的生產手段，這餘數中的400百萬元生產手段可用於同此第一類的生產之擴大上去，所以只有餘下100百萬元生產手段不曾實現了。顯然，這些生產手段將與消費手段相交換，藉以滿足追加工人的消費，而這些追加的工人實為第一類的生產擴大所必需，且其工資也却好等於100百萬元。

現在，第二類的消費手段之實現怎樣進行呢？1500百萬元的消費手段，在與為第二類的不變資本之恢復所必需的生產手段相交換而轉給第一類了；價值750百萬元的消費手段則用在第二類的原有工人人數之消費的滿足上。故餘下的，只有組成第二類資本家之剩餘價值的，750百萬元之未實現的手段了。這些消費手段的一部份——100百萬元將為第一類的追加工人之消費的滿足，以這100百萬元的消費手段去交換，第二類可以獲得同此總額的追加的生產手段，這種追加的生產手段之實現給第二類以擴大生產的可能性。但除追加的生產手段外，必需有追加的勞動力，在第二類中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等於2：1，這就是說，如果在第二類中生產手段增加了100百萬元（而且，這裏假設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則為在生產上的加僱工人所必需的消費手段就應增加50百萬元。這些追加的手段能由為第二類的資本家之剩餘價值的750百萬中取得。

總之，在750萬元中，以100萬元用在追加的生產手段上，又以50百萬元用在追加的消費手段上，餘下的600百萬元組成第二類的資本家用在其消費之滿足上的資金。

所以在第二次擴大生產週期開始時將有下列的情形：

第一類 — 生產手段的生產：

第一週期生產產品的價值……1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第一類……5324c + 1331v + 1331m = 7986	}	= 11858
第二類……1936c + 968v + 968m = 3872		
第五次：		
第一類……5856c + 1464v + 1464m = 8784	}	= 13043
第二類……2129c + 1065v + 1065m = 4259		
第六次：		
第一類……6432c + 1610v + 1610m = 9662	}	= 14348
第二類……2342c + 1172v + 1172m = 4686		

上述的圖表描寫出在觀念的比例性之假設的基礎上的，各部門社會生產品分配之實現的抽象情景。但這絕對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品是按比例分配或能按比例分配的。正如資本主義的所有其他法則一樣，實現的法則『只有以非實現的方法才能實現』。

馬克思的再生產圖表，指示出，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社會資本各部份的回復以及社會生產品的實現，怎樣才有可能，且以此揭穿固存在社會資本再生產中的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生產手段的增長，超越了消費對象的增長，這就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法則。所以在社會資本主要門類的發展上，是不能平衡的且應是不平衡的。伊里奇由此作成結論：『甚至在完全成比例的，觀念上易於實現的情形下，我們也不能以為資本主義是沒有在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生產之偉大的增長，並不伴同着國民消費之極細微的增長(或者甚至停頓與惡劣)。在生產手段算計上的實現，比在消費對象算計上的實現，進行的更大——這顯然可以由馬克思的圖表中看出；由此，又可推究出不可避免性，『生產力愈發展，比之消費關係所處的較低的基礎，牠更處在矛盾中了』(馬克思語)(全集，第二卷，423頁)

所以，再生產的圖表告訴我們：『甚至在完全成比例性的，觀念上易於實現的情形下』在社會資本的運行中，也不免我們在考察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之特徵時所已指出過的矛盾。

我們考察在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社會資本運行之圖表，是以在一般形式上說明我們以前所已指出的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之特徵，比與個別資本再生產不同的特徵為任務。

在真實的資本主義的現實性中，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是在非常複雜的形態中進行的：資本的再生產伴隨着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在社會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有貨幣參加着，再生產經過困難，停滯與恐慌而完成的。

第二十五章 曲解社會資本再生產論的批判 馬克思的圖表應用於蘇聯經濟的問題

第一百十二節 社會民主派曲解馬克 思底社會資本再生產論的批判

曲解馬克思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學說的社會民主派，以為馬克思想以其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圖表去證明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之發展中，平衡原則的統治的。

馬克思的圖表之這樣的解釋，最明顯者為伯樂五泰(Brauntal)，他曾這樣說：『馬克思為不斷地擴大的經濟而尋求在各生產部門間的平衡關係，在各生產部門間的交換關係之研究，會引導馬克思承認賽的關於銷路論』，（現代經濟及其法則，德文本，162頁）。貶抑馬克思到過去的俗流經濟學家賽的，伯樂五泰以非常的明確性指示出其貶抑的一切玄妙。爲了要曲解馬克思的理論伯樂五泰，充分地引證賽（我們知道他是『生產功績』之強辯論的主張者）的見解，以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任何生產過剩，因生產品互相交換，且在賣買者間存在着平衡。

所以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伯樂五泰想以賽的（事實上已爲馬克思批判過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之調和性的見解，關於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矛盾之闕如與商品生產過剩之不可能性的見解浸潤於馬克思。

馬克思瞭解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過程則完全二樣。他指出，這種過程開初即推動出，於事實上並非指引到生產過程之平衡與調和，而是指引到生產過程之差異，困難與間斷的，資本主義生產之深刻的矛盾。『這是事實——馬克思說——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之一般的形式，其本身——已給這種生產方法創造成常態交換的條件，當然，又是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常態行程的條件——這種條件會轉化為再生產之非常態行程之同樣多的條件，轉化為危機之同樣多的可能性，因在這種生產之盲目地結集的制度下，平衡實是偶然性』（資本論，第二卷，362頁）。

伊里奇曾為馬克思的關於社會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的學說之純正地鬥爭的革命的意義而鬥爭，且發揮了這個學說，駁斥了小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以為非成比例性就不能發展的，民粹派與西司蒙。

『西司蒙先生——伊里奇說——以為『非成比例性』的發展不是發展（我們的民粹派也這樣想），這種非成比例性不是社會經濟之該種制度及其運行的法則，而是『錯誤』的準則』（全集，第三卷，20頁）。

這裏，社會民主派也企圖蒙蔽曾為馬克思所揭穿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不可排除的矛盾，而形成其擁護資本主義之較妙的作用。

在平衡的精神上去解釋馬克思的再生產圖表的還有布哈林。依布哈林的意思，馬克思在其再生產圖表中想指示出『固存於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變動的平衡怎樣才有可能』（帝國主義與資本積蓄，3頁，192年）。布哈林以為，在這圖表中，『給在整個的社會生產之各部份間的平衡以可能性』（前書，11頁）。

在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問題上）上處在平衡的見地上者還有托洛茨基主義者。例如托洛茨基派的理論家，潑拉奧佛拉羅斯基在其許多作品中皆把馬克思的圖表解釋作平衡的圖

表。

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機械派平衡論均成了蒙蔽資本主義之矛盾的工具。

第一百十三節 徒幹伯拉諾夫斯基的市場論之批判

徒幹伯拉諾夫斯基企圖『利用』馬克思的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的學說，尤其是馬克思的再生產圖表，去『證明』資本主義之和諧地發展的可能性。

馬克思在其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的學說中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的消費比個人消費發展的更快，生產手段的生產超越了消費對象的生產。

徒幹伯拉諾夫斯基由這正確的命題伴作出根本錯誤的相反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生產一般地可以完全不依存消費而發展。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徒幹伯拉諾夫斯基說——技術進步有由在社會消費耗損中的生產手段的消費去篡代人類消費的趨勢。

但這種由產生手段之生產的消費去替換人類消費之相對的篡代不會引起不呈現於市場上的過多生產品之形成麼？當然不會，……由機械去篡代工人的本身不會使機械成為多餘與無用。假使所有工人全為機械所篡代；在這種情形下，唯一的工人將在所有大量機械的運行中進行生產，且藉此生產出新機械與資本主義階級的消費對象。工人階級被清除了，但這一點也不困難了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品之實現。資本家將於其支配下，獲得大量消費對象，且一年的所有社會生產品，均將為下年資本家底，生產與消費所容受。假使資本家酷愛積蓄，願意緊縮其私人的消費，這也是極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資本家的消費對

象之生產被縮小了，且社會生產品的大部份均將為生產手段所組成，這些手段為下次擴大再生產而預備的。例如，將生產為煤與鐵之下次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煤與鐵。每一下年度的煤與鐵之擴大生產均將容受上年度已生產出的煤與鐵，而且在煤，鐵礦的自然富藏未被掘完時，一直無止境地繼續着』（週期的工業危機，213頁，1923年）。

所以徒幹伯拉諾夫斯基理論的實質，是引導到承認：生產並不依存消費，且在生產諸部門間勞動之按比例分配的條件之下，資本主義市場能因生產手段而無阻害地發展，引起危機的不外於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無政府狀態而發生的成比例性之破壞。

徒幹的理論根本不正確的，且按其本質是強辯的。

當然，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是生產手段的增長比之消費對象的增長快得多，但如由此作出生產不依存於消費的結論，就深刻地錯誤了。生產手段的所有生產，最後又會引導到消費對象的生產之擴大。所有機械，即使係為新機械之生產而創造出來的，最後，經過這些機械或經過為這些機械所生產出來的機械，而引導到生產消費對象的機械之增長，而機械生產增加得愈大，則生產消費對象的勞動生產性增加的程度也愈高。

『歸根結蒂——伊里奇說——生產的消費(生產手段的消費)時時與私人的消費關聯着，時時依存於牠。同時資本主義的本質，一方面，傾向於生產消費之無限地擴大，傾向於積蓄與生產之無限地擴大，而他方面——無產化的國民大眾則處在私人消費擴大之極低的界限』(全集，第二卷，400頁)

徒幹伯拉諾夫斯基企圖掩蔽由資本主義生產之主要矛盾推演出的這種矛盾，因而馬克思學說，遂為他所曲解了。企圖埋沒馬克思之權威的徒幹伯拉諾夫斯基，實想紛飾且擁護資本主義。

第一百四節 盧森堡的再生產論之批判

徒幹伯拉諾夫斯基承認：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只因生產手段，而不依存消費，就可能的；而盧森堡則證明，如沒有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如農民，小手工生產者，殖民地的民衆，則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能實現用在生產擴大上的那部份資本主義之利潤的。

如我們所已知。在各類中生產品的價值皆分爲不變資本 c ，可變資本 v 與剩餘價值 m 的。在簡單再生產之下，生產生產手段的一類，實現其生產品的一部份於本類的內部，其數量恰爲填補已耗費掉的生產手段所必需的。包含在第一類的可變資本 v 與剩餘價值 m 上的其他部份生產手段則與包含在第二類的 c 中的消費對象相交換。至於說到包含在第二類的 $v+m$ 中的消費對象，牠們將實現於第二類的內部，盧森堡說，這裏，實現確不到什麼困難。

依她的意見，在擴大再生產之下，情形便不同了。這裏發生問題；在擴大的資本主義再生產之下，包括於剩餘價值上的那部份商品怎樣才能實現呢？牠是不能爲爲自己私人消費之滿足的資本家所購買的，因『主要的積蓄是資本家並不消費全部剩餘價值的這種情景』（資本積蓄第一與第二卷，84頁，1931年版）

依她的意見，這些商品的購買者不能是工人，因『資本家支付工人階級的只是社會生產品之嚴格地規定的一部份——其總額等於可變資本。當然，如果工人購買生活資料，則他們所能償還資本家階級的只是由資本家階級處所獲得的工資，——爲牠所付出的總額等於可變資本』（同上）。

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階層——官員，兵士，宣教師，學者，藝術家——也是不能購買這部份生產品的，因除取自剩餘價值與工資外『一點也得不到購買力之獨立的源泉』。

假使包含着利潤，預定積蓄的，餘下的生產品每年均在資本家間相交換且爲他完全用在生產之擴大上，『則——依盧森堡的意思——我們將處在空中樓閣中了，這將……爲生產而生產，且由資本的見地看來，成爲完全無意義的了』（前書，c.VI頁）

盧森堡由此作成結論：這部份商品的購買者只能是非資本主義階層的代表。依她的意見，在由資本家與工人組成的『純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這部份用在積蓄上的商品是不能實現的，因而積蓄也是不可能的。

作成類似結論的還有俄國的民粹派。他們把其俄國資本主義的無結果性理論建立在這種基礎上。如無國外市場之助，就不能實現剩餘價值，而國外市場都已爲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佔據，因此，依民粹派的意見，新進的俄國資本主義是不能發展的。

因考察馬克思的學說，我們已知，剩餘價值的一部份用在追加的生產手段上與工人的追加的消費手段上。所以，按其物的形式，牠已預定爲積蓄，下次的生產之擴大而起作用。但盧森堡却以爲，這部份剩餘價值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因工人與資本家均不能對這些商品表示相應的需求。盧森堡的這種見解是不能同意的，當然對於消費對象之追加的需求不能在原來生產週期上工作的工人方面發生的。但不明白，這種要求爲什麼不能由新投入生產的工人方面發生出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追加的勞動力時時皆有很多的準備着，想擴大生產的資本家，僱用了新的工人，這些工人對於消費對象表示出補充的要求，其範圍則以其工資量爲依歸，此外，資本家又表示出對於爲企業擴大所

必需的，追加的生產手段之需求。總之，預擬用在生產擴大上的這部份剩餘價值之實現，是以這樣的方法進行的：資本家把牠的一部份以工資的形式支付追加的工人，且以之購買為其所必需的消費對象；其他部份則在資本家的交換程序中實現於為生產擴大所必需的，追加的生產手段上。

堡森盧則僅推究出反對為她所提出的問題之上述解決的，唯一的結論，在這種情形下，就獲得了『空中樓閣』，『商品為生產而生產……以資本的見地看來，完全無意義的。』

但為積蓄而積蓄，為生產而生產恰恰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最大的特徵。所以如此者，因資本家的目的是追逐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又創造於生產過程中的，這刺激着資本家去無限制地擴大生產。此外，積蓄對於資本家無論如何，皆為客觀的必需性，因有其他資本家的競爭。生產擴大與剩餘價值的增長，表示出資本權力與權威之增長，同時又引導到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與私的佔有間的矛盾之深化。

與民粹派所做的一樣，盧森堡為解決為她所提出的問題而牽引出國外市場，但國外市場的引用按其本質仍不能解決問題。

在與民粹派的鬥爭中，伊里奇淋漓盡致地發揮這種論證。

『事實上，——他說——想把國外市場施行於『實現』問題上的是有健全思想的人嗎？實現的問題，就是某部分資本主義的生產品按其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額外價值）及按其物質的形態（生產手段，消費對象，尤其是必需品的對象與奢侈品的對象）在市場上怎樣與別部門生產品交換。顯然，在這裏，國外貿易應被捨棄的，因引用牠一點也不能使問題解決，不過使牠擴大，把一國的問題變成數國的問題而已』（全集第二卷22頁）。

我們得到結論，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剩餘價值可以不藉助國外市場與非資本主義的階層而實現。

這是否就是說，資本主義可以無國外市場而進行，或他能毫無困難地且毫無危機地而發展？絕對不是。盧森堡與民粹派的錯誤，不在乎，他們承認資本主義國家之國外市場的必需性，而是在乎，他們『爲了額外價值的實現之說明而引證國外市場；等於沒有說明』（伊里奇全集，第三卷38頁）。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外市場之必需性完全不是由社會生產品（尤其是額外價值）之實現的法則去決定，而……是由於資本主義只是簡單商品經濟之廣泛的發展，超越了國界的結果。所以，如無國外貿易，則資本主義的民族是不能形成的』（前書，39頁）。

民粹派與盧森堡同樣錯誤地在剩餘價值之實現上看見了資本主義之主要的困難。事實上，這些困難是發生於全部社會生產品之實現上的。『不僅是轉化爲額外價值的生產品（或生產品的一部份），而且是轉化爲可變資本的生產品；不僅是轉化爲可變資本的生產品，而且是轉化爲不變資本的生產品……不僅是存在於消費對象之形式上的生產品，而且是存在於生產手段之形式上的生品，——所有這些皆於『困難』中，於不斷的動搖中才能實現』（全集，第二卷33—34頁）。

在資本主義體系與非資本主義階層間的外在關係中看到擴大再生產之基礎的，盧森堡的積蓄論掩飾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矛盾，在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時已暴露出來的，在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下更發展的資本主義再生產之內在矛盾。

再則，認爲如無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則積蓄就不可能的，盧森堡的理論，不免會推演到關於資本主義之自動滅亡的結論。在資本主義體系的胸臆中清除出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則資本主義就喪失積蓄的可

能性；非資本主義階層的消逝使積蓄成爲完全不可能，結果，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資本主義也必會自趨於滅亡。顯然，這種理論在無產者革命的鬥爭而且非常緊急的時候，解體了無產者。現在所有「左派」的社會民生主義者（托洛茨基派也在內）皆信崇這種自動滅亡論，藉這種理論之助使工人由革命的鬥爭中退出，不是偶然的（註）。

〔註〕在本書第二冊批判反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時，我們還要再次說到這種理論應指出盧森堡底反馬克思主義的積蓄論與她底一般的機械主義的方法論，尤其與交換觀密切聯繫。這與在階級鬥爭的戰略與策略之最重要問題上的盧森堡底半少數派的錯誤關聯着。

第一百五節 馬克思圖表對於蘇聯經濟 之適川性的問題

蘇聯社會主義關係再生產之擴大，需要在各工業與農業部門間勞動與生產手段分配之相應的比例。爲使支出在組成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之基礎的生產手段之生產上的勞動與生產手段，大於支出在其他部門上，爲能保證工廠，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的生產手段與工具之增加，必需牠。此外，爲了保證在肅清當作階級看的富農與在集體化的基礎上，使農村經濟生產社會化之增長，也必需牠。爲了給勞動者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之公正地提高創造條件，也必要牠。

我們已知，在蘇聯經濟中，沒有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佔有間之矛盾。蘇聯經濟，因而不知道在生產增長與大眾之有限的消費間之矛盾——在資本主義下這種矛盾是資本主義主要矛盾之體現者，且在社會資本循環過程中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我們曾加以考察的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圖表怎樣引用到在蘇聯經濟條件下的再生產呢？

布哈林在其『過度時期經濟』裏說；『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結束，政治經濟學也將結束了』；伊里奇在這裏，給以如下的評註：『不對，甚至在純共產主義下，也還有 $lv + m$ 對於 IIc 的關係呢？也還有積蓄呢？』這評註是說，甚至在純共產主義下，也還保存着全社會資本分為二大類，即分為消費部份與積蓄部份之意義。由此可以明白，馬克思的圖表能適用於蘇聯的條件。然而由作此成這樣的結論：牠毫無改變地適用於蘇聯經濟，那就錯誤了。這根本與這圖表之馬克思——伊里奇的瞭解不同。馬克思，安格思與伊里奇，皆非把這些圖表瞭解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均衡』的圖表，而是把牠們瞭解作，以指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資本的回復，按其價值與按其物的形態，怎樣進行為任務的圖表。伊里奇，屢次指出，這圖表，以隱暗的形式包含着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一切矛盾。

我們知道，蘇聯是建設社會主義之無產者專政的國家，所以全社會生產品分為 $c + v + m$ （因這反映出資本主義社會之階級關係的）在蘇聯經濟的條件下已不適用了。雖我們曾說，全社會生產品分為二大類——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在蘇聯經濟的條件下仍保有其義意。無產者專政把勞動與生產手段分配在這二大類間的比例，即分配於這二大類內部各部門間的比例，於數量上與質量上皆與資本主義的不同。事實上，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以我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上所考察過的在生產手段之生產與消費手段的生產間的比例之根本不同為前提的；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勞動者的物質與文化的生活水準之提高的保證，同樣需要與複雜在資本主義下不同的比例。在那裏，增長了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在那裏，技術的發展隨伴着勞動者之絕對的與相對的貧困。蘇

聯比例之原則上的不同是以其實現之原則上不同的方法為前提的：在資本主義下，為無政府狀態所統治着且對於比例的傾向在其經常的破壞中表現出來；而蘇聯無產者專政則在計劃的積極的領導之循序中，實現為這種比例所必需的社會主義關係之擴大再生產。

第九篇 剩餘價值的轉化 爲利潤 平均利潤 及其降低的趨勢

第二十六章 生產費與利潤 利潤率

第一百十六節 引言

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以後，我們將轉而研究在其基礎上所滋長出來的資本之流通過程。我們現在應指出在實在的資本主義現實上當作整體看的，即當作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之統一看的，資本運行所由進行的具體形態。

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內非法則時，我們已暴露出資本主義榨取的根基，且指示出由什麼地方發生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二個主要階級——布爾喬亞與無產者間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怎樣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發展且深化。

然而，直到現在，我們皆假設着，每個工人僅直接受『其』資本家的榨取，這資本家利用其生產手段與工具之獨佔，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佔有爲其工人所造成的全部剩餘價值。

現在，由於當作整體看的資本運行之具體形態的考察，我們將闡明處在更複雜的現實性中的事實。我們將看見，每個資本家並非由其

工人造成多少剩餘價值，就佔有多少剩餘價值，在資本運行的過程上進行着在諸工業資本家間之剩餘價值的再分配。次之，我們將看到，工業資本在其循環過程中所執行的各個機能，與工業資本分離且形成特殊形態的——商業的與放款的資本之機能。這些資本形態的代表以及資本主義企業所由建立的土地的所有者同樣獲得了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

所以在當作整體看的(生產與流通之統一)資本運行過程之往後的研究中，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間的矛盾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如先前一樣的在一般的特徵中，而且在他們於具體的資本主義現實性中所採取的更複雜的形態中。

直到此刻，我們皆假設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僅有工業資本家，每個工業資本家皆一樣地，其工人造成多少剩餘價值就獲得多少剩餘價值。只有在我們已闡明了工業資本家的各集團的區別，及在他們間的剩餘價值之再分配的原因以後，才能說明，工人為什麼不僅受『其』資本家的榨取，而且受所有工業資本家的榨取。而且只有此後，我們才能說明，整個的社會資本之互相分離的各別機能，例如商人的，銀行家的，地主的各個互相分離的集團皆參加工人的榨取，除掉工業家而外。

第十七節 生產費

為開始生產與獲取剩餘價值，工業資本家應把特定量的資本投入(預付)於其企業內。這種資本，因商品的生產而逐漸耗損。在每單位商品上投入特定量的在機器，房子，原料，副料等形態中的不變資本

之支出，與在工資形態上的可變資本之支出。

假設資本家的機械與房子為10,000元，在其存在時期內共生產出10,000單位商品，再設為單位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原料與副料為2元，又設這個資本家的工人，在製造500單位商品的時期，共獲得1,000元工資，每單位商品的生產須要由資本家方面

不變資本的固定部份之支出……10000：10000即1元

不變資本的流動部份之支出……2元

可變資本的支出……1000：500……2元

在每單位商品上共須支出5元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投在單位商品上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支出給資本家組成了其商品的原費或生產費。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售價大於生產費，因牠還包含着利潤。對於資本家，如不獲得利潤，則商品生產就喪失其全部意義了。

資本家在脫售商品以後，獲得了利潤，因決定商品價格者不是其原費，而是為其生產所必需的社會——必需的抽象勞動量所決定的那種價值。商的價值大於其原費；為其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支出大於為資本家所投入的資本支出。事實上，由什麼去對等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與其價值呢？我們已知，在每一商品上投入：1物化於不變資本之一部份上的勞動，這部份不變資本則轉化於該商品上；2活的勞動：a 回復了已耗費掉的可變資本的價值；b 創造超乎此的，新的剩餘價值。所以，商品的價值按其大小，可以 $c + v + m$ 這和數去體現出來。同時與其生產相關聯的，商品的生產費，則可以歸結到 $c + v$ （註）的和數。

（註）這裏，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當然並非全部算入，而僅算入其投

進每單位商品上的那部份。

總之，我們知道，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支出即費用，與資本支出不同，與資本家的生產費不同。

實際上，決定商品價格者不是資本支出，而是其價值，即投入其中的勞動；這裏，還包含着創造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然而，資本支出的計算，或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費仍有實在的意義，牠反映出這種事實：在資本主義的現實性上，商品生產耗費了生產資本的價值之一定的部份，為了生產過程之往後的繼續，這部份應經過流通的中介仍轉化為生產資本。

所以在資本循環中，資本主義的生產費與大大地超過牠的，勞動之真實的支出分離開來。

因此加強了資本主義關係的拜物教性，因資本主義的生產費蒙蔽着，掩飾着商品之真實的價值；牠掩蔽着，為商品生產而耗費的工人的剩餘勞動，而且這種勞動是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組成部份。事實上，因計算當作資本支出看的生產費而覺得：資本家因出售商品而實現的剩餘價值，好像是生產費的超額，好像他完全與在生產上的支出無關，而是發生於流通過程中的。剩餘價值本已創造於生產過程中，牠參加真正的生產費，即參加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支出，流通不過實現了在生產過程中所已創造的東西，這種情形被掩蔽了。

而且，資本家的計算生產費（註）淆亂了且掩飾了在剩餘價值的創造中各部份資本之不同的作用。

（註）我們這裏所說的「生產費」是指與真實的費用即勞動支出的不同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費，即資本支出。

我們已知，不變資本自身是不能創造價值的，而其價值須藉助勞動，轉化到製成的商品上去（註）。可變資本，確切些說在其作用過程中的勞動力，不是把其價值轉移到製成的商品上去，而是創造新價

值，不僅完全回復了可變資本的價值，且以剩餘價值的形式造出餘額。

（註）在這種情形下，牠是全部轉化抑部份轉化，那是不重要的

各部份資本的區別消逝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費中。資本家支出了在不變資本上與在可變資本上的手段，他把這些支出與爲他因出售商品而實現的剩餘價值分離開來，因這些支出應爲生產之更新而回復到他，爲他所實現的剩餘價值成爲超過爲生產更新所需要的餘額。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費應經過流通過程而回復到他，除利潤外，已成爲並不依存於牠的不變的大小了。完成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價值之變化，他們是不說起的。在生產形式上可變資本所形成的特殊作用，這裡已被清除了。

假設，某商品的生產，支出了3元不變資本與1元可變資本，而剩餘價值率爲200%。顯然，轉化於製成商品上的不變資本的價值毫未變化，仍爲3元；作用於生產形式上的可變資本創造出超過其自己價值的200%即2元的新價值。我們知道，與不變資本不同的可變資本引導到價值的增長，然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作用的區別掩蔽於，消逝於生產費上了。假使某商品的生產支出了3元不變資本，那牠在原有的規模上加入生產費中去。但還有1元可變資本已以不變的形式加進生產費上去。這元「增殖」爲3元的這種情景對於生產費是沒有意義的，因在這裏並未包括着剩餘價值。既然在該商品生產上共支出了4元資本，那末共有這4元才組成此商品底資本主義的生產費。爲了已耗費掉的那部份資本之更新，無須超過4元。由可變資本所創造成的2元剩餘價值，表示出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無關。

在這裏，可變資本的支出，即勞動力價值的支出採取勞動價格的形態。這我們在考察工資時已知道了，那裏曾闡明，由於資本主義生

產的特徵，勞動力的價值與價格皆採取工人底勞動支付之變形。由工人處獲得勞動生產品的資本家以為這種勞動（不是勞動力的價值）已以可變資本的支出，由他全部支付了，工人不會造成新的價值（可變資本的回復及超乎此的剩餘價值），只是把其勞動的價值——可變資本轉化於製成的商品上去。這更物神化了生產費且淆亂了在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間的區別。

總之，生產費的範疇蒙蔽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根基，剩餘價值的來源。牠掩飾了不變的與可變的資本之分類，蒙蔽了資本的各種形態之原則上的區別，在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創造，價值轉化過程中的各部份資本之不同的作用。

在這裏以及別的任何地方，我們均應於否定商品資本主義之客觀性的且引導到人們之錯誤的主觀的表象之觀念上解瞭的相反中，去指出，在生產費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物神化絕對不是腦中幻想的產物與遊戲的俗流的分合。資本主義的生產費之與價值相分離「在實際上往往表現於真實的商品生產中」（資本論，第三卷，4頁）。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與流通之客觀特性的基礎上，才發生出布爾喬亞的科學以掩蔽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與淆亂是為其特徵的人們關係為目的而利用的，在人們頭腦中的，其錯誤表象的反映。

第一百十八節 利潤與利潤率

研究生產費時，我們集中注意力於商品價值的一部份上，集中在由勞動過程轉化於製成商品上的不變資本之價值上，與加入同此商品的可變資本之價值上。現在更進一步來研究商品價值的別部份——剩

餘價值。

剩餘價值是工人於生產過程中造成的，所以，牠的唯一根源是在生產形態中的可變資本。不變資本本身更是不能創造剩餘價值的，只是剩餘價值創造的條件。

該資本家的可變資本愈大，則工人的剝削率也愈大，則由工人造成的，不依存於不變資本之大小的，剩餘價值也愈大。

然而這是否說，資本家皆完全一樣地投入不變資本？不是。爲每個資本家所支配的且可以投在生產中的手段有一定的範圍。充當不變資本的手段愈大，則餘下的充當可變資本的愈少，反之也然。還不止此。

在考察生產費問題時，我們已知，資本家把一方面的生產費（在不變資本上的與在可變資本上的）與他方面的，轉化爲這些費用之超額的剩餘價值分離開來。資本家比較了工人於一定時期單位內，例如於一年內帶給他的剩餘價值，與他投入生產中的全部資本。

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的這種比較給資本家決定了企業的利益。

設有二個企業家，其資本給他以同樣剩餘價值量——假設一年爲30000元。

再設，其中的一個資本家（設爲火柴工廠主）投入其企業中的資本共爲150000元，其他一個（紡織工廠主）則投入300000元。

這二個資本家將因同樣的剩餘價值量而認爲其企業有同樣的利益麼？顯然不是。爲資本家投入在企業中的每元資本給第一個資本家繁殖了 $\frac{30000}{150000}$ 元，即2角的收入；每元給第二個資本家僅繁殖出 $\frac{30000}{300000} = 0.1$ 或1角的收入，第一種企業比第二種更爲有利了。

總之，當我們定義資本家榨取工人的程度時，是比較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的，而資本家決定其企業之利益時，則比較剩餘價值與全部

資本的；在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間的比率表示出其企業之利得的程度。

因剩餘價值關聯到全部資本，就好像，剩餘價值是由全部資本一樣地繁殖出來的，好象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一樣，同為剩餘價值的根源。剩餘價值由工人造成的這種情景，與在生產費中一樣，被蒙蔽了，被掩飾了。這裏，我們又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之假面與物神化了。

「好像由全部預支資本所滋生出來的剩餘價值，形成了利潤之變形……」

「這裏如我們所初次看到的利潤，還是剩餘價值本身，不過在必需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所發生出來的陰暗的形式中而已」。（資本論，第三卷，10頁）

顯然，剩餘價值之轉化為利潤並非人們主觀表象的產物，而是根據客觀必然性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特性中派生出來的。事實不在乎，資本家願意比較為他所獲得的剩餘價值與由他所預支出的全部資本。並不依存資本家的表象與志願，在資本主義關係的統治之下，獲得同樣收入的這二個企業中，當然投入資本較少的更有利益。但在這種和那種事實的基礎上，在其反映於人們的頭腦上的結果中，發生出這樣的表象，好象全部資本皆一樣地參加剩餘價值之生產的。

總之，關聯到全部資本的剩餘價值，採取利潤的形態。給資本家決定其企業之利益的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的關係，給以利潤率的名稱（普通是用百分數表示的）。

馬克思以字母P'去表示這個利潤率。假使資本家，於利潤的形式上實現了全部剩餘價值，則利潤率就有如下的公式：

$$P' (\text{利潤率}) = \frac{m (\text{剩餘價值})}{c + v (\text{全部資本})}$$

把利潤率定義作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之關係時，我們是注意到

在一定的時期內，普通在一年內所獲得的剩餘價值量的。

體現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之關係的利潤率任何時候皆低於剩餘價值率的。後者係體現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之關係的。〔假使支配120000元不變資本與30000元可變資本的資本家由其工人處獲得30000元剩餘價值，則由其資本繁殖出的利潤率將等於 $\frac{30000 \cdot 100}{150000}$ 即20%，剩餘價值率將等於 $\frac{30000 \cdot 100}{30000}$ 即100%。〕

盡可能地獲得最大的利潤率——這是任何資本家所追求的。

假使在二個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人數一樣，榨取率也相同，但其中之一的利潤率較高，而另一的較低，則前者將認爲是更有利益的。因資本家把其資本投在任何地方——投在製釘廠上或在喪事局上——皆是一樣的，故他力圖把其資本投在利潤率高的地方去。

第一百十九節 決定利潤率高度的因素

利潤率的高度是依存於那些條件的呢？

各個資本家完全實現了爲其工人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先由這個假設出發，去答覆上述的問題。

既然利潤率是由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之關係組成的，則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如利潤量愈大，則利潤率也愈高。利潤量是依存於可變資本量與剝削率的。

總之，向工人榨取的剩餘價值量愈大，剝削愈加強，則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利潤率應愈高。

然而，並非榨取率增高多少利潤率於百分比上就增高多少。

假設，有300000元資本，榨取率爲100%，滋生出30000元剩餘

價值，在這裏利潤率將等於10%

假設，榨取率再增加100%此時剩餘價值增加了，且將等於60000元；在這裏利潤率將等於 $\frac{60000 \cdot 100}{300000} = 20\%$ ，所以利潤率僅增加10%。

但如我們並不注意到百分數，而是注意到榨取率與利潤率增大的倍數，則他們皆增大二倍。

但除掉利潤量（可變資本的範圍與榨取率）外，利潤率還會受資本有機構成與資本回轉速度的影響而變化。

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愈高，即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更大，則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利潤率愈低。

事實上，剩餘價值僅由可變資本生產出來的。既然利潤率是決定於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的關係，那就很明顯地，牠依存於可變資本之大小與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關係的。資本有機構成愈高，即其中可變資本所佔的部份愈少，利潤率應愈低。

設有二個企業，資本同為300000元，剝削率同為100%，資本回轉的速率也相同。再設其中之一的資本有機構成為3:1；另一則為4:1。此時，第一個企業中，可變資本將等於75000元，在第二種企業中則為60000元，相應地由第一種企業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將等於75000元，而由第二種企業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為60000元。

因此在資本有機構成低的第一種企業中，利潤率將等於 $\frac{75000 \cdot 100}{300000}$ 即25%；而在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第二種企業中，利潤率 $\frac{60000 \cdot 100}{300000}$ 即20%。

利潤率對於資本有機構成的依存性，因不變資本的相對地增長致使利潤率減低，促使資本家尋求種種方法使不變資本的經濟化。這可以與原料之補充的支出相關聯的，但不需要不變資本之固定部份——

機器，房子——之新支出的，勞動日之延長達到之。不變資本的經濟化又可以生產之強固去達到之，因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在同樣的技術之下），在大企業中，支出在每個工人上的不變資本少於在小企業中的。經濟化又可以機械廉價，以低廉的物品去代替高貴的物品，利用廢物等等去達到之。所有這些能增加資本家之利潤率的方法，皆與勞動剝削之可驚地增加，勞動條件的惡化，勞動大眾的消費物品之質的惡化相關聯的。

資本有機構成對於利潤率的高度有這樣的意義。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資本回轉的速度有如何的意義。

我們已於資本回轉之一般速率那節中看到，資本回轉得愈快，則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即在相同的時期內，能藉這資本而由工人榨取得的剩餘價值量愈大。

由此可以明白，資本回轉得愈快，則資本家在相同的時期內由此所獲得的利潤也愈大，利潤率將愈高。

所以，資本家把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回轉之遲緩當做他們自己的直接損失。假使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在地主的棧房中堆積着存貨有好幾年，則資本家很少願意把其「寶具」購得的原料，存放好幾年。放在紡織企業主的棧房中的棉花不運用，雖說暫時轉化為「死的」資本，也會遲緩了全部資本的回轉且減低了利潤率。製成的商品也同樣不會很久地處在消費者手中，機械也不會很久不動用。

第二十七章 平均利潤率的形成

生產價格

第一百二十節 平均利潤率的法則及其意義

直至今刻，我們皆以各工業部門完全實現由這部門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這一假設為出發點的。

在這種情形下，各部門的利潤率依存於在該部門中的剝削率，資本回轉的速度與資本之有機構成的。

但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各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及其回轉的速度不是一樣的，例如在機器製造的工業中，採用更複雜的昂貴的機械，其資本有機構成比紡織工業或糧食工業的高得多了。由此可以明白，在各工業部門中，資本應給以不同的利潤率；在資本有機構成高於該社會的普通的資本有機構成的部門中，資本應帶給低於普通的利潤率；在資本有機構成比該社會的普通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中，資本應給以高於普通的利潤率。

但如在各生產部門中資本給以不同的利潤率，則這就是說，在其中的某部門中，資本握有更多的利益，而另一部門，則利益較少。在各工業部門中，利潤率的不同難免發生出在資本家間的競爭，使資本由利益較少的部門退出，轉投到利益較大的部門中去。

這種競爭與資本轉投的結果，將獲得什麼。

在資本有機構成低於且資本能帶給利潤率的高於普通的部門中，力圖增加資本量。在這部門中的生產擴大了，結果由牠所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下降了，而在這部門中的資本所帶給的利潤率也降低了。反之，資本開始由資本有機構成高於普通的且資本帶給的利潤率低於普通的部門中退出，生產縮小了，而且利潤率增高了。所以，各部門的利潤率將趨於相等，趨於有些平均的水準。

這種平均的（或一般的）利潤率將等於平均的資本有機構成（以及平均的回轉速率）的資本所給予的利潤率。

試舉例以明之，假設，資本主義社會的總資本等於1200百萬元，這社會的所有企業分爲三類：1 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這裏包括着機器製造廠等等；2 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這裏包括着麵包房，飯館，縫衣店等等；3 其他部門，在這裏可當作樣式的是紡織工廠。假設，在所有工業部門中的工人人數是一樣；在每一部門中，可變資本等於100百萬元；牠們的剝削率也是一樣的（例如爲100%），但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中有 100百萬元不變資本，在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中有500百萬元不變資本，在其他部門中的不變資本則爲300百萬元，爲簡明計，我們再假設，不但剝削率，連資本回轉的速度在這三部門中也皆一樣的。

想決定資本之平均的有機構成及平均的利潤率，就應先計算所有企業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總額，以及在這些部門中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記住，剝削率皆等於100%）

此時我們獲得：

	不變資本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單位爲百萬元）		
資本有機構成最高的部門	500	100	100

資本有機構成最低的部門	100	100	100
其他部門	300	100	100
合計	900	300	300

社會的全部不變資本為900百萬元，全部可變資本等於300百萬元。

所以全社會的資本有機構成可以900：300百萬或3：1體現出來。這種關係等於紡織的和其他為我們劃歸在其他企業這一類裏的資本之有機構成（300百萬元不變資本與100百萬元可變資本）。

在這些企業中，我們求得資本之平均的有機構成。

既然社會的全部資本(c+v)等於1200百萬元，而剩餘價值m為300百萬元，則平均的利潤率 $\left(\frac{m}{c+v}\right)$ 將等於 $\frac{300 \cdot 100}{1200} = 25\%$

該社會的所有企業的利潤均將趨於這個平均率。

但這絕對不是說，由於潤利率的相等，所有資本家獲得了完全相同的利潤，確切地與資本之平均的有機構成的企業的利潤相吻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無政府狀態在這裏的主宰，經常地發生資本之由這部門而那部門的盲目的流出與流入，各部門的利潤之不斷的變動，有的高於平均利潤率，有的低於平均利潤率。但所有這些擺動皆環繞於一定的界限的周圍——環繞於適應於資本之平均有機構成的企業之平均利潤率的周圍。

「一般的利潤率——馬克思說——任何時候皆僅當作趨勢，當作趨於各個利潤率之相等的運行而存在着」，當作「不斷地發生不等的經常的對等」而存在着。

假使我們注意到在多少是長時期內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那就可以說，各企業的利潤率之擺動環繞於在這特定時期內的平均利潤率之周圍而對等着。

所以我們可以在研究平均利潤率的法則時而括象了擺動，且可以由各工業部門的利潤率是適應於資本之平均有機構成的部門之平均利潤率這個假設出發。

各部門利潤之相等的趨勢會爲資本轉投所阻止——資本不易一下就結束其不利的企業的，因投入其中的固定資本須許多年才能完成其回轉。

然而這種事實並不消滅掉而僅遲延了各種利潤之等於平均利潤率

由於所有工業部門的一般利潤率之形成，資本家並非其工人造成多少剩餘價值就獲得多少剩餘價值，在各部門中所造成的剩餘價值，重分於資本家間。因此資本有機構成高於平均的那種工業部門的資本家，獲得了比其工人所造成的，還大的利潤：不是這些部門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量，僅能給其主人保證低於平均的利潤率麼？而這些部門的資本家則和其他部門的一樣，獲得了平均利潤。

反之，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的資本家則獲得了比其工人所造成的數量上較少的利潤。只有在資本之平均的有機構成的部門中，爲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才與其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相吻合。

總之，在我們前舉的例子中，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工人造成了 100 百萬元剩餘價值。而支出 600 百萬元的，這些企業的所有者，獲得了 25% 的平均利潤，即 150 百萬元。其利潤比之在這些企業上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大 50 百萬元。在資本有機構成低的企業中工人同樣造成 100 百萬元剩餘價值，但這些部門的資本家只獲得了 50 百萬元利潤（200 百萬元的 25%），即比其工人所造成的少 50 百萬元。只有在資本之平均的有機構成的企業中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才相當於其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100 百萬元的 25% 即 100 百萬元）。

所以，因一般的利潤率之形成，每個資本家所獲得的並非其工人

所造成的剩餘價值，而是根據其資本所平均計算出來的，全社會的剩餘價值之一部份。如馬克思所說，所有資本家皆為同一大企業（即聯結一氣的全社會的企業）之股東，其中每一資本家，皆根據其資本之比例的大小獲得一般利潤量的一部份。

由各部門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之再分配於資本家這一點可以看出，工人不但受其直接的主人，各個資本家的剝削，且受全資本家階級的剝削。平均利潤率表示出，不僅各個工人對立着各個資本家，而且全工人階級對立着全資本家階級。

這個結論有很大的實際的革命意義。牠明白地告訴工人，為各個工人的利益，或為各羣工人的利益而鬥爭，與各個資本家的鬥爭是不能使工人地位之真實的根本的改變的。牠指示出，工人的鬥爭能夠成功者只有在一種情形下——假使牠是為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進行的，反對全資本家階級，反對全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

體現在全資本家階級與全工人階級間之矛盾的平均利潤率同時又掩蔽了這些矛盾。

假使利潤率之形成（以及剩餘價值之轉化為利潤）發生了錯覺：好像利潤是由全部資本給予的；則因平均利潤率之形成，這種錯覺就加強了。無論各個資本的內部結構如何，牠們所引用的勞動力數量如何，勞動剝削的強度如何——只要某二種資本，依其一般的大小是相同的，牠們就能給予一樣的平均的利潤。只有全部資本大小的變化，才變化了由牠所給予的利潤量。在資本有機構成及由牠所給予的利潤率間的直接的依存性已經好像不存在了。資本給予利潤的性質，比之以前，更成為資本一般之神秘的特性了。

第二百一十一節 生產價格的一般概念

我們僅知道，由於平均利潤率之形成，各生產部門所獲得的利潤並非恰如其工人所創造出的，而是或大於或小於此的。既然各生產部門的資本因利潤率的相等，在某種情形下，喪失其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之一部份，而在別的情形下，則剛相反，獲得了一些超額，那就很明顯地，他們是按照高於或低於其價值的價格而實現其商品的。

在利潤率相等之下，各資本主義生產的部門之商品價格由什麼去決定的呢？

出售在企業中所造成的商品的每個資本家，應先首回復其轉化在該商品部份上的資本支出，即收回其生產費。除掉這些生產費之收回外，資本家在出售商品時，還實現了一定的利潤，這種利潤在其不斷的擺動中，傾向於該社會之平均利潤率的。

所以在各資本主義的生產部門內製成的商品價格底不斷擺動中，表示出對於其按照牠的生產費加上平均利潤出售的傾向。

這樣形成的價格叫做生產價格。

『生產價格——馬克思說——是等於其生產費加上依存在其回轉條件的，在該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全部資本上所計算出來的平均利潤的，商品價格』（資本論，第三卷，102頁）。

然而，各資本主義的生產部門之商品價格趨向於生產價格，這絕不是說，現實上這些價格完全與生產價格相吻合。

『一般地，——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下，所有一般的法則，僅只當作統治的趨勢，極紊亂而近似的趨勢，僅只當作任何時候皆不能正確規定的平均的不斷的動搖看而存在』（前書，105頁）。

這完全與生產價格相關聯的。資本家在出售商品時任何時候皆不能以生產費之收回與平均利潤為滿足。他任何時候皆企圖盡可能地獲得更大的利潤。假使他高於生產價格而出售其商品，且以相同的方法獲得高於平均的利潤率，則如我們所已知者然，這會引起資本之流入這部門，且在利潤率低落於平均的時候以前，商品價格低落於生產價格以前，一直繼續着。

總之，各生產部門的商品市價，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地動搖於生產價格的周圍。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經過市場價格之不斷地擺動於生產價格，調劑了資本的運行，「全社會的資本之分配於其各生產部門中」（剩餘價值論，第二卷，第一部，卅頁）。

在市場價格於某時期內高於生產價格的生產部門內，開始資本之加強流入，反之，資本難免開始由市場價格於某時期內低於生產價格的部門退出。

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是隨資本之變動而變動的，則資本之由這部門而那部門之不斷的「流動」就引導着勞動之由這部門而那部門之盲目的轉投。

所以，調劑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的資本之盲目地運行的生產價格，同時又調劑了在這些部門中勞動之盲目的運行。

第二百二十二節 生產價格與價值

既然平均的利潤率普通不與各資本主義工業部門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相吻合，所以這些部門的商品之生產價格（由生產費與平均

利潤組成的)也不與價值相吻合,而是高於或低於價值。

然而這並不是說,在商品生產下,商品價格所依以擺動的價值已不能指揮價格的變動。在現實上,生產價格並不替換價值法則的作用,而只是「商品價值的變形」(資本論,第三卷,103頁)。

假使在各部門中的生產價格與價值分歧,則這分歧只離開了價值,在這基礎上處着價值的法則。

全工業部門的生產價格,綜合起來,是與其價值總量相吻合的。

我們知道,各部門的生產價格與價值之分離可以這樣去說明之:由於利潤率的相等,各工業部門所獲得的並非其工人的剩餘價值而是與該部門的資本成比例地發生着的,所有工人的剩餘價值之一部份;因而,某一部門的資本家會「喪失」其工人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而別部門的資本家「多得」了。既然所有資本家的全體,共同獲得了所有工人的全部剩餘價值,所以其商品的生產價格的總額等於其價值的總額。

生產價格與價值的這種吻合,我們還可於資本之中等的有機構成的(以及回轉之中等的速度)部門中看到。

這一切仍可以我們前舉的例子(第一百二十節)證明之,在那裏,我們曾假設全社會的資本爲1200百萬元,按照資本的有機構成,這社會的生產部門分爲三類。爲了不混淆例子計,假設,所有部門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統於一年內用完,各部門的不變資本量,可變資本量以及剝削率,假定皆和先前一樣。在這裏平均利潤率等於25%。由這些前提,不難計算出,什麼等於各部門的商品之生產價格與價值。價值將等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的總量,而生產價格則將等於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費用加上平均利潤(爲這些部門的總資本的25%)。知道了各部門的生產價格與價值,就不難計算出其全社會的

總額。結果如下：

	不變 資本	可變 資本	剩餘 價值	一年內生產 品的價值 ($c+u+m$)	一年內商品 的生產價格 ($c+v+25\%$ 利潤)	生產價格大 於(+)或小 於(-)價值
(單位百萬元)						
資本有機構成 最高的部門...	500	100	100	700	750(其中60 0為生產費, 150為利潤)	+50
資本有機構成 中等的部門...	300	100	100	500	500(其中40 0為生產費, 100為利潤)	相等
資本有機構成 最低的部門...	100	100	100	300	250(其中20 0為生產費, 50為利潤)	-50
全社會的	900	300	300	1500	1500	相等

我們看到，在第一類的部門中，生產價格比價值大50百萬元，因這些部門的平均利潤150百萬元比這些部門的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大50百萬元。但同時第三類的各部門所獲得的利潤則比為其工人所造成的少50百萬元。所以，這裏，生產價格比價值少50百萬元。在中等的資本有機構成的部門中，剩餘價值與利潤相吻合，而生產價格與價值相吻合。

價值為生產價格之基礎這一點，不僅可以全社會的，（且可以中等部門的）價值與生產價格之吻合去證實之。

我們知道，生產價格是由生產費與平均利潤去組成的。但什麼是平均利潤呢？牠是由該社會的全部剩餘價值對於全社會資本的價值之關係組成的。沒有價值就不能瞭解剩餘價值且不能決定其數量方面；沒有價值就不能決定資本的價值，當然也不能決定平均的利潤率。

凡是社會資本的價值之數量上的變化或各部門資本的價值關係（

共有機構成)之數量上的變化，由工人造成的剩餘生產品之價值的變化，皆會影響到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

生產價格的其他因素——生產費——同樣依存於價值且由價值決定的。由於勞動生產性的變化，由於作用於單位商品上的勞動量之增加或減少，皆相應地改變了此商品的價值。但同時又相應地改變了化在該商品上的生產費和利潤。

總之「雖說大部份商品的生產價格應與價值分離，因而其「生產費」應與包容其中的一般勞動量相分離。但所有這些生產費與生產價格不僅決定於適應於價值法則的商品價值，並不對立着牠，而且只有在價值基礎及其法則上才能瞭解生產費與生產價格本身之存在：沒有這個前提，牠就成爲無意義的了」(剩餘價值論第三卷62頁)。

「價值法則指揮了價格的變動(生產價格的變動)：爲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之增減促使生產價格之增高或減低」(資本論，第三卷，118頁)。

第二十三節 價值轉化爲當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史的發展的產物看的生產價格

價值之轉化爲生產價格之更複雜的形態，是商品生產之長期的史的發展的結果。

在商品生產發展之第一階段上，那時生產尚係簡單的生產，那時商品係由小生產者，生產工具的私有者(小農，小手工業者)生產出來的，既不是剩餘價值的生產，也沒有利潤與平均利潤；此時價值尚不能採取生產價格的形態。

只有隨商品生產的發展，隨勞動者與生產工具和手段之分離，隨勞動力之轉化爲商品，商品生產才轉化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才於剝削

過程上發生剩餘價值。

但資本主義關係與剩餘價值的出現，固非一下能使平均利潤率形成的。利潤之趨於相等，價值之轉化為生產價格，只有因資本主義關係之發展，只有因這些關係成為統治關係，才能發生。

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各生產部門與各企業互相關聯還很薄弱。當時資本與勞動力之由這部門而那部門的或多或少的自由流動尚缺少前提，而且每個資本家，差不多能實現其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那時各部門的利潤率是極不相等的。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部門間的聯繫以及資本之由這部門而那部門的轉投加強了。

「資本之由利潤率較低的部門退出，轉投進別的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去，這種不斷地勝與負（即流入與流出）的手段……在各生產部門內造成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遂轉化為生產價格了。在某國家社會中資本主義愈是高度的發展，即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該國的制度愈優良，則資本的對等實現得愈為正確。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又發展了其條件。……」

1 資本愈運行即資本愈易於由這部門而那部門，由這個地方而那個地方的轉移；2 勞動力能由這部門而那部門，由這個生產的中心地而那個生產中心地的轉移愈快，則不斷地發生不等的，不斷的相等進行得愈快』（資本論，第三卷，131頁）。

如馬克思所說，爲了這些條件之實現，必當保證「社會內部貿易之自由」，資本主義關係應統攝着「各生產部門」（完全實現是任何時候皆不可能的，因有許多部門，尤其在農業中，存在着小生產）；應發展了信用體系；工人本身應「由一切職業的成見中解放出來」。

隨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條件愈實現，則愈益實現了利潤率對於

相等的傾向，愈實現了價值之轉化爲生產價格。

總之，價值的轉化爲生產價格是在由單純商品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之史的發展的基礎上，是在資本主義關係之發展且以階級矛盾爲其特徵的基礎上完成的。

商品生產的成長與發展及其矛盾的尖銳化皆是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完成的——這就是商品生產運行之主要的法則。

在單純商品經濟裏，價值體現出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同時又當作私有者而互相對立的，商品生產者間的社會關係。在價值上體現出在商品生產者之私的勞動及其勞動之社會性間的矛盾。價值體現出隱含在「物的」外幕中且因而帶有物神性的，人們的關係。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轉化爲生產價格，人們已非簡單地當作生產者，與當作商品一般之所有者，而且當作資本與勞動力所有者而表現。

這裏，商品生產的矛盾發展了，採取了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佔有間的矛盾。這矛盾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之二個主要階級的對立，其中之一佔有了另一的勞動。人們關係的物神性，這裏採取了更複雜的形態，因這裏「物的外幕」不僅掩蔽了簡單商品生產者的關係，且掩蔽了在階級間的關係。這裏，物體不僅握有交換性之「神秘」的本質；轉化爲資本的牠們，且獲得新的本質——給共所有者以收入。

所有這些皆體現於生產價格上。發生於各生產部門的利潤相等的基礎上的生產價格，體現出，在生產剩餘價值的，而這種剩餘價值由工人造成且按照資本的比例分配於資本家間的這種社會上的人們的關係。因各資本家的利潤率於生產價格上表現出相等，故生產價格遂體現出在全勞動階級與全資本家階級間的關係。次則，生產價格又體現資本主義生產的各部門之社會的聯繫及其瓦解（互相的競爭）。

因而商品經濟的社會關係的「物化」，其物神化，於生產價格，比之於價值上，採取更複雜的形態。發生於勞動剝削之結果上的生產價格，同時又淆亂了這種事實。因於生產價格上加入平均利潤，所以，可以說，商品價格並不依存於該生產部門的工人支出於此商品生產上的勞動量；平均利潤好像不始於勞動剝削的結果中，而是所有資本的本質。再次，因除利潤外，生產價格，還包括着生產費。似乎可以說，各部份資本在價格形成上有一樣的作用，而且所有牠們（化在不變資本上的與化在可變資本上的費用）皆同樣地加入生產費。

所以，在生產價格上，不僅掩蔽了勞動剝削的事實，而且連商品價格歸根結蒂由勞動決定的這種情景皆被掩蔽了。「由於價值的轉化為生產價格，遂蒙蔽了價值定義的基礎」（資本論，第三卷，110頁）。

體現於生產價格上的人們的關係，表示出更為複雜的了，比之簡單商品經濟的價值關係。但生產價格於更發展且更複雜的形態中所暴露出來的東西，早已潛存於價值中了。

我們始自在極單純形態中的價值方面去研究商品生產的法則。僅指示出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怎樣發生剩餘價值與利潤。然後我們進而於其發展的形態中，即於生產價格上去研究價值。這種由價值而生產價格的轉變，不僅是研究者在其腦海中所幻想出來的純邏輯的行爲，而且反映出，實在的史的過程。

「按照對於價值的關係——馬克思說——不僅當作理論的，而且當作史之表現看而研究商品價值，這是極妥當的」（資本論，第三卷，116—117頁）。

在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之法則時，我們往往由捨象了許多複雜因素的極單純的抽象範疇研究起，然後再不斷地轉而研究更複雜的且更具體的範疇。爲了說明資本主義現實性之複雜現象的內在聯繫，在

我們之邏輯的敘述中，我們有時使各部門與現實性發展之史的順序相分離；雖說有這些分離，然而研究之邏輯的順序大體上仍爲這現實本身之史的發展所決定。這在價值法則及其發展形態——生產價格之研究上，更明顯地表現出來：這裏，理論上研究所由開始的，正是史的發展所由開始的。

歷史所由開始的——昂格斯說——正是思維行程所應開始的，且其往後的進展也不外是採取抽象與理論上之徹底的形態的歷史過程之透明的反照；改善的，但係適應於法則而加以改善的反照，給其本身以真實的歷史過程』。

第二百二十四節 在社會價值中個別價值之 對等 額外利潤

在研究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時，我們曾說明在資本主義工業的諸部門間爲什麼會發生利潤率不同的原因，以及如何因各部門的競爭，資本之由這部門而到那部門的轉投替所有部門組成了一般利潤率。

但直至今刻，我們尚未說及存在於商品生產中的區別，以及在諸企業間每一部門內部的利潤率。

同時，同一部門的諸企業在不同的條件（不同的機械，技術方法，勞動習慣等等）下製成同樣的商品，諸企業化費在同類商品生產上的個別的勞動時間也不相同；同類商品之個別的價值（即化在其中的個別勞動）可以各不相同。然而同類商品的每個標式僅當作在該生產部門中所造成的商品總額之代表者，僅當作該部門的全社會勞動的一定部份之代表者而出現於商品經濟中。所以決定商品價格者不是個別的價值，而是爲化在該商品上的抽象勞動之社會——必需量去決定的

社會的（或市場的）價值。社會（市場）價值定義的本身因由單純商品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而更發展了。

如我們所已知，社會必需勞動決定於「在生產之社會普通的條件實現之下，在該社會的勞動強度與技巧的平均水準之下」（資本論，第一卷，4頁）為商品製造所必需的勞動時間。

假使在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簡單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各企業的勞動生產性與技術基礎的差異已被消除了的話；則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牠們於「生產之社會普通條件」的定義上，在社會必需時間的定義上有很大的作用。

假設在某生產部門中所有企業，按其資本的有機構成，按其勞動生產性以及按照其中所製成商品的個別價值，可以分為三種：勞動生產性最高的，最低的與中等的企業。怎樣的生產條件將是「社會普通的」且係決定該部門的商品之市場價值的？既然該生產部門的諸企業的商品，僅當作這部門的商品總量之代表而出現的，則社會的價值將依存於各企業的生產品在該部門的一般商品總額中之比重的。

假設，商品的大部份是由中等生產性的諸企業生產出來的，而最優的與最劣的企業的生產品則彼此相等；在這種情形下，社會價值將等於按照中等企業的商品的價值。

假使最大部份的生產品是在最優的或最劣的企業中生產出來的，則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及社會價值將近於最優企業或最劣企業的個別勞動與個別價值。最優企業或最劣企業的生產品在該部門的商品總額中所佔的比重愈大，則該部門商品的社會價值愈接近於這類的個別價值。當社會的價值不是與最優企業或最劣企業的個別生產品相接近，而是與之完全相吻合時，則特殊的配合也屬可能的。譬如在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中就有這種配合的地位。在那裏，由土地的壟斷作用造

成了土地的有限性，社會價值是由耕地之最劣的生產條件所決定的（在地租篇中將詳細地來考察這個問題，那裏將給社會價值學說的曲解以批判）。

這就是由這或那生產部門內部去決定生產品之社會價值的條件。

雖說社會必需時間以及社會價值已確定於商品生產中了，但只有在交換過程，經過這個和那個商品的生產者之殘酷的競爭，牠們才能表現出來。

資本家之殘酷競爭的結果，生產條件低於社會普通的企業不能不適應於其社會價值而出售商品，又因商品的社會價值低於這些企業的個別價值，故這些企業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遂低於該生產部門的平均利潤了。

反之，在某時期內生產條件優於社會普通的企業，因出售其商品而獲得高於其部門的平均利潤之增多的，額外的利潤。

生產性不同的企業的利潤率之不一致，又導引到最劣的與中等的企業，爲提高其利潤計，將力使技術改良。但因這種改良之普遍採用，又縮小了全部門的社會必需時間且降低了社會價值。此外，又改變了該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由此所決定的利潤率，以及該部門在其他工業部門間所佔的比重。同時，最劣的與中等的企業之採用改良，會使最優的企業失却額外利潤，——在其個別的價值低於社會價值時，爲他們所獲得的利潤。這促使各個資本家再次去引用最優的改良，這又給牠以額外利潤，一直繼續到這改良被普遍採用時爲止，等等。

所以在資本家的競爭過程中，不斷地進行着再次發生部門內部利潤率不等的對等，以及在一致的社會價值中各企業的個別價值之相等。

在部門內部的社會價值中個別價值的對等，在資本主義之史的發展上，是先於在各部門間的利潤之相等，即先於價值之轉化爲生產價

格而完成的。

假使個別價值在社會價值中的相等，僅須「在同種類商品的生產者間競爭之實現，以及他們共同去出售其商品的市場之實現」（資本論，第三卷，119頁），則這各部門利潤率之相等，如我們所已知，須有能保證資本之由這部門而到那部門的自由轉投之許多條件。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之最高的階段上，才能保證這些條件。

但如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史的過程上，個別價值在社會價值中之相等是前於各部門的利潤在統一的一般利潤率中之相等而發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上，這些過程是同時完成的且互相決定的。

第二百五節 關於馬克思—伊里奇底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學說的曲解之批判

我們已知，平均利潤的形成與價值之轉化為生產價格是商品生產之長期的史的發展的結果。

生產價格與平均利潤之形成的這種史的過程，被少數派的魯平所否定。依魯平，價值之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過程不是史的過程而是純邏輯的思維的過程。魯平以為，由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轉變，於馬克思是「理論的抽象，而非由簡單商品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之史的轉變的說明」（馬克思價值概要，第三版277頁）。且認為「在價值學說中，問題之理論的提法與史的提法之混同，不僅……無目的，而且有妨害」（前書，278—279頁）。

魯平以為甚至在連簡單商品經濟也完全不存在的那種情形下，馬克思由價值方面去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之法則的。

『假使史的問題——魯平說——已在否定的意思上被解決了，但

同時又證明，勞動價值論對於理論的思維之必需性……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牠在理論經濟學中保持爲牠現在所佔有的地位」（前書 78頁）

總之，魯平由史的方面切取了問題之『理論的』提法，與『邏輯的行程所由開始的，就是歷史所由開始的』昂格思的這種意見相反，魯平規劃了這樣的情形，由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轉變不是爲現實性本身的發展所指揮，而是爲研究者的方便，我們腦子的沈思所指揮的。

因而，他公開地反對馬克思與昂格思的這種意見：在商品生產發展之第一個階段上，價值法則作用於簡單的形態上，尙未採取利潤相等之複雜的過程。

否定價值轉化爲生產價格之實在的史的過程，魯平自己又否定了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實在的區別，這引導到中農的小商品經濟與富農的資本主義經濟之混同。魯平的這種提法與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主張相結合，且完全傾向於反對無產者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建設。

否定在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間的實在區別，轉化價值與生產價格爲純邏輯的範疇，魯平又否定了重分於資本家間的剩餘價值與平均利潤形成過程之實在的物質性。

『假使從事於生產的不同部門之二種資本之利潤的關係——他說——不適應於爲牠所採用的活勞動的數量的關係，那末這絕不是說，剩餘價值或剩餘價值的一部份之由這生產部門『讓與』『流入』那部門。基於馬克思的有些說話之字面的解釋，有時且爲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所允許的這種表象，是由於價值——握有流動性的物的本質，這種觀點推究出來的。然而，如果價值不是由這個人轉給那個人的物，而是『結晶於』『形成於』物中的，人們間的生產關係，則上述的關於價值之由這生產部門而到那部門之『流入』的表象不但不是由馬克思的價值論

中推闡出來，甚至根本與關於價值——社會現象的馬克思的學說相矛盾』（前書，259頁）。

同時，魯平又否定了平均利潤率與生產價格之階級的內容。依魯平，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並不體現出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而只體現出『在各部門的工業資本家間之生產關係』（前書，241頁）。

否定，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反映出在全資本家階級與全工人階級間之矛盾的魯平，想使工人由為本階級之根本利益，為資本主義之撲滅而鬥爭的當中退出。

在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的說明中，魯平承襲了老『同道』——考茨基。在其舊著『馬克思經濟學說』中，考茨基企圖把馬克思的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與關於平均利潤的學說切斷。依考茨基的說法，剩餘價值的學說指出在資本家與工人間的關係；關於平均利潤的學說則並非說資本家與工人關係而只指示出在互相競爭的資本家間的關係。

『我們——考茨基說——並非由利潤的法則，而是由剩餘價值的法則，認識了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馬克思經濟學說 6頁），

所以抽去了平均利潤（以及生產價格）的法則之階級內容的考茨基，把階級矛盾指引到在各資本家與各工人間的矛盾，把階級鬥爭指引到各個工人為微小利益而反對各個資本家的鬥爭。考茨基想使工人退出為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鬥爭，退出反對資本主義全體系的鬥爭。

魯平在與馬克思——伊里奇主義作反革命鬥爭的目的中，更發揮了考茨基的這些見解。

為想由生產價格中抽去階級內容，為想清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魯平直接由價值而非由如伊里奇所說為馬克思經濟學說之『三角基點』的剩餘價值去推論出生產價格。至於在價值與生產價格間的關聯，魯平建立了其關聯之這樣圖表：『勞動生產性——抽象勞動——

價值——生產價格——資本分配」（馬克思價值論概要，242頁）等等。在這圖表中，魯平完全忽視了剩餘價值，資本家階級對勞動階級的剝削。

魯平的所有反革命的概念的特徵，在乎，他把生產價格與價值瞭解作資本主義經濟之平衡的法則。

「如果勞動價值——魯平說——是適應了在各生產部門內的勞動之均衡的，那末，生產價格是適應於這些部門內的資本之均衡的」。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各部門間之均衡的條件」（前書247—248頁）

這裏觀念論的概念再次與以其均衡的法則去代替資本主義的矛盾運行的法則的機械論的見解相契合。

機械論者在其生產價格的說明中應用了這個「均衡的原則」。『生產價格的法則，——布哈林在其『過渡時期的經濟』中說，——是商品體系轉化為資本主義體系之均衡的法則』（1920年，129頁），

機械論者與觀念論者，均以生產價格給資本主義經濟各部門之均衡造成條件這種見解去紛飾資本主義，去掩瞞其矛盾。

事實上，生產價格的法則指示出，資本之由這部門而那部門的不斷的盲目的流動之不可免性，各經濟部門的比例性之不斷地破壞之不可避免性。對於比例性的傾向只有在其不斷的破壞中才表現出來。體現於生產價格中的深化了的階級矛盾，並非引導資本主義經濟到均衡，而是引導牠到滅亡。

而且這種「與馬克思主義當然沒有共同點」的，魯平，格洛孟，康特樂采夫等正當作與馬克思主義，與無產者專政作鬥爭的工具而利用牠的均衡論，也被上述事實所否定了。

第二十六節 論在『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間之歧異的意見

假使馬克思伊里奇主義理論的一個敵人——魯平，企圖以摧殘且偽造這理論之基礎的方法，抽取出其革命的本質，而同時又聲言「承認」馬克思主義；則別的敵人是企圖以責備馬克思的不徹底，極端矛盾的方法，去「毀壞」革命無產者的學說。

有一時期，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利用在馬克思的價值論與生產價格論間存在着不可解決的矛盾的說話而獲得大大的成功。

馬克思的價值論已為馬克思於其在世時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在其一般的形態上加以發揮了。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馬克思於第三卷中闡明之，第三卷尚未被他完成，且於去世以後，才由昂格思出版的。

『資本家』第三卷出版以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喬亞學者造成了一種奇談：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闡明了生產價格論且指明生產價格與價值相吻合的馬克思，處在與第一卷中為他所發揮出來的商品價格由價值去決定的那種見解之不能解決的矛盾中了。

布爾喬亞學者關於馬克思之「不徹底性」問題（尤其是『奧大利學派』的代表）寫了許多『教科書式的』解釋，「證明」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論撕破了其價值論及其剩餘價值論。這種解釋的目的是馬克思學說基礎之消滅，揭破階級剝削根基且預示其滅亡之前途的剩餘價值論之消滅。

事實上，在『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之間，在價值論與生產價格論之間的紛歧都不存在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批判過作如是想——資本主義關係摧毀了簡單商品生產的法則而且首先就摧毀了其價值法則——的人。

「如說，僱傭勞動的出現，——關於這點，馬克思說——摧殘了商品生產之真正意義——總之，是說：為使商品生產的真實性不被摧

殘外，牠不應再予以發展了』（資本論，第一卷，462頁）。價值法則……——他在同是第一卷中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恰好更自由地發展了』（前書，418頁）。

顯然，「生產價格」恰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價值法則「自由發展」的結果。

誰也不能如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法則指揮了價格的運行」即此，可以說明，為生產價格之基礎的是價值。而且在第三卷中與在其「剩餘價值論」中，馬克思詳盡地發揮了這種見解，且指出，全部商品之生產價格的總量是等於其價值之總量的。生產價格組成的因素（生產費與利潤）只有在價值的基礎上才能瞭解，因勞動生產性與商品價值的變化又變化了生產價格。

在價值論與生產價格論間的紛歧之闕如，曾為伊里奇所證實。當他注意到批判在「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間之「不可解決的矛盾」的那種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時，曾說：

「價格的追溯到價值與平均利潤的這種周知的且不可爭辯的事實為馬克思於價值法則的基礎上說明了，因……價值（社會的）之演化到價格（個別的）並非以簡單的，直接的，而是以極複雜的方法而進行的；顯然，在僅於市場上聯繫着的各形各式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規律性不外因這方面或那方面的個別傾向之互相追蹤而表現於中等的，社會的，大批的規律性中」（全集第十八卷21頁）。

「執着」為馬克思所承認的各工業部門的商品的生產價格之追溯到其價值之事實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有意地隱瞞着，馬克思仍係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去說明這些追溯的。當作流俗經濟學家的他們，只看到了個別的分離，不願意去看一看一般的規律性，如伊里奇所說，這種一般的規律性僅因「各個分離之互相追逐」而出現。

以同樣的方法去形成在『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間之紛歧的奇談的，皆以『摧毀』馬克思的關於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學說，關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剝削與階級矛盾的學說為目的。

這種理論已毫無困難地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所擊破了。

近幾年來，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在其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企圖復興關於在『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間之矛盾的奇談。從事這種企圖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社會派之代表（例如彼得萊Petry）及其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中的承繼者。

「反對價格（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分離，不會有反響的——例如社會民主主義者伯樂五泰說——問題僅在乎這裏給在嚴密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尚餘下多少地位」（現代經濟及其法則，32頁），

所以伯樂五泰與其他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相結合，力圖摧毀『在嚴密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由無產者手中奪去了其革命的武器——馬克思—伊里奇的理論。

第二百二十七節 在蘇聯經濟中的『利潤』與價格的問題

我們已知，剩餘價值的範疇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經濟的，勞動日之分為必需時間與剩餘時間的分類也消失了。同時，我們又曾指出，社會生產品之分為消費資金與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積蓄的資金之分類、對於蘇聯仍保有極大的意義。

第十七次黨大會曾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積蓄問題。這些積蓄之來源問題，對於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任務以及給國民經濟各部門造成新技術基礎、擁有很大的意義。

為了實現這個任務，蘇聯必需使每一經濟部門，每一企業所生產

出的，皆比用於本部門，本企業上的多些。這絕不排除着，剛相反，而是直接允許着，在某階段上，在某時期中，有取償於其他部門與其他企業而資助工業之某一部門，某一企業的必需性。

「不能以一時的場合，營利地去考察盈餘——俾殺黎奧諾維支說——盈餘應以幾年內一般國民經濟的立場取得之」（伊里奇主義問題，第九版26頁）。

由社會主義建設之一般的利益出發，由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政策出發，蘇聯以極大的資源投在生產手段之生產上面，雖說在其發展的某階級上，許多重工業的企業有時表示出而且現在還表示出無盈餘，「以一時的場合」說來。

但如以前、蘇聯的主要任務是重工業因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之積蓄而復興與發展的，那末現在、就提出特別的任務——重工業應爲自己造成社會主義積蓄的來源，除掉用在其本身上的以外，牠應給予物質生產品與貨幣手段之一定的餘額，以當作社會主義積蓄的資金，社會主義關係擴大再生產的資金。

俾殺黎奧諾維支曾以紡織工業爲例，證明以「一時的場合」去企求蘇聯企業盈剩之不可容許性。「過半數紡織企業——他於1933年一月中央擴大會議上說——前幾年皆是沒有盈利的，有一部份同志，當時想叫我們關閉這些企業，如果我們聽他們的話，那就怎樣呢？我們在國家面前，在勞動階級面前，做了莫大的罪過了，因我們解散了蒸蒸日上的工業了，當時，我們怎樣做的呢？稍待幾年，我們已見到所有紡織企業皆有盈的了」（上同）

以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利益的立場去企求盈利，不僅工業應該如此，大體上，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也應如此。

俾殺黎奧諾維支在其1933年一月的中央擴大會議的報告上曾指出

，在日下，並非所有的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皆有盈利的，因為「牠們爭扎於其有組織的建設中，差不多與爭扎於1920—1921年的工廠一樣……但過2，3年以後，牠們皆有盈利了，也如在1921年以後，我們的工廠有盈餘的一樣——這是毫無疑義的，以其在現階段上沒有盈利為理由，而拒絕幫助與維護，——這就在勞動階級與農民面前做了莫大的罪過了」。（前書，27頁）

傳殺黎奧諾維支的預言是這樣的意思，因他表示予以維護使之鞏固的集體農場，過二，三年就可呈現於眼前，成為有盈餘的了。

由上述的說話可以明白，反對對於盈利之營業的行程，對於各別的，暫時沒有盈餘的國民經濟的部門和企業表示資助，這決不放鬆為蘇聯企業之盈餘而鬥爭的問題。沒有盈餘的企業之維護，造成了能保證這些企業有盈餘的時間到來之條件，別的企业愈有盈餘，則對於更弱的企業之資助，愈有保證。

總之，為了蘇聯經濟之擴大為社會主義的再生產，應創造出超過為己耗損的手段之恢復所必需的，額外的資金，應創造「利潤」。

使用這個術語時，我們應隨時注意到牠的條件。在這背面所隱藏的生產關係，原則上與資本主義關係不同，在蘇聯沒有在字之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利潤，因在蘇聯沒有剩餘價值與剝削。

在各生產部門間生產手段與勞動之分配，在蘇聯是在計劃的程序中完成的，並非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那樣在擺動的利潤與價格的影響之下而進行的。

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凡於某時期內給更大利潤率的生產部門發展的特別快，因而資本遂加強地投入那裏去了。在蘇聯，各經濟部門間資源之分配，並非在這部門或那部門的利潤性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以社會主義建設之一般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我們已經知道，以

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爲出發點的無產者專政，以很大的資源提供於某時期內利得很少，有時甚至沒有盈餘的部門中去。

顯然，資本之由這部門而到那部門之盲目的流動，在蘇聯經濟各部門間利潤之對等，在蘇聯經濟中平均利潤率與價值之形成是不會發生的。

至於說到蘇維埃價格，則按其特性，牠們與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價格根本不同。蘇聯的價格不是價值法則及其變形——生產價格之體現者，而是計劃的，自覺的領導之工具。蘇聯的價格，是由無產者的國家在生產品原費之自覺的計劃的計算之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積蓄與提高勞動者生活水準之保證的必需性上規定。

在國民經濟計劃中，每年皆預定了生產品原費之減低之一定的百分數。

「在我們——傳殺黎奧諾維支說——於市場上沒有，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通常所發生的，價格之自由的形成，我們主要的，決定了麪包的價格，我們決定了工業品的價格。我們努力施行減低工業品的原費與價格的政策，努力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在市場上，不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普通所能看到的，這種特殊的程度，難道還不明顯麼？」（前書，105頁）。

中央關於集體農場員的與單個勞動的農民的貿易之進行的程序的決議案，曾規定，集體農場的，集體農場員的以及單個農民的貿易，按照在市場上形成的價格進行。

但這絕不是說，無產者國家處於旁觀者的地位且拒絕價格調劑，牠拒絕行政的調劑，但在其手中有經濟調劑之有力的槓桿。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上，社會主義的角部已「成爲全國民經

濟之集結統治的與唯一發令的力量』(傳記黎奧諾維支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的報告¹⁶頁)。在無產者國家的手中有價格的經濟調劑之特殊的可能性，國家由國營農場，且以契約的方法由集體農場與單個農民獲得之農產品之偉大的資金，牠即可以此去策動市場、去影響價格。蘇維埃國家的與合作社的貿易之開展，屯積與銷售事業之優良的組織，在價格之經濟的調劑中有極大的意義。集體農場之有組織的經濟之鞏固與行政的領導，這裏有很大的作用；以其物美價廉的生產品傳給國家的最先進的集體農場，在價格調劑中有偉大的作用。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少數派與在價格政策關係上的各形各式的有害者，由其主要的反革命的見解出發，都主張貿易之完全毫無限制的自由，盲目的市場關係之開展。以為蘇聯的經濟體系是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之變相。

『我們引用價格調劑的這種政策——康特樂采夫說——由在我們沒有市場及其價格形成之盲目法則的這種表象出發，對於上述政策還沒有客觀的先決條件，我們應任意地支配價格』。

所以，康特樂采夫把蘇聯市場看做為盲目的法則所支配的資本主義的市場，且極有害地把利於諾澂孟與富農的完全自由的貿易引進價格調劑中去。

在小布爾喬亞的壓力之下，盲目地擁護完全自由貿易之結合與提高價格的，右派的提綱按其本質是復興布爾喬亞程序的反映。如布哈林，即主張『市場的常態化』與按照區域確定麵包的價格，即提高麵包價格。

這種見解是由新經濟政策特性之根本瞭解的不正確，是由不明白新經濟政策、不但以自由貿易為前提、且以無產者國家之調劑作用為前提這一點上推論出來的。

布哈林的價格之『策動』——依俾殺黎奧諾維支的說法——不能不推演到蘇維埃價格政策之完全掃除，不能不推演到在市場上，國家的調劑作用之掃除，不能不引導到小布爾喬亞的盲目性之完全復興（伊里奇主義問題，107頁）。

由其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之不可能性的理論出發，由其主要的農民大眾之反動性的理論出發，由其農業之社會主義改造之不可能性的理論出發的托洛斯基派，按其本質，想把價格政策變成榨取且破產主要的農民大眾之工具。在理論上，可以在拍拉奧佛拉繩斯基的著作中之所謂『原始的社會主義積蓄的法則』做最明確的代表。他直接說起，以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把這瞭解作農民經濟）之榨取爲在蘇聯的積蓄之根源。托洛斯基派，由此出發，主張引用提高價格的政策，即會使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之瓦解的政策，當然也即會使資本主義復興的政策。黨給想分裂價格之國家調劑的右派機會主義的企圖，以及想利用價格政策以剝削農民的托洛斯基派的企圖以堅決的襲擊。

第二十八章 平均利潤率下降之趨勢的法則及其意義

第二百二十八節 平均利潤率下降之趨勢的法則 使下降遲緩的反作用的傾向

我們已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各資本家的意志與願望以外，給所有工業部門組成了一般（平均）的利潤率，其高度，除剝削率外，還依存於該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回轉之一般的速率。

隨因生產力增長的資本主義之發展，又提高了社會資本的技術水準。

隨全社會資本有機構成之提高又遲緩了其回轉的一般速率。但因資本有機構成愈高，及其回轉愈遲緩，而利潤率愈低，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增長難免引導到平均利潤率的下降。

平均利潤率下降的這一傾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反乎各個資本家的主觀願望而發生的。

不是每個資本家皆以提高其利潤為目的，皆以獲得額外（差額）的利潤為目的而採用進步的技術麼？當這種進步的技術僅為一個資本家所達到時，牠還不會改變全社會資本之有機構成（與回轉）與一般的利潤率的；但一旦這進步的技術被普遍地採用，牠就反乎資本家的願望地，不僅消滅了其差額利潤且促使全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之提高

(以及回轉之遲緩)與在社會上的平均利潤率之減低。如果每個資本家，以後又採用更進步的技術且又保證其獲得額外利潤，那末在這新的技術一普遍了以後，又會使社會資本有機構成再度提高，平均利潤率再度減低。

固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傾向，會碰到為曾使利潤率下降的同一原因所引起的障害。

首先，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一方面引起資本有機構成之提高及回轉之遲緩，同時，他方面又引起剝削率之增大，這在利潤率上所發生的作用恰好在共增大方面。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於利潤率上發生同方向之作用的，還有低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之低落。

此外，隨着勞動生產性的增大和不變資本的各個要素的生產上所必要的社會必需的全勞動量之相對的減少，而出現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機構，建築物，原料等之相對的低廉化，即不變資本諸要素之相對的低廉化，也是能够阻止平均利潤率的低落的。

『例如歐洲的一個紡績工在近代的工場上所加工的棉花量，比之從前的歐洲紡績匠用紡車所加工的棉花量，是以可驚的比例增大了。然而加工棉花的價值，却不曾與其量以相同的比例增大。關於機械及其他固定資本，也是一樣』。(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第十四章)。

不變資本諸要素的相對的低廉化，不僅阻止不變資本的全價值的增大，並且阻止資本的有機構成的增大。(因為「C」若減少， $\frac{C}{V}$ 自也減少，因之利潤率的低落，也會遲緩)。

在和這同一方向上發生作用的旁的許多原因中，馬克思又舉出了相對的人口過剩。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勞動者成為過剩，那些在大產業中投不進自己的勞動力去的人們，勢必擁向不靠着大量的粗笨勞

動者和低廉的工錢，就不能存在的一種極落後的產業部門去。擁有大的可變資本和較小的不變資本的這種落後的產業部門的存在，也會減低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的一般的水準，由此阻止利潤率的低落。

再如外國貿易的結果，也能够多少提高利潤率，當資本家從外國購進了比較低廉的不變資本的諸要素及生活資料且在這些國家高價出賣製品的情形，已經成功時，便是如此。

使平均利潤率的低落遲緩，或提高平均利潤率的根本諸原因，概如以上所述。然而這一切原因，無論怎樣阻止着利潤率低落的傾向，但不能完全的阻止牠。

馬克思關於這點，說道：「引起一般利潤率低落的那同一原因，同時又阻止牠的低落，使牠的低落遲緩，並且還喚起那使一部分麻痺的反對作用。利潤率低落的法則，並不因此而被揚棄，而只將作用弄軟罷了。要之，利潤率低落的法則，只是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並在長期間之中，當作表示確實的結果之傾向而起作用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第十四章）。

姑就事實證明，把那有提高利潤率作用的第一根本原因的對勞動階級的剝削的增大一事，拿來考察一下。剝削無論怎樣強化，而由總體的勞動者剝削得來的剩餘價值量之增大（如馬克思所說的「長期間的」），畢竟追不上不變資本增大的步驟，並且同時，也追不上這剩餘價值所分配於其中的總資本增大的步驟。

事實上剩餘價值量之增大，一方面依存於對各勞動者的剝削程度的增大，他方面則依存於受資本所剝削的勞動者的人數。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各勞動者的剝削程度，無論如何增大，那終不能填補機械對於勞動者的相對的驅逐，和分配於同一資本的勞動者總額的縮少

馬克思關於這點說道：「生產力的發展，在減少用來支付勞動的部分時，由於增進剩餘價值率而使剩餘價值加大：在減少用於同一資本的勞動總量時，就減少計算剩餘價值時用以乘剩餘價值率的其他因數，即減少勞動者的人數。每日勞動十二小時的兩個勞動者，縱令他們能够吃空氣過活，因之也不須爲自己作何等勞動，但總不能供給那與一日勞動二小時的二十四個勞動者所供給的相等的剩餘價值量，在這一點上，因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的增進，藉以彌補勞動人數減少的情形，還有一個一定不可超過的限界。因此，這個彌補，雖然能够妨碍利潤率的低落，但是不能夠揚棄牠的」。（資本論第三卷169—170）。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妨碍剩餘價值量增大的步驟（註）的諸原因，不管剝削程度如何強化，而一般的利潤率不因之加高，反而低落的諸原因，概如以上所述。

（註）我們在這種場合，還要補充一句的，就是關於增大利潤步驟的情形。因爲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般的利潤率雖然低落，而利潤的量，却沒有減少，反而增大着。

這些原因，同時也可以說明工錢雖然落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而利潤率低落的傾向，仍不停止的理由。因爲照馬克思的注意，在勞動者人數減少下的利潤率，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縱令勞動者能够吃空氣過活，仍不得不低落的原故。

至於說到不變資本的諸要素的低廉化，則這種現象，也不能夠完全揚棄資本的有機構成的高度化，和利潤率的低落。資本主義的現實的各種事實，表示出不變資本諸要素的價值的低落，趕不上分配於每一勞動者的機械，建築物，原料等量的增大的。今日一啓羅格蘭姆的棉花，因爲價值低落的原故，如果說比之歐洲「紡績匠」用紡車紡績的時代，更要便宜的話，則在今日由一個紡績工所加工的棉花之啓羅格蘭姆數，比每一啓格蘭姆的價值的低落超過得太多了。

平均利潤率低落的傾向，也不被由相對的過剩人口所引起的反作用的傾向所揚棄。相對的過剩人口——這是剛剛發生利潤率低落的傾向的，由機械驅逐勞動者的單純的表現。這伴隨的現象，不能揚棄根本的事物，這是明白的。

如由外國貿易的結果，增大利潤率的這件事來說，這也是無論如何，不能揚棄根本的傾向的。因為『外國貿易自身，一方是使本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達，因而使可變資本的量小於不變資本，他方則引起對於外國市場的過剩生產，隨又引起反對的結果的原故』。（資本論第三卷163頁）。

由此，我們曉得，阻止某種程度利潤率低落的諸原因，不過是產生一般利潤率低落傾向的根本的力的純單的「一個反面」。因此，不是將這個傾向「滅絕」，單是「軟弱」牠的作用罷了。

第一百二十九節 利潤率低落的傾向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矛盾的發展

如果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發展，必然引起一般利潤率的低落，那就是說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分配於同一資本的利潤額，會日益減少的事實。即，如果一般利潤率為一五%的場合，而對於一萬元的資本獲得了千五百元的利潤，那麼，在一般利潤率低落到一二%時，對於同一資本所分與的利潤，已非千五百元，而是千二百元了。

然則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各資本家不是因所得的利潤的量，日益減少，而要成為相對的貧乏麼？（註）

（註）我們在這裏，不必提及差額利潤，因為牠的實現是一時的現象且在牠消失以後，一般的利潤率早晚要低落的。

各資本家的所有的資本量，如果不能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仍舊保持牠原來的數量，的確是要變成那個樣子的。但是在現實上，却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已經知道，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必然發生的事情，是資本的集積與集中，即各個資本的量之增大，和資本到少數人手中去的集中。結果，各個資本家對於自己資本的每一元所得的利潤雖少，然對於自己的總資本所得的利潤，現在比從前就多得多了，因為構成他的資本的元數，由資本的集積，集中的結果，大大地增多着。例如有一萬元的資本家，如在平均利潤率爲一五%時，得到千五百元的利潤，那麼，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利潤率雖然低落到一二%，而他的資本却已超過了一萬元，而爲一萬五千元。這時候，儘管利潤率低落了，他所得的利潤總額，却有千八百元，即比從前增加了三百元。

利潤額的這種增大，我們不僅在增加自己的資本量的各企業中看得見，就是在總體的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看得見。因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儘管機械對於勞動者有相對的驅逐，而勞動者的總數却是絕對的增大，由他們所形成的剩餘價值總量，因剝削強化的結果，日益增大了。

這樣，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所看到的一般的利潤率的低落，由於剩餘價值量的增大，即由於對社會的總資本也能得到的，對各資本家所增大中的資本也能得到的利潤量之增大，多少都是可以彌補的。

但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特徵，就是對利潤的無厭的欲求。

資本主義越發展，利潤率越低落，於是各資本家爲要增大利潤額，多少填補一般利潤率的低落起見，勢必更加要增殖他的資本。

所以，利潤率的低落，至少是強制資本家增大自己的資本量的，換句話說，是強制資本家加強資本蓄積的步驟的。

但是，如果資本家的無厭的利潤追求，使他傾全力於盡量快而且多的蓄積，那蓄積的自身，也是基於技術和資本的有機構成的高度化而顯現着的。然而那不就是說的將來的利潤率底落麼？不是說在將來，剩餘價值量的增殖速度要比資本的增殖速度落後麼？

然而，資本的積蓄自身，首先就是由新形成的剩餘價值附加於資本而顯現着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隨着蓄積的增進，致剩餘價值量的增大成爲相對的緩慢，那末將來的蓄積的步驟，也一定非緩慢不可。

所以，我們看到，一方利潤率的低落，要強制資本家加強積蓄的步驟，他方，這個低落又會阻害積蓄的步驟。這便是橫陳於利潤率低落的法則中極重要的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由於資本的集積和集中引起小企業的滅亡，遂至加強起來。

小所有者的收奪，如我們所知，雖是加強積蓄的可能性的，但同時由於保障將來的技術發展，也會引起將來的利潤率低落，和積蓄步驟的緩慢化。

馬克思關於這點，說道：「利潤率的低落和積蓄的增進只是同一過程之不同的表現，因彼此皆係生產力發展的體現者。積蓄，因其爲勞動的大規模的集積與較高度的資本構成所決定的，故又加速了利潤率底落的趨勢。一方面，利潤率的底落，又促進資本集積的趨勢；故又收奪小資本家們的所有，並在直接的生產者之中，對於那些還有一點可以收奪的殘餘者實行收奪，藉以促進資本集中的趨勢。他方面，蓄積率雖與利潤率同時底落，然由量的方面去考察時，則積蓄因而加速了」。（資本論第三卷165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着利潤率的底落，不僅現存總資本的蓄積

步驟，變得緩慢，就是新的資本的形成，也變得困難。

實際上，任何資本，爲要能夠充用於生產，非達到某種量不可。隨着技術的發達和利潤量的低落，資本的最少額——低於此就不得充用於生產且不能提供充分的利潤量於牠的所有者——因而增大了。未達於這個量的資本，都是『過剩物』。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使「過剩資本」和無用途的資本都投閒置散的原因，即由於資本的集積與集中，以及機械驅逐勞動者的原因，就生出不能發見用途的過剩人口。這也是表示在利潤率低落的法則上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之深刻的矛盾的。

這一切矛盾的本質如此：資本家的無厭足的利潤追求，與離開他們的意志而發生的利潤率的低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雖然喚起了生產力的急速的發達，然而這種的利潤追求與平均利潤率的低落，是阻止生產力的發展的。這些矛盾的本質歸根結蒂仍包含在生產社會性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中。

利潤率的低落，促使資本家更加施以新的技術的改良，爲的，不僅要靠資本的增大去彌補利潤率的低落。並且要靠差額利潤的取得去彌補利潤率的低落。因新機械的採用所引起的結果，還沒有完全用盡的舊機械就變爲時代落後，所以不到一定的年限，就成了廢物，這件事，就是降低已存的資本價值，抑止利潤率的低落，且因此促進積蓄的一個助力。但是我們知道，同時，新機械的採用，早晚要將社會總資本的有機構成高度化，要降低利潤率，因而使積蓄速度，又緩慢起來。然而，那又引起新的技術的進步，並資本的新價值低落等等。

照這樣，被實現出來的生產力的發達，必引起使用價值，即人類必要物的量之可驚的增大。使用價值的這種增大，形成便於人口增殖的，更完全滿足其消費的前提條件。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生產出

來的使用價值，又只是便於增殖價值，取得利潤的單純的一種手段。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方是形成人口的增加與完全滿足其消費的前提條件，同時由於剝削廣大羣衆的生活資料，把他們編入於豫備軍。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越是大量的生產，同時便加強對於勞動者的剝削，限制勞動階級得以自己的勞動買得到的生產物之量。

但是，由於一方增大使用價值數量，同時又限制使用價值的使用可能性，資本主義就形成爲發展生產力的新的障礙物了。

馬克思說：『既然資本的目的，不是滿足種種的必要，而是利潤的生產；既然資本爲達到這個目的，不依靠使生產規模適合於生產量的諸方法，而只是依靠相反的諸方法的，所以，在立腳於資本主義之上的被局限的消費範圍和想超過這種自己內在的限制而前進的生產之間，必定常常發生一種衝突』。（資本論第三卷176—177頁）177。

『和使勞動者人口在現實上增加的各種刺激並行……，產生那只是一種相對的過剩人口的諸原因，也同時的起作用。

利潤率一低落，同時就增大資本的量，同時又減少既存資本的價值。然而這個價值減少，同時又阻止利潤率的低落，而給資本價值的蓄積以一個促進的刺激。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資本構成的高度化，也隨之進展，而比之不變資本部分，可變資本部分之相對的減少，就進展起來』。（資本論第三卷171頁）。

表現於利潤率低落的法則中的這一切矛盾，並不一定是同時而且在同樣程度上顯現的。如將來我們所說的一樣，這些矛盾的積集會引導到時復一時蔓延於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主義之週期的停頓，生產過剩的危機。爲資本主義矛盾之有力解決之表現的危機的，又引導到其深化。顯然只有因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方法

的毀滅，才能消除這些矛盾。

所以，馬克思說，利潤率降低的法則『證實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有限性，歷史性，和過去性。即，那是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不是生產財富的絕對的方法，簡直一到某階段，就和財富的更前進的發達相衝突的』。（資本論，第三卷165頁。）

表現於一般利潤下降之傾向中的所有這些矛盾，在蘇聯經濟中是沒有的。蘇聯之社會主義的革命已肅清了在生產社會性與私的佔有間的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推動力不是追逐利潤。因而在蘇聯沒有平均利潤，也說不上其下降了。所以，在蘇聯沒有在生產力增長與利潤率下降間的矛盾。由於社會主義體系勝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優越性，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遠非為資本主義經濟——即使在其最好的年頭——發展的速度所能企及。蘇聯的處在社會主義的關係之基礎上的生產力之增長，並非引導到大眾消費能力之有限及其貧困化，而是引導到大眾生活水準之提高及其消費性之增長。

新 出 版 書 目

北 平 寒 微 社 印 行	書 名	譯 者 著	定 價
	政治經濟學(第八版) ①	拉奧二氏著 陶達譯	\$ 1.80
	政治經濟學(第八版) ②	(譯 述 中)	
	重 農 學 派	魯平著 陶達譯	\$ 0.40
	德 茵 夢 湖 文	Ion Sun 編 註	\$ 0.95
	英算試題集解	寒 微 社 編	\$ 1.00
	奧大利學派的經濟 學說及其批判	勃流名著 (譯述中)	
好 望 書 店 印 行	新 經 濟 思 想 史	魯平著 陶達譯	\$ 1.00
	馬先爾經濟學說及 其批判	勃流名著 陶達譯	\$ 0.50
	現代國際政治講話	陳 豹 隱 著	\$ 0.90
	比 較 憲 法	章 友 江 著	\$ 1.50

正 誤 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13	5	11	級	段
13	25	26	須	瓊
38	23	17	Vcoal	Vocal
72	1	6	發的	發展的
82	1	7	估	估
96	12	8	值	物
100	22	6	殊	珠
105	11	19	經	經濟
132	21	2	W,	W ₁
144	節目(二十五節應改四十三節)			
160	22	13	(利益	利益(
215	25	5	社	社
218	7	18	間	集
220	節題		動勞	勞動
254	(第20行與21行對調)			
286	22	11,12	出供	供出
370	節題, 2		喬的	喬亞的

拉奧二氏 政治經濟學

(第八版) 陶達譯

廿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第 I 册定價壹元八角



北平虎坊橋 No.114

寒微社印行

北	經	售	處	地	址							
平 市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課	沙	灘	漢	花	園
	景	山	書	社	景	山	東	街				
	新	智	書	局	東	安	市	場	內			
	君	中	書	社	西	單	商	場	內			
外	上	海	民	智	書	局	河	南	路	九	十	號
	廣	州	民	智	書	局	永	漢	北	路		
埠	各埠大書局											



\$1.80